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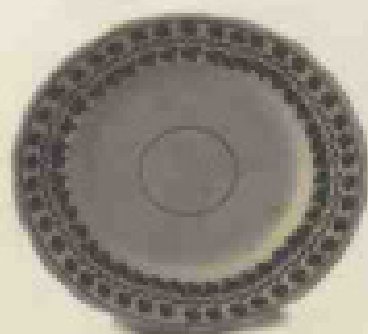
廣府海韻

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ZHUJIANGWENHUAYUHAISHANGSICHOUZHILU

珠江文化
丛书

谭元亨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珠江文化

廣府海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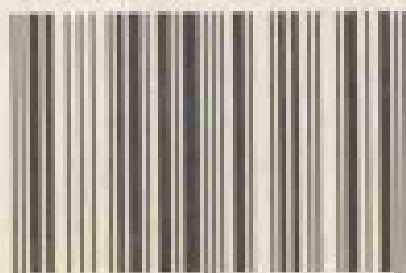
珠江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專輯

与海上丝绸之路

ZHUJIANGWENHUAYUHAISHANG
SICHOUZHILU



ISBN 7-80653-264-1



9 787806 532645

责任编辑：胡开祥 / 封面设计：郭 琦

ISBN 7-80653-264-1/K·8

定价：98.00元（4册）



廣府海韻

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

ZHUJIANGWENHUAYUHAISHANGSICHOUZHILU

谭元亨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专辑/陈永正等编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1. 11

ISBN 7-80653-264-1

I. 海... II. 陈... III. ①海上运输-丝绸之路-研究-广州市②海上运输-丝绸之路-研究-雷州半岛
IV. K29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0434 号

责任编辑: 胡开祥
封面设计: 郭 炜
责任技编: 刘振华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 travel - publishing. com](http://www.travel-publishing.com)

广东旅游网

[www. gdtravel. com](http://www.gdtravel.com)

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环城西路 45 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60 印张 1200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定价: 98 元 (4 册)

珠江文化丛书

顾 问：程良洲 陈毓铮 周 义
张 磊 管 林 朱崇山
总 编：黄伟宗 胡开祥
副总编：洪三泰 谭元亨
戴胜德 罗康宁
邓国伟 刘斯翰

本书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联合组成的广东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和开发项目组进行的系列工程之一。

内容提要

《广府海韵》是《客家圣典》的姊妹篇。

《客家圣典》出版三年，年年再版，创学术著畅销纪录，以其独到、精辟的见解，富于哲理与诗意的文字，深得广大读者欢迎。

作为其姊妹篇的《广府海韵》，更是第一部广府文化的学术专著，以其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创见，如海洋文明、海上丝绸之路对广府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广府文化定型、演变的历史分期，广府文化在中华整体文化中的作用与地位，等等，均是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府人所关注的。

作者谭元亨，原籍顺德，出生于四会，毕业于武汉大学，现系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出版有文史哲著作 70 余种，2000 余万字，先后赴欧美、亚非多国讲学，其作品有的被译为英、法、日、韩等多种文字。

多学科交叉的立体文化工程

——《珠江文化丛书》总序

黄伟宗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一个地方的特点，从总体精神上说，实则是文化特点。其特点的形成，是由不同的地理条件（尤其是水的条件）和气候条件，使得人们有不同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长期造成的不同的精神意识、思维方式、人情风俗和道德观念等等。这些属于文化范畴的特征，既决定着又体现于每个国家、每个民族、每个地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实体、措施与形态，以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研究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研究中。正如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说：“要了解艺术家的趣味和才能，要了解为什么在绘画或戏剧中选择某部门，为什么特别喜爱某种典型，某种色彩，某种感情，就应当到群众中的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中去探求。由此我们可以定一条规则：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就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根本原因。”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文化时代，即是改变了过去只是以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去认识和把握一切，代之以从文化意识与方式去认识和把握一切的时代。西方各现代文化学的兴起，学派林立，形成热潮；中国的“文化热”也从文艺创作而蔓延于各行各业、各种学科、各个地域、各个地方，以至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其中，水流地域文化研究，如：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黑龙江文化等的研究，正在方兴未艾，这是一种很值得

注意的动向，是一个很有意义、很有前途的领域开拓。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将会给每个水域总体特征作出科学的解释，找出其历史、现实和将来的契合点，并以多学科的并行和交叉研究论证的方法，将其科学化、综合化、立体化、实用化，使其可作为决策的依据或出发点。

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时代潮流和需要，于1999年6月28日在广州正式成立。宗旨是研究与弘扬珠江文化。因为珠江是中国的第三大河，其水域文化铺盖整个华南和南海诸多港湾和群岛，在中华民族历史和现代的文化上有重大贡献和重要地位。按照当今国内公认的水域文化理论，当某种水域文化形成之后，除覆盖其本身水域之外，还覆盖其周边地区。由此，珠江文化的覆盖地域，不仅是作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汇合为珠江的西江、东江、北江的各流域地带，还包括韩江流域的潮汕地区，包括湛江雷州半岛，包括南海诸岛、北部湾和海南岛；如从水流的源头而言，除西江流经的广西之外，尚有西江的源头云南、贵州，北江的源头湖南，东江的源头江西，韩江的源头是福建省等，可见地域广阔，水量丰富，文化组成成份非常多样而复杂，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又极其曲折坎坷，在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中的发展又极其迅速。以珠江文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不仅是应时之需，而且是天地广阔，前景无限的。

珠江文化有着明显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多元性和兼容性，这特点似乎与珠江是多条江河自西、北、东之流而交汇的水态有关，是多元而后交汇聚兼容于一体之中；从历史上说，由土著的百越文化与来自五岭以北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以及来自海外的古希腊文化、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的先后结合与交融；从当今的珠江水域的文化类型而言，除此较明显的粤文化地区有着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新起的深圳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移民文化之外，尚有可称之

为珠江亚文化的滇云文化、黔贵文化、八桂文化、海湾文化、琼州文化等等，都是多元而兼容于珠江文化的范畴中。其二是海洋性和开放性。珠江的总体形象，既是交汇型的，又是放射型的，它既像是蜘蛛网似的覆盖于整个水流地域，像是多龙抢珠似的争汇于其中交汇中心（广州），而其中心又像是一颗明珠，每条河流又像是道道明珠的光芒那样，向四面八方喷射。特别是珠江有众多出海口，即许多所谓“门”，如：虎门、崖门、磨刀门等等，仅珠江口就有8个门；沿海港湾和港口甚多，也都同珠江水系密切边接，所以，从古至今是由陆路、沿海与海外的交通与交流枢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在此进发，而且数千年不衰；大量移民由此散布海外，海外文化也由此最早涌入，所以，海洋文化与开放意识是特别强的。其三是前沿性和变通性。由于珠江文化水系与海洋密切边接，海港特多，对西方和海外文化接收特快特多，因而前沿性也特强；另一方面，因与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中原文化，地理距离较远，又有以五岭为代表的崇山峻岭之隔，交通不便，由此而受其控制偏少，同时也由于中原文化在这一带与海洋文化及本土文化碰撞的缘故，也就造成了相接于前沿性的变通性。此外尚有其他特点，在此不一一列举。仅此可见，对珠江文化特点的研究，以及将这样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决策依据，转化为科学规划的文化产品，都是大有作为的。

本着研究与弘扬珠江文化的宗旨，广东珠江文化研究会组织了著名的文化学家、文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民俗学家、地理学家、海洋学家、气象学家、建筑学家、生物学家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著名的作家、编辑家、新闻出版家等，分别组成学术委员会、创作委员会、影视和新离出版委员会，既分工而又交叉地进行珠江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多学科交叉的立体工程去进行。为此目的，我们依靠和组织各种力量，撰写、编辑、出版《珠江文化丛书》。这套丛书

分为四个系列：一是文化定位系列，汇编多学科专家对某个地方或某项历史文化（如：海上丝绸之路、古广信文化、南雄珠玑巷文化、曲江南华寺禅宗文化等）的研究成果；二是文化诗文系列，汇编古今名家描写各地历史风光的诗文；三是报告文学系统，主要反映某项历史文化源流或某地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新成就，并以现代文化视角观照其文化内蕴与文化渊源；四是知性之旅系列，以大型文化散文的写法，将每个地方或某项历史文化圣地的自然风光、人文历史、世俗风情的特点和文化底蕴，形象地描绘出来；五是文化旅游系列，以文化意识介绍各地风景名胜古迹，解读其古今文化品味，图文并茂，文化性与实用性融于一体；不仅有雅俗共赏的文字介绍，尚有为旅客提供衣、食、住、行的向导图文，读之生动有趣，又很适用、实在，有导游价值，又有收藏价值。这套丛书，由各地市县有关部门或企业支持协助，由广东旅游出版社陆续出版。

2001年元旦于广州中山大学

目 录

总 序	黄伟宗
前 言 寻找珠江的文化品格	1
导 论 海上丝路与海洋文明	5

上篇 源流篇

第一章 珠江流域概观

第一节 “山海经”	27
第二节 地理环境与文明演进	28
第三节 气候与人	33

第二章 民系源流

第一节 作为民系底色的“百越”人	37
第二节 汉越杂处中的越化	42
第三节 民系的“汉化定型”	46
第四节 汉民族色彩的强化（一）	50
第五节 汉民族色彩的强化（二）	53
第六节 水与七著	56

第三章 珠江文化区域构成

第一节 流域概述	61
第二节 珠江文化的代表——广府区域的形成	63
第三节 广府中心区：珠三角	66
第四节 广府南区：四邑	70
第五节 广府西区：西江走廊及其他	73

第六节	华人文化圈中心：香港	76
-----	------------	----

第四章 珠江民性

第一节	史籍评述与宏观把握	82
第二节	商业精神与价值取向	86
第三节	海洋的赋予	89
第四节	务实观与世俗性	92
第五节	边缘文化与民性	95

第五章 珠江文化历史发展阶段

第一节	中华整体文化演变中的珠江文化	98
第二节	番禺期——中原文化动荡中的“缺席”	104
第三节	广信期——中央一统的汉化定型	112
第四节	广州期——来自亚洲文化的激活	124
第五节	珠玑巷期——国运衰落时的心理强化	131
第六节	穗港期——世界文化碰撞中的异军突起	145

第六章 文化质态的落差

第一节	三大民系文化的比较	155
第二节	寻求文化研究中的“法理”	163

第七章 珠江文化的海洋基因

第一节	人的海洋文化特质	170
第二节	海上商业文明	173
第三节	作为海洋文明的经典	181

下篇 文化篇

第一章 思想文化

- 第一节 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代表人物·····193
 - 一、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思想轨迹·····193
 - 二、道教思想在华南的成熟与定型·····198
 - 三、佛教思想在珠江流域的中国化进程·····206
- 第二节 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代表人物·····216
 - 一、近代思想文化的“龙头”·····216
 - 二、“官商”与“民商”对立
 激溅出的思想火花·····225
 - 三、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233
 - 四、不断推进的民主革命思想·····240

第二章 文学

- 第一节 “开吾粤风雅之先者”·····252
 - 一、汉魏六朝诗歌之兴·····252
 - 二、“文化北伐”后的寥寂·····256
- 第二节 “中原诗风”的滥觞·····261
 - 一、危难催发的诗歌·····261
 - 二、现实主义的力度·····266
- 第三节 近代文学的光焰·····272
 - 一、民族危亡的呐喊·····272
 - 二、学者与诗人相映生辉·····278
 - 三、思想家与作家集于一身·····281
 - 四、大师级人物呼之欲出·····283
 - 五、客籍作家群落·····290
- 第四节 现当代文学新一页·····297
 - 一、早期诗歌与散文的特征·····297

二、向现实主义转化	302
三、愤怒出诗人	309
四、长篇小说的崛起	311
五、走向大气与成熟	316

第三章 艺术

第一节 古代民间说唱	319
一、木鱼书与龙舟歌	319
二、南音	323
三、粤讴	326
第二节 粤剧与粤曲	328
第三节 广东音乐	333
第四节 客家山歌、潮汕英歌	337
第五节 电影艺术	340
第六节 岭南画派	345
第七节 建筑	347
第八节 民间艺术	352

第四章 民俗研究

第一节 民俗的传承与变异	357
第二节 从节日民俗切入	360
第三节 重要民俗剖析	367

第五章 方言

第一节 两广的官话：白话源起	373
第二节 白话中的海洋腥味及其古汉语、壮语的“根”	378
第三节 外来词的融合	382
第四节 白话的语言特色	386
第五节 客方言、闽方言	389

第六章 珠江文化新质论

第一节 大众文化与文化生机····· 393

第二节 文化的产业化走向····· 398

第三节 文化的激活····· 402

跋····· 407

前言：寻找珠江的文化品格

我一直在思索着珠江的品格。

无疑，黄河是粗犷的、豪壮的，充满了阳刚之气。与其伴生的中原文化，有如山一般地厚重、挺拔，所谓“仁者乐山”。历代云“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由此被称之为“北人”，也总是义气当先，仁厚为怀，拔剑击筑，气吞山河。这是华夏文化的主轴，是文化当中父执式的形象。说黄河是母亲河，还不如说其更具有父亲威严、矜持、大气的、热烈的品格，始终在一部中国文化史中显示其作为父执的权威。

而长江呢？长江蜿蜒而下，出三峡后江面平阔，虽说少不了洪患，但被视与之伴生的江南文化，却是若水一般柔媚、清丽，亦有“智者悦水”一说，人称有阴柔之美。柔能克刚，江南人机智、灵巧，不乏市俗的狡狴，有纯美的散文，也有小巧的杂文，多的是文人骚客，他们被叫作“南人”，精明、机巧、锱铢必较，心细眼疾。这反而有几分当母亲的意味，温柔、亲切、重感情……难怪有人说，南人是当年随晋室南渡的衣冠士族的后裔，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却始终带有一种忧戚，以及积弱造成的自失……

那么，珠江呢？林语堂称，这里是“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

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当然是这么一位文化人的直观形象，可真正要完整、准确地、而非以偏概全的话，珠江赋予这“另一种中国人”的品格，恐怕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

因为，这明显不同于北人的保守，也更不同于南人的柔弱，他们开放、进取、豁达、威猛、勇敢、豪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面对惊涛骇浪而毫无惧色……

这么多年，我都带着这样的问题，在思索珠江的品格。

及至重返广东 10 年，并着手写这部珠江文化专著多年，阅读数千种典籍，跋涉两广的丛莽激流——正可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我才找到答案，一个比较完整的、贴切或中肯的、且颇为雄辩的答案。

显然，在珠江流域，这个中国正南方最大的水系所在地，三千年间，所上演的正是一部雄浑悲壮的……“山海经”！

这里，有来自中原呼啸的山风，秦汉几度大军南下，正是厚重、强大的汉文化，使这里的文化被凝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造型，可以说，秦汉之际，正是珠江文化的“汉化定型期”，因此，从一开始，珠江文化便注入了黄河来的粗犷、豪迈与阳刚之气，热烈而又大气，威严却又生猛。有如大山一般仁厚、峻拔，巍然屹立——这可以说是珠江文化的“山经”，是呼啸的山风迅猛地送来的，给了一条山一般的坚韧、峻嶒的脊梁，牢牢地支撑起了这么一部文化的历史。这是珠江文化之所以作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证明。这部珠江文化的专著，正想以严密的逻辑以及生动的形象，来证明这一点。

然而，这里面对的却是浩淼的大海，更有着亿万年海风的滋润，广州，更是三千年长盛不衰的古港——她比欧洲的海港都古

老得多，因此，更具备有海洋文明的老资格。黑格尔称中国没有得到“海洋文化的赐与”，只是看到当时中国的闭关锁国，却没见到这三千年辉煌古港的历史。正是海洋，唤起人们冒险的精神，迎接挑战的欲望以及寻求彼岸的雄心——这便是林语堂所看到的“另一种中国人”的品格：男子汉的风格，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等等。而海洋文明的核心，便是商业贸易，珠江流域，当年更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当年汉武帝第一支驶往世界的船队，便是在这里出发的，而这里的众多名城的格局，都是以商业为中心的，而非北方都市那种炫耀帝王权力的中轴线。外来宗教，更大都是在这里登陆，影响并改造着古老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到了近代，推翻千年帝制，创建民主共和，更是作为海洋文化——也是一种先进文化所起的作用。到了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人们惊呼的“文化北伐”，说的正是珠江文化挟三千年海洋文明的传统，汇合当今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成果，浩荡北上，从而大大地改变了已有的文化格局，从根本上重塑或改造我们的国民性。

可以说，中国文化，如果没有珠江文化便是残缺的，或者更进一步说，如果中国文化只被视作农耕文化，而忽略了海洋文化，那便是不完整的。珠江文化是当今再造中华整体文化中必不可少的内驱力。

凭此，我们终于可以认识到作为珠江的文化品格了——

它既有粗犷、豪迈的阳刚之气，又有豁达、进取的冒险精神；它刚柔相济，精明、灵活却又不失大度；它决不封闭自己，无时无刻没在敞开自己宽阔的胸怀；它好学多动，永远生猛，充满朝气；它乐观上进，决不无病呻吟、顾影自怜……

还可以说很多很多。

也许，还是林则徐的名言，多少可作概括：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是的，它非父执，亦非慈母，却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如林语堂所言，由山来浇铸，用海来淬火，方坚韧、锃亮，万古常新！

这就是珠江的文化品格！

导论 海上丝路与海洋文明

河流与海洋，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文明的故乡。世界第一大河尼罗河，就孕育了自公元前 3000 年的古埃及文明；而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则哺育了约公元前 2000 年的巴比伦文明；地中海的水域，更先后发育起约公元前 1000 年开始的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这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的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华夏文明。

华夏文明自可追溯到公元前两三千年，过去，一直是以中原为其发祥地，所以，黄河也就理所当然成为华夏文明的母亲河。随着历史的发掘与视野的扩度，长江也进入了华夏文明的发祥地，黄河文化与江南文化并驾齐驱。而随着对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研究与发现，濒临南海的珠江文化，也以其鲜明独特的个性，进入了华夏文明之列。正如著名的史地大师谭其骧所称：“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因此，华夏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毋庸置疑的，任何一方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珠江文化更以其独有的地域性以及开放色彩，更在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占有无可替代的一席之地，对华夏文明有着卓著的历史贡献。

如何给珠江文化定义，是任何一部专著必不可少的首要问题。当然，第一是确定其流域范围，它是以西江、北江、东江及珠江三角洲网河组成的珠江水系，流域面积达 45.37 万平方公里（在我国境内为 44.21 万平方公里，余者在越南境内）。其北以五岭及苗岭与长江流域分界；西南则以乌蒙山脉与红河流域的元江

及长江流域的牛栏江为界；南部以云雾山、云开大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与两广沿海诸河分界；东部则以莲花山脉、武夷山脉与韩江流域为界；东南则是各水系汇聚、注入南海的珠三角。整个流域跨越滇、黔、桂、粤、湘、赣及港、澳8个省区。但主要区域则在粤、桂，并含港、澳。换句话说，正是古代的“广府”范围，以广信为界，以西为广西（桂），以东则为广东（粤）。早在公元264年，吴景帝永安七年，东吴为了便于治理，把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个郡从交州划出，另设广州——此“广州”，则为今两广大部。到了宋代，则有了广东路、广西路之分——其行政制度分路、州、县三级。

也就是说，作为珠江流域的主体地区，正是两广，亦即广府。这就是没有疑义的。

同样，珠江流域内，各种文化异彩纷呈，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全流域人口约近2个亿，其中，汉族占近80%，少数民族占20%，其中人口超过百万的少数民族有10个，有苗、彝、壮、布依、侗、瑶、白、土家、哈尼、傣族、故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这也就决定了珠江文化的多元性与复合型。因此，我们决不可以忽略其中任何一元，象傣族泼水节、苗族龙舟节、踏花山、芦笙会、壮族“三月三”……都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汉族中，也有广府、客家等民系之分。

承认多元性与复合型，并不等于否认作为一种文化，总有其主流或主导的一面，尤其是所占区域之广、所占人口之众所具备的文化，当是这种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部——毫无疑义，这便是覆盖两广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广府了，也就是说，广府文化当是珠江文化的主要代表或主流，这是不会有异议的。

地域的主体、人口的主体，构成珠江文化的主体。那么，我们便不难给珠江文化下如下的定义，就是在北回归线上陆海相连处，在汉越民族长期交流融合过程中，以珠江流域为界的历久不

衰的多元性、复合型的文化。而其主流文化，则是其主要区域广府（两广）文化。

有了比较科学与严格的界定，我们才可能着手进一步的研究。

而珠江文化，与岭南文化则有相区别，又相交互。珠江文化，从流域角度而言，很难包含海南及韩江流域——潮汕民系所在地；岭南，则无法与滇、黔相联系。这也是应该有所说明的。而岭南文化的研究，总是突出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不是说珠江文化只着重于广府不多涉及客家、潮汕，但长期以来，由于界定的模糊，把广府文化作为一个主体、一个独立的单元，重点拿出来研究，机会似乎不多，每每给大而化之。所以，这次趁研究珠江文化的机会，把广府文化突出出来，作为珠江文化的主流加以全面的考察、分析，该说是顺理成章了。当然，我们同时并不排斥对客家、潮汕民系文化的进一步研究。

其实，广府文化，同是珠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主体。广府文化的特质，同样是二者的实质——与中原文化、江南文化相区别开来的“海味”，如著名学者司徒尚纪在《珠江传》中所言：“广府文化堪为珠江文化的代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确认，与黄河（中原）文化、江南文化多元并存的情况下，珠江文化当是最有海洋文化特色的，也是华夏文明中最为迥异的一种文化。

也就是说，它最具有“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的特征。

这自然与发祥于珠江流域的海上丝绸之路所分不开。这海上丝绸之路，理所当然是海洋文明典型产物。海上丝路与海洋文明本就是无法割裂开的。本书便是试图从这一点上切入的。

—

在珠江流域汉文化系统中，广府、客家、潮汕三大民系，各

自有文化上的特质，有着鲜明的差别。把三者等量齐观，显然是不科学的。例如，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可以说是近缘，而广府文化与中原文化拉开的距离却远远超过另两种文化。中原文化，一般被视为内陆文化，这是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而广府文化，则很难划入内陆文化之列。毕竟，广府文化，与中原文化相比较，自古以来，便带有迥异的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的特征，因此，有必要单独加以研究与分析。

当然，提出“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特征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为学术界所承认或接受的。

早 200 年前，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 - 1831）便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断言：

中国、印度、巴比伦都已经进展到了此种耕地的地位。但是占有耕地的人民既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到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由于其他民族把它们找寻和研究出来。①

黑格尔在哲学界有着很高的威望，这一观点，200 年来一直统治着国际学术界，包括文化史学界。东方没有海洋文明，似乎已是不言而喻的了。今天看来，这一段论断中的“西方中心观”是非常明显的，因此也是荒谬的。东方并不需要他们“找寻和研究”出来，而是早已存在且与整个世界密不可分。

问题却在于，在中国，究竟有没有海洋文明延续下来？

中国的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认为，有！但是他们却调换了海洋文化的某些内涵。在《方东蓝色文化》一书中，来自江浙的学者认为：“世界海洋文化并非只有西方的一个模式，中国古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模式。并且可以这样说，如果把西方海洋文化称作为海洋商业文

化，那末中国古代海洋文化应为海洋农业文化，两者均是世界海洋文化的基本模式。”②

这也许与作者所在的地理环境有关，尽管近代江浙商业发展起来了，但与广府相比，还是没那么早，那么具有规模。所以，他们回避了海洋文化的商业性特质。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可以白成一说。

另一种基本上仍坚持黑格尔的观点，在《岭南文化向何处去》一书中，作者称：“把岭南文化作为海洋文化更为荒谬，象古希腊，近代英国这样将航运、贸易、海外移民和殖民作为生存基础的文化才是海洋文化。岭南文化是岭南大地上的文化，是农业、手工业和城市的文化。”③

这里说的“岭南文化”，是把广府包括进去了，正好在开篇中所说的，很容易造成某种偏颇，以偏概全，从而否定了广府文化的海洋文化特征，没有把广府文化抽出来作出全面、科学的分析。无疑，华夏文化是大陆文化，包括舶司制，海禁等措施，也代表了农业文化“闭关自守”，从而拒绝“海洋所赋予的文明”，纵然古代航海也相当发达，但对临近中原腹地，如齐鲁一带的影响，在文化上留下的痕迹并不太多。

但是，如果单独把珠江文化的主体广府文化拿出来研究，情况便迥异了。

首先，我们不赞成把海洋文化划分为两种，另划出一个“海洋农业文化”来。海洋贸易，本就是与商业文明无法切割开来的。所谓的海洋农业文化，说到底还是大河或大陆农业文化的延伸，是大河或大陆文化的影响。而非独立发生的。这在实质上，还是否认了中国仍存在海洋文化，与后一种观点殊途同归。

当然，我们更不赞成后者观点。说岭南无海洋文化，实际上，也就是整个中国没有海洋文化了，因为就广府的海洋文明活动在中国最为活跃。其实，航运、贸易、海外移民等，在广府均

相当明显，并且毫无疑问地成为广府人的生存基础，而农业、手工业并非构成广府文化的全部。至于殖民，尚可讨论。而城市更有封建制度下的城市与商业城市两类，作为珠江入海口上的重要城市广州恐怕属于后者而非前者——这在后边我们会谈到的。

为此，我们特地界定出“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的特征，以与上两个观点区别开来。

我们以为，广府文化，却恰恰是最典型的海洋文化。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广府自古以来，便“分享了海洋所赋予的文明”——因舟楫之便而兴起的商业文明与移民海外的历程。没了广府的海洋文化这一章，把中国文化说成仅仅是大陆文化，显然是极为片面与武断的。可以说，忽略了广府海洋文化这一部分，中国文化就是不完整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是在广府作为起点的，这本身就是海洋—商业文明辉煌的产物。当然，要证明这一点，尚须作大量的考据，以及深入的论证。

作为黑格尔的“海洋文化”论的基点，无非是如下二者：一是商业文明，二是向外殖民。而这二者，于广府文化并不或缺，而作为“海洋”的大背景，更是无可置疑的。

而最有力的证明，便就是前边所提出的，始发于广府区域的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一说，是由德国学者利希霍芬于19世纪提出来的。这位著名地理学家，曾三次深入中国进行考察，且不说他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而且，他对广东人（广府人）文化品格的认定，也全是具备海洋文化特征的，诸如“开化种族”，“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才能”等等，甚至不惜往西方脸上贴金：“说不定这个种族是当年海洋殖民者中有才能的人种的后裔”^④——换句话说，他觉得广府人所具有的海洋文明特质几乎难以置信，仍带有西方人的偏见。且撇开他这臆断的荒谬性，我们仍不难看到，作为海洋文化对广府人已有的几千年深刻的影响。

因此，我们将在本书中进一步谈到这方面雄辩有力的论证。这里，先作简要的勾勒。

海上丝绸之路不是一两年或一两百年间形成的，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番禺古为舟”，这当是三千年前的历史记载，证明南方沿海一带造船业很早的发生与发展。而廿年前发掘出的南越王墓中，大量的船模作殉葬品，也可以看出当时统治者对航海业的高度重视，把其当作其经济命脉，而这，则是 2200 年前左右。可见那时与海外的商贸往来，已经达到相当密切的程度。

而作为史书第一次记载的，作为政府贸易的海上壮举，则是在汉代。当时，汉武帝平定了南越的叛乱，迁府治于广信，则在粤西雷州半岛的南端徐闻合浦，派遣出了第一支巨大的船队，开往印度、斯里兰卡一带——这可以称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大的商贸往来的第一次“政府行为”。

时间为元鼎六年，即公元前 111 年。

由此，粤西徐闻一带，颇得海洋商业文明之利，故唐相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志》中有：

徐闻县……汉置左右侯官，在此积聚货物，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

可见其商业兴旺有多长时间。

汉代辉煌的海上丝绸之路，成为了南海丝绸之路的先声。而后，则有公元 1—2 世纪罗马帝国东来的航线，罗马人对东方神秘的丝绸之国的向往，有着众多的神话与传说，积淀着那个时代的文化意识。汉魏六朝，与南海、印度洋、波斯湾诸国的交往更为兴旺，尤其是府治重返番禺，易名广州之后，则有刘宋时期的“舟舶继路，商使交属。”^⑤萧梁时期更是“海舶每岁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⑥——当时可考的通商国家有大秦（罗马）、天竺（今印度）、狮子（今斯里兰卡）、罽宾（今克什米尔）……等 15 个。此期间，外商定居广州成为侨民的，已为数不少，“久停广

州，往来求利”⑦。

更有名的，莫过于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海外贸易更是高潮迭起。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名著《黄金牧地》中记载：

中国之船直航瓮蛮（即阿曼）、波斯湾畔之西拉甫港、八哈刺因、俄波拉、巴斯拉等港，而以上诸港之船舶，亦直接航至中国也。⑧

而唐史中亦有记载：“海外诸国，日以通商”，“海岁有昆仑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⑨、“蕃商大至，宝货盈衢”⑩——其时，广州已大有“异国风味”，成片的阿拉伯式建筑，包括骑楼等，一直流传至今。这里暂不提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的传入。

宋代，海上丝路一如既往，到了明清，虽屡屡有海禁，广州依旧“一口通商”，不曾截断海洋文明的影响。

这是商业文明的证明。

还有海外殖民的证明。

这似乎不必花多少笔墨，因为，在过去，甚至十年前，无论是欧美、还是南洋及澳洲，都把 Cantonese，当成中国的国语。其实，这只是广州话。也就是说，几个世纪以来——几乎与西方殖民史同步，中国人移民海外的，绝大部分都是广东人，几乎遍及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南洋，更达上千万之众。有些著名的侨乡，海外的人口与国内的一般多，甚至还要超出，如台山等市县。

而他们，均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之路上先后走向世界的。

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便是以驳倒黑格尔的武断，以及其它“海洋农业文化”论，等等。这里只是提纲契领地论及，但其力度则是相当大的。

当然，我们并不曾把这当作论辩产物，力图从宏观上作出全面的把握，在细部上亦有深入的刻划，更着重于它的哲理性、史实性即学术上的开拓。也就是说，尽可能成为一部在中国文化中

有自己见地的学术专著。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海洋文化的经典，珠江文化主流——广府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在南方文化，尤其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格局中，自有其独异的光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更具有其高位势能，向全国辐射。可以说，是当今中国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

正因为这样，这么一部专著的问世，必然会引起各方面的关注，长处与短处，都同样惹人注目。写得不好，不仅广府人要骂，天下人也要嘲笑，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更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独立的珠江文化的研究专著问世，为天下先，当是件很冒险的事情。

但是，平平庸庸，重复别人已经说了十遍八遍的观点，四平八稳，不招非议，在我们却又做不到。做学问，务去陈言，敢于立言才是。但立言并不易，必有如《论语·子罕》中所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想做到这四个“毋”，是要有很大勇气的，不凭空猜测，不要自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唯我独是，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而敢于“毋”，又须如《礼记·中庸》所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需要下很大功夫，非呕心沥血不行。否则，无以使自己所建树的理论根深而叶茂，立于不败之地。

知难而进，每每是做学问者的本性，我们接受了这一挑战。望而却步便没了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研究文化同时也是在创造文化，谱写出文化新的一页。正如研究历史正是为了写出新的历史一样。

文化如历史一般在流动中、发展中，任何静止的描绘都会为时间所涤荡。所以，每每给新的立论提供了契机，也有了需要。这同立论者视野的扩大、认识的深化密切相关。新的立言，也便在推动文化的更新，引导新文化的转型——这在急骤演进中的珠

江文化来说，就更是毋庸置疑了。

这又是一个“毋”！

二

作为珠江文化主体广府文化怎么界定，说简单也简单，凡是操白话（即粤方言）的区域，可以说便是广府文化区，是一种区域特征相当明显的文化，不同于客家文化——客家文化不是按地理区域命名的。一般来说，取这一界定是不会有有多大争议的。

所以，广州文化，理所当然的是广府文化的代表，如同白话以广州话为代表一样。而它的区域，则为广东省的中部、西部，以及广西的东部、南部，当然，原属广东的港、澳亦包括在内。

但是，现当代，随着京派、海派文化的兴起，广派文化也在逐渐成为人们所公认的“三是鼎立”之一足了。广派文化与广府文化又如何看待，似乎又成为问题了，当然，二是是不可以等同起来的。“广派”这个字眼，是现当代才有的，而“广府”则是古已有之。可以说，广府文化应属文化史的范畴之内，而“广派”，则更多指的现当代文化风格与文化精神，是相对于“京派”、“海派”而言的，而不仅包含其区域性。当然，现在为广派文化下个什么定义，似乎也为时过早。

还有一个问题是，人们经常谈到的珠江文化、岭南文化、广东文化，其主流便是广府文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由此，甚至会产生某种误解，认为岭南文化、广东文化便是广府文化。其实，说岭南文化，除广东外，还应包括广西，以及刚从广东划出去的海南，当然还有香港、澳门等地。而说广东文化，除广府外，还有客家与潮汕，共同组成广东的三大民系。不过，人们说及岭南文化或广东文化时，对客家与潮汕总要特地加以说明，而对广府则相对少了一些，或者不需要加以说明。因此，很容易产生混同，把岭南或广东文化的特征，也完全等同于广府了。

话又说回来，在岭南或广东三大民系文化中，广府文化反而缺少专门与独立的研究——没有“个案分析”。而像客家文化等，海内外各种专著、论述比比皆是，包括笔者，也有不少客家文化的著述。可以说，广府文化的“个案分析”，完全淹没在岭南文化或广东文化的研究之中，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它是广东主流文化或主体文化，很难从中划分出来（详尽的分析，可以看正文，这里只好点到为止）。但是，这毕竟是一个缺憾，也是广东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空白，理所应当予以填补。为此，在文前，我们特地作了说明，正是趁珠江文化研究的机会，突出其主部——广府文化的考察与分析。

而难，也就难在这里了——如何在博学基础上，“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不人云亦云，真正让广府文化呈现出它独特的异彩，获得它的“独立性”——毕竟，文化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游移着，游移中有其稳定性，也有其不确定性，出现模糊边界，甚至亦彼亦此。尤其是今天，古老的文化又如何融入到现代文明之中，文化的模式，又怎样切入新的生活方式？旧的传统如何在退守，新的价值观又怎样在形成？……文化在流变中，也有个脱胎换骨的艰难过程，由此，便带来了一系列崭新的历史与时代的诘问——而这，都需要我们作出科学的、雄辩的回答。

好在在接受这一选题的撰写任务之际，已经有了重要的准备：在这之前，已先后出版了自己的文化专著：《千年国门》^①与《中国文化史观》^②，在文化的宏观研究上，在历史观念的全面把握上，都作出了新的尝试，并有了相应的成功。于是，这部《广府海韵：珠江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便成这一研究思路的自然延伸，同《千年国门》一样，它作为《中国文化史观》之后又一个“个案分析”，甚至它更切近《中国文化史观》一些，因为它更为切近这部专著提出的中国发展的四大阶段论：中原文化期、南北文化期，与亚洲文化交融及与世界文化交融、由闭关自

守走向开放融合，不断取得更广区域“资格”。广东三大文化有其完全不同的地方，也有相对近似之处。但客家文化更具有中原色彩一些，而且相对稳定一些，有鲜明的文化边界——是作为北方文化的板块位移下来，而广府文化相对要复杂得多，它似乎没有客家文化那么富于激情与诗意，相对要冷静与务实得多——本来，文化的品格就是千差万别的，不可强求一律。同样都具有移民的海外拓展，但二者的移民也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这有海外关于“客人开埠、广人旺埠”说法为证。

事实很明显，颇具特色的广府文化，其发展并未因融入中华整体文化而终止，反而显示出更为生动、鲜活的独有的文化色彩来——相互之间，即整体文化与区域文化，有着“双向强化的关系”。过去，齐鲁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上升为中华整体文化的主流，那么，今天，广府文化的勃兴，又对中华整体文化作出怎样的贡献，不也是值得高度重视么？

文化本身就是多元性的，其多元性也同样体现在区域物质的不同上，不研究区域文化，也就无从谈多元文化。多元文化的研究作为当今世界潮流，无疑是积极的、向上的，为历史所要求。所以，文化的比较也就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中国境内人口的大流动与大迁徙，使这种比较更有必要也更有深远的影响力，它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调整所产生的作用不可低估。为此，《中国文化史观》中对这种迁徙、碰撞与交融称之为“文化的激活”——这与区域文化的论述也就衔接上了。

无疑，珠江流域的主部——广府，作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点、结合部，也就是文化激活的典型区域，所以，它才异彩纷呈，争妍斗艳，更具有研究价值，是不可多得的一块文化瑰宝。为此，我们指出，不能像黑格尔那样，把中国文化只说成为大陆文化，中国没有海洋文明的恩赐。事实上，广府文化也是一种颇为典型的海洋文化，而这一文化好几千年前便已存在其基因

了。一部中国文化，如没有海洋文化这一章，那就是不完整的。过去，把广府文化这一海洋特征予以忽略或轻描淡写，显然是很不应该的。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我们在发挥文化激活论之际，尤为强调广府文化的海洋特质，无疑，这是个很具说服力的“个案”。

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对区域文化及多元文化的重视，是历史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对过去封建大一统观念的一个拨乱反正，使各区域文化走上真正的平等与兼容，给不同文化以更准确、更认真、更恰如其份的评价，从而在多元的轨道上，把中国文化共同推向一个新的峰巅。

这也带来了文化价值观的演进——今天，广府人的文化价值观在中国无疑是有示范与参照性的。这在本书中也有专门的论述。

三

做学问，当不拘陈说，敢于立言，一旦更新观念，在这部专著中，便有了不少新的发现，并且提出了若干不同于他人的论点。

除开前边提到了激活说外，我们对珠江文化主流——广府文化的滋生与成型，广府民系的形成与发展，都从详尽细密的考证中，提出了与别人不同的观点；在文化比较上，我们更从“可比性”入手，着重在珠江流域内亦有的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作文化比较，进而与整体文化的代表中原文化作比较，相信读者在感到新鲜之余，会有更多的得益。

同样，在研究广府思想文化之际，我们认为，作为洋务运动而产生的“官商”，与在广府民族资产阶级的“民商”的对立，是很有重新探讨的价值的。前者旨在“补天”，惟有后者方可“翻天”。

文化的此消彼长，一个文化，后来居上于另一文化的事例比比皆是，不仅在世界上如此，在中国也是如此。珠江文化也有过几度辉煌的时刻。例如，1983年8月，在广州解放北路象岗山腹心部位出土的汉墓，就表明了当时的造船业乃至商业文明已相当发达。如著名学者罗香林所称，早在汉代，珠江流域便是中原文化学术与外来文化学术交汇的重心。尤其到了南北朝，中原文化因北方少数民族的压迫，转移到了江南一带，前锋更是抵达了广府。故后来一位唐代诗人称：“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不独中原语音对广州方言产生重大影响，文化上更产生了交汇融合。最有名莫过于西晋时任南海太守的鲍靓，及其女婿葛洪了。后者师从岳父，成为了道教神仙论的奠基人，从而使道教思想在广府得以成熟与定型，这是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一大贡献。相应作为舶来品的佛教，也就在葛洪之后不久，仍是南北朝间，印度第28代菩提达摩，渡海东行，在广州今上下九路处登陆，从而开始了佛教文化思想在广府的中国化进程，直至六祖慧能，更在岭南完成了这一演绎，一道一佛两大文化，几乎同时在广府得以生发，可见当时广府宗教文化的兴盛达到怎样的程度。

魏晋南北朝后期，真谛三藏，人们认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得到印度无著、世亲法相唯识之学的真传的人，因避乱，也从建康辗转至广州，开始了他著名的广州译经“工程”，长达七年之久，共译出经、论44部，141卷，对广府文化也产生相当影响。

当时南下及至定居者，不似唐宋，是被贬谪的，而是为这里的文化氛围、学术空气所吸引。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就有：“晋时，高州冯融，汲引文华士与之为诗歌，梁曲江侯安都为五言诗，声情清靡，数招文士，如阴铿、张正见之流，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此皆开吾粤风雅之先者。”魏晋南北朝诗人中，侯安都、阴铿、张正见的篇什均有流传，侯安都

为曲江人，自不消说、阴铿亦留恋于岭南，曾任职始兴，对广州一往情深。他们的诗不同一般，当是“开吾粤风雅之先者”，另一位诗人江总也有“秋城韵晚留，危榭引清风。远气疑埋剑，惊禽似避弓。海树一边生，山云四面通。野火初烟出，新月半轮空。”以吟广州。其间，成就最高的算是阴铿了，这位“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视广府为故乡的大诗人，在当时与何逊齐名，时称为“阴何体”。他的诗，已基本形成律诗形式，是汉魏乐府五言诗到唐代五言律诗的过渡，他的《蜀道难》、《晚出新亭》、《南征闺怨》等，均算得上从齐梁新体诗向唐代旧体诗演变的开山之作，故清代沈德潜称“五言律，阴铿、何逊、庾信、徐陵已开其体，唐人研揣声音、顺稳体势，其制乃备”。^⑬可见阴铿对唐代律诗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广府研究语音的专家认为，广州白话中古语音多，所以读古诗，尤其是唐宋诗，用广州话更上口一些，甚至更押韵、平仄更分明，由此可见，它当年对律诗的形成，亦有很深的渊源……

恐怕，对南北朝时期广府文化的研究，还需要下大力气才行。光这“开吾粤风雅之先者”，便有不少文章可做，屈大均无疑是点到了穴位上了，可惜在他之后，并不曾有人花大力气在这上面进行研究。

固然这一时期广府文化的特色是最富于色彩却也颇为迥异的。但是，在这之前，却有更让研究者为之迷惘与振奋的一段历史。

那就是，作为珠江流域或岭南，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曾一度北移到了如今两广交界之处、西江中游的封开、梧州附近，那时，被称之为“广信”，广东、广西，正是以它的东、西方向为坐标的。而这次北移，长达近四个世纪之久。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这400年并不是很短的一个时间段。然而，过去对岭南、对广府的研究中，却一直忽略了这个问题。那么，

在这400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400年对广府民系的形成，对广府文化的发生，又具有怎样的意义？

而且，这个中心为什么要一度北移？

这一切，似乎都是历史文化之谜，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破译。罗香林说的汉代，这里是中原文化学术与外来文化学术交汇的重心，恐怕主要讲的是广信及沿西江流域一带，而不是指今日的广州。可以说，研究广府文化，这里便形成了一个空白地带，有必要作大量的补充与发掘。

这更是广府研究的一大疑点。

还有一个是，广府人一般称自己家族开基于南雄珠玑巷。甚至有人论断，广府民系是直至珠玑巷开基后才形成的——其时已是宋末元初，竟远远晚于客家民系的唐宋年间；相对于珠玑巷传说的客家人的葛藤坑传说，则发生于唐代黄巢动乱期间，早了整整一个朝代。

然而，众所周知，早在宋末元初之前，无论广州还是周遭地区，经济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人口众多，广府民系并不非要珠玑巷的中原移民南下才得以融合形成，它的形成无疑要早得多，甚至早个上千年，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可是，为什么一般广府人非要认定一个珠玑巷，甚至于年年都要去“归宗认祖”呢？这里边，包含怎样一种怎的文化心理？

这同样又是一大疑点。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疑点来。但这两点，却关系到整个广府民系与文化形成的重要历史时刻，远不可以几句话便可以交代过去。这部专著中，笔者将尽最大的努力，对此予以科学的、合理的阐释，否则，就无以使这部作品真正站立起来。回避是回避不了的。

四

从表层上看，珠江文化的主流——广府文化最炫目的特色，莫过于被人反复认定的是商业文化，市井文化、世俗文化。无疑，广府文化的商业性、市井性、世俗性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但是，光这么说，是否便足以涵盖一切了呢？

也有人认为，在近代中国，商业文化、市井文化、世俗文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广州在这方面的特征，都已远远落后于上海、天津，乃至汉口。那么，广府文化近代显著特征则恰恰相反，是它的精英性、前导性，是在思想的超前、政治的激进上，所以，广府文化的实质，应是在精英文化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府在市场经济理论、科学民主思想等方面，始终领先于全国，如同世纪初，民主革命思想最早在广东激荡一样。广东经济的“先行一步”，与广东思想的超前是分不开的，且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

简单把世俗文化与精英文化作断然的划分，显然是不科学的，也缺乏历史眼光。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西方的流行音乐，无疑是最世俗的，可到了八九十年代，它们却已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了主流派，日后，还会成为古典。这并不足为奇。事实上，欧洲资产阶级崛起之际，也同样被封建贵族瞧不起，称之为“暴发户”，“粗野”、“没文化”，可后来又怎样，正是他们创造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最璀璨的文化，是地地道道的精英文化了。

至于商业文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化，如果没有商业文化包含的自由贸易、平等交换及建立在“物的依赖性上的人的独立性”（马克思语），我们就没有近代以来先进的自由、平等、民主等思想观念，进而言之，中国近现代的民主革命，20世纪末的启动于广东的改革开放，都得益于这一商业文明的传统。也就是说，作为哲学、政治、思想上的“精英文化”或“前卫文化”，是与商业文明所分不开的。我们切不可仍站在小农经济的立场

上，指斥“无商不奸”而尤视真正的商业精神：自由、平等、独立、诚信……等等。

而市井文化本身就不是单一的，有北京胡同与城市中轴线相统一的“市井文化”，也有以商业利益为重的如威尼斯式的“市井文化”，各自的实质大不一样，北方始终关注的是伦理中心主义，但广州人讲的却是实在的利益，有把一切以金钱作参照系的量化之嫌，……本来，封建都市与商业城市就不是一回事，市井文化所涵盖的内容也就远远丰富得多。指斥“市井文化”，恐怕有更多的仕族意识在内，马褂下边藏不住长长的封建尾巴。

我们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暮鼓与晨钟几乎同时响起，也就难免有些辨不分明。任何简单的划定，也就约束了自身，因此，勿须过早地作出非此即彼的两极判断。表与里，粗与细，泡沫与本质，乃至真与伪、美与丑，有时都不是那么确定，甚至会发生置换。列宁在其《哲学笔记》中也有“泡沫也是本质”的批语。所以，在珠江文化研究上，切不可人言亦云，亦步亦趋。正因为这样——

对于大众文化在文化突破上的意义；

对于广府的文化产业；

对于精英文化；

乃至南中国海广府文化圈……

我们都力图不落前人窠臼，拿出我们独立思考而得出的新论点来。

凡此种种，此书中还有很多，我们不一一列举出来了。

长期以来，对珠江文化如此有特色的区域文化，我们的学者实在是关注得太少了，每每在岭南文化研究中“大而化之”，这与今日广府文化的地位也是很不相称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这部专著，也是一个“急就章”，急于解决这个“不相称”问题，以满足当前文化建设的需要。当然，我们仍是力图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前提下，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轻易下什么结论。

正如《颜氏家训·勉学篇》所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

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⑭在我们，未敢妄称已观“天下书”，但我们亦尽所能，在立论之际，反复予以“证伪”，使其能够有站得住脚的充分论据，才最后确认。

中华文化，实在是太宏博、太精深了，取其一叶，亦教人眼花缭乱，珠江文化就是如此，它比其他流域文化绝无逊色之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它对整个中华文化——中国的整体文化产生的影响，正日益重大，今日，预期其有可能出现的前景，似乎还早了一点。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的，作为总体文化，总是不断从各区域文化中汲取、筛选出来，以补充、改变、提升自己，所以，这当中，便有一个从个别上升为一般和各种区域文化要素的交汇融合的过程，哪种文化的势位高、势能大，对整体文化的改造与演进产生的作用也就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珠江文化在相当的方面，也代表了中华文化的走向与前景，对改造传统文化、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毕竟，它今日站在了时代的前列。所以，审慎地指出其糟粕与消极之处予以剔除，弘扬先进与优秀的成份，把握其本质与特征，对今天与未来，都是非常必要的。

当这近卅多万字的书稿最终完成，笔者竟有如释重负之感——当日提笔，每每觉力不从心，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小区域不小，须当大题目来做，这才能写出份量、写出真意来。是否如愿，既已交出，也就只能让读者们评说了。

时值 2001 年立春之日，写下最后一句，推开窗户，南国已是满眼春色，阳光灿烂，——这勃勃生机，当属于你与我，共同创造这南国珠江文化的人们！让我们共勉吧。

此为序。

作者

注释：

①《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146页。

②《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2页。

③《岭南文化向何处去》，1997年版，广东旅游出版社，48页。

④转引自《中国民族性》第3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沈约《宋书》卷97，《夷蛮传》。

⑥姚思廉：《梁书》卷33，《王僧孺传》。

⑦慧皎：《高僧传》卷1。

⑧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2册，221页，中华书局1977版。

⑨刘昫等：《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

⑩崔郾：《李府君墓志铭》，载关双喜：《西安东郊出土唐李敬实墓志》，《考古与文物》，1985年6期。

⑪《千年国门》，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

⑫《中国文化史观》，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⑬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⑭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

上 篇

源 流 篇

第一章 珠江流域概观

第一节 “山海经”

数千年来生活在珠江流域，尤其是广州及其周遭的人们，始终在吟唱着一部与中原迥异的“山海经”——笔者刚刚出版的一部长篇历史纪实《千年国门》，便是用这样的标题作其中重要的一章。作为主要是广府民系生存居住的两广，北枕五岭山脉，南濒南中国海，来自北边骀荡的山风，同骤起于海洋的狂暴的飓风，各自在这片土地上交互成为主调，最后融汇在了一起，形成了绚丽夺目的一道文化地理风景线。它们既封闭了这个地区，又开放了这里的人们。钟灵毓秀的中原文明，与生机蓬勃，开阔浩瀚的海洋文明，在这里既冲撞、排斥、又交融、汇合，使得这里的“山海经”尤为精彩、大气，呈现出复调结构。看来还会永远地吟唱下去……

无疑，地理环境及历史演进，对形成民族与民系，铸造文化，是最基本的要素。居于珠江文化之中，并始终处于主导地位的广府文化，其由来之久，范围之广、影响之大，理应引起众多人文学者的关注。更何况在 20 世纪，它更异军突起，不仅对中华整体文化产生的巨大的冲击并促使其形成新质，甚至在全世界也教人刮目相看。今日的创新，也就是明日的传统，研究这一民系及其文化，既是当务之急，又是今后的需要。面对这丰富多彩、流韵千古的“山海经”，我们有必要寻找、归结出其中的规律来。

第二节 地理环境与文明演进

珠江流域全境，可以说是北高南低，西陡东缓，从宏观上看，大致为一向海倾降的斜坡。即北倚云贵高原与南岭山地，中亘两广丘陵，下为宽广河谷与三角洲平原，海拔从 2000 多米下降到 20—10 米。山地丘陵地区约占三分为二强，台地平原及冲积平原只占约三分之一。

横亘在北部的南岭山脉，不仅在古代作为一道几乎无法逾越的巨大屏障，而且直到今天，仍造成着岭北（或中原）与岭南文化质态的落差，乃至民性、心理上的差异。自然，这也是经过漫长的历史而拉开的距离，不是一下子便可以改变的。应当看到，文化孕育之初，地理环境对于处于原始浑沌状态下的生存，是起着重大乃至决定性作用的。否则，地中海文明与华夏中原文明便不会各具特色了。

因此，概述作为民系发生与文化起源与发展的空间基础的珠江流域地理环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这里我们重点讲一下流域重心的状况。

粤北山区是南岭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有大庾岭、骑田岭、滑石山、瑶山等，大多为花岗岩构成的、脉络不甚明显的山地或砂岩，以及石英岩构成的山脉，海拔为 1000 米至 1500 米，最高峰为石坑崆，海拔 1902 米。山峦起伏、气势雄奇，间有山谷及河谷盆地，形成南北通衢，如浈水、武水谷地、小梅关等。后来打通大庾岭通道的，便是有名的“梅关古道”——而这已是唐代张九龄的时代了。更早时候，也就是梅关古道开通之前近千年，为秦代于广西西北部开凿的灵渠——兴安运河、湘桂运河，沟通了长江与珠江的两大水域，把湘江与漓江连接在了一起。所以，岭南府治，在那之后不久，曾一度北移到漓江下游的桂江与西江交汇处的广信。关于这点，后边将有专章阐述。

而作为考古上重大发现的，则是在粤北曲江县马坝镇西南狮子岩狮头洞穴里发现的一个中年男性头骨化石，这是 1958 年夏天发生的事。经测定，这是个距今 12.9 万年左右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被命名为“马坝人”①。由此，可以断定，早在近 13 万年之前，在这片土地上便已有原始群的存在。后来，考古学家又发现了本土“新人”的遗迹，“新人”与现代人在体质形态上已无显著区别，没有“马坝人”的原始性，而且还会用火了。其后，考古的大量发现，更证实岭南古居民在 7000—6000 年前，与中原的居民一样，几乎同时进入母系社会。

也就是说，粤北、粤中一带的先民，与中原文明发展是同步的。直到有史籍记载中原人进入岭南之前，原居民已在这里生活了上 10 万年或更长时间了。

粤北、粤中山地，为我们保留了远古的人类遗迹，而它的奇诡的“丹霞地形”，更在地质学上久负盛名。这一地形，主要为红色砂页岩构成，以仁化的丹霞山、坪石的金鸡岭为典型，丹崖碧水，相映成趣，留下了不少名胜与古迹。渐渐向南，山势逐渐降低，其终点便是由珠江冲积出来的平原——珠江三角洲。其西、北、东三面，均为古兜山、九连山、罗浮山所环绕。

但是，山到了这个地方，已经不再唱主角了。这里，水网交错，河川纵横，又是另外一番景观。众所周知，珠江是我国流量最大的一条大河之一——仅次于长江，它汇集有东江、北江、西江三大水系，如同伸展的手掌，罩在东西、北、中南大地上，珠江三角洲便是它的掌心。广义的珠江三角洲分别以西江边的高要、北江边的清远、东江边的惠州为顶点，面积有上万平方公里，时至今日，三角洲的前缘仍以每年 10 多米的速度向海洋推进。人们不难发现，三角洲所在地，便是原先一个多岛屿的古海湾。积千万年之功，才有这么个富饶美丽、生生不息的人类繁衍的处所。这里地处亚热带南缘，“三冬无雪，四季常花”，天气温

暖，雨量丰沛，生命在这里如此蓬蓬勃勃，正托庇于这么好的气候与自然环境。

而珠江三角洲南边，珠江入海口所面对的，是堪称当代“地中海”的南中国海——如果周边各国彼此相安无事并迅速加快贸易交往的话。而在事实上，在某段历史中，它的确也类似地中海一样，促进周遭海洋、商业文明的迅速发展，只是一度又一度严行“海禁”，才使其未尽全功。

显然，当古海湾形成冲积平原之际，南越先民们便在这里汲汲劳作了。在水网密布的珠江三角洲，舟楫便是最有利的交通工具。当中原以马车驰骋于崇山峻岭之中，这里便以舟楫纵横于星罗棋布的洲岛之间。舟楫文化，正是南方有别于北方马车文化的地方。正如地中海滋养了商业文明一样，这里出于舟楫之便，已经早早进入了商品交易，所以“人多务贾与时逐”^②，较早有了商品意识。三角洲上，“广为水国，人多以舟楫为食”，进而厕身大海，“逐海洋之利”，从而“身御灵风”、“习海竞渡角旺”^③……海上丝绸之路便在这里起步了。

无可否认，海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担负起了唱主角的责任。这是有别于中原文明的另一类文明。长期以来，认定这里文明的发展由于南岭的阻隔，远远滞后于中原，把秦发兵 50 万人入粤当作这里文明的开端，显然是有悖于历史真实的。中华文明的产生，从来就是多元的，而不可定于一尊。定于一尊的观念，是产生于汉武帝之际，其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连中原文明的其他成果也遭到否定，惟以儒术为尊了。这一来，又怎么能承认南方自身发展起来的文明呢？

当年，赵陀建南越国，也不曾以中原为尊，而是入乡随俗，连他自己也“越化”得相当彻底，根本谈不上什么把这里视作夷蛮之地。

我们不妨往前追溯。

据考古发现，在增城三江镇金兰寺林后边的山岗上，发掘到的贝丘遗址，其中，下层是新石器时期的遗存，而上层为战国时期的文化遗存。新石器遗存中，有砍斫器，敲砸器、双肩石斧、凿等等石器类，还有粗砂黑陶、粗砂红陶、磨光泥质红陶、彩陶等，以及贝壳、鹿、牛、鱼与龟的遗骨。而最有考古价值并证明珠江三角洲文明不曾滞后于中原的是，其中发现了陶制的男性生殖器——“陶祖”，这证明距今三四千年前，岭南也同样已从母系社会进入了父系氏社公社时期。

这一证据，有力地打破了直至秦发兵南下之前，岭南仍是落后的母系社会状态的说法。与此同时，我们从大量出土的春秋战国的历史文物中可以看到，出土的砂陶纺轮，业已证明这里的纺织已经广泛传播，而造船，也早已不是独木舟阶段了，铜铸技术是有很大的进步。

可以断定，南越先民至迟已在新石器时代就使用舟楫在海洋上往来，出土的船模，到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一定规模，比中原在这方面先进得多。在周初成王时，越人也曾向周王室“献”（这恐怕是后人假托之词）过“舟”^①，这舟怎么抵达中原的，其间大有学问。无论如何，至少在这一条上，南方的文明一点也不比中原逊色。这是在本土上滋生、成长起来的，不可以用他人的标准为参照系。

1989年，在珠海市扁担岛宝镜湾发现了春秋或者更早时期的岩刻画。画中则已有船只与乘客了。在“天才石”的岩刻中，便有一只长85厘米，船头尖长并翘起，以鸟头为饰，船中竖起一支70多厘米——几近船身长——的，挂有“旗幡”的高竿，有如桅杆与风帆，旁边还多了个船锚一样的东西。另在大坪石岸刻中，有一画面为20多人与动物围着大船跳跃欢闹的情形——可见造船的规模。经专家鉴定，这刻成时间应是新石器晚期，距今已有约三千年，这证明越人已有用桅帆出海的记录了。

本世纪 70 年代，我们在广州中山四路中，发现了秦代造船工场的选址，其规模更是惊人。所发现的 1 号、3 号船台，足以建造身宽 5 - 8 米、载重 25 - 30 吨的平底木船，2 号船台，更可以建造 50 - 60 吨的木船。

及至汉墓出土的陶质船模，我们可以看到，业已有了第一艘舵船。此外，广州还出土了更大型的船模，船上有重楼，有 10 桨 1 橹。于船上建楼及在船后设舵，在中国造船史上的记载，要比欧洲早上 1000 余年。

船，作为南方主要交通工具，也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已经到了如此发达的程度，莫非还能说，在中县人刚刚抵达岭南或珠江流域之际，这里的文明仍远远落后于他们么？

文明不可以只有一种参照系。

只能说，这里是另一种文明——海洋文明，而这种文明在珠江流域，在当时已有了相当的兴盛，之所以汉墓中已出土有外国进口的各种商品，正是因为这种文明的发达所至。当中原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际，这里发展着的是另一种文明。简单的社会形态划分文明进程与层次，已被证明是行不通了，那又何须反复论定这里的滞后呢？

《吕氏春秋》的记载，显然正是这两种文明的不同：

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粤者，坐而至，有舟也。

及至汉武帝收服南越国后，更多次组织官办的大型商船队，从合浦、徐闻出海，远到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及斯里兰卡的已不程国。其后的航海记载更数不胜数——难道不可以这么说，正是南方的海洋文明，对中华文明在此际同样起到了一个推动或促进的作用，对中华文明同样有着重大的贡献么？

惟有承认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才可能重新评价及认识南方这一海洋文明的存在。海洋在初始阶段对陆地是一种封闭，但这

封闭却正是一种挑战，刺激人们去应战，去征服它。

因此，生活在这里的古越人，很早便扬帆远航，意识到了他们正生活于南海航运的枢纽位置上。由于出海的欲望日趋强烈，航海、造船的技术也就日趋进步，于是，他们不断开拓海道，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而打破了封闭，拓展了开放的视野，形成了开放的心态，终于使海洋给他们带来无限的商机、生机。南中国海的惊涛骇浪，造就了他们敢于冒险犯难，勇于向外开拓，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一种英雄主义的自信以及强烈的生命意识——而这，则成为了他们海洋文化的本质特征。

内陆人把大海视为世界的尽头，而珠江人，主要是广府人却把大海看作世界的起点，人生的考场。大海给他们带来了彼岸未知世界无限的遐想，使得他们能虚怀若谷，大海又给他们带来恐惧与返还本原的愿望，亦使得他们对生命无限的眷恋并且把及时行乐作为生命的享受。从大海的波涛中凯旋而归是足以自慰并以英雄自居的——那毕竟须经历难以置信的苦难的考验才可能生还，更滋养了“吃蛇一族”的英雄主义的豪气。

一部“山海经”，就这么铸造了南中国另一个文明。尤其是来自海洋的万里长风，更赋予这里的人们独特的禀性与不同的价值取向。地理环境作为一个初始的、重要的因素提出，绝不等同于“地理决定论”。任何一种结论如推向绝对——绝对化的肯定或否定，也只能导致荒谬，我们对珠江流域的地理环境的便是这么看的。

第三节 气候与人

地理环境是生存的一个依托。但生存仍面临更多的挑战。人类的文化创造，是以环境的感应为基础的。感应的不同，创造出的文化也就不一样。古人云“仁者乐山，智者悦水。”便是感应

的结果。人们务必依据自身的生理、心理以及欲求，与自然、人文景观等相互感应，方可创造出不同质态与不同层次的文化——物质的与精神的。岭南或珠江流域文化的发展，也就这样呈现出不同的质态与层次。

占海湾周遭，可谓森林密布，万木争荣，生命在这里简直如同奇迹，哪怕飓风过后，一切荡然无存，可用不了多少时日，便又是郁郁葱葱、欣欣向荣。对人类也是如此，纵然瘴疠不时袭来，十室九空，可他们仍是那么轻松地生儿育女，重建家园与村庄，根本不把死亡当一回事——这一生死观或生死的态度，分明与这里旺盛的生命奇迹紧紧相连。

的确，珠江三角洲周遭，正位于我国大陆的最南端，这里阳光——生命之源——是最充足的，是全国阳光辐射量最大的区域之一。同样，这里降雨量也是全国中相当大的，因为面临南海，长时间受海洋暖湿气流的影响，季风气候典型。即便是冬季，由于暖湿气流作用，加上南岭对东北季风的阻隔与削弱，气温也不会很低，湿度照样较大，终年不见霜雪。高温多雨是这里的主要气候特征，平均气温在 20℃ 以上，降水量高于 1500 毫米。5 至 11 月，常受台风侵袭，所袭之处，总是损失巨大——而人们乃至动植物也都习以为常了。

这里的植被分布，具有由热带到亚热带的过渡特征。在陆路上，它与东南亚及印度北部一脉相连，其群落外貌也就与之有着较大的联系。这里仅科本植物就有 6000 余种，还有大量的苔藓与藻类。对植被的感应，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方面。地理环境、气候、水源以及植被的丰富性，使之各种类群的动物繁多，特别是面对江河、大海，使得这里更是“耕三渔七”，人们以大量的动植物与水产作为食物，以至在河网滨海的人们更断发文身，以渔猎为谋生的主要手段。

如此有利的地理、气候环境，促使生物蓬蓬勃勃生长。作为

生物链中的最高环节，人类也就有了相当充裕的生长条件。农业气候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多种多样，尤其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源泉——水，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至于年年都有洪水泛滥之患。这里四季常青，林木茂盛，各种果实每个季节都有，从不断绝，昆虫更无所不在，给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使这里成为全国野生动植物最多的地区之一。尤其是热带与亚热带的动植物。仅野生陆地动物，便有 700 多种，哺乳类 100 余种，鸟类 500 余种，两栖类 80 多种。野生植物更有 5000 余种，其中种子植物就有约 4800 余种。至于海洋资源，更为丰富，仅潮间带生物——栖息于潮区的最高高潮线至最低低潮线之间的海岸带（潮间带）的一切动植物，就有 1539 种。海洋水产生物资源则主要有鱼类、软体动物类、甲壳类与藻类，以及浮游动植物等。

这一切，使得越人通过采集，渔猎获得食物相对要容易一些，包括大量的海涂开发，也并不艰难，要生存、自保，这实在是一个相当优越的环境，如果没有瘴疠的侵袭的话。

在中国，一般说来，北方尚阳刚之气，而南主则过于阴柔，只不过这是指中原与江南的不同。所以，林语堂把广东人另外划了出来，他是这么写的：“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图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⑤

这多少切中这里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所造成的人的脾性。大海，令他们好冒险、好斗、图进取；天气热，又令他们急躁、容易动肝火；而优厚的生存环境，又使他们无忧无虑、挥霍浪费，耽于享乐。当然，雄心勃勃、敢于进取、风头十足、自信自强，更是海洋最好的馈赠。所以，林语堂才把他们称之为“另一种中

国人”，而不在北人、南人当中；甚至不是一般的中国人。

在这里，不能不提及沿海经常发生的自然灾害——这与优越的生存环境可以说是相对立的。凡是在这里生活过的人，无不惊叹飓风可怕的破坏力，不仅巨大的古树可以连根拔起，抛出几里之外，甚至一个村庄都可以彻底摧毁——如同经常发生的瘴疠一样，横扫过几十、上百公里；而早于广州作为港口的徐闻所在的雷州半岛上，由于环境独特，雷灾更是经年不断，不仅摧毁建筑，而且索取生命……然而，正是这些对内地来说是相当奇特而且极为恐怖的灾祸，这里的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得了的，视作新陈代谢一般平常与合理，更刺激了他们旺盛的生命意识，及时行乐的人生情调，而禁欲主义则几乎没有什么市场；他们更注重直观的感性自然及官能的愉悦……于是，灾变的巨大惨痛也就迅速转化为积极的人生豁达的态度，与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远远地拉开了距离。

“另一种中国人”的内涵，及“表面是中国文化”的评价，分明是在作一种全新的划分，而这只有珠江文化才足以担当，只有海洋文明才可以作得出解释。

①马坝人的年代，1985年由北京大学实验室用铀系法测定距今为12.9万年（+1.1万~ -1.0万年）。

②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4，食语。

③湖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篇卷8，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④《艺文类聚》卷七十一引《周书》。

⑤林语堂《中国人》，第一部分《背景》第一章《中国人·北方与南方》第32页，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二章 民系源流

珠江文化的负载者，当是从远古走向今天的土著以及入粤的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据历史学家研究，早在西周前后，珠江流域内各个部族便已基本形成。在先秦的历史文献中，他们已各具不同名称，在云贵高原的称为滇越，濮人杂居其间，北盘江便是其居所；而当今桂、琼及越南北部，则为骆越，部分叫西瓯，而在粤北江、西江、东江一带，便是南越——由此有了“百越”的泛称，大抵族名与地名相混。

“越”字的含义，则为水，或海。按《越绝书》的解释，越人称海为夷，夷即指海，越与夷同义。“越人”，也就是水上人家，可见，越人与海是密不可分的，珠江与南海之水，共同哺育了越文化。

因此，整个珠江流域上文明最早的创造者，便是越人，无论滇越、骆越还是南越——而越文化，珠江文化，便是水文化、海的文化，这当是毋庸置疑的。文明之源，便是珠江，是南海。故这里很早便有原始的水神崇拜。

但一种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不可能与周边隔绝，尤其是一旦有强势文化影响之际，其之演变便更为剧烈。

越人与今天的作为珠江流域的主要成员广府民系究竟有怎样的因缘，这正是我们在珠江文化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它远远不同于客家民系的源流乃至潮汕或福佬民系的产生，有必要多下一点功夫深入探讨。

第一节 作为民系底色的“百越”人

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由于山的阻隔、海的拦挡，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各自的族群以及相应文化的发展，倒是比较有利于特色的形成以及日后的“认祖归宗”。大的如古希腊罗马文明，相对于中国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蜂起的时代；小的，则有如中原文化相对于早年的百越文化。由于广府（这是后来所得的区域名）在先便是“百越”人生息的地区，与中原基本隔绝——当中横亘着南岭山脉，中原人对这里基本上是一无所知，抑或知之也不多，中原人南来的机率也几乎等于零，反之，“百越”人也罕有机会越过五岭而进入中原。这一来，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百越与中原的沟通，不说是无，也是近乎于无，于是，各自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哪怕是同步的，也还是相对独立的。所以，广府民系与广府文化直至今天，仍对中原保持有极其鲜明的个性与特色，迥异于诸如江南文化、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距离远远大于这些文化，不能不正是因为这种独立性——当然，这里尤其不要忽略海洋文明的基因，与中原文化有着根本区别。

所以，由于相对的中原影响少一些，本根文化的形成及承继，便容易自成系统并颇具地方特色一些；而海洋文明的影响又大于中原得多，这也教其与中原文化的距离拉得更远，更有异样的色彩。总而言之，广府民系的形成，广府文化顽强地展示自己的特征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都不能不说与这里的地理环境与历史传统有很大关系。

当然，我们尚不可以简单地把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作为证据，说十余万年前的马坝人、柳江人，乃是百越人的祖根，它只是证明在这个地区很早便有人类活动及其进化状况。除非作DNA测定，对此我们只能存而不论。

恐怕，还是从口耳相传，继而有文字记载作依据的好。

较早的文献，则有《史记·五帝本纪》，称颛顼“南至于交趾”，继续又称“(尧)申命羲叔，居南交”。《索隐》中解释“南交”亦为“交趾”，并称：“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驩兜何许人也？据汉孔安国注“臣名”，当代著名民间文学学者袁珂，则在其《山海经校注》中经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这是尧子丹朱一名的异称。这就是说，颛顼之际，已远涉交趾，到了尧，则把儿子丹朱也流落到了南方。

这应是最早记录中原人与“南蛮”相融合的证据了。既然要“以变南蛮”，肯定不是很少一支人马。

《史记》还有舜“南抚交趾，北发”，“北发”据考证为“北户”之误，即后来的“日南”，这已是今天越南中部了。典籍中，更有尧巡狩至“含洫县”，即今英德境内。

颛顼、尧、舜，均为古代传说中人物。可这也说明，岭南一带早已是中原人类关注的地方，民族的融合，或大或小，或广或狭，也已经在进行。

而这里的原住民或土著，在先秦时代或之前，则是“百越”人。据《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瓚的话，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范围很大，东至浙闽，西至越南中部，其间便是今日广府的广大地区。至于“百越”族人，则主要有南越、西甌与骆越。

“南越”人，应是广府民系先民的一个源头，南越一族本也是当地土著汇聚而成的。总的来说，其所居住的地区，基本上是岭南，尤其是当今广东境内，其进化的程度、文化的滋生，均可以算得上是岭南土著中的主干。南越人是原住地原始先民发展形成的，是岭南土著，当无疑义。至于有人称其为“夏后裔”、“越南南迁”等等，却是与后来的中原正统思潮相关，不足为据。据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考证，珠江三角洲、北江地区、西江地区、东江地区与韩江地区，这五个地区，则为“五个发达的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经济文化区域，是南越人最先结合成部落联盟的地区，时间相当于我国夏商时期，继新石器时代晚期发达的几何印纹陶文化之后，岭南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器时代上限达商末西周，下限到战国，战国晚期已经使用铁器。”①请留意，前边我们已经提到，尚在周初，越人已向周王室“献舟”了。可见，其经济发展仍与中原一同在发展，且在舟楫交通上还有超出，而且，在这五个区域内，彼此的经济文化交流已经达到相当程度。可见，南越人在“百越”人中，其文明程度是处于领先地区的，把他们作为广府民系源头之一的当地土著，不是侮蔑而是一种客观的肯定，乃至赞誉。

至于“西瓯”，是岭南西部的一支部族，范围大致在今广西境内。南越称其“西有西瓯”，“东有闽粤”，也就是西与他们为邻。这应是“柳江人”所在之处。秦征伐岭南，是从湖南西部沿湘江上游推进的，首战则在西瓯。但西瓯与广府民系似无直接关系，这里就不细说了。同样，骆越地区，从考古发掘的文物来看，主要在左江流域到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也就是今天的广西南部与越南北部。“骆”与“雒”通，《水经注》有：“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雒田，其田随潮水上下，民垦其食田，因名曰雒民。”②由此得“骆越”之名。他们与广府民系也不曾有多少直接关系，且按下不表。

确定了“南越人”作为广府先民之一的土著，我们再来看其文化特征。

先秦时期，这里的文化是以青铜器与几何印纹陶为特征，与磨光石器和干栏式建筑共存。从西周至春秋晚期，为夔纹陶类型文化期；战国时期，则为米字纹陶类型文化期。

其青铜器的器形和纹饰颇有自身特色，又有与周边各越族交流的印记及楚文化、中原文化的影响的痕迹——这已有不少专家撰文论证了。其纹饰中的“王”字形纹，则为岭南才有，铜鼓更

是百越族同时创造的，很见百越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精神。

而稻作农业已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渔猎经济更加突出，故有“陆事寡而水事众”的记载。南越人在河网纵横的三角洲及河流上谋生，进而走向大海，熟习水性、善于用舟，并且很早便掌握了造船技术，远远走在中原之前。为此，他们的道德风尚及民性上，与楚人、中县人大相径庭，“越人之俗，好相攻击”^③，江河大海，滋养了他们崇尚生猛、敢于冒险、勇于开拓的精神。并且很早便着眼于开拓海外市场，还在春秋之际，沿海便已有了相当规模的徐闻港、合浦港。

在语言上，《国语》、《说苑》、《越绝书》均保留了古代南越人的语言记录，南越语以其轻利急切的发音、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动词之后的倒置语序，以胶着语为特点的语词结构，与中原语言及楚语有显著的不同。迄今的粤语，仍保留有以上的特点——换句话说，古南越语正是粤语或广州话的最初的形态，尤其是今日口语，之所以不少用词无法用文字符号标出，正说明古越语源流之远。

语言上的差异，却还赶不上这里原始商品观念形成上与中原的差异。“以水为财”，自古以来，广府先民便把大海视为无限的商机，前所述的徐闻、合浦港，便早早把岭南的物产，如陶器、葛布等输出海外，而来自异域的文物银盒、金花泡饰、香料、非洲象牙、串珠、犀角等亦也到了岭南。当时的海上航线，不仅到达马来半岛，缅甸，而且已远至印度半岛的南部，直至锡兰岛（斯里兰卡），这已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初始阶段了。正是这一原始商品意识，海洋文明的薰风，使南越人走上与中原文化不同的历史道路，由此与中原文化产生反复的，多次的碰撞……

可以说，这才是广府的“底色”，后来的一切，都是在这上面累积的。

第二节 “汉越杂处”中的“越化”

岭南土著，主要是南越人，是广府民系形成的基础或源头，那么，尔后的“汉越杂处”则是广府民系最终形成与定型的主要方式。没有汉民族或中原文化所具备的强大内聚力，这么一支民系恐怕还需要漫长的历史演进才可能定型，或者消解掉。因此，追溯广府民系形成与发展，不能不注意发掘最早记录下的与中原的各种关系。前所提及的尧之子丹朱被“放”来此地，“以变南蛮”，无论是传说还是事实，至少证明记载者本身也在强调中原对“南蛮”很早的关注。

下面，我们继续往下寻索。

《史记·楚世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在西周夷王之时（约在公元前 880 年稍后——而夷王则在周成王之后七世，前已述番禺人向成王“献舟”一事），楚王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这里的“杨粤”也就是后来的广东。这说明，楚人已经开始入粤了，至于规模有怎样，恐怕不会太大，不然，会有较多的，详尽记载。

到了公元前 339 年稍后，即东周显王之日，这又过去了 500 年，楚威王熊商人粤。这里与一个历史人物有关，即高固，南海人，时以才学知名，晋裴渊《广州记》称他曾为楚威王（前 339—前 329 年）相五年^④。《百越先贤传》中有：“高固，越人也，世在越，称齐高奚之族，楚熊灭越而臣服之，是为楚威王。周归楚，为威王相。”其时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楚威王不能尽读，铎椒作《铎氏微》40 章，由高固进献威王，于是楚国文教日兴。或以南越有文事，自高固始。

这是秦发 50 万大军下岭南之前，越为楚所灭的一次记载。这应是“汉越共处”的又一次有一定规模的交融。

同在《百越先贤传》中还有一位公师隅，说他是周赧王（公

元前 314—前 256 年)，即在高固之后不久，南越又有“自立为王者”，因“无疆初避楚”，正是他出主意筑南武城，“而越王不果迁”。越与魏交好，偶“往南海，求犀角象齿以修献”⑤云云。南武城一说有学者质疑，但贡奉一事不会假，可见南北交往已经不再是偶然事件了。

不管怎样，上边的数次记载，对南越的冲击，都不算很大。民族的融合、文化的冲突，有时是需要经历巨大的痛苦的，乃至流血。那么，在秦灭六国，底定南方之际，这一次的冲击，才算是空前的，具有相当规模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

三十三年（前 214 年），发诸尝遣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斥逐匈奴。⑥

《资治通鉴》中则是：

发诸尝遣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⑦

五十万，这在当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尤其是南越地，尚地广人稀，在大军南下之际，“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少转移到了东南亚一带，如今越南、泰国、缅甸等国，大都为越族后裔。因此，这五十万人对越地而言是一个相当不堪的重负。当然，有人考证，并不是都抵达了粤地，不少还戍守在湘桂赣的战略要地。

读《淮南子》，便可见这次民族融合的惨烈过程：

（秦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今湖南靖州西南）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今湖南宁远南）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今江西南康南）之界，

一军结余干（今江西境内）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餉，又以卒凿渠（灵渠，沟通湘、漓二水）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驂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⑧

也许这并不是古粤地第一次遭军事征服，但无疑是一次最大规模也是最血腥的征服。内中的“三年不解甲弛弩”、“伏尸流血数十万”，可见战争的激烈、残酷。而“一军处番禺之都”则表明其大军在番禺的占领。历3年血战，终收复岭南，且在番禺设下了南海郡——这无疑为三郡中最重要的一郡。烽烟甫定，秦始皇更下令已入岭南的兵卒，“行者不还，往者莫返”，全部留守在原处。在屠睢阵亡后，“使尉佗将率以戍越。”由于士卒皆为男性，而当地越人恐怕一时也难以与士卒融洽相处，赵佗亦不得不让秦王遣送一批妇女过来，这样，大规模的移民戍边便得以实现，南下的中原士卒也同样得以逐步地方化了。

而这时，发生了一件对日后与中原沟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这便是灵渠的开凿，当时目的是解决后勤粮草的供应问题，但对后世却功德无量。《太平寰宇记》中记载有：

秦凿渠在（兴安）县南二十里，本漓水，自柘山之阴，西北流至县，西南合灵渠，五里始分为二水。昔秦命御史监禄，自零陵凿渠至桂林，故汉归义侯赵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即此郡。《郡志》：“后汉伏波将军马援开湘水为渠六十里，穿度南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旧渎耳。至唐宝历，渠道崩坏，舟楫不通，观察使李渤遂垒石造堤，如铍嘴劈水分二，水置石斗门，因便制之，在人开闭。开漓水则全入于桂江。拥桂江则尽归于湘水。又于湘水凿分水渠三十五步，以便行

舟。⑨

这一来，由湘水至漓水，又经桂江、西江，水运便可以直达珠江三角洲了。这对岭南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意义的。

因此，第一次大规模的“汉越杂处”，当从此时算起。

纵然赵佗是中原来人，但由于长期生活在以越人为主的地域，再加上南海尉任嚣临终时，得悉秦王朝已朝不保夕，“恐盗兵侵此”，授意赵佗立国，独立于中央朝廷。赵佗则把握住机会，立即封闭通道，聚兵自守。同时，将秦所置的官吏一一抓了起来，绳之以法，亲派党羽取代。

而后，出兵桂林，象郡，把整个岭南归于他的统治之下，即宣布建立“南越国”，并且自立为“南越武王”——这是约公元前 205 年的事，终于实现了任嚣的临终嘱托。

从国名便可得知，赵佗并不认为自己是中原人，就要实行汉化的政策，相反，包括他自己，也“越化”得相当可以了。

三年后，刘邦战败项羽，登基称帝，但内乱未平，无暇顾及南越国的事。过了十年，即高祖十一年（前 196 年），中原平定，百废待举，为了避免再动干戈，让百姓休养生息，汉高祖采取了封立的政策，以朝廷的名义封赵佗为“南越王”，既承认既成事实，又确立其为朝廷属国。可当他派陆贾出使抵达番禺时，陆贾见到的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县人的赵佗了。

《史记》、《汉书》中称，当时，“尉佗魁结箕倨见贾。”原来，南越人“椎结踠踠，乃其旧风”，即把头发结成椎状，为“椎结”，而伸两脚而坐，则为“踠踠”，不似中原人，不结椎发，坐态为跪坐——史书有载，由于古人跪坐一久，“未尝箕股榻上，当膝处皆穿”，⑩可见越人的坐法与汉人坐法不一样。《论衡》更称：“南越王赵他（佗），本汉贤也，化南夷之俗，背畔帝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

这一事实说明，即便是秦发五十万士卒入粤，对于南越文化而言，这中原文化当时仍很难在此称得上为强势文化，而南越本根文化更不一定是弱势文化，正因为这样，南越人才令中原来的赵佗及其部属，迅速地同化——即“越化”了。有人认为赵佗是出于“笼络南方越人的需要”，“有利于他的统治”，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从根本上，当时的汉文化内聚力，远远还抵御不了越文化的离心力，本来，海洋文明就不同于中原文明，不承认定于一尊的，而始终为一开放的态势。所以，越化是一种必然，而不仅仅是需要。

这一“越化”的过程，也为后来广府民系最终形成、广州几度漂移于中央集权之外提供了最早的依据。这也是海洋文明对塑造广府民系及其民性、文化埋下的伏笔——“山海经”的对外一面。

第三节 广府民系的“汉化定型”

平心而论，也只有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全国的文字、法律、货币、度量衡之际，中原文化才逐渐形成强势文化。由于秦王朝的短命，汉初实施黄老学，直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对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原文化才最终作为强势文化，在岭南产生重大影响。也只有这个时候，“越化”才被削弱，汉化方可加强。

其时，广府民系，也才由于汉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才最终“汉化定型”。

事实上，广府的“广”字，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用在岭南这片疆域上。这固然是“得名”，却可“循名责实”，最终完成了广府民系的内塑。

在赵佗的“南越国”，显然不以中原为尊，在汉初之际，一

度称臣，又一度反叛，汉王朝也始终取一种又拉又打的姿态，直到汉武帝才最后灭了南越国，将岭南府治北移至广信——广信则因汉武帝一语“初开粤地宜广布思信”而得名，取“广布思信”之义。

应当说，南越国之际，“汉越杂处”，越是处于高势能的位置上，所以连赵佗都越化得相当可以，就不用说一般的中县人。换过来，到了以广信作府治之际，“汉越杂处”，汉则换到了高势能的位置上，对越实施了汉化。“越化”可以说是入乡随俗，百越文化又本身是多元的，松散的，因此，这时说民系形成则依据不足，只有到了广信府治时期，广府民系才有了内聚力，从而得到定型。

当年陆贾说和赵佗时，南越国正显示出对中央王朝无可否认的离心力，这在汉王朝当时也是无可奈何的，军事压迫，由于连年征战，只能是虚张声势，赵佗也不买账，陆贾怎么说刘邦了不得，赵佗也只是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也就是说，如他参与中原战事，不见得就输给刘邦。陆贾惟有以劝赵佗毋忘自己是中国人的根本，且认为这足以说动赵佗：

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俗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

再实施胡萝卜加大棒的诱逼：

天子闻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诛暴逆，将相欲移兵而诛王，天子怜百姓新劳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王冢先人，夷灭宗族，使一偏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①

《史记》中称：

于是尉佗（佗）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屈蛮夷中久，殊失礼义。”⑫

话是这么说，陆贾表面游说成功，并且升了官，可南越国对汉王朝的臣属关系，却不是就那么牢固的，到了高后四年，便因中原断绝铁器供给，这一君臣关系即告破裂。发动“叛乱”，自称为“南越武帝”，拓展疆域，东至闽越，西抵夜郎，俨然一东西万余一大国矣。直到高后死，陆贾奉文帝之命再度来说和，才偃旗息鼓。赵佗主政南越 70 年，岭南基本上是安定的，中央王朝几乎没有多少干预——仅高后禁运铁器一事为插曲，所以，南越国一直是自行其事，没有多少“汉化”的有力措施，尽管赵佗被一再提醒为“中国人”——当时称中原人即为中国人。

赵佗死，凡传五世，经 93 年。及至汉武帝，国力增强，边患不再，这便着手解决南越国的问题。终于找到借口，发兵南下，翦灭颇得越人信赖的二朝元老吕嘉，这才真正一统中国。

当时汉武帝正东巡至左邑桐乡，听说南越已灭，喜形于色，便把所在地名改为“闻喜”。破南越大军，乘势臣伏夜郎，扫荡东越，从此东南沿海至西南，均在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了。

汉武帝着意经营岭南，将交趾府治，北移到了广信——广信正处于漓江下游桂江与西江交汇处，而秦时正凿遍了灵渠，沟通湘水，使来自中原的水路得以贯穿，无疑，从这里去施加来自中原的影响，实施中央政权对岭南的统治与改造，都比原南越国的番禺要有利得多，毕竟，刚刚灭掉的南越国仍留有不少遗患，番禺可谓危机四伏。

就这样，从西汉至东汉，直至三国之际，广信作为岭南的府治所在地，持续有 375 年，将近有四个世纪。

而这四个世纪，对广府民系的“汉化定型”无疑起到了最重大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作用。汉文化已作为强势文化，加上得

广信之地利，更具有高势能。而湘漓水路，又进一步在这400年间，大批引入了中原人，即汉人，在这里实施统治。开岭南经学之先的“三陈”，打的正是汉文化印记，后来，南海、苍梧诸郡，更是“风序泱泱，衣簪斯盛”，以汉文化为尊，且蔚然成风了。来自中原的学术文化如此，其制度文化、伦理观、城市格局等，也同样对岭南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这是借助强大的中央政权才产生的。一旦中央政权被削弱，这种“汉化”色彩又会相对让位于“越化”之后的海洋化了。所以，南北分裂之际，府治便又从广信拉回到了番禺，番禺后来更成为了广州，雄踞于全国对外交往的港口之首。这在后文将另有述及。

还是回到“汉越杂处”上。

广信时期，应是由南越国的“杂处”走向了交融或融合，这才形成一个民系，不再分彼此。广府文化也成了官方文化，强势文化。近四个世纪的和平环境——不排除局部的叛乱，但每每能慰诱招降，化干戈为玉帛，更加快了这一融合的过程，尤其是东汉初年，五岭中，“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⑬更促进了汉越的交融。

其间，有任延与锡光二太守，致力于传播中原礼义，被称赞为“领（岭）南华风，始于二守焉”^⑭。任延与后来另一太守陶基，还全力设立学校，传播中原文明。

在隋唐文明前夕，岭南更有著名的洗夫人的业绩，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地越人是如何积极参与这一“汉越交融”之中的。洗夫人为高凉郡越族一支俚人女渠帅，她与汉人交往，“诚约本宗，使从百姓礼”，让俚人上层社会较快与汉人礼仪合拍，促进了俚人社会的进步。她又亲自与汉联姻，与高凉郡太守冯宝结为夫妻，积极推行先进的制度、礼仪，从而使岭南“渐袭华风，休明

之化，沦洽于兹，椎跣变为冠裳，侏离化为弦诵、才贤辈出、科甲蝉联，彬彬然埒与中土。”^⑭

这仅是一例。

显然，汉越向更深的、更大规模的融合，在上千年间不曾停歇过。因此，广府民系在广信时期“汉化定型”后，也绝非一成不变，仍在发展之中。所谓“汉化定型”是指其凝聚的最初结果，而非固化，否则，纯然的汉化，也就不会有一个汉民族中这么一个颇具个性与特色的民系了。广府民系形成后，事实上，在后来的漫长历史中，仍有地域的变化乃至族群的变异，但其根性或本质可以说是相对稳定了的。

为此，在这一节中，我们大可以作出这么一个并非武断的结论，这就是说，古百越中，南越人是广府民系的主要源头，而广府民系则是在“越汉杂处”走向“越汉融合”中得以形成，广信时期正是广府民系“汉化定型”而凝聚产生的重要历史阶段。

写到这，很多人会要问，如今，一般人都认为，广府民系是形成于宋明年间的珠玑巷阶段，广府人视珠玑巷为祖上开基的圣地，这又怎么解释呢？

第四节 汉民族色彩的强化（一）

要了解广府民系的形成，不研究其“开基”地珠玑巷，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上的广府居民，其族谱、家谱，大都声称自己的远祖来自于珠玑巷，有人甚至认为，珠玑巷移民后裔，“约占今日整个广府民系人数的60%。”^⑮这个比例无疑是惊人的。然而，人们不禁又会反问，在宋末元初珠玑巷人迁徙至广州周遭之前，广州已有的原住民究竟还存不存在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在这之前，广州已经在南北朝至唐宋间，非常兴盛，人口众多，而且，说的也是广府方言了，也就是说，广府

民系早已生息休养于广州周遭了。珠玑巷人南下，无非只是又一次整合的过程，不能说有了珠玑巷人，才形成广府民系。所谓60%的结论，显然有点言过其实了。

那么，为什么又有那么大部分广府人，仍认为珠玑巷是他们的“开基”之地呢？

首先，无可否认，宋末元初，是有不少居住在珠玑巷的中原人，被迫再度南迁，抵达珠江三角洲。其实，这样的南迁，在这之前或之后，都或多或少发生着，只是这一次是最大规模的，较著名的便是日后学者反复考证的罗贵率33姓97户人家离开南雄珠玑巷南下的历史记载。因此颇具代表性。

其次，我们也要看到，早在南北朝之际，南雄、始兴、曲江一带，便已是中原人南下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根据当年户籍记载，这里人口已经相当兴旺了，吴就曾置始兴郡，府治在曲江，阴铿所存不多的诗中，就有几首写到始兴。到唐张九龄，史志上均有一笔，为“唐开元四年，张九龄开凿大庾新路”。在大庾新路未开通前，岭南与中原的联系，一是水路，靠灵渠沟通湘、漓二江，迂回曲折，极为不便，绕道至南岭的西部，而且常因年久失修而中断；二是陆路，由连州而桂阳，或经武水上泷口，一有战乱便封闭、断绝了。这都大大地限制了南北往来。大唐亦有故道，但如史载：“初岭东废路，人苦峻极，行径冥缘，数里重林之表；飞梁崕截，千丈层崖之半。颠跻用惕，渐绝其元。故以载则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①⑦}只是因张九龄“缘磴道，披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坡险之故，”^{①⑧}利用农闲，终凿成全长15公里“坦坦而方五轨”、“有宿有息；如京如坻”^{①⑨}的新路。从此，最艰难的险径，一下子变成了南北沟通的最便利、最重要、最快捷的大道。后宋人余靖《武溪集》笔下如行云流水：“……溯大江，渡梅岭，下浈水，至南海之东西江者，唯九十里马上之役，余皆篙工楫工之劳，全家坐而至万里。故之峤南虽三

道，下淡水者十七八焉。”^②可见，大庾新路，一下子涌入了入岭南的“十之七八”的客旅。

这一来，在大庾新路南，即南雄一带滞留的中原人也就更多了，张九龄后裔也住在这相当长时间，如今珠玑巷出名的张昌故居，便是他后人所筑。甚至珠玑巷得名也缘于此。据清初屈大均著《广东新语》：“珠玑巷得名，始于唐张昌，昌之先，为南雄敬宗巷考义门人。其始祖辙，生子兴，七世同居。敬宗宝元历元年，朝闻其孝义。赐兴珠玑条环以旌之。避敬宗庙谥，因改所居为珠玑巷。”从这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其旌表的，正是人口繁衍、家族和睦这样一种中国人的伦理观。张昌是张九龄第十四世孙，后张家也于宋末元初南徙至新会、开平等地，据称此间张性已有 20 余万人了。

由此可以断定，唐宋年间，珠玑巷周遭，已聚居了更多的来自中原的汉人。至于珠玑巷南迁中一则关于胡妃的传说，因史实关系，留待后边关于文化发展一节再谈。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仅录张昌一史实而未收胡妃传说，自有道理。

但话又说回来，无论南岭广东一侧在这些年间聚居或作短暂停留、休整（其实应是有来有去）的中原人，乃至士族再多，但从当地发展的程度看，是不可以与当时广州相比，人数也不可能很大，南雄一带作板块位移，也不可能把珠三角原住民大部挤走。因此，把珠玑巷移民定位为南北交融当中的一次整合而非广府民系的最后形成，则是更合乎历史事实的。

珠玑巷人南迁后主要居住地是珠江三角洲，由于他们南下正是中国积弱，外族人主中原的历史转折点，因此，也就激起了他们更强烈的汉民族的自尊，于是，对珠玑巷这一祖居地，更视为一个历史圣地，甚至带上了准宗教色彩，这也无疑影响了周遭的广府人，尤其是先后来到广东融入广府民系的中原人，彼此都有了认同感，而且相当强烈，以至并非经珠玑巷而来的，他们也自

觉不自觉地认下了这个“开基”地，以证明自己汉民族的血统。其实，在这之前，“粤人”每每与“汉人”有所区别，并不以汉人为尊。这也说明了一个融合过程。此外，有人认为，珠玑巷是“广州士族俱发源于此”的地方，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素质，尤其是宋代，其后儒社会有着很深影响，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有相当造诣，来到珠三角后，也就对当地产生辐射，如南宋以后，广州周遭的九所书院，均为珠玑巷人所兴……

如果说，广信时期，广府民系属于“汉化定型”内聚而成的话，那么，珠玑巷，则是从思想上进一步强化了“汉化”的进程，是他们一个精神的故乡。因此，关于珠玑巷传说还是放在广府文化形成与发展中，作为一个思想与情感的轨迹去认定与理解更合适一些。

关于民系的形成，我们就说到这里了。似乎更多讲了来自中原文化产生的内聚作用，不错，这的确是广府民系的粘合剂，没有这一条不足以凝聚为一个民系。不过，作为海洋文化，始终又是这个民系的开放姿态，没有这一条，也不足以使广府民系与其他民系区别开来，有着自身五彩斑斓的特色，从而充满勃勃生机，在近代对中国主流或整体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在此特地重复或强调广府民系形成过程中海洋文化的作用，更是非常必要的。毕竟，这才是这样一个民系的底色或本色。

第五节 汉民族色彩的强化（二）

在珠江流域内，除开广府民系遍及两广外，还有客家民系，在两广也占有相当比例，另外，人数众多的“福佬”民系，也是不可以忽视的。如以拥有这三大民系的南方汉民族人口计算，广府人约占一半强，客家人约占三分之一弱，福佬人则有六分之一多。

在这里，我们将在珠江流域内形成的另两大民系一并加以探究。

这两大民系的先民，可以追溯到两晋南北朝时期——这也是欧亚大陆上闻名的“世界民族大迁徙”的同一历史背景下。

其时，地肥水美、牧草丰盛的欧亚大草原，遭遇了周期性的小冰川期，来了个千年不遇的大干旱，迫使祖祖辈辈在那里休养生息的匈奴人分别向西、向南迁徙。

慍悍的匈奴骑兵，击溃了里海以东的阿兰人，渡过乌拉尔河、伏尔加河，进入了顿河流域，占领了那里西阿兰人的领土，并让西阿兰人加盟，进攻东哥特人，4世纪70年代，大败并臣服了东哥特人，东哥特人则渡过多瑙河，向巴尔干迁徙，为罗马人所奴役，而他们旋即起义，最后，罗马古城被攻克，西方从此陷入了“死亡之门”——进入千年黑暗的中世纪。

从中亚到南欧，这被视为“世界民族大迁徙”，但这仅仅是其中一半。另一半，则在东亚，南匈奴人渗透到了长城以南，表面似乎归化于晋王朝，却趁“八王之乱”，迅速组成一支5万人的大军，席卷了黄河以北地区并继续往南进犯，引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胡乱华”。其不数年，该匈奴大军尽取幽、并等州，又南取豫州，徙都邺城，控制了整个淮北及中原，古都长安、洛阳尽落他手……随后，东胡族鲜卑，更长驱直入，尽得青、冀、幽、并、荆、徐、司、豫诸州，氐羌族，趁机占关、陇，西取凉州、南临淮水……

这一来，中原的汉民族，尤其是衣冠士族，一批接一批地不绝南奔，出现了史载的青徐流人、司豫流人、秦雍流人。

其中，青徐流人——即鲁、苏、冀、皖的流亡士族，初循淮水而下，过大江，移居太湖周遭，其前锋，则抵达浙江、福建一带。乾隆《福州府志》中有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是

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故六朝间仕宦名迹，鲜有闻者。”可以说，这是福建最早的移民。到了唐末，又一次大规模入闽，则是汉人避“安史之乱”，这次，主要是到莆田落籍。而今，潮汕一带的语言，主要是闽南话；而雷州半岛，则主要是莆仙话，虽然二者从流域角度而言，不在珠江支流上，但仍是珠江文化影响的边缘地区。潮汕一带的“福佬民系”，自是因历朝建制沿革关系而渐渐位移形成的；先秦时，潮汕原属闽越，与福建南部相连，民俗相通，语言无分。至于雷州操莆仙话的福建移民，则是唐宋以来沿着海岸线迁移而来的莆田人。但好笼统将福建移民称之潮汕系亦不妥，因为客家人也主要是经福建迁来的，也包括从莆田迁来的。雷州人是否可划入潮汕民系，则一直有争论。

这便是潮汕民系的由来。

再来讲“司豫流人”，他们则是从豫、冀、晋及黄河沿岸地区南下，涉汝水，下长江，分布于鄱阳湖区……后来，经几度战乱，于唐末黄巢之乱，迁至江西石城，而后福建石壁，粤东梅县，最后，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处，形成一个南下移民的“大本营”——但这并不曾“固化”，到明清之际，又从这里出发，遍及台湾、粤东、粤北、桂西、湘东以及四川等地。这便是无法以地域命名的中国一个最为独特民系——客家人。有人考证他们经历了至少五次的大规模迁徙。但由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是连绵不断的大山与小盆地，而在唐末五代之际，四面均是军事割据的政权，北为钱繆的吴越、李璟的南唐；南为刘龚的南汉；东为王审知的闽，西则是马殷割据的楚，于是，把他们从北方带来的“聚族而居”的家族生活方式稳定下来，语言也相应保留住中原特色。广东有句俗语，称“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而客家人也有“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由此，把中原文化色彩更多地带往了珠江流域。

这便是客家民系的主要源流。

至于“秦雍流人”，则是沿汉水南下，到达洞庭水域，前锋，则溯湘水，至桂林，沿西江到达广东中西部，融入了业已在汉代已“汉化定型”的广府民系之中。

总的说来，无论是潮汕民系，还是客家民系，他们的形成时间，都远远迟于广府民系。而他们则带有更强烈的汉文化色彩，继而进一步影响整个的珠江文化。

由此，在三大民系中，形成了鲜明的文化落差，这在后边我们将详加比较。

而这仅仅属于汉文化的范围之内，虽说汉族人在珠江流域占人口近 80%，但是，其他民族则更具特色——他们也大都同样是由古越族演变而来的，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主人，文明的创造者。

而三大民系的风俗、民情，包括语言，也同样渗透有这些少数民族的影响，如粤方言中，就有不少壮语，客家语中，也间有瑶、畲的语言。

第六节 水与土著

壮族、瑶族、畲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化，在珠江文化圈内是一道独特的美丽的风景线，构成了珠江文化绚丽的光环，在论述民族、民系源流时，更应浓笔重彩。

除开几个民族，如回族等外，珠江流域大多数少数民族，均是由“百越”演化而来的。在先进的汉文化辐射下，加上宋人的怀柔政策与元代的铁腕政治，流域内古越族大都汉化，使宋之前，隋唐乃至秦汉史藉中屡见的“蛮夷”、“俚”、“僚”、“俚僚”等古越族分支的名称，也就几乎不再有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专用族称。

壮族，即是生活在桂西、滇东南左右江、红水河、南北盘江等流域的少数民族，前身为秦汉时的骆越与西瓯越人。

瑶族，则分布在两广、云贵，包括湘赣一带，其中广东有连南、乳源两个瑶族自治县，他们亦有被称之为“莫瑶”，为古代百越支系东瓯、闽越中分化出来。

畲族，与瑶族先民有较亲的血缘关系，是闽越族人的后裔，唐代前被称之为“蛮僚”、“洞蛮”，主要分布在粤闽交界处。其在历史上经多次迁徙，自称为“山客”、“山哈”、“山达”、“哈”与“达”均是畲语“客人”的意思。

广西的苗、侗、仫佬、毛南、水族等先民，也在这个期间由部族向民族演化，并在区域分布及文化格局上初步定型。

我们就主要的几个少数民族探讨一下。

首先，应是壮族，过去被称为“僮”，是我国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广西是壮族自治区，是壮族人聚居之地，少数分散在云贵川及广东、湖南。壮族属水居部族。早在汉代刘安的《淮南子·原道训》中，有这么一段，称其前身的骆越、西瓯越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短绁不裤，以便涉游，短袂攘袖，以便刺舟”，说明他们水上生活的习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诗云：“土民稀白首，峒主尽黄巾……红旗围卉服，紫绶裹文身……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引自《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尽知其水性。又清李绂《广西道志》更释其义：“粤之顽民，性喜攻击攘突，故曰‘僮’（音同撞）。”这是自宋代，由“厘”或“厘僚”始称“僮”的解释。由于“僮”颇有贬义，故解放后定名称时，改为谐音的“壮”。

壮族人还有过自己的文字，有人考证，早在唐代，壮族先民便借汉字的形、音、义亦创造了方块壮字，称“土俗字”，宋代流传于民间。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有：“边远俗陋，牒诉卷约，专用土俗字，桂林诸区皆然。”到清代以后，由于统治的

严酷，加上其他原因，壮族无法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古壮字也残缺不全了，不大通用，失去了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交流工具的功能。不过，现存的广府方言，即白话，也就是珠江流域的主要语系中，仍有不少壮语的成份，如“额（骗）你”、“徙气——白费劲”……等等。

瑶族，也是珠江流域的古老民族之一。目前对其是岭南土著还是岭外迁来的长沙武陵蛮后裔尚有争议。他们视槃瓠为最早的祖先。这又与畬族相一致。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论证了瑶族起源，认为是从东瓯，闽越分化出来，自东江流域向西北迁徙。亦有人进一步证明：“信奉槃瓠的瑶族是东瓯人的子孙，古越人的一支，闽浙淮一带则是他们早期的故乡”，“春秋之际在东南沿海一带的越瑶人，为畬瑶两族的共同先民。”

瑶，又名莫瑶，魏征撰《隋书·地理志》称，族名莫瑶，是因为他们“白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名。”刘禹锡还有《莫瑶歌》：

莫瑶自生长，名字无符籍。

市易杂蛟人，婚姻通木客。

星居占泉眼，火种开山脊。

夜渡千仞溪，含沙不能射。

广东谚语中更有“瑶人住山头，壮人住水头，汉人住街头。”

畬族同样是一个历经迁徙的古老民族，故有“山客”自称。亦有人认为他们是客家先民之一。史籍文献上称之为“峯民”——“峯”者，深山野岭也。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峯人》中称：“峯，巢居也。”“其人耕无犁锄，率以刀治土种五谷，曰刀耕。燔林木使灰入土，土煖而蛇虫死，以为肥，曰火燔，是为畬蛮。”

畬族人长期保存记述自己民族源流与迁徙的手抄本歌《高皇歌》，其主要内容为，东海一条苍龙，名龙麒，又名龙犬，投生

入世，名叫槃瓠，是高辛皇帝的名将，迭立奇勋，故高辛皇帝招为女婿。小两口了不贪名禄富贵，去岭南凤凰山区，耕山狩猎，自得其乐。生3子1女，长子姓盘，次子姓蓝，三子姓雷，女儿则嫁给一位姓钟的青年。从此畬族以此四姓为姓。槃瓠其实为狗的尊称，两广不少地方以狗为图腾，当与此不无关系。《高皇歌》中更有“广东路上有祖坟”、“进出蓝盘雷祖钟”的歌词。

……

综上所述，除开汉民族三大民系外，珠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大都与水结缘，显示出更多的水文化特色，其源流，与水难解难分。这也如众星拱月，为作为珠江文化的海洋文明特色作出烘托。我们以广府文化作为珠江文化代表重点阐释，也就更顺理成章了。

注释：

①徐恒彬《南越族先秦史初探》、《百越民族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②《水经注·叶渝水》，引《交州外域记》。

③《汉书》卷一，高帝纪。

④《太平御览》卷一八五“厅事”，第897页。

⑤《百越先贤志》“公师隅传”。

⑥《史记·秦始皇本纪》卷六，第253页。

⑦《资治通鉴》卷七始皇帝三十三年，第242页，中华书局校点本。

⑧《淮南子·人间训》卷一八，第203页。

⑨《太平寰宇记》卷一六二“兴安县”，旧学山房藏版。

⑩同上，卷七〇六“床”，引《唐高上传》，第3147页。

⑪⑫《史记·陆贾传》卷九七，第2697-2698页。

⑬《后汉书·卫飒卷》卷七六，注引《东观记》第 2460 页。

⑭《后汉书·任延传》卷七六，第 2462 页。

⑮《隋书·谯国夫人传》。

⑯《南雄珠玑移民的历史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

⑰⑱⑲⑳见《曲江集·开凿大庾岭路序》。

第三章 珠江文化区域构成

第一节 流域概述

珠江流域，如果从水系划分，不难看出，可以分为西江流域、北江流域、东江流域，以及珠江三角洲四大块。

其中，西江流域的范围最大，西起云贵高原，东至广东三水交汇处，跨越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个省。作为珠江的主干流，全长达 2200 多公里。西江源头在云南省沾益县境内的马雄山，海拔 2444 米。西江上游北盘江、南盘江横割山体，跌落而下，仅南盘江就有九龙山峡、星宝滩峡、陆良峡、天山关峡、雷公滩等急滩跌水达 91 处。南、北盘江汇为红水河后，又有大沙荆滩、岩滩、恶滩等急滩跌水 273 处。及至西江中游的黔江、浔江，也形成凹陷颇深的条状谷地。西江的柳江谷地由于云贵高原的抬升，形成南北走向的河流，汇集众水注入黔江；西南的右江谷地，也同样自西南向东北流入浔江。由于一千万年前第三纪末地面上的总趋势作用，西江中流南北两面的河流，均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注入浔江，由此，形成黔江、浔江段众多的峡谷、险滩。原西江干流下游河道，与广西盆地水系并不相通，只是第三纪早期喜马拉雅山运动使大容山抬升，广西盆地也随之升高，于是，流水切开了苍梧峡口，才与当今下游沟通，浩荡东去，形成今日西江水系。西江到广东封开会合了贺江，而后形成三榕峡、大鼎峡、羚羊峡，水深竟达 80 米。

北江水系，早期地质史与西江流域一样，有着众多的东北向构造盆地，原各河道在这些盆地几乎平行流过，互不相连。只因

喜马拉雅运动之后，它们才沿南倾的占地表强烈下切，流入韶关盆地与英德盆地，冲破岩层坚硬的飞来峡，进入清远盆地，再下三水与西江汇合。在这之前，也是峡谷、险滩众多，有武水乐昌峡、九龙滩等。北江是五岭南北交流的主要通道，尤其是唐代大庾通道开通后，北江在连接南北交通的作用日益突出。

东江流域则是 2 亿年前中生代就发育于东北——西南走向的断陷盆地，喜马拉雅运动冲击的余波令东江断裂两侧形成多级夷平面，即被流水侵蚀，削低了的山地。流水沿山地两侧下切，把处于这条断裂带上的河源、灯塔、龙川等盆地切穿且贯穿起来，形成东江干流。这里险滩峡谷发育不如另两大水系，但古生代地层分布广，尤其下游河段，河床覆盖层深厚，利于垦殖，所以东江支流增江金兰寺新石器文化遗址，是珠江远古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约在 2 万年前第四纪全新世前后，今日之珠江三角洲地区已具深切河谷系统，河流携粗粒泥沙在大陆架上沉积。距今 1.7 万年至 0.6 万年前，海面上升，海水入侵，淹没大陆架平原，且伸入内地，形成珠江口古海湾，使原来深切的河谷系统逐渐为河流冲积物所淤积。到 6000 年前，海平面上升到最高位置，河流溯源堆积过程结束，古珠江三角洲也就基本形成了，并开始有了人类活动。随着海岸线不断南推，珠江三角洲不断扩展，土地增加，遂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以上概述，均根据司徒尚纪的《珠江传》。

流域最广的西江，被视为南方的古文化长廊，及至广西、广东境内，尤其是二省交界的广信，更是珠江文化或岭南文化的古都，曾在汉代有近四百年的府治史，广府民系的形成与发育，也全在这一文化长廊上，并成为珠江文化的代表。

而北江流域与东江流域，则主要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区域。东江流域一侧的梅州，是客家民系的大本营，亦被视为“客都”。

不过，北江上游的南雄珠玑巷，则为广府民系当作他们在南方的开基祖地。一般来说，客家民系，在珠江流域内，是沿山区分布的，流域内各省区均有覆盖或形成方言岛。

无论从区域之广、人口众多，还是历史渊源、文化势能而言，广府文化作为珠江文化的代表，都是无可争议的。

因此，我们在论述珠江文化之际，包括其中的区域文化，也就着重放在广府文化区域上——它不仅在广东占多数，在广西，也包含其沿西江延伸而去的桂东南，以及整个的广西南部，即包括梧州、苍梧、贺州、南宁、柳州、邕宁、崇左、宁明、横县、桂平、平南、玉林、北流、容县、岑溪、藤县、蒙山、贵县、昭平、博白、钦州、合浦、浦北、灵山、防城、北海等县市，人口亦占全省近40%，即1500万左右。加上广东的4500万，总数达6000万。是整个流域汉族人口的一半左右。

因此，在这一章，我们集中讲文化上广府区域的形成。

第二节 珠江文化的代表——广府区域的形成

广府的区域，自古以来虽说有所变化，但大致的范围，尤其是其中心区域，可以说还是相对稳定的。广州最早得名，是三国吴分设交、广二州管治岭南，这在前边已经述及。我们可以从广州博物馆编的《广州历史文化图册》中看到交、广分治后，作为广州的范围，其时，广州东至镇海角，也就是当今广东东部再延伸至临近厦门的一处海角，略突出至福建一角，但基本还是广东东部范围；而西部，则基本上是广西的西部边界了。把广州分为广东、广西两部，是后来的事，可以看得出，广信，恰好正处于广州的中心位置上，所以，后来它也就成了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了。不过，往北，别说南雄、始兴、曲江，英德，以及桂林，均划在广州之内，三国时，均为荆州属地，这些地方，倒是较后

才并入广东、广西的版图。但不管怎么说，边界略有变化，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广府区域大抵就是这样了，上述版图，至南朝也大体如此。可以说，自古以来，广府区域，也就基本上限定在岭南地区。广府文化，是一种相当稳定与标准的区域文化，不似客家文化，处于流动之中，遍及中国南部十余个省，属散离子结构状态。广府文化只是两广的区域内。

这里，我们重点只讲广东境内的广府区域。虽然在古代，广府区域最早范围揽括了整个岭南即两广，且早在广府民系逐渐形成之际，即南越人与中县人“杂处”时，两广便是广府先民生存的范围。其中心开始当是在番禺，并由此得“广州”这一州的名称。

但作为区域的空间即不是一成不变的，作为一个民系的生存空间，更不曾固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民系的生存空间总是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诸方面的因素有所变易。地域的开发，可能使民系的空间拓展，却也同样有可能出现收缩与集中。广府区域属于后一种情况，由于客家民系、福佬民系入粤，广府人则相对向广东的南部与西部汇聚，从而形成相对集中的几大广府区域，而不再是整个岭南范围了。虽然广府区域仍是岭南的中心地带，广府民系仍是岭南人口最多的一个民系，广府方言也一直作为岭南的“官话”……

直到今天，我们主要以方言为参照，来界定广府区域。纯粹讲广府方言或粤方言，或以这种方言为主的地区，主要在广东省的中部与西南部，也就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区域、及以原广信、今封开及肇庆即沿西江展开的区域，以及粤西南的高阳区域，还有广西东南与南部。

当然，方言不是唯一的参照，包括习俗、艺术形式、道德观念、社会结构形态、经济特色等，都属于这个参照系内。一个民系生存的空间，总是以时间为维度发生变化的，这里，也仅是以

“此在”作为今天的依据，兼顾其发生地及主流的演变。

根据若干学者的研究，目前讲广府话的，在国内大约有6000万人，其中广东占七成，广西有三成。广东境内，讲广府话的人约占一半，居全省首位。广府人居住的区域，约为全省的四成以上。主要有如下几大区域：

一、珠三角广府中心区

二、西江广府连结区

三、粤西广府区

四、吴化广府延伸区

其间，珠三角中心，学者亦另有分出四邑作一个区域，即南区。^①

珠三角中心区，包括广州、南（海）番（禺）顺（德）、佛山、三水、清远、龙门、花县、从化、佛岗、东莞、宝安、深圳、增城、中山、珠海、英德、高明等县市。

四邑南区则有鹤山、新会、江门、开平、恩平、台山、斗门等。

西江区，则有四会、肇庆、广宁、怀集、高要、德庆、封开、郁南、云浮、新兴、罗定等。

粤西区则为阳江、高州、茂名、信宜、廉江等。

吴化区则是吴川、化州、湛江间三角地。

其间，珠三角中心区人口最多，为1000多万，其次为西江区，有七八百万，再就是高阳片；在500万以上。四邑区有约400万，而吴化区则上百万。

同是广府区，但各个大区的区域历史、特色、人文景观，也各有不同，比较起来，也可以看得出历史的变迁轨迹及文化的传承。

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南越人最早开发的地方，广州又是三江交会之处，自然形成了广府的中心区域。而西江区，由于早

年中原汉人大都因有灵渠，取道湘漓经湘桂走廊与贺江南下，广信又曾作为府治，这也实际上成为了中原文化进入岭南的最早通道，对凝聚形成广府民系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四邑位于珠三角南面临海之处，所以才成为广府区里最著名的侨乡——论人口，海外足以够另一个四邑了，其汲取外来文化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下边，我们择主要区域进行一些讨论与比较，以便对广府区域有一个较全面与深入的认识。广西的广府区域，前一节已述及，后边就不重复了。

第三节 广府中心区：珠三角

首先，我们锁定珠江三角洲广府中心区。

珠三角作为广府中心区，这是显而易见且无可非议的。历史上它开发最早，是南越人赖以生存的地方，并且很早便有了农业、渔业，耕作与渔猎并重。今天，则更不用说了，它是整个岭南的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及政治中心，这也是长期历史所形成的，周围的城镇星罗棋布，人口密度为全省之最。而且，广州又一直是千年来对外开放的城市，堪称“国门”，哪怕是“海禁”最甚的年间，也不能不网开一面，把广州当作惟一例外，允许外商出入。要动摇其中心地位，殊无可能。

广州的优越地理，是使它成为这个中心的重要自然条件，它位于珠江三角洲北部，是东、西、北三江的汇合处，又临近珠江口，面对南海，拥有远洋与内航的两大优势，这是岭南范围内无任何城市可相匹比的。广州地处亚热带，北回归线在北部横贯而过，气候温暖，四季如春；雨量充沛，草木欣荣。广州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已有考古发现为证。若按西樵山细石器遗址年代测算，更可上延至七八千年。广州有个

美丽的传说，也足以说明它历史的古老。这便是广州别称“羊城”的来历。传说在周代，这里旱魃肆虐，田地龟裂，果粒无收，百姓苦甚。一日，南海一方的长空传来悠扬的音乐，且出现五彩祥云，云上有五位仙人，各穿不同色彩的衣裳，分骑不同毛色的仙羊，羊口中衔有一茎六穗的稻谷，降临楚庭——据广州旧志称，周惠王令楚熊子恽统治岭南，南越臣服，作楚庭以朝，故当时此地称“楚庭”。仙人祝福此地永无饥荒而去，留下五羊化为石留在山坡上。故有“五羊衔谷，萃于楚庭”一说。传说固然是传说，但也是人文历史的一个折射，也证明广州此地早年开发稻作文化的悠久历史。

广州迄今仍有“疍民”，即水上居民，旧时这是个贬称。《广东通志》载：“疍民是当年越人抵抗秦始皇统治的遗民。”他们以渔业为生，当年，恐是属不愿与“中县人”融合的南越人的一部分。北上“献舟”于周成王的也应是他们，其造船技术在当时也是远远高于中原的。否则，无以作“献”。

广州自魏晋南北朝得名并设府治便有了一个突飞猛进的发展，迅速超过徐闻等，一跃为中国第一大港，在对外交流中起着举足轻重且无可替代的作用。达摩于广州登陆，揭开了与亚洲文化交融的新世纪，佛教迅速在岭南及整个中国兴盛。但更引人注目的是对外贸易，汉武帝灭南越国后，便组织大船队出南洋了。可见“海上丝绸之路”早已开辟。两晋时，更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一民谣。刘宋时期“舟舶继路，商使交属”。②萧梁时期，“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③外商更“久停广州，往来求利”，且已有留下成为侨民的……到了隋唐，广州更成了国际贸易的大都会，作为外向型经济，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均非常发达，海船可长达20余丈，载客六七百人，外贸高潮更是一浪高于一浪，“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船荐臻，倍于恒数”，④“蕃商大至，宝货盈衢”⑤……

就这样，广州从古番禺的越式、楚式及汉越混合式的城市，进而吸收了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及西洋文化，从而形成了它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特征。到了宋明时期，由于汉文化的进一步强化，更是人文蔚起，盛况空前，书院的设立，举人进士的增加，都是前所不能比的。商贸的拓展，使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明清间，广州更是“一口通商”，成了外贸受惠的唯一大都市，海上丝绸之路，则向全球延伸了。在鸦片战争前，已实现了广州与世界海上运输的大循环。

到了近代，广州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便愈加凸出了。现代工商业在这里的兴起，尤其是民主革命的启动，更使广州数度走在中国革命以及经济建设的前列，涌现了一大批走在时代前边的伟人、巨匠及奇才。及至改革开放，当年作为人文渊藪的南番顺，更一跃而为珠三角经济奇迹的发生地，广州保持了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商品经济的发达，更使这里的市场发育较内地“先行一步”，迅速与世界接轨，广东的经济更一直保持在全国第一位上，财税贡献尤巨。珠三角经济区的形成与拓展，孕育了巨大的生机与商机，而在文化上，也显示出了新的特色。这些，我们留待后边专题阐述。总而言之，作为珠三角广府区域的中心，广州已不仅仅是华南或岭南的中心城市，对全国、对外海，尤其是东南亚，更有其辐射作用。

而在广府区中，与广州相伴的“双子星”则有相距不到三十公里的历史名城佛山。地理自然环境与广州无异，河涌交错，土地肥沃，亦为“鱼米之乡”，而它“肇迹于晋，得名于唐”，是中国文化与亚洲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地点。相传东晋隆安（公元398年），有罽宾国（现克什米尔）僧人达毗耶舍在塔坡岗搭寮传教过。直至唐朝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即200多年后，有人在塔坡岗发掘出铜佛像三尊，遂认为这里是佛家之地，得名“佛山”。于是，便就地建起了一座寺，名为塔坡寺，安放三尊佛

像在寺内供奉，且在寺前立上刻有“佛山”两字的石榜，从此，原地名季华乡便改名为佛山。而后，则逐渐成为了珠江三角洲的宗教中心，所以又有“禅城”之称。一时间，弹丸之地，竟有大小寺庙 148 座之多，而佛山则以庙宇众多而驰名于世。较之广州，它则分担了宗教中心的“职责”。⑥

唐宋年间，佛山已是国内繁华的手工业与商业重镇，与江西景德镇、湖北汉口镇、河南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到了明清两朝，即十四世纪之后，佛山更跃居全国四大名镇之首，成为了我国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列为全国“四大聚”之一——北为北京，南则佛山，东系苏州，西在汉口，又称之为“四大都会”，为广州的外贸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其商品已远销到全国，以及南洋、欧美、南亚、东非等地。⑦

当年季华乡改为佛山乡，宋代又改为佛山堡，元代开始，则改称为南海县佛山堡，清代建制为佛山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 年则改镇建市，称佛山市。改革开放以来，更成了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标兵，跃居全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前 10 名的名城。

“南番顺”历来是珠江三角洲核心区域的概称。在经济发展大潮中，顺德居“四小龙”之首（另三龙为南海、中山、东莞，同为珠三角范围内），因此，这里则以顺德为代表。早在秦汉时代，这里已有先民开基创业，汉初，则已建有龙眼、石涌等村，逢简亦有西汉遗址出土，陈村也于汉代有名，唐代，龙江大岗圩已是四方商贾云集之地，“唐宋时代各村落集市贸易星罗棋布，形成制度”。因此，这里商品意识早已有所发育。到了明代中叶，顺德建县，其政治、经济、文化，已经走在全国前面了，涌现了一批著名文化人。建县后，为广州府直属，或由广东省直辖。桑基渔塘，是顺德著名的农渔业景观，其蚕茧一度占全省的 80%，塘鱼产量一直是全国淡水养殖之冠。甘蔗产量也曾居全省之首。

而顺德籍的企业家，自近代以来，一直是粤港经济中最为活跃、并形成群落的重要力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顺德的企业，如科龙、美的等，更是迅速打开了国内外市场，成为我国工业最有实力的强势企业集团。这也得益于早早发育的商品经济及商品意识。顺德还被评为全国教育先进典型。

广府区域内，如中山、东莞、深圳、珠海等，均可以有不少史绩、业绩可陈，除深圳我们留在另一节与香港一同谈及外，其他的只好一笔带过了。

第四节 广府南区：四邑

四邑，是指台山、新会、开平、恩平四地，亦有把鹤山纳入，称之为“五邑”，其范围，还可以包括江门、斗门在内，如今的建制，属江门地区。

四邑处于珠江三角洲南部偏西，濒临南海。因属古海湾内，过去的岛屿便成了山岭，与三角洲河涌盘错，交通不很便利。考古中发现，四千多年前便有人在此居住，靠渔猎为生，故有不少石器、陶器文物。古南越人、瑶人居住。从四邑的地名可以看到越人的遗存。如台山一带仍留有含“那”字地名的象那章、那金、那眉、那洪等46处，大多分布于沿海的北陵、那扶、海宴、广海、端芬等地；新会与恩平也有那伏、那吉、那朗、那芬等地名。“那”，在壮侗语的壮、傣语中为“田”的意思。瑶族古代主要在新会郡，县西45里的皂幕山至明代仍是广东瑶山之一。直至民国，恩平等地仍有瑶山记载。沿海则为瑶蛋杂处。远在南朝，甚至在这之前，中原汉人也已经到达这里。著名的俚人首领冼夫人，曾在这个地方活动过。汉人冯融为其子高凉（今高州）太守冯宝娶她为妻。《新会县志》载：“隋罗州刺史冯融墓在新会西南那船迳之古冢岭”，也就是今天台山冲蒌镇朝冲村东的狗冢

岭。可见汉越融合在这之前便已发生了。

隋朝在此设新会县，唐代则置冈州。而今的四邑，大都属原新会或冈州所管辖。台山（旧称新宁）、开平建县于明代，至于恩平，更是很早在三国吴时便建县了。

珠玑巷南迁一说，在这里却可考证到相当的史实。罗贵率 33 姓 97 家南迁，正是到达的冈州，并得到当地的“土人”龚应达、冯天诚等的接待，并联名保结，向冈州立案要求定籍，遂得到了批准。所谓“土人”，从姓氏上看，应是汉人，不过，是先期到达此地与越人融合的后代。在这之后，即宋末元初与元宋明初，尚有一批又一批的中原汉人往此南迁，并落籍于冈州。

迄今，国外仍有称为冈州会馆、四邑会馆的华侨社团，正是沿袭这一历史而来的。

四邑中的台山，有长达 587 公里的海岸线，在中外交流中很早便发挥了作用。宋朝在广州设市舶司的同时，在其濠洲亦设有望舶巡检司。濠洲即今台山的广海。这里是广州对外贸易的必经之道，所以，商船放洋归来，在这里则有寨兵防护至广州。宋朱彖所撰的《萍洲可谈》中有：“广州自小海至濠洲七百里，濠洲有望舶巡检司。”可见，四邑自宋代已人丁兴旺，经济、文化、商贸均有长足发展。至于上下川岛，在 16 世纪初，已有传教士西来，圣沙母略便是先期来到岛上的。紧接着葡萄牙人便把这里作为其早期在远东的商业基地。

四邑人本身也很早向海外发展。还是在唐代之际，黄巢起义军攻占了广州，就有新会人随广州商人出海避战乱，而从此侨居东南亚。明代更有台山人集体移居至东南亚各个国家。19 世纪中叶，美国开发西部，修筑太平洋铁路招募劳工，其中华工的大部分是来自四邑的。到光绪四年，即 1876 年，仅台山人在美国就有 17 万人了。

虽说南番顺在外的华侨也不少，如顺德在外华侨就相当原住

地人口的一半，有四五十万人，但还不及四邑多。如台山现有人口近百万，但旅居国外及港澳的就有 120 万左右，比现住人口还多，分布在 52 个国家与地区，被称为“全国第一侨乡”。新会本土有 80 多万人，而侨居在外的则有近 70 万人。开平人口 60 余万，侨胞却有近 70 万。恩平人口 40 余万，侨胞也有 20 多万。可以说，在外的人口与在乡的人口几乎等量齐观，四邑本土之外还有一个四邑，成为广东乃至全国的著名侨乡。

由于华侨众多，海外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梁启超便是新会人，是“戊戌变法”的两主帅之一；他极力主张改革教制，倡导西式学堂，创办女学堂、创立不缠足会；还提倡“法界革命”、“小说革命”——这均是接受外来文化之故。梁启超也代表了四邑人，绝少保守观念，善于吸收外来文化，胸襟开阔，兼容并蓄，取长补短，为我所用。

尽管华侨在外创业相当艰辛，可他们都不忘造福桑梓。我国第一条民办铁路，以台城为中心，道公益、新会、江门、北街等地，全长 142 公里，是早在世纪初，由旅美华侨陈宜禧发动侨胞集资 275 万元兴建起来的。当时，还想把铜鼓辟为商埠，作为自治特区，孙中山曾颁大元帅令：“派陈宜禧为筹办铜鼓商埠委员”，后这一计划未能实施，亦可见四邑华侨经济建设的热忱。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华侨的热情支持，四邑经济发展更是日新月异，在江门更是办起了自己的大学——可见四邑人重文教的远见。

四邑作为珠江三角洲广府区域的重心，当然不仅仅具有浓烈的海洋文化色彩，当年也有陆王心学的先行者陈白沙名重一时，从学其门下弟子数以千计，“余韵流风恂恂然及数百年”。其承继的中原文化，不曾食古不化，而是敢于创新，勇于独立思考，“求之吾心”，方“能自得”。此外，四邑也一度有大批的客家人居住过，后来因“土客械斗”，清廷干预，把客家人迁移到了粤

西与桂东，这里才罕有客家人，但客家文化作为中原文化的延续，对这个地区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第五节 广府西区：西江走廊及其他

西江流域，对于养育广府文化，完成对广府民系的塑造，实在是具有太重大的意义了。黄伟宗教授关于开发岭南文化占都——封开（即古广信）以及建设“西江文化走廊”，对于广府文化与广府民系来说，都是一个宏伟的、意义深远的文化工程。

无疑，西江走廊，正是中原文化与越文化的结合部，也就是在形成广府文化并凝聚为广府民系中，发挥了根本的作用，因此，研究这个区域的历史，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演变，对深化广府文化的认识，有着关键性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西江，是珠江的干流，三大支流西、北、东江中，无论长度、流量，均以西江为首，其流量达 $11070\text{M}^3/\text{S}$ ，在全国仅次于长江，为黄河的六倍。广东广西境内的支流很多，河网交错，且多为中上游，与南岭大都关系密切，因此，对南北交通线的沟通起着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地理气候环境与珠江三角洲不一样，山川河流交互，盆地厕身其间，地势偏高，气候偏干爽，不似南边的湿热，可以说，相对接近于中原，较易为中原人居住，所以，广府文化早期发育，正托庇于这里。最早生活在这里的苍梧人，便是传说中尧舜时代随丹朱南迁而来，与土著越人结合发展而成的族群。而到了周朝的五羊神话，更有另一说，说是七位仙人牵了七只羊降临粤地，五只去了广州，两只留在了肇庆——古名端州。由此可见西江与广州在族群来源与文化渊源的关系。可以说，中原文化，正是通过这“西江走廊”才深入到广府腹地的。

到了秦代，开凿灵渠，连接湘漓，与漓、桂江、贺江相连的西江，更成了中原人南下的通衢。中原文明的影响也就更直接，族群的融合也更加速了。及至汉武帝灭了南越国，把岭南的政治中心从番禺北移到了桂江与西江交汇的广信，也就更强化了中央政权的直接统治与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西汉初长沙国南部地形图上所示“封开”一地，便为贺江流域，正是封开（广信）以北。同一汉墓中还发现有“广信令印”，广信当口的文明，应是与中原相差无几。“初开粤地，宜广布恩信”，充满了儒家治国思想。这里作府治，不仅是中原与岭南的交通要道与军事要冲，更因为其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罗香林在《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中称：汉代“当时珠江三角洲虽然也有相当的学术表现，但可以代表广东学术思想的，还是西江中部的几个学者。”这里说的几个学者，便是指广信著名的经学家陈钦、陈元父子与上巒，岭南后来出的第一状元莫宣卿也是出自于此。这与他们生长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这也证明，广信在长达近400年的府治中，其作为广府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经发育到了怎样的程度，而广府话或粤方言的定型——由汉时中原古语与南越语交汇结合，恐怕大至也是在这400年前后间。

直到府治于吴南移，仍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约到了唐宋，西江的文化作用，才让位于珠江三角洲。但中原移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顺西江而下，最后抵达广州周遭的。而沿西江的肇庆（端州），其影响始终不曾减退，乃至明末西方教士利玛窦，在澳门习中文，上广州，未能定居，后来才得到新上任的制台郭应聘所邀，到了肇庆，获准建筑圣堂。而后，开始传教。最终经韶州上了南京，几经辗转，才达到进北京目的，得到神宗召见。从此在中国产生重大影响。肇庆这一站，功劳不小。

由于年代久远，尤其是战火浩劫，广信，即今封开这一广府

文化古都的历史遗址发掘尚有待深入进行，但周遭古迹甚多已是毫无疑问的了。此外，陈氏父子、莫家状元的名人之墓尚在。所以，研究方面还有大量工作可做。无疑，把握住西江区域人文历史演变，对广府民系如何形成、广府文化怎么发育，都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西江广府区域，为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开、郁南、怀集、广宁、德庆、罗定、云浮、新兴、高要、四会、肇庆等县市。在广信之后，肇庆则成为这一区域的中心，它本身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南越文化、楚文化、中原文化均可以在这里找到遗存，而作为西江文化象征的端砚就产于附近，唐代时上贡朝廷，从此闻名全国。端砚石质坚实，细润、发墨不损毫、书写流利生辉，且雕琢精美。唐代著名诗人李贺有诗《青花紫石歌》赞曰：“端州砚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刘禹锡亦有“端州石砚人间重”句。宋代，又是端正赵信封地，赵信后来便是宋徽宗。而后，这里文人荟萃，学术蔚起，天下闻名。之所以利玛窦进入中国以肇庆为第一站，正是这里的人文环境所吸引。所以，它才继广信之后成为西江区文化中心。肇庆还有广东迄今保存得最完好的城墙，是城市建筑中难得的经典之作。肇庆又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地，星湖、鼎湖风光奇脆、秀丽，举世闻名，被誉为北回归线上的“绿宝石”。西江三峡，也在肇庆市范围内，峡内山势陡峭，水势湍急，群峰聳峙，雄伟壮观……肇庆还在两广水路交通线中间，是穗港辐射大西南的一个中继站，具有很高的文化区位。

无论是古代中原文化经西江走廊南下至广府腹地，还是今天海洋文明、穗港文化以肇庆为中继站影响大西南，以及过去各种文化在这里的交汇，这一文化的结合部，在广府区域中的作用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这方面的研究，这理所当然会出更丰硕的成果来。

这里，简单概括一下另两个广府区域——粤西区与吴化区的状况。

这两个区语音上稍与广州话有差异，越语成份在口语中略重一些。但还是可以通话的。区内峡谷平行，大都可沟通内陆与沿海，与珠三角广府中心区、西江结合部均有联系。古代稻作文化起步甚早，而旱作文化也不弱。

其间高阳为古高凉郡地，但远离政权中心，且长期为俚族根据地，故风俗文化上多俚族遗风。“气习颇殊，好勇轻生，不循礼法。”⑧动不动就发生械斗。吴川“信巫而论神”，茂名“俗尚佛事，疾疾延巫师，吹角鸣锣。”⑨中原文化的影响较薄弱。直至近代，才世风日开，跟上西江乃至珠江三角洲了。但总的文化水平发展不是很高，迷信仍有不少市场。也就是说占越人或土著文化在这里保存得较为多一些，这也是广府文化的另一面，以此与西江、珠三角中心区拉开了距离。

即便在同一个区域内，文化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十里不同俗，五里不同音，在这里似更为典型。这里，也只是作一宏观把握，不可能一一触及细部。

第六节 华人文化圈中心：香港

香港，不仅是南中国的一个异数，而且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异数。“西方的天，东方的地”，是一种艺术的概括，但多少道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无疑，它也是广府的一个异数。尽管香港今日已汇聚了四面八方的人，不仅是国内的，而且还有外国的。但是，其一，它自古以来，一直是广府区域内，这毋庸置疑，历史是无法改写的；第二，哪怕在今天，广府方言，即广州话，也始终是这里的主流语言：任何人到香港，都不能不学广州话，连英国人也不例外，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传媒，也一样用的广州话。

以语言介定，香港仍属广府区域内，更不用说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本身就把广府人的习俗、价值观等传递下去。第三，甚至在不少英语国家，如美、英、澳等，长期以来，也把 Cantonese（广州话）当成中国的国语，这是因为海外的侨民，80%以上均为广东人的缘故，因此，包括华人文化圈，其主流也仍旧是广府文化。更何况紧连着广府腹地的香港呢？因此，把香港依旧划入广府区域中是理所当然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全球的华人文化圈中，作为比较“中性”的香港，始终是华人所认定的一个文化中心，对于来自这里的信息，他们相对都能接受与认可。华人以看港台电视及订香港报纸为主，这已是无可置疑的事实。这些华人，也大部分是广东人。在这个意义上，香港也同样是广府的一个中心，不仅仅是广府区域内的一个中心，甚至对于全球广府人来说，也同样是一个中心。

因此，才有了笔者的《千年国门》，去探讨穗、港二城，作为南中国的双重中心存在的历史文化意义，以及在经济互动中产生的重大影响。其实，对于某个区域，某种文化，存在双中心现象并非罕见，这在上述专著中业已阐述过了，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由于历史的原因，作为自由港的香港，不仅是全球航运中心之一、金融中心之一、国际会议中心等等，而且也以它独特的文化，形成国际影视业中心——港片之发达，已居世界前列，有“东方好莱坞”之称，且有自己全新的，也是独有的模式，说它是国际文化中心并不为过。

从历史渊源上说，穗港间作为一个民系的血缘、意识、文化，乃至民性上来说，也仍是一脉相承的。即便在五六十年代“封关”之际，也还是切不断这种联系。所谓“省港同根”，不仅仅是当年的一个口号。我们可以看到，当年香港被迫割让，这边十三行被大火焚烧，不少粤商，除开跑到上海，便是到了香港。

可以说，上海与香港的开埠，同是粤商之功——而这，与广府民系积千年外贸而形成的商品意识是分不开的。

无论是当年仕途无着，踟躅广州街头，读到从香港传入的《劝世良言》揭竿造反，成立拜上帝会，扯起“太平天国”大旗的洪秀全，以及在香港生活多年，写出《资政新编》的洪仁玕，还是“戊戌变法”的主帅康有为——他正是一次香港之行，使他“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独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再有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均是以广东人兼容并蓄的胸怀，在广州—香港的双城中，形成了他们维新变法、以及民主革命的思想，从而叱咤于一部近代史之上。

孙中山更坦然道，他的革命思想正是来自于香港，在年轻时的《上李鸿章书》便称：“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也。”

如果没有广府民系积千年来的海洋文化作底色，又如果没有就矗立于国门口的香港这么一个“异数”作最直接的参照，恐怕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还会滞后不知多久？正是珠江三角洲这块近代史上的“风水宝地”，得风气之先，凭借两千年的海上丝绸之路，数百年的商品流通与对外交往，才催生了这么几位先行者，从他们的言论与著述中，无不看到商品经济对封建宗法关系的有力冲击。

马克思曾把人类的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人的依附性——封建宗法关系、血缘政治便属于此列，中国在这个阶段中滞留得太久、太久了；第二，则是建立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人的独立性——这便是指商品交换产生的平等、自由意识及市场经济带来的民主、科学观念，而这正是广府民系所具备的“先

天”优势，所以，这个区域才得以较顺利、较迅捷进入到这个阶段。

当然，第三阶段是指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即共产主义。而这离我们还相当遥远，且按下不表。

也正是站在“第二阶段”的历史高度上，我们才可能充分认识穗港双城这一“双中心”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所能起到的“龙头”作用。

早在19世纪末，德国学者利希霍芬来中国考察，敏锐地感到“广东商人作为大商人，要求和欧洲人一样的价格”，“大商业属广东人。”“广东人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的才能”^⑩……等等。

19世纪，广东的“大商业”、“大工业”、“大交通业”当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以至日本人大谷孝太郎称利希霍芬对广东人“工艺和商业精神”的推崇是一种“假说”。可曾几何时，就在1900年，中山人便从澳洲返回，在香港开创了现代百货商业的“四大公司”，并迅速推向了广州、上海乃至欧亚……

现在，我们已清晰地看到，香港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主要是占香港九成以上的广东人努力，他们在大商业、大航运业（即大交通）上显示出卓越才能。随着内地的改革开放，珠三角“四小虎”出笼，广州与深圳高速发展，无一不得自千年来大商业、大交通业的底气——珠三角上的高速公路，无数的桥梁、快速铁路、地铁，令人目不暇接……人们也不难看到，香港与珠三角“前店后厂”的格局很快形成并向高层次发展，港商投资在广东占了最大份额。

反过来，广东的改革开放，也为香港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最为明显的，莫过于香港航运业的起死回生。80年代中期世界航运业陷入低谷，香港航运巨子都不得不壮士断

臂，在负债累累之际低价出卖大部分轮船。其时，“广船”也亏损严重，订单骤减，可他们及时转换，改造集装箱，一跃而为全国集装箱第一大户，同时也为香港航运业带来了生机，加上内地经济起飞，于1985年取代美国开始成为香港最大贸易伙伴。一下子，香港转口贸易全面复苏，年增长率高达30%以上。由于转口贸易与航运业相依相伴，航运业即被注入强心针，广船集装箱供不应求，香港航运从此走出了困境。

与此同时，广东，尤其是珠三角与香港的差距，也迅速缩小了。我们可以看出香港—深圳—珠三角—广州形成的梯形级差日趋平缓了。而珠三角经济区的规划建设，对香港发展更是一大机遇。故特区政府专门制订了以珠三角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案。正如一位广东的经济学家所断言的：“主权回归后，内地丰富的资源，巨大的潜在市场和蓬勃发展中的经济将在更大程度上成为支持香港经济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因素，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弹性空间。”

经济上的“双重奏”，给穗港双城带来了无限生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莱斯特·C·索罗所指出的：香港的经济前途，全视中国内地能否大力推动市场经济而定。而这一点，广府人是充满信心的，他们是不会走回头路的——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把香港特区作为广府区域中一个重要部分拿出来作为专节陈述，是因为它对广府民系、广府文化的现代化影响作用之大，而在历史上与地缘上所具有的共性。其间的综合性、互补性、互动作用，都有更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所谓的“港化”、“港派”也不足以引起什么恐惧或异议，相反，包括在制度文化、商业机制等许多方面，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可以说，香港正是广府区域内大放异彩的一颗明珠！

①《岭峤春秋——珠玑巷与广府文化》，参见黄淑娉文《珠玑巷·冈州·四邑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②沈约《宋书》，卷九七《夷蛮传》。

③姚思廉：《梁书》卷三三，《王僧儒传》。

④《全唐文》卷五一五，王虔休《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表图》。

⑤崔郾：《李府君墓志铭》，转引自《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⑥⑦参见林振勇、任流、陈春陆《佛山历史文化辞典》，百花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⑧道光《肇庆府志》卷二。

⑨光绪《高州府志》卷三。

⑩转引自《中国民族性》第30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第四章 珠江民性

第一节 史籍评述与宏观把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前所引述的林语堂关于广东人是“另一类的中国人”，以及利希霍芬对广东人商业意识、创业精神、美学情趣的评价，都是较直接的，有些更很近即。无疑，这也是对珠江文化区域内的中国人的评价，或者说，是对具有代表意义的珠江文化中的民系的评价，所以，满可以认为是对珠江民性的评价。

从这一认定出发，我们还可以从古代典籍中，找到更多的关于对珠江人或岭南人的各种评价。总而言之，人们总是把南中国这一个地区划出来，如林语堂一样，既不当“北人”，即中原人，北京人，也不当“南人”，即江南人，即长江流域人，而是“另一类”。

为此，我们在这里作上必要的综合。

这是自汉代以来的重要史书、典籍与方志对南方、对两广，特别是广东人民性的评述，大致有如下的记录：

人杂夷獠，不知教义——主要指广东人血缘上近于马来人种云云，而马来人本身也是南迁的越人之后。当然也包括瑶、畲等融合于广东人之中，所以，才不知中原教义，不知礼节——这也接近今人称的“远儒性”，天生没有多少条条框框的约束。虽然这稍说得绝对了点。

南方遐阻，人强吏弱——山高皇帝远，历代王朝，其中央政权大都远在中原甚至北方，加上南岭阻隔，每每有鞭长莫及之

慨，到了广东，成了一种弱勢的统治，缺少向心力或内聚力。而这里的“地方主义”又相当“严重”，不仅外国人感到“排外”——马戛尔尼率大使团出使中国到了南方马上就有此直感，连对内地的本国人，也有排斥取向。这种“排外”倾向迄今仍表现强烈，所以，北方派来的钦差大臣也只能是“弱吏”，大都很少造次，故自古有此地“人强吏弱”之说。其实，如理解为“大社会，小政府”却未尝不是好事。

豪富兼并，役属贪弱——自古以来，包括秦皇汉武，都视广东这块地面为“天子南库”，今天，更有“发财到广东”的民谣，可见，历来的商品意识相当浓厚，粤商更是中外闻名，商业运作之中，自然免不了豪富兼并，惟孔方兄是尊了。所以，难怪有人称广府人同美国人有某些相近的地方，凡事好“量化”，用Money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先敬罗衣后敬人，笑贫不笑娼，胃口大，贪得无厌，很少有满足的时候。平心而论，这一评价也没什么可怕的，自古以来，商业发达，市民意识也就相当强烈了，如果换一种竞争的说法，也同样未尝不是一种恭维。人的价值取向，与伦理厚重的农业文化自然悖道。

作掠不意，标新立异——广府人脑子灵活，也敢做敢为，很少有奴性，这才“作掠不意”，出奇制胜。尤其是不好因袭人家已成的一切，总好创新，出怪点子；求变求新，反对一成不变。“见了绿灯赶快走，遇了红灯绕着走”，“把政策用足”……均是这些评述的现代阐释。自古至今，皆一般不受约束，自行其是，认自然发展之理而不认官理。传统“义”的束缚对他们已弱化到了最低点，“马死落地行”，靠的是自己的力量。所以，广东人的自信，乃至个人英雄主义，也是相当突出的——这与标新立异也是分不开的。

性并轻悍，易兴逆节——广东人没有北方人的稳重、忠厚，步履轻捷、落地无声、动作灵活，个子瘦小——这大概是“轻

悍”的依据，当然，“悍”起来，也是够威猛的、暴躁的，谁要广东这么湿热呢，喝凉水都得上火。他们每每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迥异的见解——海洋赋予的性格及心理，当然不同于大山所给的，所以能不被视为异端么？“易兴逆节”就是这么来的，他们要搞自己的一套，不愿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恼怒起来，洪扬、康梁到孙文，不都揭旗造反了么？

……

诸如此类的评述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引用了。但大致可以看得出广府人的性格与心理，在中原看来是如何突出与“悖逆”的。其实，关于这一点，梁启超早就讲过：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主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趋然万累之表，而行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利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以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居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气，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梁启超是四邑人，他比较沿海环境与内陆环境对人的思维、心理特征造成的不同影响，从而揭示出广府民系与中原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广府人同是中国人，当然有中华民族的共性，诸如艰苦创业、克勤克俭、敬老尊贤、奉祀祖先……等等，可广东濒临大海，又自古以来与海外有着很频繁的商贸往来，所以，又有着海洋人那种敢于“冒万险而一掷之”的个性。正是大海浇铸了广府人外向型的性格，绝对自由的个人实践平衡的形态——而这些，却是内陆居民所不曾有的特质，所以才成了“另一类的中国人”。几乎打入“另册”。

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长期生活在海洋边上的人，就如梁启超所言，产生一种冒险、探胜的心

态，虽纾家毁命亦在所不惜；而在海洋中面临变幻莫测的风暴、涌浪之际，如无一种随机应变、灵活敏锐的个性，避险趋易，化险为夷，则很可能时刻葬身鱼腹；而辽阔的大海，百舸争流，又更激发起人们争强好胜的竞逐心理，好为天下先……这些，都赋予了广府人不同的秉性，促使他们自立、自强、自司，甚至以自我为中心。

虽然前边我们引述了自古以来各种典籍、名人对广府人方方面面的评价，然而，这大都还是感性的、直观的、粗略的，尚缺乏精致的、系统的、科学的分析。如何去真切地把握一个民系的基本特性，尚还需要作出努力。

一般来说，这种把握，首先要从这个民系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中入手，这是我们业已论述过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与其他民系的关联及比较诸方面，这个民系的思想意识、生存观念、生活情趣，均是与之相呼应并分不开的。

第二，这种把握，更要着重于广府人的“行”而不仅仅看他们的“言”。广府民系的行为实践是最集中反映了这个民系的本质方面，正是他们的行为，最终塑造了广府民系独特的形象，区别于别的族群。换句话说，人是实践的产物，一个民系也正是实践的产物。不同的民系可能有不同的行为模式，处世方式。陆地的马车与河海的舟楫，显然会对人的文化行为有着不同的投影。

同时，我们更要以发展的眼光，历史地去看一个民系的演进，从事找出更合乎规律的、有连续性的东西。一个民系总归是在发展与变化当中的，广信时期与广州时期的广府民系各自在中原与海洋上的影响就有所不同，而珠玑巷时期到当今穗港互动之际，广府民系同样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切皆在流变之中，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才是相对的。因此，不可以固化在某一个时期或阶段中，这才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希望的、立体的、有血有肉的

民系，而不是平面的、僵化的、概念化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一引经据典，说的都是广东人或广府人，这也证明前人或古人总是把珠江流域或岭南生活的主要族群、民系，视为广府人了。换句话说，把广府人当作这一地区的代表。这也是无可非议的，毕竟，他们讲的都是海洋文明或商业文化对民性的影响，而这又集中体现在了广府人身上。

因此，我们讲珠江民性时，主要便是讲的广府民性。

当然，在必要时，我们将补充说明在这区域内其他民系的民性，并且作简明扼要的概述，以免发生误会。如客家民系，好在笔者已有了《客家圣典——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与《客家魂》三部曲等数百万字的著述。

第二节 商业精神与价值取向

作为珠江文化代表，广府民系的民性，最突出的，自然是其商品意识上，较之其他民系的超前，这本来也是海洋文明的最显著的特征。无视广府民系这一点，也就无视在东方，早在古代便有海洋文明的传统。笔者不赞成把东方海洋文明局限在渔业文化的传统上，海洋文明的内核只能是商业文明，离开了商业文明便无以谈海洋文明了。商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各自是海洋文明与内陆文明不同的内容。回溯历史，我们均可以清晰地看到，尽管齐鲁亦濒临大海，渔业也极早发展了起来，但是，在北方海域，远航之出名，是秦皇、汉武为寻找三大神山的长生不老药而外出，是为其皇权服务的，是官方的、政治性的；而在南方海域，虽说如汉武帝组织大规模船队出洋，但目的却是商业性的，同时，更多的情况下，均是民间的、自发性的对外贸易。二者就有根本的不同。

因此，广府民系自古以来便受有海洋文明的滋养，与内地，

甚至与北方海域相当的不同，北方海域甚至被打上了农业文化的因素，一度的“禁海”正是抑商重农——这正是北方统治者既定政策。本来，海洋是极其重要的商品交换、文化交流的通道，因此，海洋文明本身就具有浓烈的开放色彩——这在南方海域可以得到证明，广府民系也是如此。但北方却把这种开放视为异端，“以海为田”，把海洋视为农业的基地，以至反对民间上海外贸易，连对海洋产品也纳入“官营”范围，而非“以海为商”，所以发展到明、清二朝强化“海禁”政策，只余广州一口通商。逼迫民间贸易采取走私的形式。

可以说，中央集权政府，历来把对外贸易，包括海洋贸易均视作政治行为，所谓“朝贡”与“怀柔”，而不当作商业的、经济行为，以至大量关税漏失，又造成了走私猖獗。而在广府区域而言，由于这种政治弱化，才有外贸的传统。恐怕，从民系的早期，大都已经形成这种观念：一切物品，均是以商品的形态出现，挣脱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樊篱——在这里，无论从事渔猎还是贸易的，以及手工业作坊，都较早地察觉，必须通过商品交换，才能换取生活的其他必需品以及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这样，便卷入了商品经济的大循环中，产生愈来愈强烈的商品意识。自古以来，“走广”便成了经商的代名词，而粤商——广府商人更是全国商人中最负盛名的。加上后来的“一口通商”，使得广府人长期的商业贸易的历史得以发扬光大，在他处受抑之际，此处却得天独厚，这一来，交换的价值观念深深地渗透到广府区域的每一个角落，更有力地排斥了传统社会的“礼义”——“贵义贱利”很难在广府人中找到市场，而约束商品交换的“礼节”更已被市场规律所取代了。

这一来，不仅商业发展了起来，“洗脚上田”的人多了，连“弃士从商”、“弃官从商”的也日趋增多，“士”与“官”，权力或名声，不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尤其是近代，上述现象更多

了，不说改革开放的今天。所以，广府人的经济头脑堪称是第一流的，其思维方式与内地也大相径庭，以至被人斥之为“重利轻义”、“人情淡薄”乃至惟利是图。

前文提到广府人与美国人有某种相近，下边，不妨引用一下著名史学家亨利·斯特勒·康默杰的名著中的几段话以作比较：“……大自然与经验都在为乐观主义作辩护，美国人是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每一个光脚丫子的孩子，都会被看作未来的总统与百万富翁……其文化也是物欲的……人们总是期待下一年或再后一年经济上的成功，绝少嫉妒在这一年已获得成就的人。”“他（指美国）已经习惯于成功了，对任何干涉都不满，把任何延误都看作是违反天性的暴行……其违法最严重的指控是对商业的损害。不管怎样，凡是允许增加财产的，都被无意识地当作好事，而美国人所能容忍的，则是，投机的、大吹大擂，……苦心钻研……”①

康默杰归结道：“所有这一切，均可对其思想作定量预测。并赞同他对几乎每一件事置于定量的估价上。当他问一个人的价值时，他的意思是指物质财产……美国人是不可救药的功利主义者……美国人对政府干涉自由企业比私人干涉政府事务更为不满。自我实现的人，不是继承者，而是英雄，‘实现’在美国则意味着发财致富。”②

这便是美国人的价值观，在广府人看来，也许更物化了，更不为内地人的观念所容忍了。当然，广府人也许不曾这么走向极端，但谁私下里都不得不承认，广府人多少也有康默杰所说的关于“实现”的意味。

在农业文化的视角中，“无商不奸”是天经地义的，这也是内地的准“商业”的表现。但广府人经商却完全是大商业的运作，那便是无信不立。著名的四大公司之首“先施公司”的英文 Sincere，便是诚信在先的意思。粤商的信用可以说是最高的，他

们绝不会推诿某某官员或上司身上，从而赖掉已有的合同，他们也绝不信任打着有某某官方人物作后台的商业行为，鄙薄这种“拉大旗作虎皮”——这恰巧是虚张声势无实力的表现，并且同传统的官本位或伦理政治划清了界限。

广府地区形成商业性市井社会更由来已久。广州城的结构也不是那种有中轴线的农业社会的结构，而更接近于地中海古代城市的商业性结构，即以商贸便利为重而形成的多元架构。这些，都深深地影响着广府人的一切，包括行为规范、价值取向以及人生目标。

当然“重利轻义”、“重商轻义”对广府民系而言并不是绝对的，如宋末、明末，对异族南下的反抗，由于中原积弱，江南腐化，独有这边才最为激烈与惨烈，皆以汉民族身份舍身取义。同样，南番顺也历来以人文渊源著称，出了不少大思想家、大学者、大科学家，不独是大商人、大企业家——其实，商业精神正是现代思想文化的催生剂，所以二者并不是对立的。总而言之，广府人的民性，精于行商、善于变通，趋利避害，而不墨守成规，一棵树上吊死而自命为“义气”，毕竟是积极的一面，所以才在现代迅速崛起。

第三节 海洋的赋予

广府民系与其他民系对比中，不安于现状，封闭自守，而是敢于冒险，开放进取，永不满足上，也同样是相当突出的。

这如前所述，与他们面对大海有着密切的关系。自古以来便习惯与大海的惊涛骇浪搏击的广府人，任何畏缩、怯懦、犹豫，妄图寻得退路或投降，都只有死路一条，惟有勇敢迎接大海的挑战，才能绝处逢生。所以，大海不仅仅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与条件，而且也铸造了他们敢于吃苦、善于吃苦的品质，更赋予

他们抓住时遇、冒险进取的个性。否则，就不可能在先秦，把航线一直从徐闻、合浦一带，引向了东南亚、印度洋上。

冒险，本身就是敢于竞争的表现，大海上百舸争流，便激发起竞争的欲望，而在商业运作上，如何获得更大的赢利而又恪守信用原则，这同样是智力、财力诸方面的综合因素的竞争。正是这种竞争意识，才促使现代社会得以迅速的发展。而这种竞争，如果以一时一事的损失为然，不敢冒险，也就一事无成了。如同在大海上一样，面对风暴，须以生命为冒险的代价一样。

同样，辽阔的大海，更让广府人形成一种开放的心态，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外边的世界有多精彩，从而不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由于航海与商贸，使他们早早与外域发生关系，把眼光投得更远，敢于向海外开拓，甚至举家迁徙，远涉重洋，“有海国超迈之意量”^③。愈近现代，广府人到海外开拓的人更似几何级数增长，由早期的东南亚，到印度洋，到非洲，一直到欧美，他们的足迹遍天下。海外华侨 3000 多万，粤人占近 80%，超过 2000 万。所以有一句话：The sun never set on the Cantonese community——太阳在粤人社会上永远不落。同时，广州自古以来，也是外国人居住与来往最多的一个城市。耳濡目染，广州人对外国人早就见怪不惊了，绝无内地早年看稀奇，乃至于官吏们认为洋人脚不可以打弯的笑话。

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乃至基督教，无不在广府地区叩开中国的大门，而且接受各种宗教的人也以广府地区的人为多。值得思考的是，素以“内功”为上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十分兴盛，进一步箝制中国人内心世界之际，在广府地区，却已经在引进不少西方的科学知识，众多人士商贾大兴格致之学……西式学堂，也在鸦片战争之后迅速在广府区域内设立，以传播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排外”，有力地抗击了西方的侵略，可他们对西方的学问，却取一种开阔、兼容的态势，欢迎而不排斥，善

于为我所用。这后来更表现在郑观应、容闳、康梁与孙中山等人身上，他们不仅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文化，更引进并介绍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体用并举，从根本上改造一个封建落后、闭关自守的旧中国。

这一切，内地均是难以相比较的，而且被一直视为“崇洋媚外”——这一说法，直到近年来才不大用了。否则，这也得承担巨大的“悖逆”风险。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的姿态，自然能兼容并蓄，不于一尊，“拿来主义”，绝少门户之见。汉越杂处，也许就开始形成这种心态，赵佗不以越俗为弊，越人也不曾抗拒中原文化的影响。到了唐代，基督教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同广府文化相处甚安，如今，长洲岛等处仍处处可见伊斯兰墓地，而南海神庙上“海不扬波”的题匾，则是不分国度、民族、宗教的祝福；到了近代，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也在广府区域中比比皆见，尤其是沿海高高耸立着十字的教堂，每每令内地人惊诧万分。而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很早在广州传播并且硕果累累。

连广州话，除开口语的越语底色及书面语言上的中原汉字系统外，还吸纳了不少外来的语汇，包括阿拉伯语、日语，尤其是英语。

乍一看，广府人在家庭伦理上挺正统，挺保守，家中的祖宗牌位是不可以少的，“天地君亲师”的神牌更是供奉得毕恭毕敬，然而，他们在追求现代科学、重视契约关系上，又很现代、很开放，法制观念较之内地要强得多。

说他们“排外”，也很厉害，什么“𧄲𧄲𧄲①，唔食盐西葱”，指的是“北方”人，包括南岭以北的所有中国人，意思是指他们不开化，“唔食盐西葱”，不吃外国传来的食物，泛指不接受外来文明的影响。这真是“一报还一报”，古代，中原视岭南

为夷蛮之地，广府区域的人自然是不开化的“獠”，到了近代，却颠倒过来了，他们反视内地人不开化，不文明了。而这种“排外”色彩，竟也有如鄙视不开化种族的意味在内，似乎不可“兼容”了。

这又该作怎样的解释呢？

同样，冒险也有它的负面。当然，“英雄不问来路”是对的，打破了旧的宗法观念，是一大历史进步。可是，在资本原始积累之际，不择手段，不讲道德与信誉，崇尚“以小博大”，梦想一夜“暴发”——马无夜草不肥，把暴发户视为英雄，也就带来了种种负面。沿海走私，固然有过去“禁海”“片板不得下海”造成的历史遗患，但在今天其破坏性却相当可怕，不下猛药则难以根治。还有吸毒种种——这与享乐主义也有关系，惟利是图，见利忘义、嗜赌，种种，仍有不少的市场，这也就给广府区域带来不应有的阴影。

第四节 务实观与世俗性

重视现实，重视世俗的享受，不错过任何时下的机遇——这也是广府民性中至为显著的一面。

所以，亦有一句话：客家人讲过去，广府人叹现世。“叹”在广州话中为享受的意思。也有说是客家人注重历史渊源，以郡望自矜，好历数祖上的名人，并以此来激励自己的后代。所以，他们相当重谱牒，重祭祖，“宁卖祖宗田，毋忘祖宗言”，很恪守祖上留下来的规矩与传统。而广府人虽然也修谱牒，也兴祭祖，但是，他们更着眼于现实，把握现在，一切，以当今的利益为基准，为中心，而不太喋喋不休去谈祖上的荣光。因此，广府人在改革开放中，又得了一个“拥有现在”的美名，他们及时抓住现实的机会，敢于开创自己的事业，经济上一下子发展了起来——

而这不是靠祖上的荣耀或一个“好爸爸”而得来的。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奇迹，正是这么出现的。

只要我有本事，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不少人都好这么自我安慰。但广府人则不然，他们认为，有本事，如不抓住机会，那就很可能会永远埋没掉。所以，机会同样是相当重要的，机会瞬间即逝，抓不住便后悔莫及了。广府人每每善于审时度势，及时发挥出自己才干，崭露头角——这便是林语堂所说的图进取而且相当急躁的原因。这无疑是他们一大优点，这样，他们才事业有成；不急于事功，是必蹉跎一生矣。

这种务实，讲究实际，便表现为通过劳动——包括加快商品流通，实现价值，获得成功，争取胜利，成就自己的事业感乃至功名感——这不同于科举时代的功名感，倒更接近于“明星”式的功名感，哪怕转眼即逝，也是一种满足，一种自豪。这与虚无缥缈的幻想、奢望、自我安慰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现实的重视，也包含有及时行乐在内。我创造了财富，我理所当然应该享受，人拼死拼活冒险，不是为的企求幸福么？广府人与禁欲主义无缘，他们是最实在的现实主义者，绝不放弃个人利益去达到什么道德的自我完善。他们更不拒绝尘世的财富与享乐以抑制发自内心的天性的欲望。他们干得要好，活得更要好。因此，在广府人的生活中，世俗的、市井的意味，每每比别的民系要浓烈得多。悬而又悬的抽象思维或理性思辩，每每敌不过他们好诉诸的直观的、感性的判断与感受。这连广府的学术与学风也同样表现出这种倾向，带有感觉主义与经验论，连大思想家、大学者也未能例外。广府人讲究真实、生动、明快、灵活、洒脱、通俗，不好虚幻、死板、呆滞、固化、矜持与故作高雅，一切，都要顺其自然，任个性自由发展，生活以及所欣赏的，都要有趣味性、猎奇性、故事性、刺激性，要够“劲”，要“叻”，又要“有形有款”。

所以，世俗文化在广府人中有最大的市场，“港片”的世俗味，乃至“无厘头”，也许正是这种文化的外化，是最为典型也最有代表性的，所以在全世界电影界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现代的城市文化就是一种世俗文化、市井文化，这种文化滋养出来的广府人，才又如林语堂所云的“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风格”、“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在享受上面几乎无所节制，尽情发泄，拼命地干，尽情地“叹”——“叹世界”，人来到这世上就是要享受这个世界的，凭什么要苦了自己、亏待自己呢，这是广府人每每这么劝诫他人的格言。

当然，其实现主义、享乐主义，也一样有负面。包括前所提到的吸毒、赌博，从当年鸦片烟的泛滥，到今天毒品再度流行，也都说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我们值得警惕并为之忧虑的。广府人在“现实”之余，更需要往前看，不仅要“拥有现在”，更要能“把握未来”。

关于广府民系，我们重点讲了以上三条，当然，还可以归纳出更多来，但大致均与这三条相关或者从这三条发挥出来。总而言之，广府民性是极富色彩，极富个性也极有魅力的，而不是由某种观念所“格式化”的，如儒家所规格的人格模式。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如没有中原文化的凝聚力，民系不足以形成；而没有海洋文明的多姿多彩，民系本身也就失去了自我，尤其是长久以来那生气勃勃的开放姿态，广府民系也就不是广府民系，混同于别的什么了。

对于中原来说，广府区域不是边缘而是边缘之外的，广府文化相对而言，恐很难说成是一种边缘文化。因为对于海洋来说，广府区域却不仅不是边缘，应该说，它是重心区域，较之齐鲁、吴越而言，它甚至是核心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它并不是边缘文化了。中华文化如果说是多元的话，就不应定于一尊，只认为有一个中心。不同的文化圈互有交叉，由此形成文化质态的落

差，各自民系的性格、特征也就有所区别又有所相近，因此，应取动态来看。如说边缘文化，那么，说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的边缘更准确些，而它又与海洋文化边缘接壤，亦受有一定影响。在这里，我无意把广府文化从中华整体文化中划出来，而只是强调它具有另一个中心的地位和效应，以此引出下一章的论题。

第五节 边缘文化与民性

珠江文化中，也包括有客家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在论述珠江民性之际，我们有必要对另一文化下形成的民性加以表述，同时，也证明珠江主流文化对其影响。

无疑，客家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延伸，也是中原文化与珠江文化的结合部。客家人来自中原，又大都居住在山区——无客不住山，无山不住客，山，赋予人仁厚与大气，但也带来其保守与封闭。而客家民性，虽有这方面因素，但并不尽然如此，毕竟，来到南方沿海地区，其文化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由此，也带来了民性的改变。

客家人大都是中原南迁的衣冠士族，尤其是魏晋南北朝的遗风，以郡望自矜，在客家民性上是表现得相当突出的，他们总是历数族谱中的历史名人，有很强的使命感，有着无法割弃的贵族意识，哪怕到了南方沦为布衣、山民也一样。当然，后天的平民生存状况，使他们更识民间疾苦，所以，贵族意识与平民思想，便成了客家民性中最突出的矛盾集合体，时而表现出这个、时而又表现出那个。而这种“以郡望自矜”的观念，与南方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会发生冲突的，这便有平民思想来调和了。因此，客家人的好“自大”、好“出风头”，也同南方的敢于冒险犯难，也每每能结合在一起，以免有辱祖先的名望。

于是，产生了客家民性一个重要特征，那便是特立独行。客

家人兼有北方汉人的豪侠、热情、敢作敢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特点，这在广府人却是相对较弱的。这一来，客家人在艰苦的环境下，总是能在一片不毛之地，兴建起全新的家园、乃至城市、港口来。而没有这种特立独行的自信，他们在千年迁徙，万里长途中，经受颠沛流离及种种的生死考验，则是难以设想的，换句话说，也正是这种磨练，才使这种自信更加牢固。纵观历史，客家人中出了那么多的历史名人，其身上都有着这种自信与自强。

传统文化中的团结互助、克勤克俭，在客家人身上也表现得很突出。这同宗族观念是有密切关系的，围屋、土楼的“聚族而居”，也证明了这一点。客家人有团体精神，危难当前，能同仇敌忾，故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一听说是客家人，便退避三舍，不敢贸然进犯。当然，他们也避免不了“窝里斗”的陋习，有较强的排他倾向。由于后来的贫困，他们也显得有些小气，不容人，刚愎自用……这些，也都是与中原文化有关联的。

如笔者在《客家圣典》所说的，对于这个迁徙到珠江文化区域的民系而言，带来了一系列“客家式的命题”——

宿命与使命——对于这么一个使命感很强的民系，面临的却是一个无可奈何的宿命安排；

主客意识与边缘地位——中原的主人南来为客，又始终与土著格格不入，处于边缘地带，势必会有临危之感；

义利之辨与自我本质的实现——中原传统的重义轻利，与东南沿海舟楫商旅的唯利是图，使得对自我本质的认识也模糊；

特立独行与融合认同——客家人自视高傲，鹤立鸡群却又不为新的“当地”所认同，反被讥以“犵”、以“獠”……

贵族观念与平民思想——祖上显赫，以郡望自矜；
沦落他乡，一贫如洗，社会地位决定新的平民思想；
守成与开拓；
返朴归真与异化；
挣扎与沉沦；
归化与孤独……

这里提出的“客家式命题”，说到底，是客家精神与其民性的重构——而这，迄今仍在进行之中。好在今日的客家人，不仅在政治、军事、文化上已大显身手，也已涉足于经济，为海洋文化所熏陶，他们有了更多的开放性，与开拓进取的潜质相结合在一起。可以说，珠江文化同样把他们纳入了自己广阔的胸怀。

广东还有潮汕民系，与广府、客家各有不同。虽然他们生活的地区，严格地说，不在珠江流域之内，似乎不宜在这里多说。好在后边我们已独辟一章，对三大民系的文化落差加以研究，这样，我们也就不会疏漏了这个民系，那就留待后边多说好了。

①②转引自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s*.
(《历史哲学与价值问题》by A. Stern. PH. D. Printed in The
Netherland by H. Klop, Printers, The Hague.

③伍顽立《广东工业》。

④“孬狮”，其实是由英文 law-son 转化的，带侮辱、轻视的意味。

第五章

珠江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

如前所述，也如众多学者、专家所论断，广府文化堪为珠江文化的代表，因为广府民系的分布，是以河流、海洋为轴向分布，有着更强的水文化特色。而广府文化也颇具“水性”，能随物赋形，不定于一尊；又能兼容并包，不固步自封；且流水不腐，可消解污浊。老子在《道德经》中所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矣。”道者，也就更切近顺乎自然，顺乎规律的意义，亦如广府中的“顺德”者。

因此，研究中国“水文化”，或珠江文化，当以广府文化为主要基干，且不道两广本身所占的珠江流域面积达80%左右，更重要的是广府文化代表了珠江文化的实质：海洋或水文化。因此，研究珠江文化发展的历史阶段，只能也只可能以广府文化为参照。显然之，无论是客家、潮汕，以及其他支文化，都难以承担这一重任。本章为了论述方便，大都以广府文化代表珠江文化，不另注明。

第一节 中华整体文化演变中的珠江文化

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的形成，首先是与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分不开的，哪怕是作为异质与边缘部分，它也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了它，这个整体也就是不完全的了，更何况它不仅具有异质或只作为纯粹的边缘部分。在相对意义上，它

是整个中华文化的主体另一面，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与整体有着有机的联系，离开它，便不可能谈中华文化。

同时，由于是与世界文化最早接触，并且通过它，对中华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与世界文化的浸润、融合也是分不开的。因此，研究广府文化，同时也得结合外来文化来予以探究，平心而论，广府文化在吸收世界文化、融汇多元文化上，是颇为典型，较为成功的。

所以，广府文化在中华文化一体化的运作中，也与世界文化产生互动。无疑，它属于一体化中相当出色的部分，但仍保留了自己的个性色彩。同样，在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中，它也并没有失去主体性，仍相应地守护了中华文化的边界。也正是与中华主体文化的“一体化”进程中，它与世界文化的交融才溅射出了璀璨的光辉，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一座无以替代的桥梁，也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 Passport。

因此，我们在研究广府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首先注重的是中华文化对其的浇铸与定型，使之有了相对恒稳的文化内核，从而又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从亚洲文化到世界文化，使之转化为自身的曲折过程。

著名史学家吴于廑，有过关于从国别史到世界史的精辟论述。从较为封闭的部族，到州郡，从某个地域到全国，又由国家，到各大洲，一直到全世界，这正是文化与历史共同的演进过程。作为广府，从其先民的部族与中原汉人的融合，一直到汇入中华整体文明之中，与亚洲，世界的互动，大体上是相一致的，在不少历史阶段中，也是同步的。但并不能因此便可以一概而论。任何一个地域文化，它之所以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个性，恰恰在于其不同步的地方，正是这种不同步才更有其研究价值，使之不可以被抹煞与取消。如果简单把一般的历史阶段、发展规律硬套在上头的话，恐怕世界也就不成为世界了——世界正是由

于有着千差万别才成为其世界。

没有异质便没有整体，没有个别也就没有了一般，没有边缘同样便没有了中心——这对于广府文化而言，可以说是至关重要。因为广府文化的异质性、独特性、边缘性是最为突出的。由异质转化为本质、由独特而形成一般，由边缘走向了中心，这正是今日广府文化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地方，这也许是中国其他地域文化所不能相匹比的，以至在近代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整个历史进程，让人大觉其似乎是“后来居上”而耳目一新，从而“重新发现”了它——中国竟然还有这样一类文化，又似自身，又不似自身，早已存在，又似乎刚刚呈现……

探索广府文化的历史进程，不能不注重这几点的演进。

为此，在中国文化演进的进程中，我们先尝试勾勒出广府文化与之同步与不同步的相应轨迹，作一简略的概述，以让读者有着大致的、宏观的把握。

一、先秦时期，也就是春秋战国，中原各国文化的相互碰撞、交融，从而激活出“百家争鸣”这一文化史上最早，也是最光辉的一章，它与古希腊的鼎盛时代，在世界史上相映生辉，几乎同时发生在欧亚大陆两端。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得以浇铸并定型，开创了今后 2000 多年的一部思想史、哲学史、文化史。以后任何一个文化流派的出现，均可以在此找到它的“根”来。

尽管这个时期，“禺人”也向周王朝献上过木舟，而中原的青铜器亦有流入珠江流域，但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应当说是不曾参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之中，珠江流域，尚属“化外之地”，还处于相对隔绝的历史阶段——当然，可以说已经有自己的文化——水的文化，舟的文化，海洋的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但这种文化，也只能处于浑沌的阶段，不足以影响中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在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两广（这也

是后来才得名的)地区可以说是“缺席”了的,也就是说,不曾与之同步,而在走着自己蹒跚的步子。哪怕传说中的“番人”也是从中原来的,而且属于黄帝后裔中的一支,也一样与“百家争鸣”没有干系。

二、当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了断了中原“百家争鸣”的局面之际,中原的儒家文化才在经“筛选”后,以强势进入了岭南,这时,才在岭南产生了相应滞后了的文化碰撞,经学在广信盛极一时。岭南府治,由番禺北移至广信。于是,广府地区,才有了一个独特的文化的“广信期”——而这已不是中原文化百家争鸣的延续了,而被定于一尊,所以,不可以相应与中原文化发展作比较,同样是不同步的。

但这个时期对于广府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文化的载体——粤方言可以说是形成乃至成熟于这个时期,书面语言规范于中原汉语,而口头语言则相应存在有大量的古越语——直至今天也没多大改变,而广府文化也同样由此被“汉化定型”,作为广府民系,也同样在这个时期内正式形成。所以,对广信期的研究尚有大量的工作可做,这个时期对广府民系、文化产生的作用,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产生不同的观点,但有一条,它是绝对不可忽略的,而过去未曾注意到则是一大失误。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已超出了中原文化,而形成南北文化的大交汇。先是北方民族南下入主中原,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而中原仕族举室南迁,在江南形成新的文化重心。而后,则发生了文化的北伐……于是,古汉族的面目得到了更新的,其间,文学艺术更出现了鲁迅所称的“自觉的时代”,出现了不亚于先秦“百家争鸣”的文化史上的昌盛。这次南北文化的激活中,广府地区成了南方文化的重心,不少南方的著名文化人,都曾在这里崭露头角,大展才华。可惜,过去对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这些名人如何“开吾粤风雅之先”,似乎还没有多少有份量的

文章。

同时，我们更要看到，这个阶段，府治由广信移回广州，从而使广府文化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发展——尤其是汲收外来文明所获得的长足发展，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意义。如果说，内地正是南北文化交汇之际，这里却已与整个亚洲文化早早“接轨”了，所以，这里同样也成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心。

如果说，中国的南北文化交汇，及中国文化与亚洲文化交汇，尚显示相应的两个阶段的话，那么，在广府地区，却已经是无法分开，浑然一体了。这里不但有同步，而且产生了超前，比内地更早接受了亚洲文化，并且进而以亚洲文化影响内地，带动随后的隋唐文明。

可以说，隋唐文化，已远远超出了南北交流，而出现了整个亚洲文化的大交融，这更是对中国文化一次强有力的激活，盛唐文明，雄踞于当时世界之首。其时，不仅有广府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源源不断引入了西域文化、印度文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前迥异；观念形态，更大相径庭，鲁迅称“其实唐室大有胡气”，宫廷音乐，十之八九，大都是外来的，唐诗更云：“夷歌是处起渔樵”，可见已遍及了民间。此间，被誉为“坐集千古之智”。而此际，广府文化也到了它的兴盛时期，成了不可忽略的角色，甚至是排头兵的角色。广州的海外贸易高潮一个胜过一个，到了宋代，更成了全国最大的港口城市，而且早在唐代，更确立了一整套全新的市舶管理制度与经营方式，成为中国外贸史上划时代的一页！

四、随着宋朝积弱，几度异族入主中原，在广府地区，出现了一个颇为独特、值得玩味的“珠玑巷时期”——这个时期，是以一则民间传说为标志的。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由宋末元初，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中后期，即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关于民间传说，后面将有专文阐释。至于这个时期，与中国文化分期，也处

于不同步了。

一直不在乎自己是“粤人”还是“汉人”的广府人，此时，却借这个传说，强化自身作为“汉人”的身份，而且，在抗击两次异族南下（元军与清军）之际，比内地的汉人更为激烈、更作殊死的拼搏——他们为此强调自身作为汉民族的血统，显然要捍卫的是进步的、发达的文明——沿海工商业的发展，是无法容忍一个落后的游牧民族的蹂躏的，中国文化科技的滞后，由宋代的领先到清代的排尾，不能不归于这两次浩劫——当然，不可以这么简单作此归结，所以，对于这个时期广府人心态的复杂性，便大有探究之必要。否则，便不会有以此时期作为广府人“开基”之说了。

五、近代，对于中国来说，更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一次大交融与新的激活——这一过程，迄今仍在进行之中，其中不乏血腥、痛苦，战争与灾难。但是，没有这次激活，中国便无以取得世界的资格，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无论从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还是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均是从异邦引进的“舶来品”。中华文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经历了严重的考验，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它能否再造与更新，如凤凰涅槃一样，正是广大的志士仁人几辈的流血牺牲、顽强拼搏、艰苦奋斗所要叩问的……人类的历史文明，一个又一个地兴起，一个又一个地走向寂灭，中华文化，这硕果仅存的古代文明，是否也该在近现代终于走向了尽头？

也就是这个时候，广府文化终于在中华文化的更新与再造中扮演主要的角色。太平天国在它和客家文化交互之处爆发；戊戌变法，更是广府人康、梁当了主帅；孙中山亦是广府腹地——珠江三角洲中出生的，广州，更成了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而到了今天，广东，则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最早的“试验田”与“特区”。①

尚不是就近现代中华文化的激活下断言的时候，但广府文化自古至今逐渐的“显影”与凸现，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我们就沿着这一线索，去研究广府文化的形成、发展与兴旺，尤其是它对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给它担当的角色予以定位，揭示其本质与特色，看它在今后的发展中，又能怎样显示出其独具的魅力与发挥出巨大的能量。

第二节 番禺时期——中原文化动荡中的“缺席”

西方学者称，铜是一种专制的金属，而铁则是一种民主的金属。他们讲的是，炼铜的技术与要求都高，只有有权力者才做得到，权力便高度集中到了专制者手中。而冶铁技术，则一般人都能掌握，所以，从铜走向铁，社会权力开始分散，一般人家都可以冶铁了。由于铁器的普遍化，生产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西方，城邦民主制得以产生，在中国，也就出现了春秋战国期间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了大动荡、大变革的伟大时代，古代的思想文化第一次有了繁荣兴盛的万千气象。

据史籍记载，正是在这个时期，冶铁技术迅速得到提高，由于发明了“橐龠”（一种鼓风的皮囊），提高了炉温，质量较为上乘的铸铁得以炼就，于是，冶铁的手工业基地，开始遍布了中原各国——以铁器发展为推动，兵器发达了，农耕也发展了，水利灌溉业也得到了促进，手工业更日趋兴盛，这一来，商品经济活跃了，货币也加快了流通——各国均已有了铸币。其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②，也就是承认了私田的合法性，私田公田一律纳税，《墨子·贵义篇》称：“今农夫其税于大人。”他们不再似奴隶般被束缚于井田之上，且有了一定土地与自由了。到了商鞅变法之际，秦国更“除井田，民得买卖”。^③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了……由于经济上的变革，政治也废除了“世卿世禄”，文化上，

更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了。中国文化最初的铸造，便是这关键时刻。老庄、孔孟、墨子、邹衍、公孔龙……我们可以列数一系列与几乎是同时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声誉卓著的思想家、哲学家之类的文化大师。

文化的融合，正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如战国七雄相争之际，赵武灵王为强国救兵，力主变法，采取胡人的军事技术。反对者称惟有本土文化是圆满无缺、无须外求的，否则，便是“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④，而赵武灵王则称，文化的主要功用是“利其民而厚其国”，“果可以利其国，不一其用；果可以使其事，不同其礼”⑤。凭此，赵武灵王方把赵国的疆土“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大大拓展。

中原文化这一辉煌的激活，波及珠江流域时，已是秦统一中国，大军南下之际了。当然，早在“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到周朝，“昔者周盖千八百国”，是否包括珠江流域，各有说法。但是，“南越”一词，始见于秦汉史籍。《史记》中道称为“南越”，《汉书》则称之为“南粤”——而广东至今的简称“粤”，便是由此而来的。

而在这之前，中原人对岭南民族的称谓很多，有百越、扬越、外越、陆梁、西瓯、骆越、瓯越……种种，均是称聚居于珠江流域或当今两广的越人。越人“削发文身”，与中原迥异，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鳞语》中便有“南海，龙之都会，古时人水采珠贝者，皆绣身面为龙子，使龙以为己类不吞噬。”可见这是另一类习俗了。

百越近邻为楚。楚人“信鬼神，好淫祠”，与孔子所在的中原“子不语怪、力、乱、神”已经有所不同。楚文化对岭南的浸润，应是在秦五十万大军下岭南前便有的。而且有人认为，番禺人是经中原到江西而到广东的，在西周后期与越人融合，成为百越的一支。但不管是被认为是“黄帝后裔”的番人，还是楚文化

浸润，在秦大军南下之前，它们惟有被吸收、化合，成为百越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百越仍保留自身的独立性与巨大的化解力，不曾认同于中原文化。

广府的“五羊”图腾，同样迥异于中原。相传在周朝，广州一度灾荒不绝，田地荒芜，颗粒无收，幸一日南海呈现五彩祥云，有五仙着五彩服，骑五彩仙羊而至，由羊口衔一茎六出的稻穗，降临“楚庭”——广州最早的地名，仙人把稻穗赐予这里的人民，并祝此地永无饥馑。而后仙人飞逝，留下五只仙羊化为石，留在越秀山坡，从此，这里便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五羊衔谷，萃于楚庭”，古之神话，多少可以折射出当时的文化、经济状况^⑥。而“楚庭”一称，据旧志记载，则是周惠王时，南海臣服于楚，作楚庭以朝，故以此得名。

“五羊”是来自南海，而非中原，这也说明当时一种文化心态。

我们还可以引证很多的考古发现，古代典籍，以证明当时的百越文化——作为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的母体或基础，是相对独立于中原文化乃至楚文化而自己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其文化特征，也同中华主流文化或中原文化，是完全不一样，拉开很大距离的。我们首先确认这一点，方可以对后来众多的论述或推断作出符合法理的阐释，如粤方言中，至今仍有大量的口语，是无法用汉字来表述的，且不说习俗、民间百艺等各方面了。

这是广府文化孕育或滋养的初期，它完全与自北方位移下来的客家文化有着不同的根源。以至于到了现代，一些著名的广东学者，仍把“粤种”与“汉种”截然分开——如黄节所称，某民系“非粤种，亦非汉种”^⑦云云。所以，真正要寻找、追溯广府文化的源头，不能不与古代百越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认为，哪怕是“番禺”，亦可汉译为“布越”，这是按壮语而来的，而“布”在壮语中即为村，故“番禺”可译为“越人之村”^⑧……

当然，还有更进一步的阐释，这里就不赘述了。

在秦五十万大军入粤之前，乃至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均一直盛行的是多元政治制度，有着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格局，这对于保留与形成地方文化风格，无疑是有好处的。及至秦汉在岭南建立了政权，其政权色彩也非北方的大一统，南方的多元政体仍是延续了下来。其时，广府地区，并没有作为封建集权的中心，各个氏族或部落仍各自为政。包括“楚庭”的设立，更多意义在于其之象征性上，而不存在这么一个所谓的首府。所以，广州作为广府文化的腹地，是日后历史发展形成的，并不一开始即如此。《后汉书·南蛮列传》中称：“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这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楚地在今湖北，“南并”至洞庭、苍梧——苍梧之野，也只到南岭，并未真及南岭之南的“蛮越”，故“楚庭”只具有象征意义。当然，这并不排斥春秋战国时期，有不少文化物品——如青铜器类，陆续流入岭南，这有不少出土文物为证。但作为青铜器中，更多是百越文化的产物，或是经百越文化流变后所铸造的，如三撇足的“越式鼎”等。

正当中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从而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坚实基础之际，春秋战国的文化浪潮，并没有多少波及到当今广府文化所在的“南蛮”之地，使这里的百越文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充其量只是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接受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若干影响。这里的文化还是按照自身的模式在运行着，对于遥远的中原，始终蒙罩着一种神秘、迷惘的色彩。所以，中国文化的第一次大激活中，这里并没有担任过任何角色，甚至不曾厕身其间，它还是“化外之地”，留待后人的认识与新一轮的开发。

它在中国文化第一次激活中“缺席”了。

而这个时候的文化，只稍为列举一些，便可以看出与中原文化的距离。

首先，它是一种“水文化”，珠江三角洲也罢，沿海也罢，

这里的古人无时不刻不在与江河、海洋打交道，所以，他们的经济生活，是渔猎为主。广府先民，正如《淮南子·原道训》中所说的：“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短扶攘卷，以便刺舟。”又有《海内经》云：“帝俊生禹号，禹号生番禺，番禺生番禺，是始为舟。”可以说，从一开始，“水”与“舟”便是广府先民文化中须臾不离的内容。

纹身文化，也是与中原相迥异的。广府先民，抑或是南越族，断发文身，是很流行的，如前所述，学者认为，为了下水以迷惑蛟龙，故有纹鳞的需要。直到今天，在下层社会中，这种纹身的习俗并没有完全消失，可以说，这也是“水文化”的延续。

同样，这里的建筑文化，也是“水文化”的折射。秦汉时期，这里的先人盛行住“干栏”式的建筑，这如同把水中之舟，支起在陆地上一样。广州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陶屋、陶仓、陶冢等建筑模型，大多数均是干栏建筑，连广州出土的若干汉代木椁墓，椁室同样分为上下两层，分明是仿效活人居住的干栏建筑。从水上走到陆地居住，也就自然而然地把水上的习惯带过来，把房子搭在半空中，下边一截可以防水、防潮，也防蛇、兽的侵害。

至于食文化，就更明显了，迄今，广府人仍有吃鱼生的习俗，讲研究生猛鲜活。过去，广府先民好食蛤贝，这不准理解，居住地便是江河湖海，水生食物居多，包括吃蛇也是如此，戏称“吃蛇一族”。

出土文物中，陶器上的压纹，也大都是水波状、鱼状，发展至方格状、曲尺状及米字，这同北方地区出土的彩陶、黑陶有所不同。这自然也是与“水文化”分不开的。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与中原迥异，如流行“凿齿”的风俗，即拔牙，以表示成熟或婚嫁。还有，以鸡骨占卜，而不似中原用龟牛骨占卜。部落战争中，倚重于铜鼓，以象征权力。……

凡此种种，无论从文化的表征与特质而言，与中原文化均大异其趣。

所以，秦发五十万大军南下，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把这已形成的文化作根本的改观。然而，这次发兵，无疑是中原文化南下的一次最其规模的冲击——也就是说，岭南终于赶上了中国第一次文化激活的余波。本来，秦统一中国，“焚书坑儒”、“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⑨使已经在承继了第一次激活的成果后却扼绝了思想文化的活力。实际上结束了中国文化第一次大激活。

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派尉屠睢率 50 万大军，兵分五路，向南方进发。其中四支兵马都未能深入到岭南腹地，一支驻扎在江西余干，一支扼守在江西南野（今南康），一支占据了九嶷要塞（今湖南宁远境内）；一支把守在镡城之岭（今广西桂北越城岭）。只有一支直下湟溪，顺北江而打进了番禺。由于这里处于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各属自己的“君长”，互不统属，力量分散，迅速被各个击破。所以，进军中可谓势如破竹，但日后却不好过——分散的、潜伏的反抗，却让占领者疲于奔命，加上越人熟悉地形，也擅长水性，让北方来的“旱鸭子”无以应付，以至主帅屠睢也阵亡了。

南岭对军事而言，也是个巨大的、难以逾越的屏障，秦军的后勤供应遭到了严重的挑战。于是，一次中国文化史上的壮举——当然，也是经济、军事上的壮举，在此启动了：这就是开凿、沟通了南北两大水系——长江与珠江水系之间，即湘江与漓江之间 60 里长的水道——灵渠。舟楫可从长江入湘江，又从湘江经灵渠进入漓江，而漓江更汇入西江，可直达珠江三角洲腹地，这样，通过水运，解决了南下秦军的后勤问题，秦军被动的局面得以改变，加上新任的主帅任嚣、赵陀等不但善于用兵，也能和集越人，于是，迅速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从此，岭南地区

纳入了大一统的中央帝国的版图之中。

岭南平定之后，秦设置了南海郡（当今广东的大部地区）、桂林郡（当今广西大部分地区）及象郡（今越南北部与广西一部分）三郡。并且把其政治文化或官方文化直接加于岭南，正所谓“并一海内，以为郡县”，把中央集权制加于岭南。在岭南设三郡后，又由南海郡来统制三郡。

但是，秦始皇也意识到，“山高皇帝远”，他对岭南是鞭长莫及，岭南与中央王朝的联系也困难重重，加上当地人的反抗又此起彼伏。于是，他一方面在南海郡不设郡一级的最高长官郡守，因为这是新置郡，官制一时难以完备；另一方面，他又赋予南海尉有相对独立与专断的权力，集军、政、财权于一身。这种无其名又有其实的委任，也是煞费了苦心，不让你自以为尊，却又给你以特殊政策，目的是加强与巩固中央王朝对岭南的统治，然而，这么做，却又埋下了分裂的伏笔，客观上为日后出现割据的南越国提供了各种有利的条件。

南海设郡后，又采取了“屯垦戍边”、“筑道设关”、“谪戍移民，与越杂处”等一系列措施，以同化、归并这一方土地，巩固大一统的成果。于是，在五十万大军之后，岭南出现了第一次最大的移民潮，赵陀“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⑩”。仅女子便有一万五千人来为留戍的士卒补衣，可见士卒之多。而专门“谪戍移民”，更达十多二十万人，无疑，这些人，浩浩荡荡来到岭南，也带来了中原的文化成果。

短命的秦朝，迅速陷入了战乱之中。南海郡尉任嚣，采取了“自备，待诸侯变”^⑪的政策。从岭南的历史与地理环境出发，拿出一个划地自守、割据南越的设想。这一设想，显然与南越历来远离中央政权之外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任嚣病危，即嘱托与他一同南下的龙川令赵陀：“……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

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⑫”。

于是，赵陀在任嚣死后，接任南海尉，即把任嚣的设想付诸实际。他派兵守住了向北的关隘，阻止了战火向南蔓延，并迅速吞并了桂林郡与象郡，趁中原楚汉相争之机，在岭南建立了南越国，定都番禺，自称为南越武王。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到文化的双重走向。正是百越文化的多元性，促使了南越国的割据与独立，为岭南赢得了和平发展的近一个世纪（93年）的间歇——这是作为异质文化离心力而产生的结果。然而，由于立国，保持了政权的稳定，由中原承袭来的政治文化、官制及治国思想，又在这里得以体现——从历史文献及出土文物可以看到，赵陀在南越国实行郡县制，其官职体制，与秦汉中央朝廷是基本一致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这样一来，中原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渗透到了整个管辖区域，换句话说，“官文化”，已是中原的了，“野文化”，才是本土的，是“北方的天，南方的地”了。

可以说，这正是百越文化或土著文化第一次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换，这也可以说是广府文化正式形成的先声，有了“汉化”的色彩。它正是在中原的礼义文教与制度文明的直接加入下，来了一次重铸与再造。

赵陀本人，一方面仿效粤俗，椎髻箕踞，自称为蛮夷大长，提倡土客通婚，以取得土著的认同——包括自立“南越国”，也是如此，同时，他又主动传播中原的制度文化，以及操作推行中央王朝的各种礼仪。如他倡导的“三老五更”礼，便是从中原引进的，对七十岁以上的长者赐杖，建立敬老尊贤的良好习性。南越王墓中出土的乐器，也大多属中原汉乐系统；另出土的6个玉雕小舞人，也是中原舞蹈的装饰与舞状^⑬。

由于赵陀治理有方，经济发展也相当快。及至西汉末年，番禺成为中国十九个著名的都会之一，海上贸易商品重要的集散

地，其基础可以说是赵陀及南越国之际确立的。

可以说，这是广府文化的初创时期，或称番禺期，它的底色仍然是南越的，但已绣进了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金线银缕，它仍然是多元的——直至今天是如此，只是各自的比重有所不同罢了。

这自然是文化大激活余波中一个小小浪峰。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南越族有自己的语言，与中原汉语完全不同，在基本语汇及语法结构上相去甚远。故有“重译乃通”一说。赵陀立国之后，促进了两种语言的交流，口头语、野语自是南越语，而书面语、官方语已是中原的了。这种语言重叠的风貌，迄今在粤语中仍可以找到。至于南越族过去是否有自己的文字，尚可考，但中原汉字作为一种强势的语言符号，在这里立足，自是借助于官方的能量。粤方言如今除保留相当数量的越土著口语外，亦含有中原的若干古音，这也是那个历史时期留下的语言痕迹。

总之，作为“番禺期”的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之形成，是在中国春秋战国第一次文化激活之余，于中原文化南下，借助于统治手段、文化措施、国家职能诸方面，与本土文化交融的结果，它虽然滞后于中原文化的全盛期，但仍不乏自身的特色并长远地影响了这一区域文化的定型与发展。

第三节 广信期——中央一统的汉化定型

汉朝的鼎盛，无疑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而激活出来的。《汉书·五行志》中称：“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寥寥几行字，概括了“汉兴”的思想进程。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一进程的结果。由是带来了几百年的稳定与发展。

此时，封建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的局面业已形成。西汉初期，之所以出现“文景之治”，是因为文、景二帝及其领导集团，吸取了秦王朝迅速覆亡的历史教训，奉行黄老之术，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在政治上则进一步削夺诸侯王的权力，巩固中央集权；经济上则实施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政策，使国力大大得到增强，不仅取得三次反击北匈奴的胜利，西南疆域也得到了开拓，包括岭南，也平了南越国，归入大一统中，并将府治由番禺北移到了广信——当然，这是另有深意的。

作为广信期的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的定型与发展，不能不看到这个大背景及其直接的影响，不仅仅是地理上，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经济上与文化上的。

汉武帝之所以全盘接受董仲舒提出的思想体系，正是因为它适应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形成，提出了作为统治者的“有为”，强化与统一法度——这包括对边域的府治，而反对放任“无为”，全面总结秦二世而亡的教训及汉初的弊政。

也可以说，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形成了稳固的统一大帝国，使中原文化产生了巨大的辐射，与各地域的文化走向整合与交融。这也标志着变法与统一的最后完成，使中国的历史步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珠江流域的府治，北移至广信，长达375年之久，也正是这种稳固、统一的表现。因此，这节，正是重点阐释这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影响与变迁的。

375年，并不短的历史，当有很多文章可做，很多问题可探究……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个朝代的气数毕竟不可以长久维持，于是，在汉末出现了大的动乱与分裂，社会秩序大解体，旧礼教来了个总崩溃，大

一统再也统不住了，思想获得了解放，信仰赢得了自由，人们的创造精神在枷锁瓦解后得到了猛烈的勃发——正如宗白华所言，在汉末魏晋南北朝“这时代以前——汉代——在艺术上过于质朴，在思想上定于一尊，统治于儒教；这时代以后——唐代——在艺术上过于成熟，在思想上又入于儒、佛、道三教的支配。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人心里面的美与丑、高贵与残忍、圣洁与恶魔，同样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中国周秦诸子以后第二度的哲学时代……”^⑭

人们不难看到，古罗马帝国的覆灭，与汉魏六朝的大动乱，可以说是同步发生的——而且是同一个肇因，因欧亚大草原千年不遇的大旱引发的世界民族大迁徙所至。西匈奴的西进，其结果是古罗马寿终正寝；而南匈奴的南下，则是“五胡乱华”，西晋灭亡；……短短一两百年间，先后建立了 20 多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一会儿是汉人“臣服”，转眼便又是胡人“汉化”；一会儿是军事南下，转眼转又成了文化北伐，中国大舞台上，热闹非凡，你方唱罢我登台，民族的大融合，也由此发生——北方，如北魏孝文帝元宏与其祖母冯太后改制，施行三长制、均田制，以中原政制为参照，作楷模，改造北魏政权，又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装。而被迫南迁的“中州士女”，举族来到江南，乃至岭南，以百万之众，对南方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冲击——这后边将详加叙述。与此同时，汉民族在融合少数民族之际，也汲取了他们不少优秀的文化习俗……

也正是在汉魏六朝中，南北文化的激烈碰撞，激活出了中国文化史上众多灿烂的不朽篇章。玄学思潮由此兴起；而初始的“名教本于自然”，则走向了“名教不合自然”及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出了思想解放的最强音……无疑，这是一个“天放”（庄子语）的时代！一个自由的时代，一个诞生巨人的时代。光文学而言，三曹、建安七子，还有蔡琰、陶渊明、谢灵运等巨匠，还

出现了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艺理论巨著，教后世难乎为继。如果说先秦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黄金时代”，那汉魏六朝便是古代文学的“自觉时代”。读一读《世说新语》，我们均可切身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豪放、潇洒与壮美来。

伦理中心主义的崩溃、历史束缚的松弛，人格与心灵的大自由、大解放，是这么个悲惨时代的生命呼喊，所以才如此“富于命运的罗曼司”^⑮（宗白华语）。

这便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二次激活，它已超出了中原，而遍及南北了！

我们大致归纳了汉代“定于一尊”到汉末及魏晋南北朝“礼崩乐坏”这么一个文化的大变迁的历史背景，现在，我们再看看在这大背景下的广府文化的演变。

人们不难发现：

正是汉代“定于一尊”，即“独尊儒术”，强调大一统或汉化之际，岭南的府治，则由原来南越国所在的首府番禺，北移到了临近灵渠的广信。广信作为府治的始终，与此是密切相关的。

而随着“礼崩乐坏”、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几度游移，最终府治还是从广信又重新回到了广州（番禺），而这时，南北文化的融合，尤其是亚洲外来文化的登陆，正方兴未艾。“大一统”局面受到了挑战。

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不妨深入加以讨论。

广府的府治，一直是设在广州（番禺），但是，却有这次“脱轨”，一度北移到如今的梧州、封开一带，史称广信。而且长达近四个世纪之久。这似乎是异乎寻常的。

历来的解释是，这是权力斗争的结果。但这显然是牵强附会，不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府治的位移或文化重点的变迁，显然有更多的历史文化的因素在内。

当日，汉武帝平定南越之际，中原也正出现一次文化格局的变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说，确立了儒家文化作为汉文化的主流地位。而被平定的南越国，尽管君主是当年南下的汉人，但他们为了安定岭南，取悦土著，尽可能尊重当地风俗，这一来，连他们自己已“土著化”得相当可以了。这些，已有不少史料，就不赘述了。

由于中原汉文化已“定于一尊”，因此，哪怕到了岭南，其“土著化”显然是不能相容的了。所以，让府治尽可能北靠，不仅仅是有军事上的考虑，政治上的需要，同样，也是文化上的必然。

也就是说，广府府治的一度北移，正是为实现“汉化”的重大的战略举措。换句话说，广信期，正是广府文化为中原文化所吸附、改造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而经学在此期间于广信取得的重要成果，正说明这种吸附、改造所取得的巨大作用。因此，把广信期视为广府文化的“汉化”定型的首要阶段，当是有充足理由的。

我们可以寻溯一下这段历史。

现在，我们来看看，广府文化在这次中国文化激活中扮演了怎样的特殊角色。

未雨绸缪，我们得研究一下在这之前广府文化区域的历史性变化。

赵陀经营了93年的南越国，几番臣服，又几番反叛，终于在公元前111年即元鼎六年，为汉武帝的十万大军所攻破。汉武帝平南越后，将原南越故地分为了七个郡，分别为南海、郁林、苍梧、合浦、交趾、九真与日南。为了“初开粤地宜广布思信”，在今封开梧州——即贺、漓两江入西江处，设立了其管辖岭南各郡的“交趾刺史部”，并给此地命名为“广信”——取“广布思信”之义。

我们可以从地理上看出广信位置之重要——自灵渠沿漓江而下，正是在广信这个地方，进入珠江的主干之一——西江，也就进入了广府腹地，这正是秦五十万大军后勤粮草得以顺利入粤之处。汉武帝设“刺史部”于此，自是一番苦心。再取番禺作南方的政治中心，显然危机四伏，而位于广信这里，则与中央政权相应接近，并易于联系得多。作为中央政权统辖岭南的首府，广信持续了有 300 多年，一直延续到黄武五年（公元 226 年），因龙编侯、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孙权采纳了吕岱的意见，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置广州，治番禺——即历 337 年后；但不久，吕岱诛杀了拒不成命的士徽兄弟，又撤广州，复为交州。直到永安七年（公元 264 年）才又复分交州置广州，这更有 375 年，近四个世纪了。

因此，岭南的重心，或者说，真正成为中央政权在岭南的重心，最初应是这 300 多年的广信。而在过去，番禺虽作为南越国都，但处于多元化状态下，番禺甚至作为港口，还不如徐闻、合浦，而在汉代，史载当日的出海港口，是作为军事要塞的日南（今在越南），合浦与徐闻。班固《汉书·地理志》上便有：“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语。因此，番禺取合浦、徐闻而代之，应是以后的事情了。

广信时期，也就成了广府文化定型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大量的史实证明，当日的广信，是中原文化大规模的南下、也是外来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交汇点。在漫长达 375 年间，这里始终是中外文化、南北文化碰撞的热点。这对于广府文化的定型，有着相当大的份量。我们不难看到，正是这个时期内，广信出现了开岭南经学之先的“三陈”——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三人，陈钦甚至自命其著作为《陈氏春秋》，可见当日接受中原文化却不以中原文化为尊的傲气。而后的士燮，一度游学京师，汉献帝时任交趾太守。《三国志·吴志》

中说他“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于是，往南方避难的士人，纷纷投奔他而去——由此可以证实，当日广信作为南方的文化学术中心，当非虚言。著名学者罗香林曾撰文指出，当日的岭南（交趾）已成为了“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是经过深思熟虑并反复考证所得出的结论。笔者在多年前曾撰文一再强调，对汉魏六朝岭南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岭南一度作为中原与外来文化交汇的重心的研究，实在是太缺乏了，虽说不是空白，但也是很不够的，因为这个时期，对岭南、对广府文化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几年后，传出对封开的考察，黄伟宗教授提出并进一步证实封开是岭南最早的文化古都的说法，形成开发与建设“岭南文化古都”的构想，以及开辟“西江文化走廊”等等^⑩，正与我的研究不谋而合。今日的封开，正是当日广信的一部分或主要部分，另含梧州的东部。广信作为岭南首府的300多年，当有很多古迹可发掘，如今掌握的资料，与这300多年的漫长历史相比，实在是太少了。

从考古中发现，广信时期，南方墓葬的越式陶器和铜器已基本绝迹，可见受中原文化影响已经相当深了。而南方的土特产，包括外国的铜器、象牙、犀角、宝石、水果，也成批北运，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与循环。而日南、徐闻、合浦与海外的商业贸易交往，也长盛不衰，番禺的工商业——即制陶业、铸铜业与造船业，亦相当繁荣，成“一都会也”。

而粤语的形成，专家们也认为，广信时期是最关键的。过去学者大都认为粤语出自广州，或珠江三角洲一带。而广东语言学家叶国泉（《广东省方言志》主编）与罗康宁，在《语言研究》1995年第一期上，发表《粤语源流考》一文，则提出“粤语形成于西江中部”，也就是广信一带，从中原传入的古汉语文化，正是在这里作为结合部，与古百越文化结合、交融，语言也逐步发展为一种既具有古汉语特征、又有百越口语特征的语系，从

而扩展到了南方各地——两广。正由于广信作为长达 300 多年岭南首府，它是完成可以有此功能的——而在当时而言，湘、漓水路，应是最通畅，也是最主要的南北交流的通道。

在湖南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文物中，有“广信令印”一枚。此外，在一幅地图上，又有“封中”二字标于“封水”（也就是今天的贺江）流域。由此可知，广信的影响程度，这自然是与经济、文化的发达分不开的。而史料记载，广信所在的苍梧郡，人口也远远高于南海郡近一倍。王莽篡政时，动乱中，鲁国汶阳士氏，也避地上广信，后来成了此地的望族。

尽管上面引证的史料，只是片鳞只爪，甚至不成系统，有待日后更多予以搜集，但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诗语》中，也不少处提到汉和帝时，南海杨孚著《南海异物赞》；孝惠帝时，张买侍游苑池，鼓櫂为越讴；晋时，高州冯融，更汲引文华士与为诗歌；梁曲江侯安都，数招文士……“开吾粤风雅之先”，可见当日文化活动之活跃了。

除上所述，375 年及其后年间，广信在岭南作为首府的地位是应予以确认的，它不仅作为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是文化的中心——这些，我们在后边专门章节，如思想、文学上，还要专门提及的。

清代经学家江藩在《炳烛室文集》中，把广信日后的沿革作了较清晰的交代，现摘录如下：三国孙吴“黄武七年，割南海、苍梧、郁林、高凉四郡为广州；交趾、日南、九真、合浦为交州，俄复旧，永安七年又分立交、广二州，广州之名实始于此。所以名广州者，因刺史治在广信，乃取县名之一字为州名耳。迨及宋时分广东路、广西路，于是有广东、广西之名矣，元、明、本朝因之。汉之广信，今之封川县，封川以西为广西，封川以东为广东也。吴以广名州，本于广信，宋以广名路，亦本于广信也。”

此外，广府文化成为岭南三大民系文化中的官方文化——粤语成为广东的官话，应当说，是与地方的行政机构的设置大有关联的，体现了作为南方地方制度性文化的特征。换句话说，假若不是制度管理与行政机构的设置，广府文化就不足以成型，当然，制度文化也只能是整个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但应该说，在广信及其后广州的设置，对广府文化的命名或广府文化中心的变迁，都是起决定性意义的。因此，我们把广府文化的定型期确定在广信—广州作为岭南首府这几百年间，可以说是有充足的法理依据的。

把首府从广信移向广州，是经过反复的，黄武五年（公元227年）的交广分治，只实行了一年就取消了，直到永安七年（公元264年），也就是34年后，才又成为定制，可见其间还是有争议乃至斗争的。东吴统治者的用意，自是“绥和百越，遂用宁集^{①7}”。番禺于是又成为分治后广州的首府，从此，番禺的地位开始上升，于六朝时超过了合浦与徐闻，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当北方战乱，士族举室南下之际，而广州市郊出土的晋墓砖铭文却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于是，这里作为文化人聚居地或避难地，南北文化、中外文化，在这里都得到滋养与交汇。

还在两汉，南海、苍梧诸郡已是“风序泱泱，衣簪斯盛”，如前所提到的经学“三陈”；吴初汝南名士程秉，亦避乱广信，博通五经，著有《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弼》等，蜚声杏坛。而北方名儒刘熙，更著有《孟子注》，与程秉等考论经学大义。黄武中，江东最负盛名的经师虞翻，因得罪孙权，徙居广州，“讲学不倦”十数年，“门徒常数百人。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鉴于当日玄风日盛，他的学问“传孟学亦间出道家”，开创了以玄释经的风气，把交、广的经学

研究推到了一个高峰，左右了南方学术的走向。

及至道教创始人葛洪居留罗浮山，更开创了中国道教的历史，影响了日后的整个中国，从而复又浩荡北伐，成为中国本土的宗教——这也是中国第二次文化激活——南北文化碰撞中，南方的历史贡献，当然，在这之前，应是酝酿，准备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可以说，在南北文化交融中，如果没有广州这一稳定的南方作为退步，后来的文化北伐便难以形成。当然，说南方文化北伐，当时主要应指江南汉文化对北朝的影响，北朝始终认为南朝为“正宗”的缘故。而在岭南的结果，则是为正在逐渐形成的广府文化正式定了型，而一种文化形成了基本形态后，也就有了它的边缘效应与辐射功能，所以，在这次南北文化交流、激活中，广府文化不再是消极、被动地承受，而发挥了它的作用，不可以无视它的存在了。

如果说，南越国及之前的土著文化，更多认同的是百越，包括国名亦如此，所以，番禺时期的广府文化雏型，中原色彩是相当淡薄的；那么，到了广信—广州时期，它已纳入了整个中央政权的相对有效的控制中，因此，中原文化对广府文化的规范化、定型化，无疑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于是，广府文化在接受南来的中原文化之际，尤其是中原的社会伦理原则被逐渐认同，它在某些方面，也逐渐达到了作为中华文化所能企及的高度。但是，广府毕竟只是有一方与中原接壤，而另一方，则是浩淼的大海，它同样较容易接收来自外边文化的影响，加上长期被视作“化外之民”，对中原的保守、泥古等传统亦有所摒弃，绝不亦步亦趋，始终保住自己相应的自主性，尤其是大量移民的流入，更使其不断获得朝气与生气，这一来，对它在未来扮演新的、更重要的角色，无疑是起着良好作用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广信期的结束，是随着来自中原大一统

的张力松弛的状况下，而外来文化却日益增强之际所导致的。前边，提到的外来文化不多，主要是因为作为广信期，中原汉文化影响毕竟是主流，外来文化的进入尚有一个过程，其间可提到的是东汉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来中国的、佛教史上第一个佛经翻译家安高世，他是经海路至岭南，而后北上的。而 100 年后，已是三国时期，即建衡年间（公元 269 年），府治已至广州，海路来的僧人才络绎不绝，如真喜在广州译《十二游经》等。及至两晋南北朝，广州更是名僧荟萃、寺院林立了——这时的史实更不胜枚举。

这也反证了广信期的意义与作用。

如果我们确定了广信期为广府文化定型期的话，有人会问，珠玑巷又算是怎么回事？该怎么看待流传于民间的、认为广府民系主要是开基或形成于珠玑巷时期，而且有相当多的谱牒可以作为证据的这一说法呢？

所谓珠玑巷开基，其时间已延至宋代，而且是南宋了。如果说，客家民系最终形成或定型于“葛藤坑”或稍后时期，那还说得通，因为那是一个流动的，始终处于迁徙中的民系。但是，广府民系，至少在主观意识上来说，很少有“移民”观念，他们大都认为自己是本地人，而且有歧视“北佬”的观念，诸如“舜孙”之说，又如顺德大学者黄节，也有“汉人，粤人”之分一说。因此，不可以轻言广府民系是迟至“珠玑巷时期”才形成的，这要形成得早多了。

之所以有“珠玑巷”一说，恐怕同当时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宋代是进入了后儒社会，实用理性风行，比汉代“定为一尊”的观念更为严重得多。程朱理学，对人们的思想箝制也一再升级。所以，强调汉民族的文化传统，乃至强调自身的汉族血统，这就更为迫切与重要了——于是，这也就与“广信期”相呼应了起来。

但广信期是汉文化南下，汉族统治者布“恩信”于岭南，但到了南宋，由于国力积弱，宋赵江山风雨飘摇，作为汉民族的王朝已面临覆灭的危险。这也相对激发起了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因此，包括广府人，此时反而讲究起了自己的汉族血统，这就不足为奇了。

正因为上述的两个主要原因——宋代实用理性思潮，加上汉民族王朝处于危亡之间，这才有了“珠玑巷”作为汉民族于岭南开基一说，强调广府民系的汉族血统。

当然，任何说法，都是必有一定事实依据的，珠玑巷 33 姓 97 户人家南迁珠江三角洲，也毋庸置疑。况且，南岭南麓始兴一带，自南朝起便一直有着中原南下汉人聚居之地，而且相当兴旺发达，一直是重要的城镇与治所。随着宋末的军事压迫，他们再度南下，也在必然。

因此，视广信期与珠玑巷期，是广府文化两度被“汉化”定型的历史时期，当非虚言。但情况各有不同，后者，即“珠玑巷”更多是出于一种理念，并不等于真正的“开基”，这是应说清楚的。关于珠玑巷，当别处重点阐释。而且，珠玑巷并不曾似广信，曾作为过府治的所在地，它只有理念上的位置或象征性的意义，不具备府治地所代表的实在作用。

府治地的位置，无疑是代表一种文化的重大变迁，不仅仅是地理上，而是实质上的。正如历史上不少国家或民族的迁都一样，都不那么简单，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以及地理环境、气候，等等，都是有重大关系的。因此，作为广府府治这一次特异的“脱轨”，有必要从作全面的、深入的、科学的论证，其对广府文化的定型与塑造上的作用，无论是高估还是低估，都会影响到对整个广府文化的形成、流向的研究，乃至其特质的研究。这里，权作抛砖引玉吧。

第四节 广州期——来自亚洲文化的激活

随着东汉末年，中央政权日趋没落，统治松懈，岭南的地方势力“坐大”，拥兵自重，广信作为府治的地位也同样岌岌可危了。其时，交趾太守士燮羽翼丰满，朝廷已拿他无可奈何了。史载士燮“雄长一州，威尊无上，震服百蛮”，可见在地方上的势力之大，威望之高。因此，东汉末年群雄蜂起之际，朝廷为避免割据的军阀染指交州，故特地给士燮下玺书，称：

交州绝域，南带江海，上恩不宣，下义壅隔，知逆贼刘表又遣赖恭窥看南土，今以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领交趾太守如故。

其实也只具象征意义，士燮又何须朝廷加官呢？况且玺书也是出于无奈，生怕刘表派遣的刺史真个要去管理交州，故须士燮正名，正名又不放心，只给个“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却不敢让他当交州刺史。

后来，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吴国也就关注起交州的问题了。建安十五年（即210年），江东孙权加士燮左将军职，任命鄱阳（今江西波阳）太守步骘为交州刺史，并率大军自湘桂水道南进，击败刘表的部属，夺得苍梧郡，并建立了一支二万人的水师，这时的士燮，才接受孙权任命，宣布归属东吴，保住交趾、九真、合浦三郡。

第二年（211年），即迁交州治至番禺，筑立城郭，以示对地方势力的安抚。

第三年（222年），即孙权在建业（今南京）称帝，年号黄武，正式建立吴国。至黄武五年（226年），龙编侯，交趾太守士燮病故，孙权采纳了吕岱的建议，分交州之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置广州——这也是第一次有了“广州”之名，由“广信”而得名，治番禺。

于是，府治重新回到了番禺。

病故前的士燮，的确威风无比，《三国志·士燮传》中云：

……出入鸣钟磬，各具威仪，笳肃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十，妻妾乘辎辂，子弟从兵骑，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不足逾。

这里的“胡人”，当是指因海上交往而来的东南亚、乃至印度、阿拉伯的商人及因传教、生活而来的其他人等。他死了后，其家族势力因与地方及海外关系结合很紧，吕岱只好分而治之，从交州划出一个广州，吕岱为广州刺史，戴良为交州刺史。而一向与朝廷保持良好关系的士燮家庭，只给其儿子士徽安了个安远将军的头衔，并调去交州南部九真当太守。这一来，士燮家族便受不了，士徽自命交州太守，发兵拒戴良于境外。

吕岱诱降，借安抚之机，竟出尔反尔，诛杀士徽兄弟，铲除士氏势力。这一来，另立广州已无必要，于是，又撤广州，恢复原来交州的管治范围。

广州此次只存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

士燮家庭虽被铲除，“藉累世之恩”的格局似乎已被打破，府治回到了广信，似乎又是来自内地的力量的一个胜利。但是，内地政权与南方地方势力之间的拉锯战，绝不因此而一了百了，尤其是来自海上丝路的强大商业的、经济的影响，更不可能便由此中断。于是，在撤销广州府治的近40年后，即吴景帝永安七年（264年），又再分交州置广州——即不得不又对地方势力“分而治之”。

触发这次分治，是永安六年（263年）交趾的一次大规模的叛乱。

这次叛乱，是因太守孙胥贪得无厌、暴戾无常而起的。加上又征发丁壮当兵，老百姓不愿远役，故谋反作乱。这年五月，郡吏吕兴等杀了孙胥，煽动兵民，会同少数民族，北上向魏国救

援，弄得吴国腹背受敌——此番叛乱，后人归结于弊政，即官贪、欺民及滥征发兵丁引起的，这当然是直接的诱因。但其背后的文化动因，后人仍不难看出来。

吴国设立广州后没多少年，便亡于西晋了。

然而，广州却从此确立下来，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之际，南方的商贸发展，尤其是与海外的联系，比在广信期要强得多，如果仍把府治设立在远离大海港口的腹地，也就无以把握住这一经济的命脉，可以说，是来自于海洋文明的一股巨大力量，把府治拉回了广州。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府治的位移，看上去是政治的结果，是地方谋反须“分而治之”所至，但其后面的经济大背景，却是毋庸置疑的。而“地方势力”本就得有经济作有力后盾，否则，何以能“坐大”，而中央政权的诛求无已，正是“官逼民反”——历史的必然结局。

广府文化的中心，由广信重返番禺，称得上是伟大的战略转移，它标志着广府文化走向兴盛与繁荣，第一次在中华整体文化的再造与整合中，扮演了重要的、无以替代的角色——同时，由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弱化，南北分裂，即便是南朝，对交广地区的控制，也远不如前了，这使地方势力能够“坐大”，获得相应的自由发展，长盛不衰。尤其到了六朝时期，广州更成了岭南的经济中心，以及国内最重要的外贸口岸，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在南朝乃至全国，都举足轻重。

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第三次大的激活，即在中国发生的整个亚洲文化的大交融，其触发地之一，正是在广州，由此，才有了盛唐文明的出现。使中华文化，更加确立了自身的多元格局，而非汉代的“定于一尊”。文化的多元格局的形成，是一种开放的、向上的姿态，意味着历史的大踏步前进。

亚洲文化的汇聚，我们可以从如下众所周知的事实引入。作

为古印度宗教的佛教，始创于公元前 6 世纪，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佛经翻译家安高世，是于东汉建和元年（公元 147 年）来中国，正是经海路到广州，而后北上江淮的，他是安息国王科斯老之子，来后，通习汉文，20 多年译佛经数百万言，达 95 部之多，并且在广州等地宣传过教义，讲解佛经深得信服，传译梵典，毋须转解，“义理明析，文字允止”，流传甚广，为南北朝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东吴之后，自海路来广州的僧人更是络绎不绝。建衡间，外国沙门强梁娄至（真喜）到广州，译《十二游经》。及至广州确立，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 281 年），西天竺僧迦摩罗赴广州，亲建三归、王仁二寺，而后，天竺僧耆域亦来到交广，上中原。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 401 年），罽宾国僧昙摩耶舍亦至广州，在虞翻故居建王国寺，又在白沙寺讲法，一时门徒甚众。

南朝统治者好佛信佛，于是寺院林立，广州更是名僧荟萃。外国僧人借兴旺的海外贸易之机，纷纷搭乘商舶来广州，有名的有求那罗跋陀、求那跋摩（功德铠）、求那跋陀罗（功德贤）、昙摩伽耶舍、僧伽跋陀罗、达摩菩提、智药三藏、波罗末陀（真谛）等。达摩来前，他的老师般若多罗尊者还送给他一首诗偈，预言他在其死后 67 年将赴中国并在广州登岸：“路行跨水复逢羊，独自栖栖暗渡江……”“羊”即是指羊城广州。而真谛更两次居广州光孝寺有 12 年之久，译了 49 部经，译讲《摄大乘论》、《俱舍论》等，后在广州圆寂。

当然，佛教的传入，还有西域的陆路。

同后来的西方宗教传入不一样，佛教完全是和平传入的，它对中国走向盛唐的发达，无疑是起到了重大作用。笔者在《中国文化史观》一书中，以《“神意”的激活》为一章，曾这么写到：

无疑，佛学对于中国人来说，当时是一种全新的观念。

日本一位史学家甚至说，它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来说，算

得上是一种个性解放的思潮。这不无道理。当然，佛教最后仍归于“大公无私”——还是伦理观大同小异的群体。但毕竟对从一开始就约束于群体，无任何个性自由的伦理社会是一次反叛，一次挑战。问题不在于佛学本身的教义归根结底是什么，而在于，像中国这样一个自然—伦理一脉相承下来的沉滞、封闭、内窒的社会，需要一种外来的激活与催化，恰好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一样，它并不一定参加反应，到最后仍依然故我，可它却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进入中国古代社会的佛教，也就是这样一种催化剂。于是，它与诸方面的因素相配合，造成了唐代的繁荣昌盛，国内也有人认为：“……我们不能不承认佛教在当时是一个代表进步的力量，而非反动势力。”（李亚农语）。

人们不难看到，盛唐，正是摆脱了伦理、历史的束缚、汇集了亚洲文化之百川，从而推出了一个高度文明的时代。其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空前繁荣，其余绪直至宋代，仍是当时世界所无法企及；而政治、经济、外交，也同样是远远超出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甚至可以说，其时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迄今仍无法超越。

“贞观之治”，斗米值三四钱，已成历史佳话，自贞观至开元百多年间，经济飞升，百姓富足，疆域广阔，国力无敌。大诗人杜甫有《忆昔》一诗，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文化的激活，使得广州这个结合部最为得益，正是隋唐之际，广州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大都会。“广货”浩浩荡荡，远销海外，所造之船舶，也海内外称雄，造船业规模空前，广州的远洋

交通更前所未有的，成为东西方海上的交通中心。贞元间（公元785—805年），贾耽在《皇华四达记》中，具体描绘了广州至南海、印度洋、波斯湾及东海沿岸各国的航程，称之为“广州通海夷道”，途经有90余国之多。其时西方学者也有同样的记载。

从城市格局也可以看到广府文化的特点。其时，广州已形成“州城三重”的格局，包括南城、子城与官城三大部分。中国城市，历来是以伦理为中心，惟有官城，讲究城市的中轴线。但广州却以商城格局显示出其特色，在南城外，建了新南城，兴起了大片商业区，尤其是西部，更是中外商贾聚汇之处，其“蕃坊”“列肆于市”，成了广州的商业旺角……

隋代所建的南海神庙，庙前有一黑人石像，人称“波罗使者”，说的是其在广州乐而忘返，船队扬帆远去，独他在此等待，直至化石。隋代更有文帝的告诫：“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①9}设南海神祭祀，可见对海外贸易的重视——题匾便是“海不扬波”，祈愿各方使节，总管海路邦交外贸，迅速使“海外诸国，日以通商”，“每岁有昆仑舶以珍物与中国交市。”^{②0}而后，更有“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②1}开元年间，蕃坊以光塔街为中心，包括如今的大德路以北、中山路以南、人民路以东，解放路以西——几乎就是今日广州的中心地带，可见其繁华与风光。

当时，外国人称长安为摩柯支那（梵文 Mahacina），意指“大中国”，广州则为支那（cina），即“中国”。^{②2}当日长安规模之大可想而知，但广州也已经有相当规模了。

除开佛教外，伊斯兰教等也已传入。

而与外交流之际，文教事业也同样蓬勃发展，进步甚巨。州有州学，各县、乡也设学校，唐代也有了广州登进士第的人……

唐后，出现了五代十国，广州又一次如当日南越国一样，成为了南汉国的国都——颇有意味的是，刘岩先自立为南越王，后

称帝，国号“大越”，第二年，遂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以别于中原的后汉。可见与前“南越国”师承关系。

南汉国承唐制，对中原五国长期取对立的态度，刘岩甚至“有欺四方，傲中国之意，每见北人，盛夸岭海之强。”^②这与广府历来无视所谓中原正宗，是有传统的。其外交上，更与吴国交好，抗御中原系统的楚、闽二国，南唐代吴后，与南汉关系亦没有变。由于南汉、吴（南唐）两个南方大国长期结盟，切断中原王朝与吴越、闽国的通道，“阻塞梯航”，更对中原系统表现了强烈的离心倾向。

我们不难看到，仅广信时期，中原对岭南施加较有力度的影响外，在隋唐的多元格局及其后南汉国的独立，广府文化并没有再多受中原“一统”的箝制，而走出自身的发展道路来，从而出现了绚丽多姿的华彩乐段。

南汉的开创者“坐拥百粤，闭关自擅，而不毒民”，令辖区内“府库充实，政事清明，辑睦四邻，边烽无警”，无疑是恪守广府文化的传统，从而“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令一度为战火所伤的广州外贸得到迅速的复元，广州亦兴起了规模空前的都城建设。既仿长安大兴宫殿苑囿，又扩展商业区，令蕃坊一带万间云集，宝货充盈……由于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更是人文蔚起，人才荟萃，文化事业盛况空前——朝廷更是以文治国，延揽文才，对外来宗教也很是“崇重”……

这一繁荣，一直延续到宋代。

我们在讲到外来文化，主要是亚洲文化在广州的“登陆”之际，也应当看到，中原文化的南下也始终没有完全中断过，即便在南汉国，延揽人才之际，也很注重内地知识分子的人选，让他们跻身于统治集团中。而自魏晋以降，由于中原板荡，南下的中原望族，也纷纷在岭南建立了自己的势力，由此，广东，成了中国最重要的移民区域。

及至宋朝积弱，南宋偏安一隅，南下的中原仕族也就日趋增多了。加上唐宋深知广州为其“货财之源”，不能不予以重视，而这里却又多“易动难安”的众少数民族，为达到治理的目的，往南移民，则是完全有必要的。因此，早在唐代，便有张九龄主持大庾通道的开通，把过去崎岖难行的大庾岭古道路面拓宽，使自北而南的交通大大改观，从此，自中原至岭南，不仅仅走秦代绕道灵渠的湘、漓水路，而大大缩短了行程，从而加大了中原向南移民的流量。被称之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著名学者丘濬曾对此说过：“兹路既开，然后五岭以南人才出矣，财货通矣，中原之声教日近矣，遐陬之风俗日变矣。”

请注意，此评价是明代作出的。

也就是在宋末，开始有了广府人皆出自大庾通道或梅关古道上的珠玑巷的说法，乃至于把珠玑巷当作广府文化的近源。不少广府人的谱牒中，都有关于珠玑巷作为“开基地”的记载，其间真伪，自可一一考证。但是，可以说，珠玑巷的出现，却表明了自隋唐以来昌盛的广府地域中发生的文化激活的一个终结，广府文化一个辉煌乐章的中止。因此，我在这里，把这一次文化兴盛期归结为“广州或前珠玑巷时期”，当否，请各位学者评判。

第五节 珠玑巷期——国运衰落时的心理强化

研究广府民系的形成，尤其是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的“源”与“流”，都不能不触及到珠玑巷的传说，这不仅仅在于广府民间一讲到祖上开基之处，是必提到珠玑巷，甚至有的学者沿袭这一说法，去论证广府民系是直到珠玑巷时期才得以正式形成——这自然值得讨论，而是在于，这一传说所包涵的文化意蕴，其在广府民系发展史中所具备的无可回避的重大影响。

因此，如果写广府民系与广府文化，无视珠玑巷，甚至不知

珠玑巷，那便等于对这一课题的无知；同时，如果对珠玑巷本身不加以研究，简单几笔带过，也同样不可能真正认识与了解这个民系及其文化。

无疑，广府人有太深的“珠玑巷情结”——这被他们视为自己的汉文化之“根”，以此证明他们不曾自外于一部中国的整体文化史，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近年来，关于珠玑巷的研究沸沸扬扬，出了不少书，提出了不少新的证据，也有一些不同的见解。其间，大量的谱牒证明——至于谱牒的真伪，不少专家各有不同的说法，这里且不加以妄断。但研究一部文化史，有时更真实可信的，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演变——那正是史实本身提炼出来的，不存在虚拟的可能。故史学家有思想史是唯一的信史一说。

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珠玑巷的传说，与其说是基于大量谱牒的发现，予以了进一步的证明，还不如说是产生于一个非常时期作为一个民系共有的认同观念。

这点，我们在“广信期”中提到——“珠玑巷传说”，正是产生于中国积弱、屈辱，开始走下坡路的南宋时期——除了宋代进入“后儒社会”，实用理性占了上风，强调汉民族文化传统乃至汉族血统之外，更重要的是，汉民族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际，相对激发起了作为一个民族的文化自尊乃至血统之至贵——“珠玑巷传说”的内涵正是在这，以强调汉民族于岭南开基，作为广府民系的汉族血统。

而在珠玑巷传说之前，这一意识是不曾如此强烈的，哪怕在广信期！

因此，“珠玑巷传说”，不在于故事本身如何，而在于这个故事本身所传递出的文化信息，所具有的理念。如前所说，珠玑巷毕竟不比广信，未曾作过府治之所，那么，后人又为何如此对它念念不忘呢？

我们还是先对这一传说作一番文化与历史的阐释——这毕竟还是一个相当美丽的传说呢。

当是南宋偏安于江南一隅之际。首都临安照旧“隔江犹唱后庭花”，小朝廷依旧是三宫六院，歌舞不绝，夜夜狂欢，不知亡国之日将至。

后宫中，有一位胡妃（胡者，狐也？狐媚之美，当非虚言），或称为苏妃（似乎这更得体，因为胡姓，亦含一部分胡人归服汉族，自取姓为胡，当然，胡姓最早仍源自中原，为古汉族一支），“貌美性淫”，很得皇上欢心。一夜，得皇上宠幸，却失手，所奏的乐曲竟走了调，这还得了，龙颜大怒，遂将她打入冷宫，不复为皇上所召。

南宋小朝廷自身难保，后宫自然管理不严，这位胡妃不甘寂寞，便悄悄逃走了，神不知，鬼不觉，竟没人知晓。她自觉不可再度入宫了，于是，“扮作游妇”，在京城里漂泊，“所遇辄投”。正好，有一位富商，自岭南而来，叫黄贮万，据传是南雄珠玑巷人。他亲自“运粮上京”，在临安一个港湾里停泊，“备牲酬福”——看来，南方人自古信迷信不假，这就招来了一批美女，以歌舞取乐。这批美女当中，便有胡妃。她本身就美若天仙，加上有伺奉皇上的经验，一时间，技压群芳，令黄贮万为之动心。旋即，黄贮万“以意挑之”，胡妃心领神会，立即下船，与黄娓娓长谈，一见钟情，一拍即合……

胡妃从那“见不到人”的地方逃出来，寻得一位可以托付终身的富商，被雪藏的激情一下子便爆发出来了。于是，她不顾一切，随从这位富商不远千里，到了南雄珠玑巷……

这本来也就没事了。偏偏皇上喜怒无常，一天，竟又想到了这位胡妃，谁知一查，人已不知去向。顿时雷霆震怒，下令追查，由兵部尚书张钦发出通缉令，于全国追捕这位胆大妄为的妃子。

偌大一个中国，找一位女子，有如大海捞针。日子久了，只好“复奏圣上”，说找不到了，请准许中止此案，不予追究。

这又该没事了。而胡妃，也早已改名换姓，成了黄贮万的老婆，由皇妃摇身一变为商人妇，谁能猜得到呢？却没料到黄的家人因与主人有隙，竟到了京城向张钦邀功领赏，张钦不敢如实禀告皇上，竟诈称南雄刁民作乱，并冒挟圣旨准行，准备来个焦土政策，从而来个斩尽杀绝，毁灭任何证据，以免皇上怪罪。

幸而南雄有人在兵部任职——此人是后来率珠玑巷 33 姓 97 户南徙的带头人罗贵的姑夫乔辉，派人昼夜前往老家密报，于是，珠玑巷“密相通透，团集商议”，决定南迁。

纵然南迁中并不顺利，竹排过连州水口被狂风打散，死了不少人，可还是抵达了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大家夸罗贵：“今日之行，非贵公之力，无以逃生。吾等何修至此哉？今日之德，如戴天日，后见公子孙，如瞻日月。”

由此，散布在珠三角 33 姓 97 家，均以南雄珠玑巷为祖先“开墓”的圣地。后人，也每每以一概全，扩而论之，认为整个广府民系发源于珠玑巷。

其实，自古以来，无论是番禺还是广州，抑或整个珠江三角洲及两广地面，早已有古越人休养生息，连同随秦大军五十万南下的士兵——这自然是中原汉人，他们，大都都是广府民系的前身，而在广信期，即广府民系“汉化定型”阶段，应当说，这个民系业已形成有上千年历史了，毋须推移到宋末元初如此之近。加上粤方言，也早于广信期前后形成了，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是与一个民系基本形成相关连的。因此，仅以珠玑巷传说为依据，以 33 姓 97 户人家的南迁作为全部广府民系之“源”，显然是有失偏颇——这将置在珠玑巷传说，即南宋之前生存于广府地区的千万百姓于何处？

平心而论，这一传说，无非是强化广府民系作为汉人的血缘

意义。如前所述，当异族——元军大举南下之际，汉民族的尊严遭到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元横扫南方，竟然把南方的汉族定为等级最低贱的所谓“南人”，这就更激起了广府人的文化自尊了，所以，无论是元兵南下，还是清兵南下，在南方却遭到了最激烈的反抗，为甚者，更在广东，这也可以解释珠玑巷传说为何会成为—一个民系的无法挥之而去的“情结”了。

正是这样，在广府民系及广府文化发展之中，产生如此特异的一个“珠玑巷时期”——如果说，广信期是“汉化定型期”的话，那珠玑巷时期则在思想上、传统上又一个相呼应的汉化的强化时期，使得广府民系从灵魂上都深深打上汉化色彩。广信期，是由于南下的汉人带来了中源发达的文明，同化了土著；那么，到了珠玑巷时期，则是广府人以汉人自居，奋起反抗推倒了汉王朝的异族大军。

人们不难看到，正是珠玑巷事件发生之后，便是广府人以最后的抵抗，与元军经过七个回合的艰苦拉锯战，在广东地面上呈现了抗元的最激烈的鏖战局面——南宋王朝到了后来，“江上列城，或降或遁，无一人坚守”，宋朝“如江河之决，日趋口下而不可挽”，一直败退到了南粤，才有了与元军决战的主战场。

第一回合，是徐直谅奉被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扶立的宋益王赵昰之檄，与元军大战于石门，未果，只得弃广州而逃。而后，流亡的宋政权派人率兵来广东，东莞人熊飞大治舟师起兵抗元，新会曾逢龙亦拉起一支分兵，三军合围，元军被迫弃广州出走，广州又回到宋军手中，这是第二回合。几个月后，元军又在南雄打败熊飞、曾逢龙，再度占领广州。但不久，又让宋代岭南惟一的状元张镇孙打败，广州重新为宋军所拥有。这是第三、四个回合了。半年后，元军结束福建战事，大军直逼广州城下，张镇孙无力回天，只得投降，元军第三次占领广州，因对广府人的顽强抗争恼火之极，元军将领竟下令毁掉广州城——这是第五个

回合了。

到第二年春天，宋军又趁元军将领赴京之际，举兵收回了广州。而后，益王赵昞亡，广王赵昺立。年底，元军水陆并进，直杀广州，在崖山总决战，宋朝才最后亡了——这是第六、七个回合了。

在内地对元军的反抗日益消解之际，为何在边缘地区——广东的反抗意如此之激烈，哪怕力量不足，以卵击石，也一般视死如归，这又是为什么呢？

无独有偶，在 300 多年之后，也同样在广东，又重新出现了当年抗元的激战场面——只是已不是元军，而是另一支异族军队清兵了。清军南下，在江南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同样，汉王朝也在广东建立了“南明”政权。广州沦陷后，南明兵部主事陈邦彦联合农军余龙，起兵于顺德；监军御史张家玉，起兵于东莞；大学士陈子壮联合增城农军，起兵于南海，一时间，全省各地，纷纷响应“小者百人之奋，大者万人之斗”，一度围住广州，牵制住清军……上述三人，自顺治四年（即 1647 年）起兵，坚持抗战近一年之久，均壮烈牺牲或英勇就义，被誉为“广东三忠”。

在他们失败后五个月，由于满汉矛盾，广东又归附南明政权，再度同清军血战，直至顺治七年底，经历最惨烈的决战，南明官兵阵亡 6000 余人，广州方失陷，旋即为屠城，居民士兵数万被杀，是为广州史上最血腥的记录。

这两次反抗异族统治的激烈程度，为何广东远远超出于内地或中原，这不能不归于广府人被强化了了的汉族意识——而珠玑巷传说，正是这种强化演绎出来的证明。

不少族谱，都强调该姓是来自中原的汉族人，经大庾通道，落户于南雄珠玑巷，时间或长或短，而后，则发生了搜捕胡妃事件，由罗贵率 33 姓 97 户人家出走，来到珠江三角洲——源头，确凿为中原汉人，当无可疑义。

然而，作为民间传说，它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却不仅仅是这么一点：“珠玑巷开基”。

它的外在形式或故事框架，是传统已有的，也许是汉文化或儒家文化的“元故事”：即凡是狐媚之类美丽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只会带来灾祸——诸如“惟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女人皆祸水”的演化，胡妃投井而死是必然的。纵然其中包含对宋王朝声色犬马、腐败没落的讽讥，但故事的结局并不尽然为悲剧——来了个“因祸得福”，珠玑巷人来到了广州，来到了珠江三角洲地区，却获得了更加蓬蓬勃勃的生机，33姓97户人家，全都兴旺发达了起来，一枝生九叶，遍布了华南当今的广府人地区。

这么个故事，几乎列入了广府人所有家族的谱牒之中，并被解释为南迁的根本原因，却更耐人寻味。

对这个故事的认同，不仅仅是前述的对汉民族、汉文化的认同——当然这是很根本的，由于这个，方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广府地区才有那么激烈的抗击异族南下的斗争，应当说，在此同时，也包含有对商人挑战皇权的一种宽容与理解，而这，正是广府文化中具备海洋色彩的重要一面，故事中，不仅同情黄贮万——在“无商不奸”的中国传统文明中，这算是“离经叛道”了，而且也同情胡妃——美并非罪过。事实上，南宋末年，也包括明朝末年，闽粤乃至江浙的工商业已经相当发达了，有不少相当规模的作坊，科学技术仍是世界之冠，而商业与科技的发达，是新的生产方式催化剂，本身就是对封建制度的一种瓦解——这种认识，似乎不必在此多说了。因此，在这个传说中，更多的同情给予商人与美女，而不是遵奉皇命，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因此，这样美丽而又凄惨的故事，当日也只能产生于南方。

这个故事的广泛流传，再换一个角度看，也意味着广府民系与汉文化整合的强度——如前所述，愈加强调了广府人的汉民族

的血统。通过这一变故，愈加强化了广府民系作为汉民族的自尊、所以，元灭宋，清灭明，为何在南方的抵抗与反抗，竟远远猛烈于北方，除开保土的目的之外，更在于激发起了一种民族的情绪。

同情南方的商人与强化南方人的汉民族色彩，在这里并没有什么矛盾。正是元、清两次武力南下，大规模地摧毁了南方的商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生产方式，滞后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为了维系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为了守护先进的生产方式，需要更加强烈的自立不息的精神，绝不可以任入侵的野蛮落后的异族面前俯首帖耳、惟命是从——本来，无论是元朝，还是清朝，均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带有很多后进的印记。其后果如今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正是所谓“康乾盛世”前后，曾经落后于中国的西方，发生了“文艺复兴”，并进入启蒙时期、工业革命，一下子超过了中国，进而向中国挑衅……

如果没有这两次历史的倒退，中国当在近代与世界同步，不至于形成后来的落后挨打被动局面。

也许，这正是广府人的“珠玑巷情结”的真正文化动因。

当然，对“珠玑巷传说”还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分析与解说，但上述两条，当是最根本的，也是能触动广府人心灵深处的。所以，广府人以及海外广东籍华人，都把珠玑巷当作他们祖宗的“开基”所在或“发祥地”，不断地回到南雄珠玑巷寻根问祖。

明代诗人梁维栋曾有诗云：

珠玑遗迹动凄其，
厌说前朝有徙移。
旧路人非芳草在，
故园春尽落花知。

于是，传说也就成了一种强烈感情的外化，愈传愈真，愈传

愈细。

真，就真在一种理念，一种情感，一种可以依托的民族自尊。从而便有了无数的细节补充。真，就真在其一脉相承的思想，对历史前进的思考，对新生活的追求。从而有了更深层的文化价值。

所以，无论这个传说有多大的真实性，乃至把这传说当作广府人的“创世纪”历程，我们都仍愿意从中发掘到文化学、历史学的珍藏来。

至于“细”，则值得细细考证了。

罗贵所率的 33 姓 97 户人家，已经有人作了各方面的考证，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亦有之，这里就不予以重复了。

我们在此，尝试考据一下其他姓氏的族谱。

一是潘姓，一是孔姓——这均是 33 姓当中没有的，然而，其族谱中，均一致称其为珠玑巷过来的，同其他在珠江三角洲落户的姓氏一样。

当然，不排除 33 姓之外，仍有人从南雄南迁。但问题是，小小一个珠玑巷，如何一下子容纳了那么多？

潘姓的族谱称，其最早的始祖魁居公，是宋代金兵入侵时，二帝被掳，南逃到了广东，抵达南雄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而后延续有五世，族谱到此则语焉不详，接不上了。而后，其实际始祖东莱公，开基于佛山，是元末由南海魁冈堡迁来的。而从珠玑巷到魁冈堡这一段，无论是代数、年月，也都无法算清楚——似乎只有一个解释，前边一段，是后人为接上珠玑巷一说而假托的。

潘姓不算大姓，那么，让我们来对作为大姓的孔姓作一番研究。

珠江三角洲是广府人的主要居住地，有必要对其中有代表的族姓加以深入了解、调查分析，进而加以研究、论证。孔姓应属

此列。

按通常的说法，岭南三大民系，广府人是由赣南经南雄珠玑巷等地、继而南下珠江三角洲而形成其民系的；客家人，则是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历石城、石壁、汀州，最后以梅州为大本营，从而遍及南中国 11 个省，不以区域为界定而形成的一个民系；至于福佬人，或潮汕人，则是由福建南部（闽南）移居而来的。各自有鲜明的特征，不易混淆，尤其是方言，更是千差万别。

所以，确定珠江三角洲族姓考察，便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在广州南面，番禺的“阙里南宗”就十分引人注目。众所周知，江浙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出名的“阙里南宗”了，何以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都是孔家的正宗血脉么？

这自然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与南雄珠玑巷有密切关系。

原来，首次移居广东的一支孔家世系，是居于河南省开封府河阴县的，以 36 世孔如珪为始祖，称河南世系。38 世，即孔如珪孙孔癸戈，于唐元和 12 年（公元 817 年）拜御史大夫，授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孔家遗风不改，故“惠政及民”，颇有政声。所以，韩愈在广东写的名篇《南海神庙碑文》，其中的主角便是孔癸戈。三年后，迁吏部尚书侍郎。后以礼部尚书致仕，死后，又赐兵部尚书。故今天“阙里南宗”有“孔尚书祠”，便是他的纪念祠。

孔癸戈的长孙孔纬，唐大中十三年（即公元 859 年）状元，官至刑部尚书。因朱温之乱，遗命其子孔昌弼，避居先祖曾“惠政及民”的岭南。孔昌弼为进士，从父遗命于光化三年（公元 900 年）随宰相徐彦入粤，定居于“韶州正昌平林村”；也就是今天的南雄油山乡平林村，创立了“孔林书院”，成为孔氏入粤

的始祖。这是在珠玑巷开基之前了。

孔昌弼的孙子孔承休，生于五代的后周（公元951—960年）之初。先期在广州教了十余年的书，于宋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自“南雄珠玑巷石井头”携子迁居广州彩虹桥，成为孔氏在珠江三角洲的始祖。也就是说，孔氏一脉，作为广府人，似乎也是经南雄珠玑巷而南下珠江三角洲的。

孔家的族谱，详尽翔实，应是不存在伪饰成份的。所以，这“阙里南宗”一脉，则不同于宋代随皇室迁至江浙的另一“阙里南宗”。这也说明，广府民系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而随着地域的变迁，又有着文化异质，而区别于中原文化。

孔承休定居广州后，子孙繁衍，支脉扩展到了整个珠江三角洲，形成了今日“珠三角”上的“孔氏十一房”——即小龙房、洗墩房、逻冈房、龙伏房、孔边房、南村房、叠滘房、罗格房、石碣房、孔村房及上涌房，这均为承休的后裔。此外，还有散居于高要、德庆、封开、云浮、怀集、高明、三水、惠州等地的。

“阙里南宗”为小龙房设的祖祠，建于明代中叶，由孔竹侣（五十七世）的次子孔玉涧买地建祠，由竹侣的父亲惟端（即希正）等建匾。迄今已有五个多世纪了。

“阙里南宗”为“宋太守孔粹公之祠也，并祀南迁昌弼祖”。这里说的孔粹公，是前所提到的孔承休的五世长孙，是他率次子元凯从广州彩虹桥迁出，辗转于南海、番禺，最后定居于今日的小龙房所在地——番禺“河湾司之小龙”。

孔氏家谱是全世界最完整的家谱之一，编纂有二千五百年之久，具有很大的可信性。如下记录当非虚言：

吾族溯源洙泗，自北而南，由南雄迁居广州者承休祖也。于宋太平兴国四年始纂南迁宗谱。其由南海鼎安石番溪迁居番禺小龙者元熏祖也，于南宋绍兴二十九年续纂番禺南宗谱，盖犹合谱也。②④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孔氏家族早在唐代，便在广州声誉卓著，自始，一直有孔氏后人在岭南休养生息，并创立了“孔林书院”，也就是说，远在珠玑巷开基前很久，孔家便已到达了岭南。后来又掉转头来，走了一遭珠玑巷，才算正式携家人来到珠江三角洲繁衍将息。而这时间，宋太平兴国二年（即公元977年）即北宋初期，与后人所传的珠玑巷大规模开基及南迁的南宋末年，相距有两三百年之久。因此，孔氏家族在珠玑巷开基并南迁这一段史实，同不少他姓假托珠玑巷开基的事实，可以说是一致的。就拿学者们严谨考证的，作为珠玑巷罗贵97人南迁史的结论，也仅有五分之一的可考查出来，而其他则很难说，并发现不少迁徙年月上的矛盾、行文形式、手文之误。不排除自南雄珠玑巷在南宋末年发生过相当规模的集体迁徙移民事件，有组织、有领导，具有历史真实性。但如说广府民系皆出于此，则大谬特谬也。更何况33姓中并无孔家。

与其说胡妃事件导致南迁，还不如说在其后没几年，元兵南下，扫荡江南，临安沦陷，逼使已逃到珠玑巷的中原士族再度南下，更为可靠。也就是说，当年中原士族越过南岭后，先行在珠玑巷棲息了一段时间，却没料元兵又紧追而至，不得不又再度逃亡……这倒有可能形成大规模的难民潮。

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几百年间，也就是大庾通道开凿之后，珠玑巷周遭，曾作为南迁汉民的中转站、栖居地。而这个时期自中原来的汉民，也构成了广府民系中的一部分。当然，就是宋末元初之后，仍有大量的中原汉民经此地而南下。

但是，并不等于说，整个广府民系是因此而形成的，甚至广府文化到此才开始形成，如果这么认为的话，珠玑巷以前广府地区辉煌的文化也便被一笔抹煞了，这恐怕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不会同意的。

那么，为什么如今珠江三角洲上广府人的大多数谱牒，均称

自己的远祖是来自南雄珠玑巷呢？这又作何解释？

既然谱牒有不可靠之处，我们惟有求助于一部思想史的演变了，求助于活的、流动的历史——只有流变中的思想才是可靠的，真切地反应于那段历史的诉求。

只要认真分析，我们便可以发现，珠玑巷作为南下中原人在岭南的发祥地一说，与宋明以来的实用理性思潮是分不开的，或者说，是这一实用理性的具像化。其间的理学，由自发的伦理阶段发展为实用理性，封建伦常，即“三纲五常”，上升为先验的“天理”，从而“存天理，灭人欲”——历来悖逆、反叛的南方，常常闹自主、要独立的“南越”，实在是“人欲”太多而不服“天理”，这么下去可怎么得了？

因此，要让广府人臣服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不进行一番“破心中贼”的改造，使之牢牢依附于正统的中原文化，显然是不行的。于是，有意识地、大规模地对漂离主流文化的种种离心力予以束缚或消除，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抓住某个典型的中原南徙事件，加以扩充、演化，说成整个广府人皆是如此，于是，从祖宗意识上便得以匡正过来。时至今日，有的学者不正认为，珠玑巷被选中，恰巧正是弘扬一种“流徙不弱、历久弥深的重根意识”么？人们不难发现——本书在尔后思想史、文学史等章节中，正是在珠玑巷之后，广府人一度被深深束缚在那种后儒社会的忠义观念之中，有时，甚至比中原更为之强化。

在宋末元初至明清这漫长的五六百年间，让一个珠玑巷的伦理神话深入人心，时间当然是足够的，更何况这个神话首先还依托了若干实有其事的历史记载呢。

当然，我并不反对就珠玑巷文化进行探讨，而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凝聚，也不否认其也有积极的一面，所依据的史实，如张昌七世同堂等，也不可以一概否定。但是，它毕竟不可以与宁化石壁之于客家人相比。它至多也就是一个象征意义——否则，珠

玑巷之前，为何大多数假托的种姓均无一说出源自何处。

同样，珠玑巷是广府文化上的一个印记，但绝不可以代替整个广府文化，它只代表中原文化在宋明间对广府文化的一次有力的渗入，把祖先崇拜等伦理意识予以了强化，对游离的广府文化作了一次主观的整合。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其“从驾入岭”，“不是事实”，但“不忘枌榆所自”，却未可轻慢。^②

但问题在于，这种寻根意识，是否已侵入广府文化并成为主下，却值得存疑。相比之下，客家人“根在中原”的意识，要比广府人强烈得多。石壁也比珠玑巷要真切得多，可信得多。倒是广府人，每每不自觉把“粤种”与“汉种”相分开，甚至鄙视北方人为“蠢獠”，尽管史书上也有“南蛮附姓”一说，他们并没什么在意，在珠玑巷之后几百年间，迫于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压力，不少非珠玑巷开基的原广府人，伪托谱牒，冒充珠玑移民，以融入一时的潮流之中……

于是，原汁的广府文化，又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蛰伏期，几乎风貌顿改，但是，它的特质、它的生猛，它的开放与超脱，却始终不曾被消除掉，随着又一次文化的碰撞与冲击，势必又再度激活起来。其实，就是在珠玑巷传说中也包容这一点。

这些并不会伤害广府人对珠玑巷的情感，也许，这里对广府文化的定位与一般学者所作的不一样，我只以为，把广府文化自此说成是中原文化的附庸或一种衍生，这与其说是抬举了它毋宁说是轻蔑了它。广府文化更多特质是属于海洋文化的，而决不是内陆文化的，如果把整个中华文化说成只是内陆文化，同黑格尔所下的断语一样，同样是片面的、武断的，也阉割了中华文化。

我们只是把实用理性思潮背景下珠玑巷神话予以了分析，同时，也确认了自珠玑巷之后中原文化对广府地域强化的影响——当然这一影响也是双向的，如一柄双刃剑，有消极也有积极的。

事实上，自宋明至清代，中国可以说是由盛极而走向衰落，

在西方文艺复兴后的迅猛发展背景下，康乾盛世，也只能是一个回光返照而已，使中国更加落后于世界。所以，这一段广府文化由于受中央集权的箝制，尽管也显示过多次异端色彩，但终于是蛰伏下去了。

但蛰伏不是屈服，于是有一天，在积蓄到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爆发，冲天一啸了！

终于，珠江文化或文化走到了它的全盛期——中国近现代与世界文化大碰撞之际，由它充当了完全的主角！

第六节 穗港期——世界文化碰撞中的异军突起

平心而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日益增大的。尽管中国日益走向闭关自守，数度实行海禁，但也不能完全阻遏外来先进的文化传入。早在明代中叶，徐光启便在著述中多次提及，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多所未闻”，更力斥反对派，称如果外来文化“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②，其他学者也称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几何、物理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者”，“补开辟所未有”，“冀我中华岂云小补？”众所周知，利玛窦等人，正是在广府，即珠江三角洲沿海登陆，经广州、肇庆而北上的。为此，徐光启怀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响亮地提出了“超胜”西学的口号，力主“西法不妨于兼收，诸家务取而参合”。

明代中后期，东南沿海一带，已出现了近代工商业的萌芽，广府地区经济发展迅速，且出现了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生产区域。佛山一镇有“炒铁之炉数十，铸铁之炉百余”，规模可观。万历年间，“广纱甲天下”，生丝运往国外的每年逾3000万担，价值上100万两。及至清代，广州更出现了专业性的墟市……“工商皆本”的呼唤，也早早从这里发出，反映了新兴市民的强

烈要求，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终于产生了这一近现代的思想。

南宋及元代，泉州作为外贸商港，曾一度超过广州。到了明清，由于广州几度成为唯一对外开放的口岸，泉州衰落下去，它便又重新复兴了，并允许与较多国家进行贸易。清初，尽管“朝野旧儒，群起非之”，但西方的火器历法，仍为中国逐步接受，随之是“制械练兵之法”，再进一步，便是“西政”了，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思想。^⑦

当然，这些“接受”，已不是过去佛教文化传入的和平式的了，而是充满了血腥，形成巨大的压迫力。鸦片战争，中国震惊于西方的“制械练兵之术”，这才有了洋务运动。甲午惨败，才识“西政”，要求变法，变法失败，才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争，引发了辛亥革命。

人们不难看到，由于地域环境，珠江三角洲——即广府文化腹地，成为了西方文化最早登陆的地方，同亚洲的佛教在此最早上岸一样，西方的宗教，也最早在澳门登临。随着宗教文化的进入，加上这里的商品经济已具备近现代萌芽因素，所以，与西方的商业文化、科技文化也产生了交融，应当说，刚开始还是和平的，广府人也以平和的心态接受着，加上广府文化独特的传统，对异域的舶来品并不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从而也滋养、充实，更新了自身。但是，由于西方列强垂涎于这片富庶的宝地，在“自由贸易”的借口下，竟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军事入侵与疯狂已极的经济掠夺。这也激发了广府人的救亡图存的斗志，在抗御外来侵略之际，力求变法维新，使自身迅速强大起来，这一来，广府文化更以自身业已存在的优势，迅速接受外来的先进文化，取得了极为重要的发展。于是，在中国第四次文化大激活——与世界文化的大碰撞，大交融中，它由中华民族文化的边缘或非主导地位，一跃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中的主导文化，对中国的政

治、经济与文化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可以说，当广府文化冲天而起，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中的主角，这不仅说明其之成熟并对中原内陆文化产生了重大的辐射作用，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由中原传统的农业文化在向现代文明的演变，是中国文化发展一个飞跃。广府文化的这次全方位的上升，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新整合的主要动力，不仅仅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及本世纪初得以充分展示，而且在本世纪末中国又一次启动的改革开放中，再度得到了历史的公认。它代表了接受了新文化的地域文化向整体文化的一次全面的冲击，由非主流文化逐步争得主流文化的势能与地位，在中国重新呈现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广府文化第一次取得了重要的、引人瞩目的高位势能的一席，并将在久远的将来，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谁也不可无视它的意见。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简略地概括一下近现代广府文化崛起的具有代表性意义的种种变革——人物与事件、及运动。

这里，有丘濬的经济理论、陈白沙的哲学思想，均反映了广府地区工商业向近现代的转化的诉求；还有前边提到的利玛窦在广东的传教与科学活动；广州十三行的出现及其兴衰；鸦片战争的爆发，林则徐力主“禁烟不禁商”，香港的割让及其后洪仁玕、康梁与孙中山在那里的政治活动；洪秀全于广州街头得到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及至创立“拜上帝会”，并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大量的广府人出国及往返，于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出现的由华侨投资的最早的工业、商业；康有为在广州创建“万木草堂”嗣后以康梁为首的、轰动世界的“戊戌变法”……一直到孙中山在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发动的多次起义及辛亥革命的最后成功，当然，还应包括以广州为基地的北伐等等。

以上所随笔拈来的人物与事件，几乎每一件，不对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文化冲击产生根本性的巨大的作用，甚

至可以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基本上就是以上述人物与事件所构成的。广府文化在中国冲天一啸，成为了先锋与主帅，承担了中华文化再造与重构的伟大历史任务。

虽然在 20 世纪中叶，它又一次被扭曲或排斥，但到了 20 世纪后期，它却再度让中外侧目。这里，也不妨信手拈来若干人物与事件——如“文革”中出现的关于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文章，是在极权统治下再度擎起的现代思想旗帜；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珠海特区的崛起；珠三角“四小虎”的“出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推出，广州等成为沿海开放城市，高速发展的沿海经济；小平同志来广东刮起的“南巡旋风”……一直到香港、澳门的回归。

当然还可以列数更多的人物与事件，而上述一切，也无不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上，留下浓笔重彩的一章，并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在近现代能够一朝崛起，产生如此之大的效应？这是众多文化学者所苦心叩问的。

无疑，一个封闭的体系，是不易于接受外来影响的，要其接受，是必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是要流血的；同样，一个太古老的文化，由于过多的沉积，是必产生固化，走向封闭——这便是中原文化在明清，甚至在宋之后所取的态势，这在近现代中国，人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包括鲁迅在内一批文化大师，都举起了“改造国民性”的大纛，无数的志士仁人，都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乃至生命。

而广府文化，无论是佛学东来，还是西学东渐，都取的是一种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态势，能够汲取人家的长处，来补充、滋养自身，并不封闭自己——虽说自宋末以来，由于中央政权的箝制，它也一度呈示过一定的狭隘与局限，但很快便又冲破了。

也许，它没有中原文化的古老，相对要年轻一些；更没有被

定于一尊，而自形成以来，处于一种边缘状态，因此，它比较容易更新自己、发展自己，善于变通，不易偏执，如改革开放以来“排污不排外”论、“变压器”论、“红绿灯”论，皆是如此。

同时，由于处于沿海地带，与外界接触多，商业文明兴起得较早，这也比较容易接受现当代文化，包括由商品流通、平等互利而同步发展起来的民主意识、科学观念、平等思想、自由精神以及独立性……

总而言之，任何同化、整合，都必须有内部相近素质作为呼应，方得以进行，否则，便只有排斥与对抗了。可以说，广府文化对中原文化存在这一内应，但对外来文化，更具备这一内应。所以，还是在上个世纪末，西方学者便敏锐地发现“广东人具有干大商业与大交通业”诸方面的才干——这也正是文化素质所决定的。

因此，说广府文化具有开放性、重商性、多元性，乃至世俗的享乐性、感受型……等等，多少是与它形成的历史相关联的。广府人求新、求奇、求感官的刺激，这更与现代意识接壤，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改造，以这里来启动，则是历史之必然。

这里的地理与历史的因素，本身也是相互融合的。地理上的远离中心，自然环境的得天独厚，亚热带生命的蓬蓬勃勃，都给广府人带来一种生猛的气质，充满精力，乐于运动，富于自信。而历史上与中原的几度离合，两次外来文化自此的入境，移民带来的流动的、开拓的、敢于抗争的精神，使得他们更似十七、八世纪的美国人，具有某种爆发力与无穷的生命力。

可以说，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自番禺期的自我衍生，两次外来文化的汲取与滋养，使之永远保持一种青春勃发的姿态，较之中原更具革命性与生猛的活力。于是，它不重传统、不畏权威、不受束缚，有着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样，它使得广府人很少保守性、正统性、敢于创新，敢于革命——积蓄一久，也就惊天动地

爆发出来了。

也只有近现代，广州才在一部中国史上，须用如椽大笔来写下——因此，广府文化才在这时名至实归，可被称之为“广州—香港时期”或“穗港时期”了，不是为中原所羁绊的广信时期及珠玑巷时期。

人们可以看到交互的文化发展曲线。即番禺期、前珠玑巷期或广州期直到这个穗港时期，都是相对独立自主并取开放姿态的，均是广府文化奠基、迅速发展以至一啸冲天的交响乐章；而广信时期及珠玑巷时期，则是相对成型、凝聚或沉滞、内倾的，较为中原文化或中央集权的控制。这也就使广府文化显示出较为复杂的历史轨迹。但二者均不可以轻易割裂，彼此是有着有机联系的，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这才是广府文化的本来面目。

历史一旦加速发展，提出的文化课题便成几何级数增加，在今天，对广府文化而言，它承载须解决的课题也是空前地增多，不一一加以解决，历史就不可以被往前再推进。而今，广府率先实践市场经济、转换企业机制，起到了改革开放试验的表率作用，但前边仍有很多难题、很大的雷区，它是否堪担重任，世界更在拭目以待。

已经没有退路了。

四小虎的出现，尤其是产权明晰、贴身经营、小政府、大社会等尝试集中一身的顺德经验，无疑为这次悲壮的踏雷区的战役打响了前哨战。人们不难看到，随着香港的回归，香港的制度文化、市场机制诸方面的影响，正日趋增强，包括顺德经验中，也不讳言对香港的借鉴，这意味着，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国际自由港的身份以及近 30 年的飞跃发展，它有可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中，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再造几个香港”一说便是包含这一企望。同样，香港对这一时期广府文化的熔铸、上升，更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广州—香港上百年之间的互动与血脉联系——首先，应看到，今日香港人，绝大多数便是广府人，上百年间由广府地区移居而去的，是他们筚路蓝缕，创造了香港的今日。从洪仁玕、康梁、孙中山，无一不在香港滞留过，孙中山更直言不讳，说他的革命思想是来自香港的。通过香港，或以香港为基地，发动了民主革命。而中国现代商业，首先在香港立足，才向广州、上海发展。四大公司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于是，南方以民商抗衡官商、洋务，不仅有行动，而且有理论形成，百年后广府民营企业异军突起，那正是源头。至今仍保持其“世界之最”的省港大罢工，以及三十年代末及四十年代初穗港难民的双向流动，都说明其间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共和国之初，帝国主义的封锁，只余下香港作唯一的外贸渠道，进而才有广交会的出现。六十年代初，香港开始起飞，又正得益于当时大批“督卒”过去的科技人员与劳工……而今天，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形成的“前店后厂”的经济格局，回归后香港特区政府制订的以珠江三角洲为其经济发展后盾的大战略构想，等等，都在表明，广州—香港的“双城记”，正有声有色地演下去，远还没到高潮。

尤其是香港，更作为联击海外数千万华人的中性的都市，它的凝聚作用与辐射范围，使其能量怎么高估也不为过。香港之所以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主要在于海外华人经济的强劲发展。而海外华人中，广府人也占去了绝大部分。如果说，我们作一个大广府文化的描绘的话，广州—香港便是一个“双中心”了——其实也可为同一中心，相距不过百多公里，一小时的路程。甚至如前广州市长黎子流所说的，很快会有有一天，广州的地铁便会同深圳、香港的联结在了一起。

正如笔者在《千年国门》中预言的：

双城，在地铁与轻轨的联击中，在直通车与高速公路的连接下，已经在，或者很快要发生历史的拥抱，从

而结为一体。

亢奋的灵魂要迸发出新的呐喊。

这里，再引用一段作此节的结语：

广府是个古老的灵魂，它已经躁动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由于濒临大海，它不曾似内陆城市与人那么厚重，海浪的击拍使它总要踮起脚尖去眺望海那边的世界，于是便有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诞生，更有了一度作为全中国唯一开放口岸的侥幸历史。义的束缚，对这座古城也许是最小的，而利的诱惑，则几乎没有停止过。于是，以“重义轻利”而著称的民族，到了这里却有点不那么不循规蹈矩了。更由于远离皇权中心，它更多了几分自由度……

该补充一句——衍生出了一个被视为历史“怪胎”的香港，成为不仅广府，而且整个中国的一个立于国门上的巨大经济参照物——对于古老民族的一大不幸，终于演化为一大幸事。

虽然至今仍有人认为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人是“经济动物”，这大致是内地的评价，但是，广州人大都不这么认为，而且还予以认同，因为，香港文化与广州文化多少要相近得多，同是广府文化的一脉。而且，香港电影业一直居于世界的前列，是三大电影中心之一，怎能是“无文化”呢——它只是另一类文化，商业气味多一点罢了。也许，正如当日英国贵族不认同美国文化一样。

至于今天在广府文化区内，出现这“一府双城”以及“一国两制”，应当说是一件大好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毕竟，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历史遭际，使之能长久地共生，又能以各自的差异知照对方，互相提携，互相补充，闪耀出无穷无尽的光彩来。

而古老的炎黄之魂，也将在这南方炽热的辐射下，更快地剥离旧体，焕现出更旺盛的生命力来。

※ ※ ※

纵观珠江文化及其代表广府文化，从百越始，至今日止，其海洋的熏风，总是在这里与吹过南岭的山风交互，各领风骚，但随着历史推移，其作为航运、商贸乃至海外移民为特征的一面，愈来愈明显与凸出，也就是说，作为海洋文化的色彩愈加鲜明。这里，我们不同意把渔业文化与海洋文化等同起来，说中国有渔业文化便有了海洋文化，同样，也不赞成非要有殖民扩张才完全构成海洋文化，把海洋文化视为侵略性色彩，从而否定中国有海洋文化。广府人几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便有向南洋移民的特性，但他们一直是和平迁徙的，不是用血与火开路的。广府移民到澳洲的历史，比欧洲移民要早得多，然而，他们并没谋求什么“占领”，而是与土著交融在一起，共同开拓蛮荒之野，为文明作出贡献。关于这一点，我们后边还要讲到，而且，应当有专门的著述。

把珠江文化定位为海洋文化，并不是标新立异，更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反复考证、论证与研究、分析而得出的结论，一个符合科学的结论。

将中华文化蓝色的一面揭示出来，有如海阔天空，未来的风景将更加令人神往！

注释：

①参见《中国文化史观》广东高教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春秋·宣公十五年》。

③《汉书·食货志》。

④《史记·赵世家》。

⑤同上。

⑥见明黄佐编撰《广东通志》卷二百十六；同治年间重修《广州府志》卷八十八中《五仙观》条；屈大均《广东新语》。

⑦黄节在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广东乡土史》，1905年（光绪31年）版。

⑧莫俊卿《试论古越人与壮侗语诸民族的渊源关系》，《百越史研究》第132-171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⑨《史记·秦始皇本纪》。

⑩《史记·淮南王列传》。

⑪《史记·南越列传》。

⑫同上。

⑬参见《西汉南越王墓》广州文管会等编，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⑭宗白华《美学与意境》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⑮同上。

⑯参见黄伟宗《当代中国文艺思潮论》中《珠江文化论》，广东旅游出版社1998年版。

⑰郦道元注，郭守敬疏《水经注疏》，卷37，《泅水》。

⑱见《中国文化史观》第45-46页。

⑲许敬宗：《文馆词林》卷664，李德林《隋文帝安边诏》。

⑳刘煦等：《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

㉑《全唐文》卷515，王虔休《进岭南五馆市舶使院图表》。

㉒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㉓《五国故事》卷下，《伪汉彭城》。

㉔见番禺学宫资料。

㉕见《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㉖《辨学章疏》，《徐光启集》卷九。

㉗均引自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

第六章 文化质态的落差

第一节 三大民系文化的比较

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来看，恐怕很难有比南岭造成的阻隔，更大地造成了文化质态的差异，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更为五彩缤纷的格局。中原文化，是以可涵盖齐鲁、三晋、燕赵、陕秦……等区域文化的，甚至近代的江南文化——虽然已有了一定的距离。但是，珠江流域，由于濒临大海，自古以来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连结之处，商品发达，则形成了与内陆文化几乎迥然不同的海洋文化，有人甚至以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加以区分。

将近二百年前，由于洋商加官商的双重压迫，广州有名的商埠——十三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消失。他们跑到哪去了？没多久，华东长江入海口处竟出现了一个上海。随着广东帮商人的开埠，宁波等地商人也接踵而至，于是便有了这么一颗璀璨的东方明珠。同东南亚各著名商港一样，均是广东人最早开创的。香港也是如此。某种意义上，珠江文化对北方、对东南亚都产生不容忽视的辐射，这也是海洋文化或商业文化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给北方带来了南气，给稻菽麦粱上拂来了海风的腥味。

但长期以来，人们对这股“南风”北渐产生了一种误读，总认为是“洋风”，对本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海洋文明视为异己。尤其是近年来，有人若干甚至把中国文化划为三大形态——即京派、海派与港派，这一划分是否科学，暂且存而不论，如果说电影业上有“港派”这应当说是对的，香港电影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也是自成一派，有相当影响并占一席之地的。但

如果就此扩大并加以推论，认为文化上亦有“港派”，则大有可商榷的余地。正如前边所说的，香港文化，是广府文化的一部分，哪怕是一个“异数”，也仍是其中的一个部分，部分是不可取代整体式另成一体，这是很明白的道理。而且，我们从前边的论述中可以看到，香港毕竟位于广府区域内，无论从方言、习俗、行为方式、心理积淀……等等上面，也仍是广府文化的成份，它无以取代源远流长，亦不失博大精深的广府文化。所谓“西方的天，东方的地”，只是指当时英国政府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统治，而今，这统治的“天”业已不存在。至于西方文化的影响，虽然比内地，甚至比广州还要大一些、深一些，但这仍不足以改变它作为广府文化的底色或根基，事实上，不仅广府文化，珠江文化，包括中华整体文化，一样也在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影响。如果以偏概全，以“港派”取消“广派”，只能说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无知或带有偏见罢了。同时，京派、海派在电影上是否已自成一派，尚还难说，文化上倒已有这种约定俗成，所以，如称之为京派、海派、广派，应更加客观一些准确一些，也科学一些。

只是，一定的提法，不是无缘无故地出现的，哪怕它只是一种“误读”。

因为，这种“误读”毕竟是有其历史背景的。

这就是全球业已泛滥了的后殖民文化——自从一位印度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后，迅速为东西方学者所认同。人们不难发现，即使在经过血与火同殖民者搏斗过的中国，过去，精英文化的代表人物的前卫性，表现在他们对西方文化相当透彻的认识与有机联系，而老百姓则仍沉滞于传统文化中，而现在，西风日渐却表现在流行文化上面，时装、节日、消费、广告，种种都向西方看齐，洋名的商标有着奇异的促销效果——这自然是基于老百姓文化心理变化上。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也由此发生了嬗变，进而

言之，不少小说、影视、流行音乐也予以认可和趋同。而这，又是从南方开始的。

所以，把这当作“港派”文化，不是没有一定依据的，但是，毕竟不可以以偏概全，把全球的后殖民文化现象在中国归于“港派”文化。

这需要审慎。

而在南方的精英文化，则呈现出了逆向走势，以致有人感到奇怪，愈是“港化”之处的文学、学术，反而向传统与本土化逆转，显示非西方化或非“港派”的走势，鲜明体现出了广府文化或珠江文化的特征。

无疑，精英文化才是南方文化的真正代表，而广府文化的精萃便在此了。如果说什么“京派”、“海派”的话，那么，也该有个“广派”而不是混淆视听的“港派”。

如同岭南画派，以及粤剧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鲜明的地域特点一样，南方的文学、学术方面新的崛起，亦有目共睹，这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岭南出了若干文化、思想的大家——如黄遵宪、梁启超、孙中山等的证明。

这是毋庸置疑的。

一个得风气之先、经济上已“先行一步”的区域，不可能不带来文化上的奋进，况且广东已积有几百上千年作为中国最早对外通商口岸的历史沉淀。如果我们拨开浮泛在表面上的泡沫以及被搅起的沉渣，亦应对“广派”有一个清醒的、全面的与公正的认识——作为一个在内地生活了几十年的笔者，是由衷地这么说的。

“广派”文化，只是暂时由于其不同的质态难以为中原或内陆文化所认同，同时，也一时不为挟江南——由中原南移而与南方地域文化相结合的“海派”文化所等量齐观。

其实，在广派文化也就是珠江文化中，也有与中原文化的

“结合部”——这就是其中的客家文化。通常，人们把南方文化归结为三大派系，一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广府文化，一是以粤东北延绵至闽赣湘桂等地的客家文化，一是以潮汕为代表的福佬文化——亦称潮汕文化。

客家人是中原人经千年大迁徙、万里回旋至南方的衣冠贵族，这在历史上已有了定论。所以，我曾说过，正是客家南徙，给南方带来了北气，他们重伦理、重教化，称得上是南方的文人——广东作家群与学者群中，客家人数的比例之大，远远超过其人口比例。当年第一届学部委员中，其人数几与上海的相等，占全省近一半，中科院内医学的学部委员几乎全是客家人。同中原人一样，他们重义轻利，重学轻商——当然，随着历史变迁，客家人的巨商亦已出现，人们不难发现，其商业上的奇迹般崛起，却得益于他们所重的信义，所以，才与现代商业精神迅速得到焊接而越过了小商小贩的“无商不奸”阶段。但他们作为“人文秀区”之美誉，至今仍不失去光彩。客家人到岭南的开拓精神，不仅体现在其延伸至东南亚“开埠”上，而且在人文科学、科学技术上亦可称之为佼佼者。他们的自信、自强、自立、自我奋斗意识，使他们尽管是最后一批来到南方的中原汉人，“无山不住客”，惟有在偏僻、荒芜的山野中重新创业，不可能到海边或水网交错的珠江三角洲等相对开发较早的地区，仍能后来居上。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客家先民中，有不少是中原来的“衣冠仕族”、“诗书世家”，传统的封建时代知识阶层的自信、自强——所谓“君子自强不息”，也一并带来了，尤其是靠饱读诗书、自我奋斗而跻身仕途的“寒士”意识，更在他们当中根深蒂固。诸如“学田”、“学谷”的设置便是由此而来的，崇文重教也是这么来的。不管怎样，传统中原儒家文化，在客家人当中应是其主流——当然也不排斥道家、墨家文化。所以，相对而言，把客家文化定位为中原文化的边缘文化，要更准确一些，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它也就不可能作为“广派”文化的主流文化，事实上，客家话也非广东的官话，由此可见一端。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的某些负面，在客家文化中相对表现得集中一些，例如“窝里斗”、“内耗”种种：“熟鬼打熟人”、“愈热愈见鬼”、“鱼食鱼，唔嫌腥”等等。他们对外，显示出比广府人有更大的凝聚力，能抱成团，彼此间热情、豪爽，但是，一转到内部，却“鹅卵石也要擦破皮”，甚至闹“红眼病”。同时，也过份强调汉民族的血统，以正统自居——这其实也是自卑心理的一种扭曲的反映。他们还着眼于自身的人文渊源，历史上的功业，尤好炫耀祖先的功名与业绩，以至被人称之为“客家人有过去”，言下之意是沉缅在过去的荣耀中而不注重现在的发展，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客家地区在经济上的发展相对滞后，这固然有地理上的因素，但传统心理、重义轻利、重文轻商的观念也不能不说起到了拖后腿的作用，再有钱的人，如果没有功名、地位与品格的，同样不为人所看重。所以，长期以来，他们相当顽强地排斥商品意识，在经商上比广府人、潮汕人都略输一筹，虽然现在已有所改变，但历史包袱还是相当沉重的。

我们承认客家文化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而这个根基不是海洋，而是中原，哪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放精神”——客家先民正是这个时期开始南迁的，自由奔放的客家山歌、热情能干的客家女子……这与海洋文明也是挂不上勾的。我们只能说，就“山海经”而言，由“山”至“海”的第一个“落差”，正是客家文化，经过客家文化作为边缘与过渡，才可能与海洋文明相接。当然，海洋文明的影响，对客家文化也还是有的，但与中原文化相比，却又少了一些。

从中原文化，到客家文化，再到广府文化，当中还有一个落差。

那便是潮汕文化。

潮汕人也是吴越（东越）土著与汉族交融的民系，有人把他们归于闽南民系，或叫“福佬”，却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这也是一个独立的民系。他们的人文渊源，同客家人一样，也相当深厚。潮汕人每每以韩愈曾在那里主政为骄傲，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是后儒的先声，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为了纪念韩愈，连那里的河流也被命名为韩江。为了显示他们的文化修养，连饮茶也相当讲究。清人翁辉东《潮州茶经·工夫茶》云，产茶区“如龙井、武夷、祁门、六安、视其风俗，远不及潮人之风雅”，仅饮茶，“潮人习俗风雅，举指高超，无论嘉会盛宴，闲处家居，商店工场，下至街边路侧，豆棚瓜下，每于百忙之中，抑或闲情逸致，无不借此泥炉砂铫，擎杯提壶，长斟短酌，以度此快乐之人生。”由此可见潮汕人的艺术之美、形式之美。

潮汕区域自古以来人文荟萃，故有“到广不到潮，枉走此一遭”的说法。由此，可见传统文化在潮汕区域的深远影响。

潮汕正处于海滨，所以又有“海滨邹鲁”之称。传统文化之“义”由此发端。

但又因为处于海滨，商业文化也早早起步，自唐宋以来，“潮汕帮商人”，均以做大生意出名，潮州城一度以“商贾辐辏，海船云集”而著称，所以，在传统文化的“义”之外，海洋文化的“利”也可以在此寻到源头。据人类学家考证，日本、南韩、至闽南、潮州其人种上有某种近缘可考。所以，有人说潮汕人有日本人味道，有拼命精神，敢于“下克上”。潮汕人特别认老乡，很抱团，一遇到外来欺压，便同仇敌忾，“欲拼正会赢”，有股“拼命三郎”的劲头。无论是军事，还是经商，潮汕人都不好惹。因此，无论在政界、商界、潮汕人的能量决不可低估。他们很有开拓意识与创新精神，更有较强的商业精神，善于经营；办事也很有韧性，精益求精。

他们既有客家人团结凝聚——甚至比客家人更强，崇文重教

的传统，又有广府人崇利重商、注重现世的观念。可以说，他们正是介乎于客家人与广府人之间，吸收了二者不同的特性。客家人重义轻利，广府人重利轻义，潮汕人则义利并举；客家人重学轻商，广府人重商轻学，潮汕人则学商并重。也难怪东南亚有句话：

客人开埠

广人旺埠

潮人占埠

客家人能吃苦，能在荒天棘地开拓出港口，但缺乏商品意识，还须广府人来搞兴旺；但广府人重利轻义，缺乏凝聚力，在一个地方难以长久立足，搞旺了商埠，却只能由潮人来管理——当然，这种说法未免有点太绝对了，但也说明了一般历史演变的事实。

“英雄不问来路”，潮汕人同广府人一样，不那么注重历史渊源，他们同样着眼现实，把握现在，注目于将来。由于潮汕人这些特性，使他们在广东人当中占的比例虽然不大，但他们的能量却远远大于这一比例。

由于他们中原人文色彩较之客家弱，又较之广府人强，所以，他们也只能是二者边缘上的一个民系。其文化亦非“广派”主流。正因为占尽两种文化的“义”与“利”，“学”与“商”，潮汕人的利害，在广东是出了名的，人有说他们是“什么都要”，名分与利益不可或缺。

如果说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各主要显示出的是大陆性与海洋性的特征的话，潮汕文化则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有机结合，是二者之间的一个过渡，同样呈现出作为文化质态的落差。

上面，我们只是在岭南或珠江流域范围内，去探讨作为文化

质态的差异或落差，其间显示出很有意味的区别，这么一比较，我们便清晰地看出一部文化发展史上，纵的与横的，各自的万千气象。

或许，仅在这一范围内作比较就够了，毋须把北方的游牧文化、中原的农业文化，或者分得更细，如巴蜀文化、松辽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等等各自的质态研析一番，去诠释前人归纳的“人性劲悍，习于戎马”“俗重气侠，好结朋党”，或“人性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伤于迟重”，还有“矜于功名，依于经术，阔达多智，态度舒缓”、“厥性安舒，人多豪俊”，以及“巧而少信，多女少男”、“轻扬淫佚，好学工文”……等等，大抵如此，与地理自然环境是分不开的。岭南自有岭南更典型之处，三大文化——广府、潮汕、客家，各放异彩。

本书的落脚点还是在珠江文化的代表广府文化上。

上述的粗略分析，不少也可能是一己之见，但多少可窥见广府文化在质态上与其他文化在中国本土上拉开的距离，重新为“广派”文化定位并摒弃“港派”一说，尤其是更为严谨地剔清当今后殖民文化造成的影响，使已非西方化、本土化的精英文化脱颖而出，得到更大的播扬与发展——这一条，无论对广州，还是对上海、北京，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此外，如何推动区域文化的研究，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只有这一研究得到升华与深化，才可能具有成熟形态的中国文学，产生其爆炸性的世界影响，这也许需要另作一篇大的文章了——这算是本文的题外话了。

南岭的阻隔造成的文化质态之差异，说到底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幸事，为中西文化相互的激活在岭南这一大移民区产生新质提供了历史的楔合点，我们有理由期待它新的辉煌。

第二节 寻求文化研究中的“法理”

从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岭南三大民系的文化中，作为与中原文化“结合部”的客家文化，自有其独特的代表性，也不受区域所限制——它遍布南方十一个省，以闽粤赣三省交界处为腹地。它对“广派”文化艺术特征的影响与贡献，不是那么凸出，可以说，它甚至可以自成一派，且有待它日后的发展方可作出评判。因此，不可以简单列入“广派”的主要成份，它只带有一定的边缘色彩，作为必要的补充与参照。它的地域广泛性及与中原有机的联系，决定了其不同的走向，这当有另一部著作论述。而现在关于客家文化研究的著作，已经出现不少，是为一大幸事。同样，潮汕文化与闽南天然与有机的联系，它作为“广派”的特征也同样不很明显，也只能作为边缘的补充与参照，这是比较明白的了。毋须过多的阐释。

于是，只余下广府文化。

毫无疑问，“广派”的几乎全部特征与特质，包括价值取向、人生观、美术情趣等等，只能从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广府文化中去寻找与确认了。

我们从文化质态的落差入手，引入了这部专著的中心课题——也就是作为文化风格与现代精神的“广派”，主要是发端于已存在于历史的广府文化，并在与客家文化与潮汕文化的比较中，大致勾勒出了广府文化的初步轮廓，以引起读者的关注。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引入，进而研究广府文化的细部了。

历史上的广府文化，构成了今日“广派”的坚实基础，并成为“广派”的鲜明特征的底色。“广派”的现代文化精神，同广府的历史文化精神，有着天然的、血缘的承传并得到滋润与发展。没有这个基础，今日的“广派”不足以表现出独有的个性色

彩与自由精神，在今日中国文化大格局中突出出来，如此引人注目，并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同样，在南方文化或岭南文化、珠江文化中，广府文化也始终是作为其主流与骨干，以及核心，这是毋庸置疑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上说过：“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么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与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仅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①作为广府文化亦如此，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有着它地理的、历史的因素，也就是时空上的构成。同作为移民文化的客家文化——它是自中原成块板状位移而来的，在各处形成其相对稳固的文化边界，不易被浸润——不同，广府文化有非常明显的地理上的占位特征，它的形成同其地域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从而与中原文化拉开了距离。

广府文化对于中华文化是一种边缘文化，但在中华南方文化或珠江文化中，又居于主体地位——这是与广府所在的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背景分不开的。因此，不可把它视为中原文化一部分，哪怕是边缘，也不准确。

无疑，横亘在广东北部的南岭山脉，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地理上的屏障，所以，文前笔者便首先点明，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来看，恐怕很难有比南岭造成的阻隔，更大地造成了文化质态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它对中原文化形成一种隔离效应，一种对内陆的封闭。

为此，广府人迄今与中原人的价值观、人生观诸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便已经有了，是地理造成的阻隔，使一种文化相对独立形成所导致的。直到近现代之交，梁启超在他的名作《世界史上广东之位置》中，仍不无感慨地指出，历代

——
朝廷以羈縻视之，而广东亦若自外于中国，故就国史上观察广东，则鸡肋而已。

所以，他要以世界史上观察广东。

这一观察，首先就从地理环境上便可以看到，作为广府人世代生息之地，恰恰处于南海边上，以及珠江南岸。自古以来，舟楫之便，便使广府人驰骋于辽阔的大海上，视大海为世界的起点。两千多年前乃至更久，这里便有世界最发达的造船业，本世纪末发掘出的南越王墓葬中，就有不少船模；在广州地铁动工之际，更在广州城中发掘出有相当规模的船台。而造船业的发达，标志航海的拓展，也就是说，对整个大洋，广府人是开放的、豁达的，有无限的进取精神与犯难冒险的勇气。正是海洋，赋予了广府人开放的胸怀与无限的生机，他们走出国门，逐渐形成“以商为本”的海洋文明，在中华整体文化中构成独特的一翼，不是封闭住自己，而是敢于、善于面对整个世界——反过来，就国史视广东为“鸡肋”，而就世界史来说，广东却又是黄金海岸，以至世界竟把广东视为了中国，把广府话（Cantonese）视为真正的中国话，而 Mandrinese（国语、普通话）只被当作中国的北方方言，乃至满洲语——笔者在国外讲学多次，每次都不得不对那边的教授就此作出反复的解释。

这便是广东独特、奇异的人文地理——对内封闭，因为南岭的阻隔，对外开放，由于大海在铺路！

内陆人把大海视为世界的尽头，望洋兴叹；广府人却把大海当作世界的起点，令“海不扬波”（见南海神庙题匾），好扬帆远航，“以水为财”——如前所述早在先秦，便处处可见越人“善用舟”的文字记录。甚至在《艺文类聚》中卷 71《周书》里，便说在周初，越人就向周王室献过舟。

这已是远古时代了。

以后的史实，更数不胜数。

沿海的港口，均是广府人的所在地；富饶的珠江三角洲，更是广府人的中心——正是这样，海上丝绸之路才逐渐得以形成气候，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及至今日的香港，虽不可取代广州成为广府文化中心，但是，也正是广府文化的张力，才使得它风生水起，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华人华侨的一个“陪都”——请注意，海外华人绝大多数仍是广府人。

对于当代中国，香港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假如当日南下大军没有在深圳河边驻足，横扫过去，那么，后来的香港，便会同广州、上海一样的命运。既没有五十年代初作为在西方列强封锁下唯一的“透风孔”——商贸渠道，整个中国一边倒；更没有今天“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以及“再造几个香港”的宏愿。无疑，当日的驻足，是香港的大幸，也是中国的大幸，它至少可以证明，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多一个参照系，从而返观自身，是不断自我更新、自我完善的可靠保证。这也是当今世界多元文化潮流作出历史进步的一个标志。一统则死，这不仅仅就什么计划经济而言，对文化也同样如此。香港相对于中国，相对于广府，都是历史之镜——无论从过去被割让的耻辱而言，还是今天收回的荣誉而言，均是如此，但它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政治上，而更在于文化、经济诸方面。虽然前文我们一再强调不可以“港派”来混淆视听，但是，它作为广府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广派”的一足，也仍是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

正如香港之于广府，对保存广府文化传统并为广府文化添加新质一样，广府之于整个中华文化的意义，也就更为有份量与力度了——也就是说，广府文化为中华文化添加新质、予以改造、更新，有着更加无以替代的、极为重要的作用。

南岭之阻隔，对于在岭南滋养出迥异的、独特的广府文化有着根本的作用，从而为中华文化造就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一个与内陆文明几乎完全不一样的海洋文明，补充了中华文化血液中的铁质，使之不再是单色的、固化的，而能够不断汲取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也是今天我们来研究广府文化的必要性，是历史发展至今而提出的命题，是时代的要求，是过去抹煞个性，只求一统的历史反拨，其重大意义，怎么高估也不为过。由于地理的因素，使广府文化今天显示出更大的能量与生机，这是无论如何值得庆幸的。

纵观历史，众多古老的文明，均已相继衰落下去，甚至最后消失。所谓的“四大古代文明”，如今，也就只剩下中华文明了，但它已在早几个世纪前，已显得垂垂老矣，差点覆灭在野心勃勃的西方殖民者手中……无疑，一种古老的文明，总归是要走到尽头的，闭关自守、唯我独尊、近亲繁殖，只会产生弱智儿、低能儿乃至白痴，但幸运的是，中华文化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此消彼长，此起彼伏，它曾一度克服过危机，让只剩余烬的文化之火又重新熊熊燃烧起来，论为异族统治的当口，反能卧薪尝胆，汲取教训，重新崛起。不过，今日的世界，已不是沉滞的中世纪了，那种只是一个刻度上的消长，不足以证明这种文化生命力，似过去的循环往复，是绝不可能再造新的辉煌了。今天文明的突飞猛进，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丝毫的懈怠，都有可能被甩出十万八千里之外。

如何认识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承认，还是否认，这是第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而这却并不容易为人所接受，无疑，中原文化、儒家文化，历来便要定为一尊，排斥异己，两千年的历史便

是如此。唯有承认中华文化的多元性，摒弃过去“独尊”的格局，这才谈得上第二个问题：如何在多元文化格局中，激活其优质部分，剔除其腐朽的成份，输血、嫁接、移植，使老树迸发出新枝，来个再造与更新……

也只有进而谈及第二个问题，研究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才顺理成章，毕竟，它与曾为“独尊”的中原文化相比是那么异端，那么不同，而且，在近代，一下子更是惊世骇俗，尤其是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民主革命与改革开放，让中国与世界都为之震惊。所以，以过去的程式及观点，来对待带有“异质”的珠江文化进行研究，恐怕也不可行。

于是，我在这里，试图寻求另一条思路，一条合乎当今“法理”的思路。

①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1版。

第七章 珠江文化的海洋基因

关于中国古代海洋文化问题，近年来已有了不少学术的探讨，并成为文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无疑，这是与改革开放的推进密切相关的。

的确，如果把中国文化仅仅界定为大陆文化类型，现在看来，显然是很片面的，包括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一书中，也说，尽管中国有那么长的海岸线，有可能在古代便有发达的航海业及由之而兴盛的商业，然而，中国“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而海洋，也“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①——换句话说，即中国不存在海洋文化。他这一论点，与他的中国“无历史”论，长时间左右了国内外众多文化学者的思考。

果真如此？

珠江文化，能纳入大陆文化类型么？如不能纳入，那又属于什么呢？而中国文化的界定，仅仅是大陆文化类型，那么，珠江文化岂不要被排除在外了么？没有了珠江文化以及东南沿海众地域文化，中国文化能算是完整的么？

无题，必须证明作为珠江文化的代表，广府文化有着海洋文化的基因，而没了海洋文化这一章，中国文化即是不完整的。大量的事实论明，中国古代便存在有海洋文化，同样也分享了海洋所赋予的文明——舟楫之便而兴起的商业文明，海洋，更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广府文化乃至珠江文化。

正是广府文化雄辩地证明了，在中国，一样有海洋文化，一

样有蓝色文化。广府发达的海洋文化，是自古以来已有之，以广府为起点之一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是海洋文化辉煌的产物。

当然，学术界自前仍试图以东方的海洋农业文化来与西方的海洋商业文化相抗衡，把中国的海洋文化的农业特征上升为主导^②，这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无可否认，海洋文化中应包含农业、渔业等等，但是，其根本特征，还应当是商业——这我们在前边的章节已经阐述过了。不然，又与大陆文化的农业作何区别，仍回到让黑格尔否认中国有海洋文化的基点上。其实广府文化的海洋特征，也恰恰是其发达的商业贸易，而不是别的什么。

第一节 人的海洋文化特质

应当说，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是有着很多鲜明的区别的，包括文化人格类型。如同古代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而荆楚多文人骚客之类——光是南北差异就很明显，更何况大陆与海洋，对人格类型的铸造就愈加拉开发距离了。

这里，笔者不想用自己的，或本国人的目光，去审视这两种文化造成人的多种差异，却想跳出去，用外国人的眼光来看，而且不是用今天的外国人的眼光——毕竟，今日中国的开放已大大不同，内陆也拂去了海洋的腥风；而是用上个世纪，即中国并未真正或完全打开国门前，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不同区域——请留意内陆与沿海——人的区别。

文化本就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发生和成长的，某个文化圈中之人，其社会性格与其知识背景、精神面貌、心理素质、风俗习性、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在长期的沿袭及变异是分不开的。例如，在中国人眼中，英、法、美、德均是白色人种，但是，只要一经接触，你便可以不用其语言（假如他们都操一口流行的英语的话），只根据其行为举止，判断出他们分别是哪国

人，英国人的绅士味，美国人的牛仔味，法国人的飘逸，德国人的严谨——均一目了然。

即便在中国，人们也可以一下子判断出你是江浙人、东北人、京津人、西北人还是广东人……连老外来过几次，也都不难对此作出区分。我们找来的这位外国人，便是德国学者利希崔荅，他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对中国各省的文化性格——加以描绘，如今看起来仍觉不乏精辟与独到，特摘引几段：

宁波人在勤奋、奋斗努力，对大事业的热心和大企业家精神方面较为优秀。

尤其是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广东商人作为大商人，要求和欧洲一样的价格，而宁波人商人则更看重小的、零碎的利润。

湖南人没有商业精神，而军事精神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江西人和山西人、广东人一样善于算计，但仅限于做小商人，开杂货店。金融业属于山西人，大商业属于广东人，江西人在做小买卖方面才能卓越。他们没有湖南人的那样刚健，也缺乏可以博人好感的浙江人的柔软……

山东人……比起商业来，他们更专心于农耕、工业和陆上交通业。

湖南不仅中国最优秀的军人大都出于此，而且是政治家的摇篮。

在所有中国人中，对中国特有的尺度、数、度量观念以及基于这种观念的金融业倾向最发达的要数山西、陕西两地的人，作为最古老文化的保持者，他们获得了对邻人或周围国家居民的精神上的优越感……

正如四川的水山是中国各省中最美的一样，其居民

除了局部以外，以其生活方式的精醇和性格的和蔼，都是卓越的。与一般的中国人相比，其穿着较为清洁，保有秩序和礼仪的人较多。③

——请注意，这均是一百年前一位老外写上的。而这一百年的，湖南出军事、政治领袖、山东的交通业及宁波人在上海商业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等等，亦一一印证了他的这些……直觉——该说是直觉吧？

那么，对广东人，他又是如何写的呢？

在广东，居住和杂居着语言、相貌、肤色、社会地位千差万别的不同种族。广州市及其附近的开化种族，在所有的智能、企业精神、美术情趣方面优于其他所有的中国人。广东人几乎掌握着中国所有的工业，其工业制品数百年前就传到了欧洲……④

显然，他是用西方文化的目光，来看待广东人的，也就是以海洋商业文明的尺度，来衡量广东人或广府人，进而涉及宁波人等。在这篇文章中，他甚至不惜往西方人脸上贴金，竟称广东人有可能是他们祖先航海来到东方而留下的后裔，这显然有点自我吹嘘了。广东人经营商业的才干，广东人的智能、美术情趣等等，也是几千年来自己形成的，与西方人种并没有什么关系。

从上面的人格类型比较来看，湖南人、四川人、山东人等，显然是内陆文化类型的，至于山西票号——那他所称的“金融业”怎么看待，当另作分析，不过，山西票号却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间完全衰落下去了。

可以说，广府人的海洋文化的特征是最为鲜明的。利希霍芬最后不得不称：

广东人对经营大商业和大交通业有卓越的才能，人

们生长在自古形成的氛围中，受其熏陶，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人种……⑤

今日，珠江三角洲大商业，大企业及大交通业的形仿佛在一百年前都给他说中了——不，本来，在一百年前就理应如此，只是我们的历史走了不应走的弯路。

广东人的文化精神，或换一句话，广东的主体性文化——人，在历史上来说，还是从外国人的观感反馈过来，并不是业已形成的某种偏见所说的哪么粗鄙、暧昧、浅薄的。

原因在其参照系的不同。

一种文化的来源越是丰富，其内容就越为博大、形式更为多彩，成就也就更为璀璨——这恰巧证明，这种文化的延续性、继承性、选择性、融合性乃至可塑性就愈大。这，不也正是海洋所赋予的么？

这一部分，我们只是给广府的海洋文化特征作一个“人证”。

第二节 海上商业文明

而广府的“物证”——即商贸业来说，其海洋文化特征也就更雄辩了。

广府的经济文化，从一开始，便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海洋商业特征。据考证，广东迄今发现的青铜文化遗址有 300 多处，但其年代一般都比中原地区要晚。但其商业文化，却早于中原很多。《战国策》中便有楚王的一段话：“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这些，则均产于岭南，说明番禺早在秦汉之前，便成为了南方珍异特产集散的商业都会。古巴比伦人已有记载，在公元前 425 年间，即我国的战国时代，他们已到达中国南海，其时，中国丝绸也由海路输入了古希腊。可见，古番禺的海洋文化特征——商业文明已经很显著了。

而按汉初在南越王太子墓中所发现的长 120 - 126 厘米的象牙五支，与岭南的亚洲象“牙小而红”记录不符，应是非洲象牙，所以，这也是海上商贸的见证，其产地应在西亚、东非。仅此一例，便可知两千多年前，番禺已是世界海上商业来往的一个港口。其他佐证还很多。

到了汉代，在《汉书·地理志》上，便有“南海航路”所附，是以证明“海上丝绸之路”已在广府文化区域作为起点。番禺的工商业已相当发达，制陶业、铸铜业都成规模，造船业更是个国之最。并有了从这里开始的海外交通。史载粤西南的徐闻、合浦已是商港，故时谚曰：“欲拔贫，诣徐闻”⑥合浦更有“合浦珠还”一说。从这些地方出发的商船，规模不小，携带大批“黄金杂缯”，去换回“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船到过七个海国，主要目的地为黄支国，最终到达“已程不国”⑦。而印度、东罗马帝国也有使臣从海路来中国。

六朝时，广州渐渐取代徐闻、合浦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早在西晋初，便有“大秦国（东罗马）奉献珍来经于（广）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⑧”南朝未设外贸专门机构，只由广州刺史和南海郡太守兼管，“州郡以半价就市，又买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⑨“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⑩

到了唐代，广州不仅是我国主要进出口口岸，而且成了世界著名的港市。由于唐代经济文化的空前繁荣，广州对外贸易也就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对作为贸易伙伴的阿拉伯、波斯、天竺以及南海诸国的海运，更是兴盛，来往船只空前之多。

其时，广州便划出了一块地方，专给来自波斯湾、东南亚的外籍商人居住，这个地方，便叫番坊。这些人，后来也都融合于汉族了。据史学家考证，这里不仅融合有波斯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乃至黑人、白人等人种。如同中国北方一样，也融合了

当年的“五胡”等人种。

这种融合，更是海洋文化的一个部分——没有山川的闭锁，大海本身就是开放的，广纳百川。为什么海洋文化根本特征在于其商业，则是因为海上贸易的互通有无——世界强调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则是因为古希腊与近代欧洲，由于地中海得天独厚，才使海上贸易达到极大的繁荣。可以说，唐代文化，多少得益于当时海洋文化的滋补，才走向鼎盛。而这，则是无法说成是农业文化或渔业文化的，纵然渔业自身已包含有交换的商业意味在内。

对于海洋文化的接纳，唐代统治者也是颇有胸怀的——当然，这也与经济利益息息相关。唐代特别注意广州的吏治，把其任命与外贸的兴衰联到一起，“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外国之货日至……故选帅常重于他镇。”^⑪如岭南节度使李勉到任，由于“勉既廉洁，又不暴征”^⑫，使到达的外轮增加了10倍。不要小看这一事实，它证明，商贸的兴衰，与吏治的好坏直接有关，也就影响了一种文化的变迁。

宋代，是广府经济文化中兴时期。唐代之前，广府的中心地带——珠江三角洲，垦殖正有待扩展。由于宋代人口大量南移，使珠江三角洲的垦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农商并旺的地方。广州城繁华超过唐代，西城内的番坊番汉杂处就有几万家。在黄埔一带，番舶的避风港，“延袤十余里、阔数丈，人称鹿步渚”。^⑬

外贸大为增加，“华人诣大食至三佛齐修船，转移货物，远贾辐凑，故号最盛”。^⑭有了不少“住唐”的外国人，也有了长期“住番”中国人，他们的后裔便成了当地的“土生唐人”。

宋代对外商制订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从而也促进了广州外贸业的繁荣与发达。宋初曾送内侍敕书、金帛分头招至番舶，“来远人，通远物”为既定政策，价格要公平，不能令外商亏损；市舶司年年在来远驿盛宴迎送外商，准许向违法的市舶官员越级投

诉；以官衔授予招徕舶货抽解累计在5万贯以上的纲首……。

到了元代，外贸业更加发展，如前面已提到的当时来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特写道：“秦克兰（广州）者，世界大城市之一也。市场优美，为世界各大城市所不及。”^⑮

元代对外政策更为完备，也更放宽：对舶货禁榷不多，政府收入主要靠抽解，初时“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取一”^⑯，税率较南宋低。还开办官本贸易，由政府备船，出资本，募商人“入蕃”贩运；再则鼓励私舶贸易，把舶商及艚工分列户籍，免除全家差役……。

到了明代，广东的商品经济显示出了极大的活力。尤其是农业商品性生产，推动了农副产品的加工业，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手工业更发达了，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兴旺起来。这一来，广东的对外贸易亦获得很大的推动，整个广东的经济文化，因此呈现了全新的格局。长期作为对外贸易口岸的广州，在明代更显示出它在城乡间、海内外的枢纽作用，有力地推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

广州，“天下商贾聚焉，”其商业文化尤为发达，虽然明初一再禁止民间入海“通番”，把对外贸易限制在海禁政策范围内的“朝贡”贸易，但还是无法阻挠得了私人贸易，最后，也不得不开海禁了。官员们不得不承认，“诸番到中国货物，益互市通商，来往不绝”^⑰……当然，其间亦几经曲折，连海禁时，地方官更与总兵也“新造大舶，以通番商”^⑱商人也成了“海盗”，“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⑲其队伍之大，连官兵亦无可奈何。

开禁之后，通海者“十倍于昔”^⑳。广州还每年举行两次集市交易：一次是春天的一月，另一次是夏天的六月末，期限为两个月，但每每延长，可见兴旺的程度。广州的商业更加繁荣了。

在明代，广东便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只是由于明清交替的

几十年战乱，又受到了摧残，直到战乱甫息，才又重新发展起来。所以，清初，矿业、铸造业、陶瓷业、纺织业、制糖业、茶业均非常显著地形成了规模，行业有了内部分工、计件工资，有了不同于封建家法关系的雇用关系……。

1757年，清政府封闭了漳州、宁波、云台山三个对外口岸，仅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这一来，广州的商业更成了全国之翘楚。全国进出口全集中于一地，自是空前繁忙。广州人口一下子剧增至100万，出现了大批的商馆，著名的十三行就是此时出现的。

广东帮商人在全国中更是活跃，从而驰名海内外。其中百分之八十为广州帮商人，他们“度岭峽，涉湖湘，浮江淮，走齐鲁”，赚了“大利”。顺德商人，“或奔走燕齐，或往来吴越，或入楚蜀，或客黔滇，凡天下省郡市镇，无不货随其中”^{②1}……他们加强国内的贸易同时，也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

据史籍记载，广东帮商人兴起于明代，尤其是嘉靖中期后，凡“番夷市易，皆趋广州，”适应于广州对外贸易需要的广东牙行商帮亦于隆庆、万历年间形成了。万历年间，广州商人在苏州虎丘建立岭南会馆。清初，南、番、顺的商人在湘潭建立会馆。康熙年间，又到汉口合建会馆。。随后，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都建立了会馆，这又是一种作为国内长途贩运批发的商帮了，与主持和操纵外国商船贸易的牙行商帮不一样。按其顺序，是先有海商，后有长途贩运的批发商。

明清时期，广东人观念与内地相比，其商业意识日趋拉开距离。明代，便有亦官亦商者，如嘉靖时南海人霍韬在吏部任职时，便在佛山经营炭铁、盐生意而发家致富。弃儒经商者，在清代更为盛行，有应试不第而经商者，亦有不应试而去经商的。至于官位不高的，当上了，也宁愿不当这芝麻官而去经商。当然，洗脚上田，弃农经商，更是珠江三角洲中不少自耕农的选择，

“始变农之贾”^②，南番顺比比皆是。以上，又以弃儒经商、弃农经商为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意识的重大变化。民商也渐渐多于官商，这就为中国在广府区域内产生第一代的资本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广州商帮的主要活动范围，不仅在国内，更在海外。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新会商人卢继恪，便在南洋各港口往返，商船运数十艘，隆庆年间，广州—澳门—马尼拉—墨西哥等航线开通后，广东商帮更跨过了太平洋到达美洲。光绪年间，到达太平洋彼岸的广东商人更达4万人之多。据史载，南海商人简照南，“置巨舶往来日本、暹罗、安南、远及欧、美等大埠。”^③光绪三十一年（1905）回香港，发起集资创办南洋烟草公司……人称，自明清始，“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④

海商之后的牙商，或称之为当时官方的经纪人，也就是十三行了。史称，其在清代前期，承担与完成了对外贸易的重任，事实上他们承担的也是外交加外贸的双重职能，无疑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起到重大作用。道光十三年（1830）英国议会曾在调查后作出结论：“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作证人都一致声称，广州的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好做。”^⑤这与十三行牙商谙熟外贸业务是有很大关系的。鸦片战争后，十三行一夜消失，许多十三行商人在上海摇身一变成了买办，成了上海开埠的先行者。如今溯上海由小渔村一举成为全国最大商埠，第一批开拓者则几乎全部是广东商人，而后才是宁波商人等跟上去的。例如同顺行商吴天垣（吴健彰）在英美支持下，出任苏松太道，成为近代最早的买办官僚之一。^⑥

但广东帮商人主要是民商而非官商，并从他们当中，形成了民族工商业，由商业资本发展为产业资本等，流向了生产领域。

早在正统七年（1442年）南海商人聂天根便把商业资本投入纺织业中，“四世祖天根……流贾于厓门水滨，……后以纺织

为业，勤俭成家。”^⑳而后，明清之际，由经商到创办产业之人，更是不计其数。由是产生了新的经济因素。

商品经济进一步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广东成为了全国银元流通最广的省份。据统计，1700—1830年间，广州一口的银元输入量便在4亿左右，以后就更一发不可收了。最后导致光绪中叶中国货币制度的空前变革。中国第一个近代机器造币厂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后在广东建立，“吾国机器铸造制钱涉银圆铜元均创制于粤省”^㉑，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货币制度走向最后的崩溃。

与此同时，广府地区的城市化、以及乡村的城市型或商品型农业也日趋高度发展，城市经济更是突飞猛进。如“佛山镇离广州四十里，天下商贾皆集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百不及一也。”^㉒“佛山一镇，绅衿商贾，林林总总”^㉓——“商业依赖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㉔

尽管鸦片战争，港澳被侵占，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尤其是广东的工商业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但由于原先的物质基础，尤其是思想文化的因素，终于，在广东出现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继昌隆缫丝厂。也就是说，广东成为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最早诞生地。

正如我们在前边关于广府文化一节中所说的，洋务运动在广东推进得迟，且受到了抵制与抨击，正是因为针对其“官商”性质而有广东“民商”的巨大实力所在，广东作为侨乡，侨资的流入也就与洋务“官商”分庭抗礼。所以，从史实上来看，广东的民族工商业的兴起，比洋务企业要早得多、快得多。

继昌隆缫丝厂的创办人是南海人陈启沅，（约1825—1905）。他早年在家当塾师，后“弃儒从商”，到南洋去了。在泰国当地法国机器缫丝，大受启发，遂于1872年回国在家乡简村筹办工

厂，其兄长侨商陈启枢设资白银七千两，一半用于建厂与器械，另一半用于由购蚕茧与支工资。厂内实行计件工资，并管午饭，以集中生产。女工由初始时的 300 人，发展到了 600 到 700 人。该厂“出丝精美，行销于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②

但创办实业并非易事，后一场官司，官府竟判丝厂等用机器“每日可缫丝四五十斤，约抵四百人工作之力”，使工人“无可雇趁，”此乃“专利病民”，“情难曲恕”，勒令“尅日齐停工作”。^③陈启沅只好迁厂澳门，又因女工不愿同往，招工困难，再又迁回，改用小机缫线……

在其建厂 18 年后，即 1890 年，我国民族资本又在广州创办了第一家电灯公司。创办人为黄秉常，台山人。他在美向华侨招股，集资 40 万惨淡经营了九年之久。中国第一家民办火柴厂，则在其一年前 1889 年于佛山创办。同年，中国第一家造纸厂也在南海盐步正式投产，创办人为钟星溪。在这之际，开矿业也发展了起来。

从 19 个世纪中叶时开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逐渐形成了一个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力量，在中国社会里，在民主革命中起到了积极的反帝反封建的作用。

几千年来，由于海洋带给广府的种种物质与精神的影响，或者说，“分享海洋所赋予和文明是数不胜数的。当年黑格尔只是由于信息的局限，片面作出海洋未曾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的结论，本身已给一部历史所推翻了。我们可以当之无愧地声称，灿烂的古代海洋文明，一样在广府、在岭南及中国放射着光芒，并且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这一节，只能算是浅尝辄止，只局限于广府文化中海洋的影响，而未涉及到海洋文化在其他区域文化，如吴越文化、闽台文化……等的影响——如果综合起来，当可写一部中国海洋文化的专著了。也许，已经有人在写了。

第三节 作为海洋文明的经典

广府人自信、豪放、达观、好胜。人说，这也是大海赋予的性格。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也对其人格类型借助德国学者作了一个大略的分析。如梁启超所称，广东人好犯难冒险，对内招架不行，对外却富于竞争力，这也证明他们对于封建专制与正统观念每每处于边缘状态而不适应，却更能对付来自大海的挑战。他们更多地表现出灵活、宽容、进取、务实的姿态，在国际大竞争中显示出优势来。

为此，我们不妨举一个案来分析。

古代已分析过了，就来分析近代的吧——也好与西方提出的古希腊与近代西欧为海洋文化蓝本作对照。一古一近，更有可比性与说服力。

下面，我们以香山县（即今中山市）人发起的、从而在全中国崛起并发展到海外的中国最早的四大百货公司为例，来探讨作为广府海洋文化的特征与历史价值。

首先，其资本的由来，便是中国人的一部血泪史。他们不是自己，就是父辈被“卖猪仔”到南洋的。如四大公司之首的创始人马应彪，其父早年就是这么去的澳洲，去那里开矿，当劳工，有了少许的积蓄，方让儿子去，去时，矿产已穷竭，转行经营蔬菜，渐成货栈，并兼营存款、汇款到国内的业务。直到1892年，马应彪则有粤港之行，在香港创办金山庄，并于1894年正式成立，担任经理。^④由是下了回国办实业的决心。当时华侨在澳洲的资金，由于当地白人的排华政策，找不到出路。于是，资金流回国内兴办实业，便是势在必行。因此，无论为民族，还是为创业，都别无选择。

侨资的走向，也大都是这么从海路回到中国的，中转地为香

港，可以躲开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且可作为海外华人与海内侨眷的结合部。而四大公司的创业路线，便是以商兴业，走规模经营的百货之便。马应彪为此奔走呼吁数年，直到 20 世纪前夕，终于召来了美洲、澳洲，包括香山老家一共 12 位具有一定实力的商家，发起第一家百货业股份公司——先施公司，斥货二万五千元，在香港筹建。

1900 年元月 8 日，20 世纪新年即到之日，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终于在皇后大道中 172 号成立。

由于总部设在香港，遂先于 1907 年，于广州建先施公司，而后，1914 年，又在上海建先施公司，再陆续于日本、英国、新加坡均设子公司。由于先施公司率先创立，其后，永安公司（1907）、新新公司（1926）、大新公司（1931）也跟着建立起来。⑤他们不仅同是香山人，而且同是澳洲华侨，皆是沿着先施开辟的路线走过来的。永安公司的郭家，与马应彪是儿女亲家，另外蔡、黄两家，均曾与马家合股办过先施，而后自己出来，另立公司。一时间，四大公司同时闻名于世，同时耸立在上海南京路上及广州等地，开创了中国百货业的现代新格局。在当代思维科学新的研究成果中，有一说为“群体激发效应”，当在这四大公司上得到验证——不然，为何中国现代百货业的首脑人物，全出自旅澳香山华侨？

四大百货公司的诞生，标志了中国商业迅速跻身于世界现代商业的行列，在广府商业文化史上，更是有着极其重大意义的。

首先，这是地地道道的民族工商业的产物，而非官僚买办的、仍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行商之类。它代表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走向。而且，他们均比较清醒地意识到，孙中山等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正是作为他们这些新兴的民族实业家的民主思想与现代观念的体观者，更是他们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代表。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八方捐资，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支持了辛亥革

命。包括马应彪在内，有的还在革命政府中任职。应当说，当时，社会已经意识到这批新兴实业家的历史推动作用了，如严复就曾说过：

盖言禹之功，不过能平水土，俾民莫居而已。后稷之功，不过教民稼穡，免其沮饥而已。实业之事，将生货为熟货，以民力为财源，披之以工巧，塞一国之厄厄，伎人人得温饱也。言其功效，比隆禹、稷，岂过也哉。③⑥

时至今日，恐有人仍会觉得逆耳，以为这有抬高商贾的作用了。不过，连当时著名革命家。壮烈蹈海的陈天华也说：“泰西革命之所以成功者，在无中等社会主技其得。”③⑦这已在呼叫中国的工商业家争取自己的独立地位，以身系革命成败的气概走在时代的前列。这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在自觉地登上了历史舞台。

其二，四大百货公司的创立，充满了一种近代科学实验的务实精神，这也是广府文化的特质之一。四大公司自澳洲到香港创业，几经挫折，先施公司更是四年后方得分红，几欲收盘。在这前后，他们没少作试验、探索。至今中山人记忆犹新的是，当时先施在上海南京路上选址，分别以路北、路南作统计，投豆子计算人流量，而后方决定在人流量大一方确定公司的基地。后来，永安公司也采取同样方式选址，其他两家亦如是③⑧……今天看来，这似乎简单了点，但其务实精神却可见一斑。先施公司在香港创立时，甚至不惜派雇员用望远镜在高处守候海轮进港，以随时将生意送上码头。凡此种种，都有当日的中山先生所说的“行而后知”的实验精神，一如孙先生所说：

夫习练也，试验也，探索也，冒险也，之四事者，乃文明之动机也。生徒之习练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达其欲能也。科学家之试验也，即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

也。探索家之探索也，即行其所不知以求其发见也。伟大杰人之冒险也，即行其所不知以建其功业。^{③⑧}

孙中山视这种“行而后知”为“文明再进文明”，针贬当时中国缺乏实验科学，是有真知灼见的。

其三，其创立“不二价”，更可谓现代商业精神的开拓。在“无商不奸”的传统观念中，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则被视为天经地义。时至今日，已有百年，改革开放了，这一陋习仍有不少市场——这倒更显当日首创“不二价”之难能可贵。虽说“不二价”一词中国古代已有之，且也有实行过，但那是官府定死价，或者是个别人的行为，与现代商业精神不是一回事。马应彪在谈“不二价”之创立时，讲到他在澳洲悉尼所见的一家大公司，其以一大树为商标，上面有一句格言，为“我生存一日，则成长一日”，给顾客一种信誉的保证，让顾客一同建树信心，该公司正是以诚实不欺、货价不二而立业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人，与中国封建社会里的商贾，应是两回事。所以他力主以新的方式办商业，须以诚信先施于人，方是成大事之开始；又搜罗万有，明确标价，以信示人，以信立业^{④⑩}……无疑，这期间，包含一种互通有无、平等互利的契约精神，不是哪个族长、哪位老祖宗个人意志说一句话就可以改了的。从开百货公司，到标不二价，这都走的是近现代商业的必由之路，他们正是顺乎历史潮流而动的。

其四，四大公司走的，是以商业带动实业发展方向，不仅仅是经商，所谓“以商立国”是美国精神，美国一位总统柯立芝也曾称，美国的国务就是商务——这是得资本主义立国之要领的。先施公司除兴办旅馆业外，在广州还一度创立十大工厂，成为华南最大的企业之一，在上海亦开过乳牛场，还投资过公路等其他产业。马应彪女婿，永安公司第二代首领郭棣活，本身就是学纺织的，后来成了上海乃至全国纺织业巨头之一，“文革”前后还出任过广东省副省长。得有实业，国家才可能强盛起来，不受制

于人。早在上世纪，德国那位人文学者两度到中国考察，便得出结论，认为广府人有经营大商业、大交通业、大工业的天赋，可谓言之不谬。其敬业精神，更与西方人相近，与地中海的商业文明不相上下。在中国南方，以商业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可以说不同于中国内地产业发展的路线。

其五，四大公司很注意员工素质的提高，如马应彪就亲自为员工编了个“五千字课”，在员工中扫盲、习技，并且捐巨资于岭南大学，成为该校第一位华人校董。他们清醒地看到，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在激烈的竞争中，一家公司不足以及站稳脚跟的，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除开岭南大学外，他还捐资建了很多幼稚园、小学与中学，把钱用在培养人才上。

这也是他从办厂失败得到教训后领悟到的：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尖端人才驰骋在科技领域上，是很难与人竞争，尤其是长久竞争的。几经努力，中国人终于夺回了岭南大学的主权，在其大学章程中写下了如下文字“本校由本国人全权管理，施行人格教育，养成科学人才，适合中国之需要为宗旨。”^⑪

最后，还应指出的是，先施公司亦非中国传统的家族公司，子嗣继业，而是一个股份公司，后来主事的，已非马应彪的直系亲属，而是由董事会推出得力的人选。人说，在中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从商，有个二世祖就折腾光了。如今，先施公司已历百年，仍屹立东方之珠——香港，并且一再拓展，这同体制是有关系的。正如一位史传作家所写的：这种体制，也说明中国民族工商业最终摆脱封建宗法观念，真正具有近现代意义。

可以这么说，没有马应彪之辈先后崛起的一代平民工商业家，中国由官商（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转向民商（现代意义的），由洋务运动转向维新变法乃至辛亥首义，从而推翻千年封建帝制，走上二十世纪现代之路，则是不可能的。

这也说明了，中国的民主革命，为何只能启动于南方，广府为何在中国二十世纪初时走在革命的前列，从而揭开了中国现代史上崭新的一页。

据史料记载，除百货业带动其下属产业的发展之外，在广东同时已出现了不少新兴的行业，如橡胶业，1917年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广东兄弟树胶公司”，几年后，橡胶厂则已达20多家；还有冶锡业，这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军火工业的刺激，在广州河南就设立一家有11座反射炉的冶锡矿的北江公司，产品主要供出口。另有水力加工业、肥皂业、粮食机械加工业等。保险业（先施也兼容此业）、航运业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当然，轻工业、重工业也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对外贸易与对内贸易发展则更快了。仅1913年为例，广东进出口总值达19,957万多两，比九年前增加2.3倍，占了当年全国的20.16%——这个数字很点意思，到世纪末，广东的进出口又一次达到并超过这个比例。

尽管在世纪的中叶，广东的商业文化有过很大的曲折，但是其“底气”仍是一脉贯穿下来了，所以，到了世纪末的改革开放又再次显示出其活力来。

商业精神，自是讲求等价交换、平等竞争以及所有权的确认，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一位，这就自然淡化了政治意识与宗法色彩，从而与封建的“官本位”形成对抗。这一来，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秩序也就被打破了，广东普遍的弃儒从商、弃农从商，把商提高到士农之上，这本身就是对传统的或正统观念的反叛。长期养成的商品意识，使之很快便接受了外来近现代的启蒙思想。于是，在久被压抑之下，一冲而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龙头”以及世纪末改革开放的“龙头”，人们不得不对这过去不屑一顾的“南夷之地”两度刮目相看了。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这并不等于说，由中原而来的儒家正

统文化，在广府没有多少市场。而应当说，在整个大背景——即中国背景上正统文化还是在广府占有相当地位的，甚至在某些阶段，更压过这里的非正统文化，占了主导地位。例如在“文革”十年中，封建专制文化的影响在这里还是非常严重的。包括在这之前，也在统制的模式下，扭曲了广府文化的正常发展，以至造成了广州作为华南、南中国海的商业中心城市地位的迷失，非驴非马，从而落后于本在它之后的香港。

直到今天，虽说珠江三角洲“官本位”观念已经非常淡化，而在某些城市的职能部门、等级观念仍很强，知识分子地位一再跌落，权钱交易，官商作风，亦大有不可一世的味道——当然，这些也在改变之中，对于我们，如何审慎在二者的交替中，去其弊而善其善，还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今天，广府海洋文化或商业文化的发展，当另辟一处去阐述了。因为这是它再度显示的华彩乐段。它与上世纪初的奇丽，可谓相映生辉，光彩夺目，并有望更加辉煌。在这一章，我们只是粗略地给了一个纲目而已。总而言之，海洋，对于广府人的文化精神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这是广府文化中的一个主脉，是不可以抹煞或忽略的。可以预期，它的“将来时”更会无可限量的。

注释：

①《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46页。

②《东方蓝色文化》，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前言，第1页。

③④⑤转引自《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版，第229-301页。

⑥《舆地征胜》引自《元和郡县志》。

⑦黄支国及已程不国，史学界有几说，一说为苏门答腊岛，一说为印度东海岸与斯里兰卡，一说为西亚与东非。

⑧《艺文类聚》：火布，即火浣布，指石棉布。

⑨《梁书·王僧孺传》。

⑩南齐书·王琨传》。

⑪韩愈《送郑尚书序》。

⑫《新唐书·李勉传》。

⑬道光《广东通志》卷二 290。

⑭宋·朱彧《萍洲可谈》。

⑮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第二册，伊本的《游记》。

⑯《元史·食货志》。

⑰印鸾章《明鉴》卷 3。

⑱《明史·孙锐传》。

⑲谢杰《皮台倭纂》上卷，《倭原二》。

⑳明·丁元荐《西山日记》卷上。

㉑《嘉庆龙江乡志》卷 4。

㉒《南海劳氏族谱》卷首，《三乐堂训言》。

㉓《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 15、14。

㉔《辛亥革命丛刊》第二辑，第 183 页。

㉕转引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海禁海关》，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 年第二期。

㉖《筹办类务始末》（道光朝）卷 57。

㉗《聂氏家谱》。

㉘《广东造币厂第一次报告书》，民国 7 年版。

㉙吴震芳《岭南杂记》。

㉚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 12，金石下。

㉛《资本论》第 3 卷，第 371 页。

㉜宣统《南海县志》卷 21。

③徐賡陛《不慊斋漫存》卷6《禁止丝偈晓谕机工示》。

④《粤海同心》1994年3-12期《马应彪》。

⑤《中山文史》总第13辑，《澳洲华侨创立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经过史略》。

⑥⑦同③，转引。

⑧《中山文史》总第17辑，《香山籍人创办的四大公司》。

⑨《孙中山选集》，第185页。

⑩⑪同④。

下 篇

文 化 篇

第一章 思想文化

作为珠江文化的代表，广府文化以其鲜明的特质与中原文化或内陆文明拉开了距离，其地理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上篇中已作了较详尽的阐释。正如一位文化学者所说的：“从区域文化的视角来看，恐怕很难有比南岭造成的阻隔，更大地造成了文化质态的差异，使得中国文化显示出更为五彩缤纷的格局。”^①而在珠江流域汉民族三大民系文化中，广府文化又是以其色泽的鲜丽、亮度之眩目，卓然而立，成为珠江文化的代表及主流。把握住其本质与特征，是必要做很多细部的工作，纵向的追溯与横向的剖析，都是不可或缺的。下篇，我们拟就其几个主要方面，思想文化、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及学术等方面来做这一细部的工作。如前所述，广府地区占珠江流域70%以上，人口80%，珠江文化的代表、主流亦为广府，因此，本章在论述中亦多以广府为主，兼顾其他。

第一节 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代表人物

一、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思想轨迹

作为“南蛮”之地，由于南岭的阻隔，来自中原的“中央”“正统”的观念，或者作为这种观念的载体——孔孟之道，一直就相对淡薄、疏远一些。而反过来，其思想文化，受正宗观念的箠制、禁锢也就少得多，从而有可能让自由思想或异端思想得以

萌生。这也正是珠江思想文化得天独厚之处，从而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及近代思想史上，都有不容抹煞的显著地位，少了它，一部中华思想文化史就是不完整的。

应当指出的是，既往的思想文化史中，虽然把这一部分也系列其中，但是，由于列入之际，没有标明其出自广府或珠江流域这么一个地理文化位置，所以每每让人忽略其所带有的区域文化特征，从而将其淹没在正宗思想文化之中，失去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机会。这一来，带来的讹误与负面效应是不言而喻的。换句话说，这也就不可能真正地发掘出其本质的东西，展示出其独有的文化特征，对其历史渊源、所处地位也就说不清了。

思想文化，总是一种地域文化中核心的东西，无论其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都有着左右整个区域文化的巨大作用。

这一节，关于广府的思想文化，我们是以珠江流域开化为起点，也就是说，呈现出思想的特质为开始。

南方的狂野，放达与开放，与中原的礼教、自控与禁锢，自古以来便形成鲜明的对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广府思想文化的形成过程中，与儒教格格不入，却与老庄的学说有几分合拍。两者对政治的淡化、对伦理教化的天然的排斥，对世俗生活或自然本原的关怀，都是相当接近的。时到今日的广府民俗中，仍表现出这种思想文化的底蕴。

正是从崇尚自然开始，珠江文化或广府与中原文化走出了两条不同的思想轨迹。

在中原，由自然而伦理，由第一自然走向“第二自然”——即把人伦关系为天所钦定的自然秩序，这可以从《易传·序卦》一文中看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于是，由天——地——人，演变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纲五常等伦理秩序了。

北方严酷的生态环境，由是产生了如此严酷的“礼义有错”——地理、历史由是产生如此逻辑的一致性。这一点，毋须在此作过多的论证了。

那么，在岭南，在这南海浩瀚的大海之滨，在这被视为原始蛮荒之地却又是为大自然所厚爱的广东呢？

孔子在两千多年前便说过：“南者生育之乡，北者杀伐之地。”②一点也没说错，自然环境正适应于万物蓬蓬勃勃、欣欣向荣的生长，没有黄土高原的严酷，也没有戈壁大漠的杀气，随意扔下一粒树籽，便可参天而立；插上一根枝条，说不定便是一片树林……大自然的宽厚，也带来了人伦的宽松，这里然绝非禁欲主义的场所，却有着享受自然、享受生活的广阔天地。——作为热带亚热带的生态环境，日照时间长，雨量充足、土地肥沃、森林丰茂，生活资料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水果、鱼类与飞禽走兽实在是太多了，虽说自然灾害也不少，台风、瘴疠……但失去得快，也来得快，这就带给世俗生活功利性、短期效应。所以，在珠江文化中，人们比北方更崇尚自然，是因为这个自然与他们的世俗生活融为了一体；而他们所说的“顺乎自然”（请注意，广府语汇中的“顺”可是不少，连轮船的命名都是“顺风”、“顺水”、“顺利”……等等），恰恰讲的是顺乎其世俗的生活，不要打扰它、中断它……这样一来，太容易奢望成仙得道，以享尽生享不尽的福祉，乃至认为天上的神仙也该下来同他们一道享受。干，是为了享乐，所以才有拼命的干活，也有忘情的享乐。

因此，在广府人的“第二自然”，则绝对不同于有着严酷的伦理秩序的中原“第二自然”。他们讲究的自然，是自然而然、不受规范约束的世俗化生活。

任继愈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中曾说：“楚文化的特点还表现为受家法制的的影响较小，因而能够对以家法制办

基础的周文化持一种怀疑的批判的态度。”③

那么，比楚文化更远离中原文化的珠江文化，其受家法制的影
响也就更小了，所以，每每把世俗化的生活置之于所谓的伦理
秩序之上，任其自然。人们可以看到，广府人的独立性、自尊心
每每要比内地强得多。而老庄论及的“小国寡民”在他们看来也
更实际一些，自在一些。他们喜欢一个天然的小社会，却不好一
个尊尊亲亲的大家庭；他们不喜受“定于一尊”，却热爱“广纳
百川”。对各种舶来品绝不持排斥的态度。

作为早期的，即古代珠江文化或思想文化，相对于中原的伦
理教化的规范，它更崇尚自然，一本自然的放达。也就是说，在
其商业文明未勃然兴盛而带来新质之前，我们可以归纳出它的如
下三大特征：

一、崇尚自然，主张一切“顺其自然”。人的发展，也就是
历史的发展，是与自然同步的，人作为自然的产物，理应是大自然
的一个“自在之物”。顺其自然之必然，人也才能得到自身的
自由与发展，“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④
庄子的思想，同广府人的观念几近相吻。由此，由道学衍生出的
道教，为何在珠江流域中得以成气候，这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将
会细述。葛洪之所以来到罗浮山修炼，正是南方有他赖以生存的
气候。

二、世俗化。这是由珠江流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所带来
的。早期，自然生存环境无疑是利于人类的自然生长的，人们的
感官享受要比理性的思考要强，而实惠的心理又比那种工于心
计、深谋远虑的作法要占上风。同时，我们分明能体察到，在这
片世俗的土地上，那种生命力的扩张、撒野、恣意的渲染，无拘
无束，要比内地任何一个地方都强得多。享乐主义在这里是有它
的原始土壤的。

三、开放性。广府人的中心的地域，位于珠江三角洲，以及

延伸出的沿海地带，它位于中国大陆的边缘，却又雄踞于南中国海上端“面北朝南”的重心。内地人因鲜有舟楫之经验，视大海为畏途，从而在大山中封闭了自己。而广府人恰恰把大海看作世界的起点，几千年前，便“陆事寡而水事众”^⑤，敢于往外开拓。而他们又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对来自内地与海外的思想文化，都不存芥蒂，故有人称广东又是中国最大的“移民省”，什么人物，怎样的思想，都可以在此找到容身与立足的地方。因此，这里自古以来，也是多种文化并存的地方。

例如，最早的进入中国的佛教，其水路，便是经海上丝路在广州登陆的，这是广府思想文化中的开放性所致，然而，却又是来到广府寻求立足的惠能，却创立了禅宗，促使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把“天国”招回到了人间。

因此，抓住这三大特征，以葛洪、惠能为例，是最足以说的思想文化于广府人中的历史进程的。前者，表明了来自内地或中原相对异端、非正统的思想文化，能在这里找到结合或焊接点，并得以迅速的发展，以形成其一定的思想体系。葛洪的自然哲学也是在广州一带成熟，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道教神仙论的。并且使他开拓的道教所在地罗浮山，成为道教思想发展、传播、兴盛的一个“圣地”。没有广府这样一个精神的大气候与历史地理的大环境，是不会有葛洪及其道教事业发生的。作为后者，佛教西来，在广府“登陆”也表明了来自异域的思想文化，同样可以在这里生根、萌发与拓展，而在其拓展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在这里完成它的世俗化的进程，从而诞生了具有中国特色，尤其是岭南特色的禅宗。一内一外，均可在这里契合，这是发人深省的，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二、道教思想在华南的成熟与定型

这里，我们先粗略介绍道教与佛教二者之前广府思想文化的若干代表人物，然后重点阐释葛洪与惠能二人在华南思想文化中的历史地位及基本材料。

较早可进入珠江或广府文化思想史的，可以从西汉的“三陈”、“杨孚”、“四士”算起，但并非每一位都够得上资格的，这里只是沿袭历史的习惯说法罢了。

所谓“三陈”，是指陈钦、陈元、陈坚卿父、子、孙三人。苍梧广信人。陈钦早年从师贾护，专修《左氏春秋》，颇有名气。他曾经用《左氏春秋》来教授西汉之间的“新朝”造反者王莽，这已见其悖逆之端了，而他竟还自命为《陈氏春秋》，可见广府人的傲气及对中原文化不以为尊的立场。其子陈元，史书载他“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至不与乡里通”。在当时，“与桓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⑥著有古氏训及集数卷。陈坚卿在经学上亦有造诣。而杨孚，番禺人，他潜力搜集、汇总岭南一带与中原不同的动植物、矿物“异品”和世俗风物，著为《异物志》。这是广府人所著的第一部有学术价值的著作，亦为我国首部地域性的异物志。其标新立异精神，自是广府人所有。至于“四士”，只可提士燮，与陈氏同是苍梧广信人，一度游学京师，汉献帝建安初任交趾太守。《三国志·吴志》本传中有：“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人。”因此，使交趾一度成为了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交州于汉武帝州治初设在嬴陵县（今河内附近），后移治苍梧广信县（今梧州封开附近），汉献帝建安十五年方移治番禺县。也正在这之后，广州才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中心。

下面我们来谈葛洪。

在广州，早有说周穆王时把稻穗带给羊城的五仙，视为南下

传道教的最早人物，作为神话传说，当然不足为据。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山语》中说：“安期生常与李少君南之罗浮。罗浮之有游者，自安期始。”似乎秦代罗浮山已为道教源生地，但也不足为据，因安期生乃汉武帝时术士李少君所编造出来的人物。

如是，岭南道教，应是东汉末年到三国之交，由太平道与五斗米道——即符箓派道教转化而来。江南一带道教由民间渗入一层，使道教由符箓派转向了丹鼎派。

而有史可稽的，当推岭南道教开创者的，还是西晋时曾任南海太守的鲍靓，丹鼎派一脉。《晋书》中专有《鲍靓传》，谓“靓学兼内外，明天文河洛书”，且“尝见仙人阴君，授道诀，百余岁卒。”晋代一位求仙者许迈曾“往候之，探其至要”，从而连他也“莫测所终，好道者皆谓之已羽化矣。”^⑦由此可见鲍靓的影响。其女鲍姑，习从父业。

作为鲍靓的女婿葛洪，也就是鲍姑之夫，则成了道教神仙论的奠基人。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原籍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生于西晋武帝太康四年（公元283年），卒于东晋康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祖上均为高官。但他年仅十三岁，父亲便弃世，由此中道困瘁。《晋书》谓“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⑧而他自己在《抱朴子·自叙》中称：“洪少有定志，决不出身”，“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今居世知其为文儒而已。”然而，其祖父葛玄，却对他产生重大的影响。陶弘景在其碑志中云“公幼负奇操，绝伦党，神挺标峻，清辉卓逸，坟典不学而知，道术才闻已了，非复轨仪所范，思识所该，特以域之情理之外，置之言象之表。……”他修得仙术，并以其炼丹术授弟子，“停驾虚无中，人生若流水。”“散诞游山水，吐纳和灵津。竦气同希夷，静咏道德篇。至心宗玄一，冥感今乃宣……”颇有物我齐一，同乎“大通”之感，向

人表明他已达到无我忘物的“宾天”效界。

葛洪年青时应当说还是重功名的，立有战功，封为伏波将军，终弃戈释甲，往洛阳求异书。后又随广州刺史嵇含到广州就职，因嵇含被刺，葛洪在滞留广州期间，则成了他一生中重大转折点。

其间，他“师得南海太守上党鲍玄（靓）。玄亦内学，逆占将来，见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传玄业，兼综练医术，凡所著撰，皆精核是非，而才章富贍。”^⑩

无疑，在这里，他找到了他精神的寄寓之所，而不仅是棲身之所。这一次，他在广州呆了整整5年，并从广州远足至日南（今越南顺化）、扶南（今柬埔寨南部）寻求丹砂——这是他祖父传下的家学，焉能不关心？

而这5年，广府的人文氛围、地理环境，对其道教神仙论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5年后，他回到故里，也曾任职，但已无心事仕，只潜心著述。

所著者，也就是流传到今的《抱朴子》内外篇。可以说，正是这5年的广州之旅，使他的思想趋于成熟——正是闻交趾多丹砂，他后来才求为交趾句漏令。途径广州，为刺史邓岳所挽留，于是便上了罗浮山炼丹，到终年。其间13年，“优游闲养，著述不辍”^⑪，也就是还在忙修改、补续他的《抱朴子》，并著有《全匮药方》与《肘后备急方》等医书。

巫医与道教，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道教求的是成仙与不死，也就是生存与享乐，那么，为了生存与享乐，对人寿、对健康，自是产生最大的关注。从葛洪的《抱朴子》卷三《对俗》中，我们当可悟此：

人道，当食甘旨，服轻暖，通阴阳，处官秩。耳目聪明，骨节坚强，颜色悦泽，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

处任意，寒温风湿不能伤，鬼神众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忧喜毁誉不为累，乃为贵耳。⑫

因此，其炼丹术与医术，也就浑然一体了。那个年代的思维便是如此。我们不能以今日的科学观念硬性把它分开。

而这种养生术、这种信仰乃到哲理，无疑也是得自于南方、尤其是广府人的精神气候。我们甚至可以从《庄子》、《楚辞》中找到其源头。

如《庄子》云：“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⑬

又如《楚辞》云：“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⑭

道教是十分重视炼气的，这在后世被视为“内丹”的精要，旨在“养气守静”。因此，我们不妨以气入手，来讨论葛洪的《抱朴子》。

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称：

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根竭枝繁，则青青去木矣。气疲欲胜，则精灵离身矣。⑮

这段话中，包括了中国哲学历来众多的命题，即有与无，形与神……等等。其重心在“不死”，而不死的先决条件则是形神不离，离便是死，合即为生。而形神相合，关键在于“气”，如果“气疲”，则神“离身矣”。他进而言之：

苟能令正气不衰，形神相卫，莫能伤也。⑯

葛洪之“气”，源自于两汉元气本原论。从其《内篇·至理》中所说的：“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承认元气为天地万物的最高本原，也就是两汉元气

论的基本观点：元气是宇宙的终极本原，天地万物由元气而化生。不过，在前边一段论述中，他则是把有与无、形与神这对哲学范畴结合了起来讨论，并以“气”予以统摄，无疑，这更具备了理论的形态。

葛洪认为，享受元气的多少、元气的特质不同，从而决定了天地万物各自的性质、功能、及其发展、繁衍。他说：“（人与物）受气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小者其竭速”，又说：“彼虽年老而受气本多，受气本多则伤损薄，伤损薄则易养……引虽年少受气本少，受气少则伤深，伤深则难救。”^⑮

由此，他走向了“受命应仙”的宿命论，称：“命之修短，实由所值，受气结胎，各有星宿。……命属生星，则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属死星，则其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则亦不自修其事也。”^⑯

好在他这“受气结胎”，不曾走向极端，还得看“信”与“求”。所以，有人问他：“古者岂有无所施行，而偶自长生者乎？”他是这么回答的：

无也，或随明师，积功累勤，便得赐以合成之药。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于世，言不累及俗，而记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阙如也。昔黄帝生而能言，役使百灵，可谓天授自然之体者也，犹复不能端坐而得道。……按神仙经，皆之黄帝及老子奉事大乙元君以受要诀，况乎不逮彼二君者，安得自有仙度者乎？未之闻也。^⑰

这里说的是，连黄帝那种天授自然之体，也须经过学习，方能度世得仙，不可能有自然而然就长生不死的。

其之学，观其要旨，在理论上，则在于“养气”与“补气”。

养气，则在于人要保养好所禀得的元气不致于受到损耗，这样，便可以无限延续生命下去。葛洪称：“故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要言也。”可见养气之重要。

但人的元气是不可能不被损耗的，所以，光“养气”是不够的，还需要“补气”才行。葛洪由此导向了他的“金丹”论。

五谷、草药乃人之日常服食者，当然有补气的作用，“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

于是，他便苦苦去追寻那“上品神药”。

他认定，金丹，便是这上品神药，为什么呢？请听他的说明：“夫金丹之为物，烧之念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①金丹之不变质，则证明其为气中的精髓，要固精保气，长生不死，那就得借助于金丹了。人在服用金丹后，自能回复到本源气那种绝对纯和的状态，本原是不死的，返回本原也就不死了，人便由此得道成仙了。

无疑，在这里，气本身已经被他（包括他的前人）从自然引伸出来，加以了神化。变得无所不在，无所不生、无所不能了。不妨再引用一段葛洪的话：

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吴越有禁咒方法，甚有明验，多气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气可以攘天灾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互石掷人，以火烧人屋舍。或形见往来，或但闻其声音、言语，而善禁者以气禁之，皆即绝，此是气可以禁鬼神也。②

这气，已成了至高无上的神了。或者说，他用气，构筑了一个神的世界。本来，他关于“养气”、“补气”之说，是可以走向生命哲学与自然哲学的，但他却在这生命哲学与自然哲学上走向了神学的迷狂。这自然无法苛求于他，人类的认识本身就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应当允许迷误。

从他如下描绘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亚热带热带自身带来的生命色彩——自然环境本身就在滋养着神话与不解的谜团，生命在这里太旺盛也太脆弱，莽莽山川皆是生命之杰作：

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②③}

又万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托人形。^{②④}

越人信巫、好淫祠（即所谓乱神，而不定于一尊），无疑也曲折反映在葛洪的神仙论中，这也与环境分不开。

伸葛洪的道教，在其哲学范畴上，却在两汉“气”的单一范畴为主，演变为多对范畴。从老庄的“气”，到西汉的元气论，再发展到葛洪《抱朴子内篇》中出现的有无、本末、形神、玄器、一多、质用、动静等成对范畴的本体论，这无疑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不可忽略的一步。在其《畅玄》、《论仙》、《寒难》、《道意》、《明本》诸篇中，可谓比比皆是。

关于天地生成、阴阳二气与动静关系，葛洪谓之“浑茫剖判，清浊以陈，或升而动，或降而静，彼天地犹不知所以然。”并进一步指出，动静之依据为道：“方者得之而静，员者得之而动”。

而玄与器这对范畴，则说的是：“玄之所在，其乐不穷，玄之所去，器弊神逝。……其唯玄道，可以为永。”^{②⑤}

至于本与末，则有用来区分本体界与现象界，认为道本无名，俗人不识其本，只注意其末，“俗人不能识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自然界也是如此，有本末之别，“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钩末乖，未可一也。”那么，在自然与名教上，葛洪也有其本末论，他提倡神仙养生与儒家纲常名教相结合，其《抱朴子》内外篇更是颇为典型的内圣外王学，内篇以个人为本位，乃为道，外篇的社会为本位，则为儒，既追求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安宁和谐，讲究人与

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归一，正与“内圣外王”的人格主张相吻。尽管他一再声言推重儒学，且有一部《抱朴子外篇》，但他却非纯儒。葛洪明确表示：

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②⑥

本末，也体现在其《抱朴子》内、外篇之分。道为本，作内篇，因为它是内在于个我的心性之中的；儒为末，作外篇，则在于它外在于我，于本我无可无不可。从这本末论出发，则“治国平天下”，并不与个人内心价值追求相一致，与个人内心情趣相符。所以，外者——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及实践，都是被迫的，不出自本心，那么，由此得到的功名，也就无关宏旨了。人，说到底，还是得按照自己内心的情趣，率性而行，这一来，个我才可能成为“我身在我者”，自在、自由、自主。

由此，他批评的锋芒，也就自然而然地指向了周公与孔子。他反对以圣人与五经的标准作参照，在《抱朴子内篇》中称，五经所未载入的，是无限的，周孔所没说到的更不少，很多知识在周孔处是找不到答案的，反而在一些非经典的书籍上还能求得，所以，不可以五经与周孔未说过便都以为虚妄。圣人与凡人的差距并不大，不吃饮一样肚饥，不喝水一样口渴，他们与常人不同的只在于才思远、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如果认为圣人不能而常人也不能，人所不知而常人亦不知，那就太可笑了。

这种反权威、反经典，主张以效验应证的“务实”，无疑也是南方的精神所系，纵然它最后被导向了神仙论。

《抱朴子》内篇，被视为第一部全面论述道教宗旨、哲理、仪式与方法的集大成之作，并形成其理论体系，是广府思想文化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之作。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从广府人的思想行为中发现它的影响，道教之盛，也正在珠江文化圈内为烈，《抱朴子》一书，仍为广府人所珍藏。从首篇《畅玄》至第20篇《祛惑》，将宇宙本体、人的本质、人的生活哲学、神仙之存在、

凡人升仙的可能、养气健身之法，金丹的炼制乃到斋醮程序，均作了详尽的论证与阐述。应当说，它表明了道教摆脱了巫术的原始形态、形成了哲理体系，并摆脱了依附老庄的状态，从而走向了独立与成熟。这正好《释凝》中所说：

《五千文》虽出老子，然皆泛论校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举，其事有可按据也。但暗诵此经而不得要道，直为徒劳耳，又况不及者乎？至于文子、庄子、关令尹喜之德，其属文华，虽祖述黄老，宪章玄虚，但演其大旨，永无至言。……其去神仙已亿千里矣，岂足耽玩哉。②⑦

于是，道教是为道教，道学是为道学，二者不再混为一谈了。

直到《隋书·经籍志》便说，道教“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

当有专门的论述，论及道教在南方、葛洪在罗浮山修炼使之成熟并定型，尤其是广府文化氛围所起的作用。这该是篇大文章。在这里，我们只能略述其在要了。

三、佛教思想在珠江流域的中国化进程

中国南北朝时代，也就是葛洪之后不算太久的时间，印度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问他的老师般若多罗尊者，即第二十七祖：“我该到什么国家去作佛事呢？”二十七祖告诉他，等我死后 67 年，你就到中国去，宣传禅旨，普渡众生。并鼓励他，说那里能获得真传妙旨的人数不胜数，且云在中国南方，“好有为功业，不见佛理，汝纵到彼，不可久留。”还送给达摩一诗偈：

路行跨水复逢羊，
独自栖栖暗渡江。

日下可怜双象马，
二株嫩桂久昌昌。⑧

“跨水”，即指达摩将渡海东行，“逢羊”，便是指到达羊城——也就是广州。可见，当年广州已在海外作为通商口岸负盛名，连其“羊城”的传说也都知道了。果然，偈语一一得到了应验，此番佛学西来，走的不是西域的陆路，而是渡过印度洋、太平洋，由水路抵达广州。梁武帝大通七年九月二十一日，达摩到达羊城，舍筏登陆，受到刺史萧昂欢迎。而今，广州下九路上还留有其登陆地的碑志。传说，在这之后，达摩作为禅学初祖，将印度禅学奥旨传给了中国高僧慧可——为二祖，慧可传给僧璨，下传道信，再下传弘忍，然后到了六祖慧能。正是这个慧能，方使其禅宗，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刻下了无法磨灭的深痕，占据了重要的一页。

而慧能，也正是在珠江流域，在广府人体养生息的这片风水宝地上，使禅宗极大地兴盛起来，因此，写广府思想文化，需浓墨重彩来写慧能。

当然，慧能之前，广州的佛教已经兴盛起来，亦出了若干著名的高僧。其间，有牟子、康僧会，应该提及。

关于牟子，尚有争论，一说他是苍梧太守牟子博，亦又说牟子并未任苍梧太守，牟子是否为牟子博，也就可疑了。但有一条是确凿无疑的，他是苍梧人，这是据其著作《理惑论·序》中得知的“先是时，牟子将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归苍梧娶妻。”其生卒年尚未可考，一般推论在东汉末年。其间，苍梧聚集过一批中原南下的学者，牟子与他们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他的著作便是为论争而写的。

作为中国较早传播佛学的著作，《理惑论》是以中国的道家思想，去阐释佛教的。可以说，佛教惟有借助中国的道学，才有其托缘滋生之地。“无”与“空”不同，却有相通之处，作为一

种外来文化思想观念，惟有在本地找契合点，才能获得生存并相互激活。平心而论，牟子讲的佛教，只是道家心目中的佛教，而非佛教自身，牟子在尽力使佛教解释成中国人新所接受的东西之际，殊不知自己并未领悟到佛学的真谛。

但他这么做，也表现出了广府人对外来思想文化历来所取的开放态度，无论是北方南下的，还是异域引进的，皆不取排斥的态度，尽管牟子力图使“修世事”的尧舜周孔与“无为志”的佛老彼此相容，今天看起来有点好笑，但他当时却是真诚的。他是这么说的：

尧舜周孔，修世事也；佛与老子，无为志也。仲尼栖栖，七十余国；许由闾禅，洗耳于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不溢其情，不淫其性，故其道为贵。在乎所用，何弃之有乎？

这种开放的心态，不厚此薄彼，不只取一种而排斥其他，允许有不同的选择与追求，这才使他从道学往佛教，铺设了一条桥梁，无论这条桥如何粗放，但总归是开了个头。

他极力调和道、甚至儒与佛之间的大差别。他解释佛的第三、四谛“天”与“道”——即“灭”为把摆脱苦痛的根本出路在于涅槃、静寂，进入因缘俱灭心相皆尽的精神境界；“道”则是为达到涅槃应取的修炼方法与途径——为“道之宫，导也，导人致于无为。”于是，道即为道谛，“致于无为”则是修道达到最高境界，也就把无为等同于灭谛了。这无疑是以老释佛，但是，把“涅槃”等同于“无为”，则牵强了。道家之无为，讲的是顺乎自然，反对主观努力与人为的社会规范，但不否定外界的客观存在主体的生命情调。而“涅槃”则不同。是曰：“以无明灭故，心无有起，以无起故，境界随灭；以因缘俱灭故，心相皆尽，名得涅槃。（《大乘起信论》），显然是要灭尽外的“相”与内的“心”，才可进入“涅槃”，在虚无主义道路上走得更彻底一些。

牟子还以中国的传统鬼神观，来解释佛的“灵魂不灭”；更把佛教的捐宗财、弃妻子，说成为“让之至”，亦合乎中国礼教……也难为他一番巧辩的了，这里也就不一一评述。总之，牟子的过渡作用，在广东思想文化发展中是应当看到的。

康僧会，应当说，他比牟子要往前多走了几步。他与牟子同时代，自小生活于交趾，因此，深受广府文化的影响。他在《安般守意经序》中讲到出家学佛的经历：“余生未踪，始能负薪，考妣殂落，三师凋丧，仰瞻云日，悲无质受，眷言顾之，潸然出涕。宿梯未没，会见南阳韩林，颖川皮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执德弘正、烝烝进进，志道不倦。余从之请问，规同矩合，义无乖异。陈慧注义，余助斟酌，非师不传，不敢自由也。”

他一生除注《安般守意经》外，还注有《法镜》、《道树》等经，并作经序。另外还编译有《六度集经》。在每一“度”的经文之前他都加了一段提要，由此表现出了他的思想倾向。

《安般守意经》云“安般，即梵语数息观，通过坐禅来“正心”、“摄心还念”，正是由此出发，康僧会达到了佛教的高度，他称：“夫心者，众法之源，臧否之根，同出异名，祸福分流。”^{②⑨}心则为万有之本原，正心，便可“专心涤垢，神与道俱”，进入佛境，这便引出了佛心即“万法之源”，而非中国哲学中的心了。进一步，他又说，“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祸福所趣”，“识与元气，微妙难睹，无形系发，孰能获把？然某释故稟新，终始无穷矣。”^{③⑩}他从“元气”出发，达到了“灵魂不死”轮回转世，这便又是佛教的观点了。只是，他巧妙的把两汉的元气论掺和其中。

他进一步把“众生得救”作为个体解说的前提，以表述“度世”的思想：“忧愍众生，长夜沸海，洄流轮转，毒加无救，菩萨忧之，犹至孝之丧亲矣。若夫济众生之路，前有汤火之难，刃

毒之害，投射危命，喜济众难。”③①

在康僧会之后，约400余年，也就是到了唐代，便在珠江文化区域中出了惠能，惠能原籍范阳（今河北定兴），其父因罪贬南海新州，即今天的广东新兴县，入籍新兴，惠能也就生于新兴。三岁时，父亡，“父既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屡空，业无腴产。能负薪矣，日售荷担。”③②当上了樵夫，一日负薪上市，听人诵《金刚经》，突然“心明便悟”，上曲江，到乐昌，探寻诸佛妙理，最后跪到黄梅冯墓山去礼拜五祖弘忍，以“佛性无南北”③③使弘忍觉其“根性大利”，收作踏碓的行者。8个月后，弘忍用呈偈的方式传授衣钵时，他便脱颖而出。弘忍的大弟子神秀踌躇满志，作偈称“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无疑，此偈体现出了禅学“戒——定——慧”的禅定工夫，表明了佛教对于世界的理解及对解脱方式的理解。谁知，惠能却认为神秀未见佛的本性，于是写下另外两首偈语：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静、何处染尘埃。

弘忍遂觉惠能才是真正的彻悟，于是“夜至三更”，把惠能召至堂内，传给《金刚经》妙旨，并宣布把衣钵传给他，即令他回广东。

可以说，这两首偈语，正式奠定了中国禅宗的开创根基，它抛弃了禅学的“戒——定”两阶段，认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可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即指人的本心便为一切，本是清净的，无所谓污染与否，只要直指本心，便可顿悟成佛。

由此，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发，来研究一下惠能的思想以及他所创立的中国禅宗。

首先，是他的“梵我合一”，或“心即真如”的本体论，他回到广东，“至广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风吹幡

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慧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众骇然。”^{③④}众所周知，在《大般涅槃经》中，佛性，作为佛的本性，对于众生来说是具有客观精神的意义的。而“一切众生，悉有佛性”，是指客观绝对精神内在化于众生的结果。在传统佛教观念中，“佛”、“佛性”、“佛法”、“净土”等，均是用来描述、把握外在于人、人心、人性、人境的宇宙最高支配者、宇宙本体、宇宙真实存在这一类物体的，也就是在人的“此在”之外的另一个神的彼岸世界。所以，要修行成佛，就得超越自我、超越“此在”，方可到达彼岸。但在惠能，却把佛、佛性、佛法、净土直接说成是每个人的自心，求佛只能向自己的心性中求：

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心中顿见真如。^{③⑤}

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③⑥}

一念吾若平，即众生自佛，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③⑦}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

这类语录还有很多，就只引这几条就够了。

惠能把心视为本体，心外别无本体，从而把个我的主体意识，提升为本体的无限自我意识，缩短或者索性取消了自我意识的循环中主体与本体相互冥合的路途。所以，惠能的成佛、证真如，解脱等，就不再是追求另一个遥远彼岸世界，而在于了彻现实世界（“本地风光：禅宗术语）所依存的自体，即人人所具有现实的自我意识自身。所以，佛性不可向外求。为此，禅宗认为：

此“本源清净心”，常自圆明遍照。世人不悟，只认见闻觉知为心，为见闻觉知所覆，所以不睹精明“本体”。但直下无心，“本体”自现。……不可将心更求于

心，历千万劫，终无得日；不如当下无心，便是本法。

⑳

正因为佛即心，那么，求佛毋须苦苦修行，而在于心了。惠能以其“心即是佛”、“无心之心”，为他的“亲证顿悟”的成佛方法打下了理论基础，所以，他便又进一步提炼了“顿悟成佛”的方法论。

长期以来，宗教的“成佛”与哲理上的“使主体与本体直接冥合”，始终是佛教各宗争论不已的问题。而从惠能来看，只要从“心即是佛”出发，这就不成什么问题了。“见自性自静，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也就是说，只要本性清静，“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便可以“自作自成佛道”了。亦即“一念相应，便成正觉”。

惠能的弟子神会，说得很明白：

迷，即累劫，悟，即须臾。……譬如一缗之丝，其数无量，若会为绳，置于木上，利剑一斩，一时俱断，丝数虽多，不胜一剑。发菩提心人，亦复如是。若遇真正善知识以为方便，直示真如，用“金刚慧”断诸位烦恼，豁然晓悟。……证明之时，万缘俱绝，恒沙妄念，一时顿尽。㉑

这种“豁然晓悟”，也就是禅宗的“顿悟”了，它是不可言传的，只能“亲证”、“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一种“默契”、“默照”，或如禅宗的公案，借助于形象思维，或用诗名来作象征说明。

惠能依此，对以往修行的“定——戒——慧”三字作出了新的阐释，“秀和尚言戒定惠，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惠。”进一步称：“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定，心地无痴自性慧”。㉒把先前的外在之戒，与自控之定、求知之慧，全放在了“心”，所以，戒、定、慧只能用来劝谕“小根智人”，而“上人”，则“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般若观照，常离法

相，有何可立。④”因此，只要“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⑤”如前所述，取消了此岸世界至彼岸世界漫长的路途。

这一来，“上上根器”的“聪明”人，一旦接受了禅宗的教义，便可“应机接物”，人还是人，境还是境，“人境俱不夺”，从而顿悟成佛，在这个现实亦即彼岸的世界成为了一个逍遥自在的“解脱人”。从顿悟成佛到“人境俱不夺”，便到了最后的归宿，也就是最高境界了。

惠能在这个理论上，又进一步指出“凡夫即佛”：

凡人即佛，烦恼即菩提。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前念著境，即烦恼；后念离境，即菩提。

他的弟子及后继更称：

未悟来解时，名贪嗔；悟了，唤作佛慧。故云：不异旧时人，异旧日行履处。

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路，未曾踏着一片地。与么时，无人我等相，终日不离一切事，不被诸境惑，名“自在人”；念念不见一切相，安然端坐，任运不拘，名“解脱”。

于是，小根智人与“上人”，凡夫与佛，其间区别，无非仅仅是“一念之差”罢了。而此在的苦难世界与彼岸的佛家乐土，仅在咫尺之间。“修心成佛”进入天国的人场券的兑现，不是遥遥无期，而是立在眼前。

惠能就这样以顿悟，打破了在世与出世、凡夫与佛、在家与出家、俗世界与佛世界或此岸与彼岸的分隔。“成佛”之后，哪怕一切依旧，人境俱不夺，但你却已“解脱”而成了“自由人”。

禅宗甚至可以“呵佛骂祖”，其一支派临济宗甚至说：“你欲得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⑥当然，其根本的意思，是在于取消一切认识对象（如佛、

菩萨等)，再取消一切关于对象的认识，做到“人境俱夺”，摆脱一切“见闻觉知”，从而达到纯粹自我直观的顿悟，这才可以达到“人境俱不夺”的至境。

惠能之所以在广府真正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与广府文化的世俗性是分不开的。从上面可以看到，由天国拉至此在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世俗化的过程。另外，广府人重感性、轻理性、重直观、轻思辨，无疑也是惠能作为一字不识继承人，凭个人体悟、直觉去把握与发挥佛教的基本精神的依据。而广府人的非正统性、非规范性文化，更使他敢于“离经叛道”，变渐修渐悟而“呵佛骂祖”达到顿悟。可以说，惠能改造与革新佛教，正是处于广府文化这特定的大背景下完成的，也是从广府人自身的特殊条件出发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作了又一大的推进。

法国美学大师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相当精辟地说明了精神流变的问题：

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哪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

思想流派也是如此。文化地理加精神气候或即黑格尔所称的“时代精神”，决定了禅宗只可能在唐末、在南方——亟而言之，在广府——才得以生发开来，易地易时，便没了生长的可能。作为惠能的南宗，其终于“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也正得自南方唐末的精神气候。一时间，各地知识僧侣纷纷南下求教惠能，以得“心法”。广府也就成了禅宗南宗传播的根据地并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据史载，惠能法嗣 43 人，明确于广府文化圈内的就有法海、志道、印宗、令韬、定真、吴头陀、法真、韦璩 9 人，其中广州就 4 人，罗浮山、曲江、韶州 5 人。广府之佛教由此兴盛，并构成广府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引，惠能在广府思想文化进一步的开发推进上，起到了重

大的作用，留下了潇洒的一笔，对以后的广府人、以及被谪至广府的思想家、文学家等，都产生了不可抹煞的重大影响。尤其是其弟子神会北上京师传播南宗，更对整个中国佛教、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作为广府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思想文化成果，不仅仅属于广府，属于岭南，更属于整个中国。

第二节 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及其代表人物

一、近代思想文化的“龙头”

1974年底，在广州中山四路发现了一个秦汉造船工场遗址，内有船台三个，各长88米，足可造宽6—8米，长30米，载重达50到60吨的木船。再看南粤王赵昧墓出土的船模之精致，去印证《南越志》上所载的“越王造大舟”的说法，便可以论定，早在汉代，海外交通便已在广州开始，并有一定规模了——这也是广府文化具有海洋文化色彩的重要例证。

尤其是汉代以后，岭南对外口岸定点到了广州，史籍上已有了以广州为目的地的海舶记录，以及南海诸国至广州里程与方位的明确记载。南朝时来广州开展商业贸易的海舶数量更是空前。到了隋唐，就更加兴旺了，其船的远征里程，远达波斯湾，因其过重须在深水港口罗夫港泊位。到了宋代，已有了可容千人的“木兰舟”，并用上了指南针定位。元代造船业更为宏大，船帆多可达12张，橹大者须20人方能摇动。中印之间的海上运输，大部分由中国人经营，船上还可以预购来回票。

明清间，广东商品经济更获长足发展，明初虽曾有海禁，但仍封锁不住，待取消海禁，便一发不可收了。清代也有由禁到“开海贸易”的变化，但广州始终是得天独厚，甚至一度作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广州一千多年来便是扬名于世界的商埠。

这是对外。

而对内，广东帮商人早已声名赫赫，明清之际，浙商、徽商、晋商、闽商，亦争相“走广”^④。不仅广州，整个珠江三角洲——即广府文化中心地带，便早已成了商品性农业区，农业生产结构有了很大变化，相当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或从事手工业

——这也是海洋文化作为商业文明的特征。

因此，近代以来，广府文化圈始终是我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广府的中心地带，基本上也就是商业性的市井社会，这与它古代以来的世俗化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广府的思想文化，也就自古代以来，愈来愈深地烙上了商业精神的印迹，更有别于中原文化。因此，当我们把握近代，或者古代中后期以来的广府思想文化的特征，除开前述开放性与世俗化之外，还应加上一条，这就是它的商业精神。

尤其是近代，作为客家人，但长期生活在广府人中，加上在香港多年，洪仁玕最早提出带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纲领《资政新篇》；郑观应更有其商战理论，倡言发展商办企业；康梁提出维新变法；孙中山更发动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些，都可以说是在近代的商业精神激发下才能产生的。于是，在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进程中，广府人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走在了前面，令举世瞩目。前有康梁变法、后有辛亥革命。沿至当今，则改革开放和建立经济特区先行一步的省区，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龙头”。显然是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的。

追溯这一历史演变，有必要突出近代广府思想文化中渐渐凸现的重商性及随之产生的种种新观念，如平等观、民主观、人权观等等。这便抓住了广府思想文化的“龙头”。如同抓住早期广府思想文化中的道教与禅宗一样。

为此，在这里，须跳过去或略去若干历史人物不提，而提到的，也可能只侧重于一面而不面面俱到。

我们从明代前中期的丘濬讲起。他曾被称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在主持国家大政之际，对国计民生的经济问题，颇有建树，算得上一个从济世安民、进而研究现实的思想家，在理论上亦有创见。

丘濬是明琼山府下田村（今海南琼山县府城乡）人。生于明

成祖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卒于明孝宗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年76岁。他少年丧父，由母李氏教导读书，“虽三教百家之言、无不涉猎”^{④⑤}。自述“凡天下户口、边举、兵马、盐铁之事，无不究诸心意。”^{④⑥}故“举乡试第一”，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成进士，改应吉士，授编修，由是“见闻盖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④⑦}二十六年后，被加封礼部侍郎，掌管国子监，著《大学衍义补》160卷，以补宋真德秀《大学衍义》之不足。在这部《大学衍义补》中，他提出了财用为立国之本、食货为生民之本，得民心为君之本的经世致用思想。

丘濬认为，一国的强弱与财政的好坏关系极大，财政的收支与盈亏，关系到“一国之贫富，民之休戚，兵之强弱，世之治乱”，是“人君治世”、“大臣经国”的首要任务。^{④⑧}

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在“以农为本”的中国，重视农业生产是理所当然的。但丘濬家在海南、读书亦在南方，耳濡目染的，却是东南沿海日趋发达的商业贸易，商品口多，市场繁荣，所以，其对商业的认识，就不同于历代当政者，故力主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不可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他认为，“民之于食货，有此者无彼”，那么，就得上市场交换，“因此”，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中，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从这段话来看，他对商品交换与市场功能，已有了较开放的认识。

交易中，须有货币的媒介。对货币，丘濬作了一番历史考察，认为其最初是“日中为市，使民交易，以通其有无”，经过“以物易物”的阶段。后来，交换扩大了，市场上不能要什么有什么，“物不常有，故有货币之设焉”。^{④⑩}基本讲清了货币产生的原因。他进而认识到，货币价值须与交换物价值相等，“必物与币两相当值而无轻重悬绝之偏，然后可以久行而无弊。”在当时，能达到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对商品价值，丘濬的观点已接近了现代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论点了。他认为，商品虽然“生于生地，然皆必资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其体有大小精细，其功力有深浅，其价有多少。”^{⑤①}这种看劳动力多少来确认商品价值的观点，在此可以说表述得相当明确了。

他进一步提出，民财即民心，搜刮民财必失民心。造福民众，民富则国强，而祸民必终祸国：

盖财者民之心，得其财则失其心。^{⑤②}

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税敛，宽力役，以为民造福，民之享福，则国之享福也。彼昏暴之君，视民如草芥，凡所以祸者，无所不至。民既受祸矣，国亦从之，无国则无君矣。^{⑤③}

丘濬被后人称之为“经济理学，兼而有之”，当非虚词。

在广府文化中，相当有名气的，还应推陈白沙开创的江门学派。这一学派，在中国明代思想文化史上都是很有地位的。黄宗羲就曾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⑤④}而在明初为程朱垄断的思想文化界，可谓死水一潭，到了陈白沙及王守仁，才打破其凝滞、僵化的局面，开创出一代新风。

陈白沙，实名为陈献章，因居靠江门的白沙村，才是此名。他与丘濬差不多同时代，生于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卒于孝宗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享年73岁。生于广东新会都会村。身后其著述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早年，勤读苦学圣贤书，但从程朱中一无所得，则从静坐中寻求自得，这才在思想方法上突破了程朱的藩篱。如他自称，久读而不得，“久之乃叹曰：夫学贵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也。”^{⑤⑤}这就逐步形成了他“学贵乎自得”和“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体系，成为独树一帜的江门学派。

这一学派，倡导较自由开放的学风，即是得自广府文化的真传。

陈白沙力主做学问须有“知疑”的勇气：

学贵知疑，小疑则不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章初学时亦是如此，更无别法也。凡学皆然，不止学诗即此。⑤⑥

他的主张中，当然有禅宗的余痕，为主“求之吾心”，但这是指大胆怀疑，独立思考：

夫子之学，非后世人所谓学。后之学者，记诵而已耳，词章而已耳。……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

今是编也，采诸儒行之迹与其论著之言，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⑤⑦

以上为“学贵自得”，但不仅到此而止，进而在独立思考之后，有自己的见解，还需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一个没有独立品格的人，学问上也难有卓见。例如，他对彭韶被调黔时曾作如下赠言：

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变一也，富贵贫贱、夷狄患难一也，而无以动其心，是曰“自得”。自得者，不累于外，不累于耳目，不累于一切，鸢飞鱼跃在我。知此者谓之善，不知此者虽学无益也。⑤⑧

这里，有“鸢飞鱼跃在我”，这是他在诗文中好用之词，水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这也是广府人开放心态的写照，更是对自然生态的深刻感受。所以，陈白沙之治学的思想境界，总给人以自由奔放、驰骋海空的旷达感，由此，引出他另一“以自然为宗”的思想主张。

他对此是如此描绘的：

有学之学，有觉无觉。千金一瓠，万金一诺。……
天命流行，真机活泼。水到渠成，鸢飞鱼跃。得山莫
杖，临济莫渴。万化自然，太虚何说？绣罗一方，金针
谁掇。⑤9

这是他写给学生的诗，为的是作治学的启迪。不妨再读他的
另一首以阐发“以静应变，万化自然”的七律：

江云欲变三山色，江水初交十日秋。

凉夜一蓑摇船去，满身明月大江流。⑥0

梁启超曾评述道：“白沙心境与自然契合，一点不费劲，
……常常脱离尘俗，与大自然一致，其自处永远是一种鸢飞鱼
跃、光风霁月的景象。”⑥1

细细读来，其要契合“自然”，旨在求诸于心，依靠人心的
自得，仍立足于反对人云亦云，倡导独立思考，不妨再录几段
诗：

后儒不省事，差失毫厘间。寄语了心人，素琴本无弦。

千卷万卷书，全功归在我。吾心内自得，糟粕安用那。

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后焉⑥2。

后一首，更是告诫学生，哪怕是作为老师我说的一切，也不
可盲目听从，要有自己的头脑。由此，他常常同朋友、学生的讨
论问题，决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够得上学术民主了。

陈白沙还是个爱国诗人、民族志士，他还与陶鲁等人创建大
忠祠，为宋末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人立
祀，且留有《凭吊厓门》一诗，歌颂为国死难的英雄，指斥卖国
的叛贼，充满了民族正气，因篇幅有限这里就不引了。

陈白沙弟子不少，如林光、张翎等，颇有造诣的算是所赠诗
与之的湛甘泉，并由他广收门生弟子，遂成为一个学派。他师承
白沙的治学思想与学风，倡导贵疑、重思以寻求自得：

或问学何贵？甘泉子曰：学贵疑，疑斯辨，辨斯得矣。故学也者，觉此者也。

夫学而知所疑也，学之进也。如行路然，行而后见多岐，见多岐而后择所从，知择所从者，进乎行者也。

⑬

他较之白沙往前走了一步，是力主学以致用，不满当时“有是内非外，重心略事之病。”

吾儒学要有用，自综理学务，至于兵农钱谷水利马政之类，无一不是性分内事，皆有至理，处处皆是格物工夫，以此涵养成就，他日用世，凿凿可行。⑭

南方的务实精神又再度在他身上体现。

由于洪甘泉等弟子遍及广府以及外省，以至“天下莫不知有白沙先生。”

在陈白沙去世的十六世纪，便有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广东，并获准建教堂与传教，为中西文化交流开创了新局面，其最早受影响的，自是广府，后来康有为从经学转向实测之学的启蒙，正是得益于他翻译的《几何原本》。加上商业交往，由于康熙平定台湾后大开海禁，建立广东等四大海关，更推动了这一文化交流。

而“西学东渐”，应是由广东的思想家们首先开导的。中西文化的碰撞、激活与交融，从而在广府形成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新思想、新观念，便是近代广府思想文化更新的开端，这也与它历来的开放性、世俗化及重商色彩息息相关，由是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策源地，富有开拓性、创新性与改革性，在全国开风气之先。当年，康有为的学生欧榘甲便作过如下的描述：

一曰人才出众：广东通商最早，风气最开，其能通外事而知内情者，所在而有。故自有洋务以来，其变国政之形式者，若开平矿务局、招商局、制造局等事；变

国民之精神者，若开报馆、开学堂、开学会、开国会等等，无不起于广东人之手。……此人才之超于各省者也。一日财力雄厚，广东以财雄闻于天下，中外所公认也。一日地方握要。……外国文明输入中国者，以广东为始，东西洋轮之年必经。……一日户口之繁殖。⑤⑤

可以说，这一段广府思想文化的发展，不仅称得上是自身发展史中的华彩乐段，而且称得上是整个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华彩乐段。

而梁启超的概括，则更为深刻：

广东人旅居外国者最多，皆习见他邦国势之强，政治之美，相形见绌，义愤自生。

广东之商可用，广东之长在富而通。⑤⑥

广东言西学最早，其民习于西人游，故不恶之，亦不畏之。⑤⑦

因此，“欲验中国人之果有爱国之心与否，当于广东人之验也。”⑤⑧

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近代三大革命运动，皆发生于广东或由广府人所领导，也就可以看出广府思想文化在近代的巨大影响与作用了。

这一节，先讲太平天国，不在其历史，而立足以理出其思想脉终。

首先，以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为思想材料，无疑，它反映了近代农民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要求，有“耕者有其田”的民主主义思想了。洪秀全早期的男女平等主张，反对“君王私自专”的激进口号，亦如是。

及至洪仁玕，这位在香港呆了多年的天王族弟，在太平天国后期抵达天京，受命支持天国大政，则在思想史上有更多的建树。他写的《资政新编》，主张学习西制，惜未推行。他会见留

美学生容闳，商谈改革太平天国内政，……种种，均不同凡响。

在《资政新编》中，他开宗明义，称“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这比当时魏源等启蒙思想家主张的“变器不变道”更走出了一大步，要“以资为政”，把这作为“立国之本”。

他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措施：兴车马、舟楫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宝藏，开发各类矿产，兴邮产、兴各省新闻官、兴省郡县钱国谷库、兴市镇公司、施行工商水陆关税之法，兴士民公会……等等，我们不难看出，这比在他之后才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更要先进，不仅是“变器”，而是“变法”、“变制”，在社会变革中迈出一大步。

他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命题，允许“富民”从事商业经营与矿业开发，并从事近代的金融业，以达到“与番人并雄”、“奋为中地倡”。他反对外国侵略，也反对中国传统的外夷观，“凡外国人技艺精巧，国法宏深，宜先许其通商。”他清醒地看到，不学习西方立法制度上的“体”是不可以改造一个积弱的落后中国。

其时，能认识到“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从而导改对几千攬中国“人治”的怀疑，这已是相当“超前”了；他猛烈地抨击封建专制，非偶像、反迷信，反对神权统治；对礼法名教、旧仪习俗，也都一一加以了揭露，从而引进了不少新的政治观念。这也是他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结果。如他所说：

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
极深思索。

依《资政新编》，当可对太平天国作一番全面的民主启蒙式的改造。

纵观中国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大过程，当是先器用，再变法

改制，后思想文化，大致分三步走。而在洪仁玕之后，“洋务派”仍坚持的是“中体西用”，比洪仁玕还要滞后。可惜，由于太平天国后期的腐败，洪仁玕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他自己也以身殉国了，他这些似乎是“超前”的主张，便又“沉没”下去了，几乎又再等了半个世纪。

他施政之际，常叹息“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从而形成“革之而民不愿，兴亡而民不从”的局面，饮恨终天。

二、“官商”与“民商”对立的激溅出的思想火花

重新审视广府思想文化近代的历史进程，我们务必在此提出或者说作出一个新的结论，决不能因袭业已有过的观点。

过去的观点总是认为，随着西学东渐，在中国，由汉族督抚集团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揭开了“洋务运动”的序幕，虽说对广东的官办工业影响较晚，但对广东的通商、文化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依据是，广州亦仿京师同文馆办了个广方言馆，张之洞在广州办了炼铁厂，广东水师学堂，广东陆师学堂并设立广雅书院，出版广雅丛书……等等。

然而，提出这一观点的，没有看到，广东近代的经济发展与思想文化的演变，恰恰是与官办的“洋务运动”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它不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依仗过去的宗法关系、权力意志而得以兴盛。恰恰相反，它是自下而上，形成自己的民族资本主义，与官方恰恰相颞颥的。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两种发展对立的痕迹。

无疑，在北方，在封建宗法关系十分稳固的地方，洋务派采取“官办”、“官督商办”或若干“官商合办”的形式搞工矿业，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刺激与倡导作用，但其负面效应却更为严重——这就是严重的阻碍了自己发展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这种

负面效应，在较早通商开禁，得风气之先的广东，就更加明显与更为严重了。于是，在广东，便造成了“时艰蒿目，目切杞忧”的局面，引起了广泛的抗议。

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很明显地分为了两条路线。一条是官商，另一条是民商，或可以说，一条是官僚资本主义，打着很深的封建专制烙印；一条则是民族资本主义，带有自由资本主义色彩。无疑，洋务运动是属于前者，而在广东发展走的资本主义，则少有官府的背景，是广府人自己积累走资金，包括被“卖猪仔”，下南洋开矿、做生意而挣来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节较详细地作出例举。

因此，作为民商或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人物，从一开始就对“洋务运动”及其官商经营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如何启、胡礼垣在《新政论议》（指洋务新政）中指出：

富国者莫先于利民，利民者莫先于便民，民得其便，则向之农田，以十亩为率者，今且从事于百亩也。向之作贾，以千员为志者，今且相期以万员也，而矿务不难于崛起，机局不难于竞起，铁路不难于网布，货物不难于丰饶。⑥⑨

其立足于“民”而非“官”，遂指出“官督商办而为办法之不善”：

官有权而民无权，官有势而民无势，以无权者与有权者竞，则有权者胜，无权者负矣；以无势者而与有势者争，则有势者得而无势者失矣。⑦⑩

官借权与势压民，民又怎可与官竞争，因此，是必坚决革除这一妨碍民的发展的政策。这实际上是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而大声疾呼，也代表了广府思想文化的真正走向。

可以说，这是广府思想文化近代进程的第一阶段，以摆脱、抵制洋务派观念为其主要的标志，又一次显示了“南气”。

随后，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近代维新派，发起了影响全国、震惊中外的改良主义启蒙运动，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慈禧太后在镇压了戊戌变法后也不得不祭起变法的旗号。这是近代广府思想文化的一个峰巅，也是其第二个重要阶段。

戊戌变法失败宣告了“君主立宪”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改良派出现了大分化。而代表民商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孙中山、朱执信等则由此崛起，开创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其民主革命的学说，则构成了广府思想文化近代发展过程中第三阶段的重要篇章，直至爆发最后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

近代这三个阶段广府思想文化的发展，其大背景是中华民族屡遭外侮、种种政治、经济与文化危机、西方文化以不同方式渗入、封建帝国气息奄奄……这是横向的剖析。而从纵向研析，我们更不难看到，广府思想文化历来的各大特征，如开放性、世俗性、重商性等，也在染上近代色彩之际，有了新的发展并扩充其内在的涵义。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近代广府的思想家如此积极地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学说，认真学习其自然科学知识，并以此去摧毁清朝封建黑暗统治。也没有近代任何一个思想家，如广府的思想家一样，如此重视现实与民间的一切，大声为真正的“民”——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民商或民族资产阶级呼吁，反对闭关锁国与乡村小农经济的落后经济形态，体现出市民社会的民主、平等精神；更没有哪位思想家，如广府所有近代的思想家一样，如此浓笔重彩地去宣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重大社会意义与历史意义，其重商主义最早得到确立并形成一大思潮。

这三条，可以说是沿袭过去广府思想文化的传统。但更应当说，是到了近代，这三个特征才更为显著，熊熊燃烧起来——作为海洋文明的积极因素，这才充分地体现了出来，而不似过去那

么受压制，被视为异端。从此，广府思想文化赢得了勃勃的生机，有史以来，第一次向中国内地产生了巨大的辐射，远胜过当日六祖慧能创立的禅宗。在广府近代思想文化学者中，首开风气的则有“九江先生”朱次琦与“东塾先生”陈澧，两人分别是南海人与番禺人，他们被誉为开近代先河的务本开新思想家。他们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风，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儒学走向近代的社会过渡，在其弟子康有为及后继者中留下很深的影响，且能持发展与进化的观点看问题，致力于百年树人。故不能漏掉记他们的这一笔。

而后，在对太平天国思想开拓方面，洪仁玕也应该再说几句，虽然他是客家人，但在他而言，则是最早涉猎西方政治与经济文明的思想家，他的《资政新编》代表了中国近代化最早构思的一种理想，揭开了近代中国中西文化互补的大幕，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思想的檄文，这与他多年生活在香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思想文化有一定的认识是分不开的。

在太平天国失败之后，广府人仍前仆后继，坚持不懈地寻求解决民族危机、改造中国的真理，由此产生了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思想家，为全中国所瞩目，广府文化保持着近代中国的思想“龙头”的地位。容闳亲率学子远渡重洋留学求教，并致力于传播西学，写下著名的《西学东渐记》；何启、胡礼垣批判了洋务思想，以《新政真诠》较完整地提出了以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来改造中国的方案，要求全面在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郑观应《盛世危言》阐述了维新思想，并且提出了发展工商业、推进现代商战的重商主义学说；而康有为、梁启超则把思想启蒙实实在在转化为维新变法，……由此，形成了自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在广府产生从而遍及全国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运动，为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揭起一面大纛！

容闳，号纯甫，香山南屏镇人，生于1828年，卒于1912

年，年 84 岁。早年丧父，母送其人私塾读书，后自愿报名随香港玛礼逊学校校长赴美留学，不久便进了著名的耶鲁大学，决心“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①。”遂归国组织学子出洋留学。

他到过天京，曾为太平天国提出改革方案，未果。后应曾国藩之邀筹办江南制造局，提出创办机械工业。随后着手从事派遣留学生的计划。1872 年夏，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南人十居八九。”这是中国前所未有的创举。可惜，他惨淡经营了 13 年，竟被清政府一纸文令中止了继续派遣留学生之举。但这毕竟是不可阻止的历史潮流。容闳一再指出，中西文化之别“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之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忘也。”^②

他的《西学东渐记》记叙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反映出了西方文化“东渐”的艰难历程。他活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为之欢欣鼓舞，可惜没几个月便病逝了。

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向洋务运动提出质疑，并有力地批驳了洋务派“中体西用”主张，指出中国不可再走洋务派师西学长技之路而不西方建设近代化模式，应当从政体上作根本改革，把资本主义的体用均在中国统一起来的，则是南海人何启与三水人胡礼垣。他们的主要观点，都写在苦心修撰达 13 年之久的《新政真论》上。正是从他们开始，表现出广府人锐意变革、振兴中华的勇气，与“洋务派”自上而下变末保本的路线划清了界限。是冲天，而不是补天。

何启生于 1858 年，卒于 1914 年，字迪之，号沃生，出生在香港。早年留学西方，后是香港大学的创办人之一。1887 年，便已发表《中国之睡与醒——与曾侯商榷》的英文论文，批驳曾国藩之子曾纪泽的中体西用观，因而声誉鹊起。1895 年又发表《新政论议》。同年，参与孙中山香港“兴中会”的活动，负责起

草对外宣言。

胡礼垣生于1847年，卒于1916年，字荣懋，号翼南，出生于侨南家庭，生活于香港，就读于皇仁书院，创办《粤报》、译《英例全书》。从1887至1900年间，与何启一道，或单独署名，发表了《新政始基》、《康说书后》、《劝学篇书后》与《新政变通》等论文、论著，其影响之大，不仅遍及中华，还到了海外。

在对洋务新政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之际，《新政真诠》中提出，务必同步进行政治上的变革，方可保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政”，实际上已是初步的民权方案。他们从“天赋人权”观出发，提出“天下之权，惟民是主”——“政者民之得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事即属于民，则君之属于民。”^{⑦③}；因之设计出了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政者民之事，而民不能自办其事，故举一人以为君；君者政之司，而君不能尽之为司，故立官员而行政。”^{⑦④}更强调学习西方政体，西学为救世之用，“惟其愈欲救时，是以愈求西学，惟其愈深西学，是以愈能救时。”^{⑦⑤}

他们提出了“体用一致”的新论，以否定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本来者，事之终始也，指一事之全者而言”、“体用者，身之全量也，指一身之完者而言”，所以，“本末有先后而无不同也”，“体用有内外而无不同也。”也就从理论上阐明了体用、本末不可割裂的统一性、摧毁洋务派本末、体用的分离观，具体来说，就是不应只学西方的长技，也要学西法的全体，这才是真正的富强之路。

为此，他们提出了体用一致、同步改革的构想，其“体”即改革封建官僚体制以拥护变法，实行新政为任人标准，“择日揆以协同寅”；高薪养廉，厚官禄以清贿赂；改革科举选择人才，“废捐纳以重名器”，兴办学校、培养真才；还有“行选举以同好恶”、“开议院以布公平”等七项——都几近西方的议会制了。

其“用”则有“开铁路以振百为”、“广轮船以兴商务”、“作度务以阜民财”、“册户口以严捕逮”、“分职守以厘庶绩”、“作陆兵以保疆土”、“复水军以护商民”、“理国课以裕度支”、“宏日报以广言路”等九项。

而九项“用”的核心，便是经济改革与振兴图强。但“欲行九事于后，必先行七事于前；能行七事于前，必能行九事于后”，也就是说，没有“体”的根本变革，“用”是不可能奏效的，关键在于“体”上，二者相互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这一见识，至今，仍在很多当代中国人之上，体用之辩，到现在仍未曾结束。何、胡当时就认为，只有体变，用才可以行，中国方能“易老为安、转祸为福”，若能先富民，方可后富国。

在当时，何胡的主张，是很有远见卓识的。

与他们同时代的郑观应，更进一步提出了“富民之道”，就在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并且阐述了他的重商思想与商战理论。

郑观应生于1842年，卒于1922年，本名官应，字正翔。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17岁，即弃学从商，进沪宝顺洋行，开始了一生中的买办生涯。后从事教育工作，著有《救时揭要》、《易言》与《盛世危言》等书。

在《救时揭要》中，他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痛斥殖民主义者拐卖华工“猪仔”的罪恶行径，要求“设领事官”以保障华人贸易与利益。

他剖析造船业“官造”而非“民造”的流弊，指出“富民之道”在于“改官造为商造”。^②光只知造船，只是得“泰西之长技”，而不知该由民造、商造，便是“不知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原”。换句话说，民商，才是“大旨本原”，只有走民族资本主义的道路，方可以“致强”、“致富”。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官造只会流弊不已，中国还是在老路上愈来愈穷与弱。

这与洋务派力主“官办”是相对立的。

郑观应还在《易言》中，以大量的篇幅，谈了他对在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构想，西方之所以能侵略中国，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中国要富强起来，也得走西方资本主义富强之路。而洋务派“但学西人之制器，而不学西人之理财”，是实现不了富国强兵的梦想。

在《盛世危言》中，郑观应进一步认为，为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务必摆正“兵战”与“商战”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在反对西方列强经济侵略的认识上，要高人一筹。他在此书的“商战篇”中指出，重兵战，而忽视发展民族工商业，正是近代以来历次与西方交战而中国每每败北的重要原因，也是洋务运动的一个致命的弱点。他力主商务须成为整个社会政治、军事、工业、业、教育等领域的根本物质基础，以增强中国的国务。他说，无形的商战与有形的兵战之间，应该“裕无形之战固其本”，^⑦把商战视为“固本”，而兵战仅为“治标”而已。

我之商务一日兴，则彼贪谋亦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餍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以蔽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⑧

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⑨

郑观应在关于“兵战”与“商战”关系上还指出“能富而后可以致强，能强而后可以致富”，富国方可强兵，从而痛斥洋务派“筹饷则聚敛横征，不思慕工商以兴大利；练兵则购售炮，不知广学业以启聪明”，实在是“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

最后，他还严正指出：“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

在郑观应的著作中，关于建立议院制、设立学校的理论也很多，这就不一一阐述了。他为中国近代化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

议，让同时代人及后人受益匪浅。著名教育家蔡元培称其“以西制为质，而集古藉及近世利病挥之，时之言变法者，条目略具矣”^⑧郑观应的重商思想的提出，代表了中国民族工商业要求发展、争取独立的呼声，同时，也进一步阐发广府文化中的重商传统，并注入了新的内涵，使近代广府文化的商业精神更为突出。它对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对孙中山及其后的毛泽东，也产生过影响。

郑观应晚年认识到“教育为立国之本”，出任招商局公学任校董事，并在这一任上终其一生。

三、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1898年，中国爆发了戊戌变法运动，它被视为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试图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演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这次运动的两位领袖人物——康有为，梁启超，又都是广府人，这绝对不是偶然的，可以说，中国近代开始于南方，开始于岭南，甚至说开始于广府，绝非妄言。

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通过向西方寻求真理，传播资产阶级的自然科学与文化，形成了“新学”对“旧学”、“西学”对“中学”、“学校”对“科举”之争，掀起了近代史上这一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整个民族的觉醒，具有不可低估的进步作用。

我们先从康有为说起。作为戊戌变法的领袖，他自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代表之一，他在广东形成的近代启蒙思想，也就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诞生于广东，滥觞于全国，震荡了世纪之交。

他生于公元1858年，卒于1927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出

生于广东南海苏村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故学子尊称其为“南海先生”。

在赴京进行维新变法的 1898 年前 30 年，他一直生活在广东。其间 1879 年到香港，接受西学，“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从而“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⑧著有《实理公法全书》，《内外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及《大同书》等。他的社会变法理论建立在新的进化论基础上，哲学思想则揉合中外、淹贯古今，汲取了不少近代自然科学及自然哲学观点。

他以《新学伪经考》来破除对正统思想的迷信，寻求学术上的解放；又以《孔子改制考》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张口，阐发他的“三世说”即由封建制的据乱世，进化到君主立宪的升平世，再进化到大同的太平世，以确立他的进化论。一破一立，引起了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巨大震动，而他则以“康圣人之名震天下”了。

他思想中最有活力的，是关于万物自变的进化论，被梁启超视为“进化派哲学”——这是他提倡变法的根本理论。

他总结了鸦片战争之后 50 年早期启蒙主义的变法思想，突破前人“器变道不变”的思想局限，也摒弃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不变论，从而直接提出“变者，天道也”：

盖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而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沧海成田，历阳成湖，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无一不变，无刻不变。^⑨

他正是从天体演变与生物进化中，阐述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主张“善变以应天”，反对“不变而逆天”，为其维新变法运动提供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

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⑩

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

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⑧④}

其之“全变”，则在于“兴农工商”；今日不变新，则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之学，不可。”^{⑧⑤}

这显然也是南方或广府重商传统的作用，在《条陈商务折》中则称“夫商之源在矿，商之本在农，商之用在工，商之气在路。”由此，建议设立“农工商局”，并成立商会，发行“商报”和废除封建的厘金制度，以保障民族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这才是真正的富国之路：

工业盛而商业荣、农、林、矿、渔、垦殖随之而兴，中国之富强，可计日致也。三年而规模起，六年而人才成，政治立，十年而霸。^{⑧⑥}

由于他一再努力，使光绪皇帝明瞭“民足而君足，国富而势强”，便颁发出各项有助于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诏书，称“能商惠工，务才训农，古之善法。”

而康有为之“富国”，须有“富民”为前提，即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士农工商）四业既兴，小民可富——富民即富国。”^{⑧⑦}

这也是代表南方的呼声。

因此，对洋务派的“官商”及“中体西用”“道本器末”，他亦加以抨击：

购船置械，可谓之变器矣，不可谓之变事；设邮便，开矿务，可谓之变事矣，未可谓之变政；改官政，变选举，可谓之变政矣，未可谓之变法。日本改定变法，国宪之全体。^{⑧⑧}

在“变器”、“变事”、“变政”与“变法”四者中，决定因素是“变法”，惟“变法”才是“全变”，而全变、尽变，如前所述，则在兴农工商——国体之变矣，是维持那个有两千年封建帝制的国体，还是建立一个“君民共主”的立宪制国家？康有为

说：

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⑧⑨

也就是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政体，并把这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趋势。

他试图用“托古改制”的手段，将孔子重新打扮为一个近代鼓吹资产阶级博爱、自由、平等思想的化身：

“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⑨⑩

可以说，他成书较晚的《大同书》所表达的理论，正是寻求人性解放而出的提资产阶级人性论。——《大同书》的初名便是《人类公理》。

他认为，人的善恶是人为的，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不同，“人至人界，始有善恶；不人人界，无善恶。”“据乱世之民性恶，升平世之民性善。”“太平世……人人爱己若人。”更在《大同书》中强调：

人之有四肢五官也，有是体即有是体之路，此中西人之所同。

人生而有欲，天之性也。

这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一次有力的清算。他还进一步以“去苦求乐”作为衡量社会政治好坏的标准——这在南方的世俗化或享乐性上，倒是有源可溯的。他说：

立法创教，令人有乐而无苦，善之善者也；能令人乐多苦少，善之未尽善者也；令人苦多乐少，不善者也。

尽诸圣之千方万术，皆以为人谋苦求乐之具而已矣，无他道也。⑨⑪

他在《大同书》中，充分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给人们造成的

“压制之苦”、“阶级之苦”、“刑狱之苦”、“贫穷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等等，希冀能建立一个“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可以说是揭起了一面人道博爱的旗帜，并给人预见一个高度工业化社会前景与高度文明的社会蓝图，这无疑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远远超出过去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构想。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它毕竟促进了中国废科举，兴学校，也就摧毁了封建教育制度。康有为不仅呼吁建立学校，“泰西之强，由于人才，人才出自学校。”而且在广州亲自兴办了“万木草堂”，变法期间，亦在北京筹办“京师大学堂”等。纵然变法失败，可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却大都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育才之举，转为酿乱之所。”^⑫

如上所述，他的三权分立、大同思想、公羊三世说、民权观念……等等，代表了历史进步的要求，虽然他在变法失败后，仍死死抱住君主立宪的主旨不放，未能跟上民主革命的新潮流，终于落伍，但他在变法维新中的巨大贡献，却是永远彪炳史册，不可以抹煞的。我们无法苛求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这样做或那样做，他的选择与他的道路，也自有其历史的因缘。

作为康有为的学生战友，同是戊戌变法两主帅之一的梁启超，却没有发生康有为晚年的悲剧。当然，不仅仅因为这，而主要是他在世留下的大量文献与著作，使他在广府思想文化史中，更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贡献不仅在政治思想上，还涉猎到文化领域中的各个方面。他即是思想家、政治家，又是一位大学者，是广府文化哺育出来的杰出文化大师。

他生于1873年，卒于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熊子乡人。他12岁考中秀才，被视为“神童”，16岁中广州乡试第八名举人。1891年入万木草堂尊康有为为师，接受变法维新思想，并协助康有为完成《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论

著，并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列名首位。在戊戌变法中，与康有为齐名，被称为康梁。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同流亡日本。于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其一生，著作甚丰，留下的140多万字著作，在哲学、史学、文学乃至经济学上均有建树，称得上近代中国一代巨人。

郭沫若曾这么评价过他：

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残垒作战……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代言人，他的功绩实在不在章太炎辈之下。⑳

首先，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位作为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的有力推动者为惨痛的历史教训所动，不再追随康有为的改良主义主张，“既爱吾师，尤爱真理”，在《新民丛报》上开始连载他的《新民说》，思想继续往前发展，并趋于激进。《新民说》代表了当时启蒙思想运动的新潮，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道德，起到了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并首先揭起了国民精神批判的大旗，由此，它被视为中国20世纪初的“人权宣言”，产生了空前的影响。

在国民精神上，他指出，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观念传统，直接支配了国民素质的发展和民族力量的发挥，而中国近代之羸弱，正在于长期以来在国民精神上的种种痼疾与弊端。因此，必须高扬人的主体精神之自由，才可能根除封建蒙昧主义给国民造成的“奴性”。而在中国，国民心理上的“奴性”则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成为“天行（天命）之奴隶”，二是成为“古人之奴隶”；三是成为“世俗的奴隶”，四是成为“情欲之奴隶”。而造成这种“奴性”的，正是那些奴役他人的人，其制造的蒙昧、落后与守旧，正用于禁锢人们的自由思考，以他律代替自律；其

次，则是由外控化为内控，形成奴性而不知自觉。这样，整个国民便长期缺少了自我意识。

而海路大开，民族间竞争不可避免之际，对国民精神的再造正是契机：

夫列国并立，不竞争无以自存。其所竞者，非徒在国家，而兼在个人，非徒在强力，而兼在智慧，分途并趋，人自为战，而进化遂沛然莫之能御。^⑭

由此，他进而大声疾呼其自由观：

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也，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也。

人人有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

团体之自由，个人自由之积也；人不能离国体而自生存，团体不保其自由，则将有人团体自外侵之、夺之，则个人之自由更何有也。^⑮

他的结论便是：“自由”二字，正是几千年封建专制之“公敌”。因此，务必对旧中国孕育奴性的政治土壤和文化环境予以彻底的破坏，同时，也对个人心中的“奴性”以彻底的清算，“人之奴隶我不足畏，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尤不足畏，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要真自由“必自除心中之奴性始。”

其痛心疾首，惨然于笔端。

因此，在历史观上，他有他的“心力”史观。他的心力史观，或可与近代世界史学的新论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相比较。因为，他是这么认为的：“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理之发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并进一步认为，历史发的动力为思想，即个性、学术等等：

近世史与上世、中世特异者不一端，而学术之革新其最著也。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⑯。

仔细研析，他所指的“心力”，也就是指人的思想觉悟，指挣脱封建桎梏之后自由开放的思想，“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联系者，始能成为史迹。”^①

在史学界高呼“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成为史学革命划时代的经典理论之际，可惜我们每每忘记了梁启超“心力史观”的内涵本就与此不分上下。他应被推崇为中国近代历史哲学的奠基人，并当之无愧。

当然，他在史学上亦是“史界革命”的领袖，在批判旧史学上，创立了新史学，指出“历史者，叙进化之状者”、“叙人群进化之观象也”、“叙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之例者也。”并曾计划写一部《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可惜未能如愿。

他的《中国史的叙论》和《新史学》，当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巍峨的里程碑。惜篇幅所限，这里不便再深入阐述了。

在文学上，梁启超可谓开了近代小说理论研究之先河。他提出“小说界革命”，是革新政治、风俗、道德的先决条件，把小说的社会功能提到很高的地位——当然，旨在把小说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梁启超的学说影响了好几代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鲁迅无一不受其深刻影响。其后至毛泽东，则沿其“任公”称己为“子任”，组织“新民学会”，并且在延安告诉斯诺，他对《新民说》是“读了又读，直到差不多背得出来。”

直到今天，本世纪末，广东又一次走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列，众多思想文化界人士，仍在不断引用他当日的理论与观点呢。

四、不断推进的民主革命思想

戊戌变法以流血告终，本身也就宣布了“和平改革”的改良

主义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康有为等人在海外仍鼓吹“开明专制”，只是一厢情愿，保皇党其实有何“皇”可保——正是针对保皇主义，广府中一位伟大的人物站了起来，开展了一场对保皇派的大论战。他不仅在理论上挫败了保皇主义，而且以“武器的批判”，最终推翻了清朝封建专制的统治，在中国建立了共和国。作为推翻千年帝制的第一人，他的历史功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无可替代的。他无愧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与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导师！

他，便是孙中山。

孙中山，生于1866年，于1925年去世，名文，字德明，号日新、逸仙。因1887年在日本曾化名为“中山樵”干革命，所以以“中山”之名著称于世。他生于广东香山县（即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少时读私塾，12岁随父母到檀香山，始“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⑧17岁时回乡欲移风易俗，为村中劣绅所不容，复离家赴香港求学，26岁毕业于著名启蒙思想家何启办的西医学院。当时，民族危机日甚，他奋然觉醒，“殷忧故国之念日益切，乃决废医业为虎啸一隅”。28岁，即上书李鸿章：

窃曾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通。此四事者，富强之大径，治国之大本也。^⑨

自不被理睬，使他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由此组织了第一个革命团体于檀香山，这便是兴中会。其时为1894年11月。从此，经过“十起十落”，最后爆发了辛亥革命，终于用武装推翻了封建帝制，创立中华民国。

他首先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实践家，却又能及时总结革命理论，不断把思想往前推进，从而在思想文化上屡有建树，著有著名的《建国方略》一书，内含《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

《民权初步》，力图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三方面创立他的革命理论。观其一生，他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他的思想没有丝毫的凝固、僵化与束缚，总是不断地随革命的形势开拓出新的理论历程，去指导革命由一个高潮走向又一个高潮。这种开放性、适应性、变通性——当然是基于不断的演进基础上，恰巧是广府思想文化在近代的鲜明标志。孙中山由和平的改良梦想，到暴力的武装革命，从革命的实践始，到创立革命的理论，而从理论上的旧三民主义走向新三民主义，由其中的民生主义，又发展到民生史观……总是不断地前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这里，我们着重谈他的三民主义的思想，尤其是怎么从旧三民主义走向新三民主义的。

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是在1905年创办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正式提出来的。

民族主义是指推翻清朝帝制，澄清民族革命是要“灭尽满洲民族”的讹言。要清除狭隘的民族主义，确立中国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

民权主义则是彻底推倒封建帝制，建立起“主权在民”的真正共和国，也就是说，民权主义是彻底的无君权论思想。这思想一直贯穿了他的一生，包括他反对呼“万岁”在内，后来，他还提出一个“权能区分”的政治体制，把“三权分立”发展为“五权分立”——即“立法、司法、行政、选举、监察”五权，以避免政权为少数人所“垄断”。

民生主义，便是社会革命，在前则是“平均地权”，通过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使“耕者有其田”。在后则加了个“节制资本”，避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时产生垄断及外国资本对中国的控制。

三民主义，说到底，便是民主主义。所以，列宁曾评价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这

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和有力量的。”^{⑩⑩}

随着历史的变化，孙中山目睹辛亥革命以来的曲折与经验教训，给原来的三民主义注入了新的历史内涵并得到更大的活力，这就是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完成了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变。

民族主义，也就包括了“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当时，只有苏联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要“联俄”、以俄为师。“法、美共和国皆旧式的，今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⑩⑪}

民权主义，也就要“反对假革命”，扫除在革命进程中假民之名义而篡权的“三种陈土”，即“旧官僚”、“军阀”和“政客”三种腐朽政治势力。而革命党人也不要图“个人私利”、“升官发财”，须“救活”“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从而去“联共”。

民生主义，自是“扶助工农”、“唤起民众”，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而工人未来“可以作全国人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

正是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之际，孙中山将他的民生主义上升为民生史观这一哲学命题，明确提出了以“民生为重心”的历史观。他说：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⑩⑫}

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

民生问题才可说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⑩⑬}

也就是说，他是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历史的动因了，这是很了不起的见地：

经济问题，不是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可以解决得了的，必须把社会的情状和社会的进化，研究清楚了之后，才可以解决。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原理，可以说是全凭事实，不尚理想。^{⑩④}

后面八个字，充分体现出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正是从这里出发，他考察了中国这么一个“民穷财尽”的落后国家，也洞察了西方资本主义之利弊，严肃的提出了，“经济革命——社会革命”的命题：

欧美各国二百余年以来，只晓得解决民族、民权两件事，却忘了最要紧的民生问题。到现在全国的权力，都操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只有少数人享幸福，大多数人还是痛苦，因为大多数人不甘受这种痛苦，所以现在才有经济革命——社会革命——的事情。^{⑩⑤}

他认为，他的“民生史观”，就是“包括一切经济主义”，从而摒弃了一切小生产者的乌托邦空想、道德说教、宗教激情而走向唯物史观，尽管这一过程并未最后完成。

他这一“民主史观”，表现出一位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家思想上的一大飞跃，他坚持历史的重心在民生，坚信历史是进化的，这都是在他那个时代震聩发聋的。“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办法可以反抗。”这句话，何等豪迈，何等自信，这也正是他历史观的展现。他还进一步认识到：“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稽迟”——也就是说，民心史观也阐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同步发展，是很有见识的。

他的“知行观”，也就是“行易知难”一说，也包含在他的历史观内，他说，人类的知行活动，可分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

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然科学发明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⑩

他之所以这么认为，是意识到西方社会由文明进入科学，突飞猛进，显然是得益于科学实验的发达。“行而后知”，其意义在此。但正因为受传统的“知易行难”影响，科学才落后了。而“知而后行”，则是指科学高度发达，人类认识进入“盛轨”，即高级的“真知特识”阶段，“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知之则必能行之，知之更易于行。”在获得科学认识之后，便可以作出指导，做到事半功倍了。也正是从“知难行易”出发，他作出了“人事胜天”的学说：

世界上的进化，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量，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量关系到民族的兴亡，比较天然力还大。”^⑪

孙中山的思想，可谓宏大精深，但更在其开阔进步，所以，他称其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其一方面继承了中外文化的优秀遗产，一方面又总结其一生革命实践而升华的理论，并且强调，它是随革命的发展而发展的。虽然他也有他的历史局限，但其思想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块矗立云霄的丰碑。

与他同时期的，在思想文化上颇有建树的，还有朱执信，广州市人，他生于1885年，卒于1920年，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他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被孙中山视为“革命中的圣人”。由于他主要参与理论与宣传工作，留下的思想材料亦不少。这里只能作个简单的概括。

在新文化启蒙运动中，他强调反对迷信与偶像崇拜，力主对一切迷信对象，包括宗教、君主、习俗乃至科学理论，都应有一

种大胆的怀疑精神，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

在社会发展观上，他认为民心是决定一切的，英雄之所以能发挥其号召力，是因为他能站在群众的一方。所以，他主张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寄望建立一支新型的有主义的军队，以平等的精神作为军队的组织原则……

在他之后，还有中山人杨匏安（1896 - 1931），较早在广东（1919）的《广东中华新报》上以“世界总说”为总标题，发表了40余篇译述文章，介绍了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几千年来不同的思想流派，并以《马克思主义——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一篇长文，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些，在广府思想文化进程上，都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从以上大致的勾勒，我们已经基本看清了珠江流域主体——广府思想文化的来龙去脉，它的萌发、生长与鼎盛了。今天，广州正走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前列，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实践中更是硕果累累。广府思想文化一再呈现了龙腾虎跃的势态。

注释：

①《书城》1994年四期《文化质态的落差》。

②刘向：《修父》。

③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9 - 391页。

④《庄子·知北游》。

⑤《淮南子·原道训》。

⑥《后汉书·陈元传》。

⑦⑧⑨⑩⑪见晋书《本传》。

⑫《抱朴子》卷三《对俗》。

⑬《庄子·在宥》。

- ⑭ 《楚辞·远游》。
- ⑮ 《抱朴子内篇校释》第 110 页。
- ⑯ 同上，第 224 页。
- ⑰ 《抱林子内篇·至理》。
- ⑱ 《抱朴子内篇·极言》。
- ⑲ 同⑮，第 136 页。
- ⑳ 同⑮，第 240 - 241 页。
- ㉑ 同⑮，第 71 页。
- ㉒ 同⑰。
- ㉓ 《抱朴子内篇·微旨》。
- ㉔ 《抱朴子内篇·登涉》。
- ㉕ 同⑮，第 1 页。
- ㉖ 《抱朴子内篇·明本》。
- ㉗ 《抱朴子内篇·释凝》。
- ㉘ 《水月斋指月录》卷四。
- ㉙ 《法镜经序》。
- ㉚ 《察微王经》。
- ㉛ 《安般守意经序》。
- ㉜ 《续高僧传》卷八。
- ㉝ 同上。
- ㉞ 《坛经·般若品》。
- ㉟ ㊱ 同上。
- ㊲ 《坛经·五二》。
- ㊳ 同㉞。
- ㊴ 《神会语录》卷一。
- ㊵ ㊶ ㊷ 《坛经·四一》。
- ㊸ 《古尊宿语录》卷四。
- ㊹ 《筹海图编》卷 12。

④⑤⑥⑦《明史·本传》。

④⑥《愿丰轩记》。

④⑧⑨《大学衍文补》。

⑤⑩《世史正纲》卷十。

⑤⑪⑫⑬同④⑧。

⑤⑭《明儒学案·白沙学案》。

⑤⑮《陈献章集》附录二。

⑤⑯《与张廷实主事》、《陈献章集》卷二。

⑤⑰《道学传序》《陈献章集》卷一。

⑤⑱《陈白沙先生年谱》卷二，《陈献章集》附录二。

⑤⑲《示湛雨》、《陈献章集》卷四。

⑥⑩《偶得示诸生》其一。

⑥⑪梁启超《儒家哲学》。

⑥⑫《赠陈秉常》、《陈献章集》卷四。

⑥⑬《雍语》、《甘泉文集》卷六。

⑥⑭《大科训规》、《甘泉文集》卷六。

⑥⑮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二论广州有自立之特质》，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271页。

⑥⑯⑰⑱梁启超《戊戌政变论》、《戊戌变法》（一）第299页。

⑥⑲《新政始基》、《胡翼南先生全集》卷九。

⑦⑩《新政始基》、《胡翼南先生全集》卷七。

⑦⑪《西学东渐记》第五章《大学时代》。

⑦⑫同上，第二十一章《北京之行与悼亡》。

⑦⑬《新政议论》、《胡翼南先生全集》卷五。

⑦⑭《劝学篇书后·正权篇辨》、《胡翼南先生全集》卷十八。

⑦⑮《劝学篇书后·循序篇辨》、《胡翼南先生全集》卷十六。

⑦⑯《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郑观应集》上册，第55-56

页。

- ⑦《盛世危言·商战下》，《郑观应集》上册，第595页。
- ⑧《盛世危言·商战上》。
- ⑨《盛世危言三编·商务》。
- ⑩《蔡元培年谱》，第8页。
- ⑪《康有为自编年谱》、《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 ⑫《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
- ⑬⑭《上皇帝第六书》。
- ⑮《日本书目志》序。
- ⑯《请计全局筹巨款以行新政筑铁路起海军折》。
- ⑰《归万寿庆辰，允许士民庆祝，并刊贴新政诏书，勸士农工商，以教尊亲而隆恩，宜人心以永天祈命》，《述评》第310页。
- ⑱《日本变政考》卷七。
- ⑲同⑱。
- ⑳康有为《中庸注》。
- ㉑《大同书》。
- ㉒《光绪东华录》，总5807页。
- ㉓郭沫若《少年时代》。
- ㉔《论进步》，《饮冰室全集》1916年第二册第4页。
- ㉕《论自由》。
- ㉖《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学之学说》。
- ㉗《中国历史研究法》。
- ㉘《上李鸿章书》，《孙中山选集》第1页。
- ㉙《复翟理斯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页。
- ㉚《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 ㉛《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总理全集》，第二集。
- ㉜①②③《民生主义第一讲》，《孙中山选集》第802页，809页。

- ⑩⑤ 《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总理全集》第二卷。
- ⑩⑥ 《孙文学说》，《孙中山选集》第 150 - 151 页。
- ⑩⑦ 《民族主义第二讲》，《孙中山选集》第 630 - 631 页。

第二章 文 学

珠江流域文学的历史发展过去疏理得很不够，其实，何止广府文学如此，连岭南文学一样，业已出版的数部有关岭南文化的著作，均没有独立的岭南文学艺术的专门篇章；倒是画派、音乐反而还有，可见其不被重视。的确，如众史料所称，由于岭南地处偏僻，唐宋以前，文献散佚，文学作品鲜见，诗歌流传甚少。而唐宋的诗词类，由于宋元之交“崖门兵燹，版藉荡然”^①，同样难找。其后，“元、明均尚唐音，无人收拾。”^②如此说来，似乎整个岭南文学，更成了一片空白。

事实果然如此么？

无可否认，有些史实，如文献散佚、崖门兵燹等等，的确存在。但这只是给搜寻史料造成困难，但并不能说明岭南文学就是一片空白。有的说法，更只是偏见，诸如元明的文学，无人收拾，但并不见得其成就不高。尤其是魏晋以降，中国文化重心南移，到了明清两代，岭南文学更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近现代更出了不少文化大师。溯其源，唐代张九龄、明清的屈大均、黄遵宪，近代梁启超，都是对整个中国文学产生影响的大师级人物。到了现当代，就更为出色了。

在其中的广府文学，也同样如此，它与带有中原文化底气的客家文学，前有张九龄，后有黄遵宪相比，各有千秋，却也没多少逊色的。只是过去不曾有人归纳过，研究这罢了。

第一节 “开吾粤风雅之先者”

一、汉魏六朝诗歌之兴

广府番禺人，“岭南三大家”之首屈大均，在其“作史者可以征故实”的《广东新语》一书中“诗语”首条中，曾这么介绍过：

汉和帝时，南海杨孚字孝先，其为《南裔异物赞》，亦诗之流也。然则广东之诗，其始于孚乎？而孝惠时，南海人张买侍游苑池，鼓櫂为越讴，时切讽谏。晋时，高州冯融，汲引文华士与为诗歌，梁曲江侯安都为五言诗，声情清靡，数招文士，如阴铿，张正见之流，命以诗赋，第其高下，以差次赏赐之。此皆开吾粤风雅之先者。至张子寿而诗乃沛然矣。③

这里简略地追述了张九龄之前的岭南文学大致情况。“善为粤讴”的张买的作品，现已无片文可考，殊为可惜。这里，当以杨孚为粤诗的开头了。而他的《南裔异物志》中的“赞”，均为四言韵诗，该算今天还能见到的广东最早的诗歌了。从一开始，就异于中原的诗风，如《榕》：“榕树栖栖，长与少殊。高出林表，广荫原丘。孰知初生，葛崙之俦。”又如《贝》：“乃有大贝，奇姿雄俦。素质紫饰，文若罗珠。不磨而莹，采耀光流。思雕莫加，欲琢匪逾。在昔姬伯，用免其拘。”两首诗，物性与人性结合得甚妙，更有《鸕鹚》：“鸟象傜鸡，白鸣鸕鹚。其志怀南，不思北徂。”大有卓立不群之意趣，显示了广府人不随俗的个性。三首一齐读来，其个性色彩尤为鲜明。

魏晋以降，文人学士，尤其是诗人，素为放达，经常有聚会，饮酒赋诗，相互唱和。其间颇有历史影响的，有建安诗人的邺城邺宫的“西园之会”，乃曹氏兄弟曹丕、曹植作主人的西园

文士的集会，留下不少名作，而后，则西晋“二十四友”的金谷之会，且十分频繁，盛况可想而知。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有东晋兰亭之会，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便有记载，传诵至今。这种集会，由于时势变迁，由北及此，所以，到广东，便有了晋朝之际，“高州冯融，汲引文华士与为诗歌”，到了南朝，“梁曲江侯安都为五言诗，声情清靡，数招文士，如阴铿、张正见之流，命以诗赋……”无疑，这也是沿袭魏晋以来的“邺宫之会”、“金谷之会”、“兰亭之会”之后的“高州之会”、“曲江之会”。

一部岭南文学史，由于查找史籍上的粗疏，未及对屈大均这一段文字进行考证，一概推说侯、阴、张之流的诗赋“已不复得”未免臆断。事实上，这几次诗会，仍还是可以找到若干诗作的。

无疑，侯安都、阴铿、张正见等人，是被屈大均称之为“开吾粤风雅之先者”，一部粤文学史，对开风气之先者不加笔墨，自是说不过去。以屈文为线索，寻找一下这三人的诗作，当是很有必要的。

三人中，最负诗名的当是大诗人阴铿了。其次，便是张正见。其实，几种秦汉魏晋南北朝的诗文集中，均可以见到他们上百首诗，仔细研读，不少与广府的关系都是密切。可惜的是，“声情清靡”的侯安都之诗，未能见诸于这些诗文集，不过，阴铿、张正见“和侯司空”的诗却不少，可见侯安都皆作诗在前，后来阴、张的诗名，却已超过了他。

阴铿是梁陈间的大诗人，其生卒均已不可考，其原籍为甘肃武威，其父阴子青在梁朝任东莞太守、梁秦二州刺史。阴铿自小在南方长大，五岁能诵诗赋，日千言，及长，“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被当时所重。”^④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始兴任职，为始兴王（陈伯茂）府中录事参军，正是在那里诗名大振，行到宫中名诗人徐陵推荐，以至为陈文帝所赞赏，奉诏赋诗。后来，在陈朝

历任招远将军、员外散骑常侍等官职。他的诗作，与当时的何逊齐名，称之为“阴何”，同以清丽的风格双枝并秀。其诗，秉承“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的宋齐文学余脉，以写景见长，尤工于写江上景色，让人耳目一新。下引其《和侯司空登楼望乡》（侯司空即屈文中所提到的侯安都），更提到广州的石门——这在广州人是很熟悉的，地处广州西北水路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汉代吕嘉拒汉，筑石江中为门，故称石门，汉武帝“十万楼船”，重兵压境方得胜。此外，还有不少诸如“贪泉”之类传说：

怀土临霞观，思归想石门。
瞻云望鸟道，对柳忆家园。
寒田获里静，野日烧中昏。
信美今何益？伤心自有源。

后一句从王粲《登楼赋》中“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演化而成。诗中，霞观鸟道，柳絮家园，寒田野日，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他的其它诗中，船歌、乡愁、春色……也都真切动人。如《江津送刘光禄不及》、《渡青草湖》、《五洲夜发》、《和傅郎岁暮还湘州》等等。内中不少佳句，如：“泊处空余鸟，离亭已散人。”“莺随入户树，花逐下山风。”“带天澄迥碧，映日动浮光。”情景交融，形象清新。又如“大江静犹浪，扁舟独且征。”相互映衬对比，更显大江浩瀚与扁舟孤独。“棠枯绛叶尽，芦冻白花轻。戍人寒不望，沙禽迥未惊，”其景色凄凉，更见行者之苦旅。至于“溜船惟识火，惊鳧但听声”，可谓如在耳目之侧。其“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远戍唯闻鼓，寒山但见松。”更是炙脍人口的名句。清陈祚明称：“阴子坚诗声调且亮，无齐梁晦涩之习，而琢句抽思，务极新隽；寻常景物，亦必摇曳出之，务使穷态极妍，不肯直率。此种清思，更能运以亮笔，一洗玉台之陋，顿开沈（佺期）、宋（之问）之风；且觉比玉台则特妍，较沈宋则尤媚。”⑤

人称阴铿诗已基本形成律诗形式，是汉魏乐府五言诗到唐代五言律诗之过渡，当非虚言。读其《蜀道难》、《晚出新亭》、《南征闺怨》等，皆可称之为从齐梁新体诗向唐代近体诗演变中的开山之作，故清沈德潜称：“五言律，阴铿、何逊、庾信、徐陵已开其体，唐人研揣声音，顺稳体势，其利乃备”。⑥可见阴铿对唐代律诗形成所作出的贡献。

杜甫曾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诗中说：“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可见阴铿对李白诗歌创作的影响。这里未能作多比较，仅引宋王明清《挥尘录》一语：“‘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阴铿诗也，李太白取用之。”至于杜甫，更自称“颇学阴何苦用心”。后人亦对比之：阴铿有“行舟逗运树”，杜诗有“残生逗江汉”、“远逗锦江波”；阴铿有“天际晚帆孤”，“天边看远树”、“大江静犹浪”，杜诗有“江流静犹浪”、“云中辨烟树。”阴铿有“薄云巖际出，初月浪中生”；杜诗有“薄云巖际宿，孤月浪中翻”；阴铿有“花逐下山风”；杜诗则有“云逐度谿风”……等等，皆由阴铿诗中脱胎。

由此可见阴铿对唐代两大诗人的影响有多深。到了宋代，词人柳永更引用过他的“夜雨滴空阶”入词。长期以来，阴铿诗受诗论家重视，自是视其成就与影响的原因。

《赋得山中翠竹》一诗，亦可见其人品诗品：

修竹映巖隈，乘风异夹池。
复涧藏高节，重林隐劲枝。
云生龙未止，花落凤将移。
莫言栖嶰谷，伶伦不复吹。

过去的岭南文学史，似忽略了阴铿存在，除引文中偶有提及他，正文从未论及，未免大意。当然，他原籍并不在此，可算得上“南下干部”，却又与被贬谪的苏轼、韩愈不一样。不管怎样，他对岭南文学是有着其独特贡献的，所以，才为屈大均视为“开

吾粤风雅之先者”，也就是说，屈大均是把他与侯安都、张正见算作开风气之先的佼佼者的。

认定了这个“开吾粤之风雅的先者”，我们才可能确定珠江或广府文学、诗歌的起点，要是把他们排斥在外，也就否定了屈大均的这一结论。其实，广东人一查其族谱，无不以中原郡望而自矜，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心态，也是不争的事实——广东，毕竟是中国最大的移民省。所以，不必寻究阴铿的“根”是否在广东，只要知道他是在这里成名、在这里生活过相当长一段岁月便行。更何况他的诗文更为这里增色呢。

从屈大均这段文字中，亦可看出当时珠江文化的勃兴。

汉魏六朝，如西汉年间的经学家陈钦、陈元父子，亦在思想文化一节中提及。其后还有何丹、郭苍、姚文式等，亦博学能文。郭苍写“六泷山水之胜，形容殆尽，其才亦扬雄之亚”，⑦为后人所称颂。这一段时期，广州为南方的文化中心，不少诗人学者南来，如著名诗人谢灵运，便被流放到广州，途中写有《岭表赋》，他最后被诬谋反，惨死羊城街头。他的绝命诗句首为：“龚胜无余生，李业有终尽，稽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殒。”悲愤之情，跃然纸上。

从阴铿的诗风来看，其得益于珠江流域当年作为：“中原学术文化与外来学术文化交流的重心”⑧（罗香林语）的关系，“声调既亮”、“务极新隽”，亦可为广府之声，南国之新矣。他不仅是广府，也是全国的一位重要诗人。

二、“文化北伐”后的寥寂

广府文学，很少有与中原文学发生同步的时间。它或者滞后，或者超前。在南北朝之际，中国文化中心南移，甚至可以说，中国出现南北两个文化中心之际，广府文化一度有过超前

——这便是以阴铿为代表的，开五言律诗乃至新诗的先河，走在全国的前边，这在当日，可以说是“文化北伐”的第一支劲旅。南北朝时期，北人武功，南人文化，互不相让。但最后新诗——律诗的成熟与完美，也还是在中原，这也意味着“文化北伐”的终结——胜利即终结。其时，中国已再度统一，国都由江南又回到了中原，于是，南岭又再度成为了阻隔，不再影响中原或受中原影响了。

律诗的形成，或许要作另一种考证，它的产生与岭南有什么关系？如今，粤语中古音之多，是人所公认的。而用粤语作律诗，其平仄规律的把握，相对北音而言，要容易得多，可以说很顺口，或脱口而出，其起伏跌宕、平仄变化十分清晰与明显。所以，当日阴铿作律诗，与粤音的特征是不无系的。

随着文化中心北移，珠江流域又孤悬在外，因此，当唐诗、宋词在中原闹得红红火火之际，广府的文学相对却要冷清许多。也许广府人当时更热衷于葛洪的神仙道教以养生，倾心于惠能的南宗以禅悟，世俗生活的享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华更具备吸引力一些……张九龄是曲江人，当属客家民系居地，自与广府关系不大，而自张九龄成名之后岭南的文人似更寂寂无声了。

到晚唐，才出了邵谒与陈陶，邵谒亦为粤北客居人藉，而陈陶则很难考证他与岭南的关系。一说他是剑浦（今福建南平）人，一说为鄱阳（江西波阳）人。甚至谓有两个陈陶：一为唐宣宗时人；一为南唐时人。《全唐诗》仅含混称之为岭南人。两人成就不算太高，所以究其原籍是何地人，争起来也没多大意思了。《全唐诗》中仅留有岭南诗三十三首，除张九龄、邵谒、陈陶之外，寥寥可数。

邵谒诗“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人道“洗剥到极净极真”；陈陶诗“歌诗中似负神仙之术，或露王霸之说”^⑨其风格特异，意境奇诡，几近李贺。二人诗，这里不

……引述，只带过一笔而已。其间，仅余几首的有南海人廖有方，卢宗四，番禺人郑愚、封开人英宣卿以及一位刘轲。

岭南唐宋诗词散佚太多，如廖有方，柳宗元曾称其诗“有大雅之遗”^⑩，今却只见一首《葬宝鸡行路上人》：

嗟君没世委空囊，几度芳心输墨场。

半面为君申一恻，不知何处是家乡。

质朴无华，可见霭然仁人之心，但尚不足柳所称“世之所罕也”的作品。

五代间较著名的有孟宾于、黄损，皆是粤北连州人，为北方南迁客居者，诗文皆有名。

总的说来，唐五代间，广府文学鲜有建树，这是客观事实。直至宋代，也很难说有大的起色。

个中原因，这里也很难说出个准确的来。

而唐宋间，岭南诗文开一代风气的宗师，历来推张，余二宗，余即余靖，亦同是粤北曲江人。

直到南宋，广府诗文中起色者，才有增城的崔与之与番禺的李昉英。崔与之（1198—1239）的诗句，“高华壮亮，犹有唐人遗音”^⑪，所如《寿李参政璧》，述“涂炭未苏兵未洗”之际，“大地负荷须巨鳌”，盼雄才大略者挺身而出，“扶持世极寿国脉”。又如《送夔门丁帅赴召》，沉郁老健：

议论方前席，功名早上坡。

去帆瓜蔓水，遗爱竹枝歌。

同志晨星少，孤愁暮雨多。

倚风穷望眼，碧色渺平莎。

文天祥曾评价他的诗文“盛德清风，跨映一代。”^⑫当非溢美之词。

李昉英（1201—1257），为政年间，以直谏著称，贪官望而徒行。宋理宗曾称：“李昉英，南人，无党，中外颇畏惮之。”其

诗，文如其人，风格刚正遒劲，如《题石室木》：

似屈才伸蛇解蛰，似断还连龙蜕骨。

天河失却古槎樾，落在人间撑实兀。

若非胸中磊块洒浇出，老死画工无此笔。

其《送高礼部不安知严州》，更有古人清风：

从来直气劲摩空，又吐忠嘉忤九重。

指斥分明人所忌，去留諄复上能容。

清风慨慕桐江钓，异渥新疏竹使筒。

熊轼一行聊复尔，羽仪禁路要夔龙。

他重大义，淡名利，“平生不被利名锁，半掩柴扉听晚樵。”“老来一任添霜缕，寒暑难磨只寸丹”。其吟景之诗，也颇见笔力，如《景泰寺》：

树合疑山尽，攀缘有路通。

远鸦追夕照，低雁压西风。

瀑势雷虚壑，松声浪半空。

凭栏僧指似，涨雾是城中。

崔、李的词也颇有造诣，崔被视为“粤词之祖”，其《水调·题剑阁》人称“此词豪迈，何减稼轩”，李昉英的《兰陵王》，“一首绝妙，可并周（邦彦）、秦（观）。”

历来论者还很推重李昉英之文，这里不赘。

及至南宋末年，岭南奋起抗元，也崛起了一批爱国诗人，如袁玠、陈纪、赵必瑑、李春叟、马南宝、何文季等，其作品凄怆、悲愤，颇见气节。

顺德人区仕衡（1217—1277），诗文沉蔚婉雅，人称“有嘉祐风”。忧国伤时之诗作甚为苍凉：

多难兴邦海舰移，忽逢祀夏配天时。

小臣不死留双眼，东向行都望六师。

马南宝（？—约1284），香山人，毁家纾难，《感赋》中有：

黄屋匡扶事已非，遗黎空自泪沾衣。

众星耿耿沧溟底，恨不同归一少微。

而南宋室后裔，落籍广府，以赵必瑜为代表，其“上下世变，词多感慨，尤有楚骚左史遗态，读之令人三叹。⑬”如《避地惠阳喜鼓峰同徐心远韵》：

收拾当门破敝黄，山中蕙帐梦魂香。

风供松叶暖茶灶，云卧茅窗冻笔床。

一雨鸣蛙乱深夜，数声啼鸟怨斜阳。

风尘浩荡愁如海，怎得山中醉酒方？

及至元代，广府诗文中，仍未见有大起色。可提者有罗蒙正与黎伯元。

罗蒙正（1300 - 1367?）新会人，人称“元人所多以丽缚为病，刻翠剪红，或近晚唐小令。独吾粤罗希吕圭臬盛唐，元气浑然，调高字响，开南园后五先生之派。⑭”如《登圭峰怀苏长公》：

久向风尘厌薄游，到来象外且淹留。

溪边石枕和云卧，岩畔山茶带雨收。

古寺老僧非旧主，疏林晴色又新秋。

坡仙题咏今残剥，词客登临涌未休。

黎伯元，东莞人，其诗人称“沉郁苍凉，所造甚深

⑮”，不妨引其《感兴》以观：

雁泽秋风入浅斟，商歌激烈夕阳沉。

青山犹是古人面，白水不同今日心。

食肉有谋当报国，封信无相盍投簪？

草庐未必名湮没，何用栖栖《梁父吟》？

第二节 “中原诗风”的滥觞

一、危难催发的诗歌

正当唐诗、宋词、元曲在中原盛一极一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又一个高峰之际，岭南、包括广府的文学，却冷寂萧条，无甚建树。及至到了明代，中原诗、词渐趋式微，转向戏曲、小说，岭南却反而在诗、词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成就或者可追过自身的唐、宋两代。

可以说这是一种滞后——中原诗风，到这时才波及岭南，在中原却已成强弩之末。但也很难说是滞后，因为自宋以来，南方人文之风已逐渐超过、甚至压倒北方，从而形成南方文化的一个新的传统——它融合了来自海洋的熏风，得到了新的生长气候，从而在汲取了中原诗风的精华之际，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高峰，直到近代走向鼎盛。可以说，这是两种文明、或文化所走的不同道路，此盛彼衰，此衰彼盛。有必要从宏观上加以把握，不可人云亦云。

元宋明初，广府诗坛上，以“南园五子”著称的青年诗人，可谓异军突起，自成一派。他们努力矫正元代诗歌的纤靡委顿，继承当年阴铿等人及三唐的诗风，让广府诗坛为之一亮。他们的散文也颇有成就。大学者陈白沙曾称五子之首孙黄的学生稊坡：“吾邑以文行海后进，百余年来，稊坡一人而已。”可惜，明初深文周纳，南园五子不是被杀，便是被流放，均不得善终，他们的作品便流失不少。明嘉靖年间陈暹辑得《南国五先生诗》五卷，已不足200首矣。

五子之首孙黄（1337—1393），顺德人。曾出仕，多建树，又受累，入过狱。罢官后归乡里，再复出，终被株连而处死，年56岁。《明史》称他“性警敏，书无所不窥，诗文援笔立就，词

采灿然。”⑯有“气象雄浑”一面，又有“清圆流丽”的另一面。明清以来，对其评价很高，故应麟《诗薮》谓其诗“是雄踞一方，先驱当代。”其他人则认为其“七言古体不让唐人”，“岭南明诗之首。”“五古远师汉魏，近体亦不失唐音。”

他的《下瞿唐》气势磅礴，笔力雄健。而《骊山老妓行》，可称得上是《长恨歌》的续篇，跌宕多姿，音调谐婉，如泣如诉，声情并茂。

读其《昭君》则另有一番意味：

莫怨婵娟堕朔尘，汉宫胡地一般青。

皇家若起凌烟阁，功是安边第一人。

与历代为昭君“悲远嫁”而鸣不平的诗相比，此诗可谓一扫陈词迂调，以开阔的胸怀，去消解占来狭隘的民族与地域观念，得到不同的、全新的见解。这在六个世纪前能有此见地，当是见识过人。这自然是得益于广府文化历来的开放与务实观。

孙蕡的文章，亦颇受称道，人称其为文“初若不甚经意，而气象雄浑，兴喻深致，戢戢乎魏晋之风。”⑰如《祭灶文》，假借向灶君陈词，抒发个人怀才不遇、历遭坎坷的感慨，显示出其刚直不阿、遗世独立的品格，文气雄阔，文锋犀利。

五先生中，还有南海、番禺的王佐、赵介、李德和黄哲。其成就虽不及孙蕡，但亦各有所长。如人称王佐，“构辞敏捷，王不如孙；句意沉着，孙不如王”⑱，“才思雄浑，体裁甚工。”而赵介，“气充才瞻，发为诗歌，实肖其人”，被称之为“广之高士”。李德，其诗“跨晋唐而踈宋元”，亦“短篇炼气归神，静穆而淡远”⑲。黄哲，其诗已“造晋唐奥域”，意境阔大……

五人结“南园诗社”于广州南园抗风轩，开明一代岭南诗风，甚后，又有欧大任等，又于南园结社，为“南园后五先生”，明末，更有“南园十二子”，及至清代，又出了个“后南园诗社”。六百年间，几经兴替，流风余韵，绵绵不绝，可见影响之

深远。

明初除南园五子外，前提及的黎贞，即秣坡（1346? - 1405?）为新会人，孙贲被处死，他抱尸恸哭。其著述甚丰，诗文可谓“滔滔自胸中写出，无斧凿痕”。试读其《午夜还乡……》：

十年戎马不离鞍，沙漠长城万里寒。
今日归来浑未老，青山还许白头看。
历尽沧桑，仍自有一片旷达之心境，殊为难得。

在南园前后五子之间，广府人中还出了两位大学者，一是新会人陈献章，一是香山人黄佐，两人同丘濬同被推为明代广东三大学者。丘濬在思想文化一节中已提及，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及前述，故在此不再重提。

而被称之为哲学家中诗人，为古往今来所少有的，则是陈献章，即白沙先生。虽前文已提及，因其诗作亦为上乘，《白沙子全集》中存诗有二千，风格趣妙冲淡，清新秀美，与道学诗全然不同，所以，在此亦须多著一笔。

他的哲理诗奇瑰跌宕，情理交融，“一片化机”，出色者如《偶得示诸生》其一：

江云欲变三山色，江水初交十日秋。
凉夜一蓑摇艇去，满身明月大江流。

其“以静应变”、“万化自然”的观念，尽在诗行中。

《四库全书》称他“心境虚明，随处圆通”，亦可见于此诗中，而仍可见魏晋风骨，一脉于阴铿、陶潜等，不妨一读《题新村书斋壁》：

茅栋依岩静，柴门斫竹通。
桑榆巷南北，烟火埭西东。
一径渔樵入，孤村井臼同。

邻家得美酒，吹笛月明中。

其后的黄佐（1490—1566），曾改白云山景泰寺为泰泉书院，在此讲学，故人称“泰泉先生”。“南园后五先生”，大多出于他的门下。他著有《泰泉集》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称他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文献学者，撰有《广东通志》七十卷，《广州人物传》二十四卷及若干县志、山志等。

黄佐诗歌的思想性、艺术性堪称上乘。他积极入世，不离现实，关心百姓疾苦，处处为民请命，写了不少好诗，如《秋怀》中：

……野庐尽悬磬，飞镜犹开边。

初月张虚弓，流火无炊烟。

……吾民亦劳止，昊天故乃然。

他的怀古之作，亦寄寓有现实的感慨，动人毅魄，如《横州伏波庙》：

高滩危石锁崔嵬，长夏风烟午未开。

南海楼船从此去，中原冠冕至今来。

武溪一曲风尘静，铜柱双标日月回。

千载伏波祠宇在，汉朝何处有云台。

又如《宋行宫》，写的是名不见经传、毁家纾难的马南宝：

沙涌清夜月，曾照宋行宫。

未抵黄龙府，空悲白雁风。

丹心思蹈海，正气化成虹。

若逐崖门愿，吾乡有大忠。

黄佐诗风，雄直恣肆，不傍门户，其《春夜大醉言志》可作为代表作：

拔剑起舞临高台，北斗插地银河回。

长空赠我以明月，天地知心惟酒杯。

门前马跃箫鼓动，栅上鸡鸣天地开。

倦游却忆少年事，笑拥如花歌落梅。

人评此诗“倜傥不群，神来气来”。

朱彝尊称他是岭南诗派的领袖，功不可泯。

自黄佐带出南国后五先生，在前五先生之间的“风雅中坠”的岭南诗坛又再度复兴。后五先生颇受黄佐切近现实，积极入世的影响，风格刚直雄浑，在中原也产生了影响，有不少传世之作。清人檀萃曾说：“岭南称诗，曲江（指张九龄）而后，莫盛于南园；南园前后十先生，而后五先生为尤盛。”后五先生之首为顺德人欧大任（1516—1595），著有《思玄堂集》等诗集。其受儒学薰陶较大，立志治国平天下，虽仕途曲折，夙愿难酬，却不曾消极，可见《三河水》：^②

三河水，万军泪，泪滴三河水不流。

胡茄吹落蓟门秋。

河水流不住，胡茄向何处？

谁使十年来，移营两屯戍？

君不见胡已驰墙子关，汉军尚哨熊儿峪！

讲的是嘉靖四十二年，冬，鞑靼进犯京畿一事，忧愤之极，人称“长于讽谕，风人之遗”。

咏史诗亦沉郁深厚，如《镇海楼》：

一望河山感慨中，苍苍平楚入长空。

石门北去通秦塞，肆水南来绕汉宫。

虚槛松声沉暝壑，极天秋色送征鸿。

朔南尽是尧封地，愁听樵苏说霸功。

历代选家必录他的名作《九江官舍除夕》：

钱岁浔阳馆，羁怀强笑欢。

烛销深夜酒，菜簇异乡盘。

泪每思亲堕，步频寄第看。

家人计程远，应已梦长安。

颇及杜诗遗风，真挚感人。

后面四位是黎民表、梁有誉、李时行、吴旦，分别是从化、顺德、番禺与南海人，亦各有千秋。不过，风格上差异不是很大，人称“如出一手”，这却是令人抱憾的。不过，梁有誉仍名列明代“后七子”之一，与李攀龙、王世贞等齐名，在全国亦颇有影响。其《崔门吊古》悲壮雄浑、笔力刚健，见真情至性：

谁悟当年讖已真？汴杭回首怎成尘。

愤无勾践三千士，死恨田横五百人。

海上乾坤春梦短，崖前风雨国仇新。

贞魂若作啼鹃去，葛岭峰头哭万巡。

二、现实主义的力度

明代诗坛，复古主义文风可谓盛行一时但广府诗风，却自有其品格，很见现实主义之力度。其间有区大相（？-1612），高明人，可谓“力祛浮靡，还之风雅”，写了不少十分切近现实的力作。现《区太史诗集》，存诗1500首。其风格上有杜诗中离乱之作的影晌，反映了明代日渐衰落过程中的民间疾苦。万历三十三年，他自京南归广州，写有《南行感怀》40首，“触时感事”，忧愤之深，令人扼腕。下录几首：

驿小欺陵易，民贸供亿难。

虽疲邮宰力，犹失上官欢。

鼓吹连樯动，闾阎疾首看。

传言来往使，慎勿念加餐。（其十二）

目睹此等腐败、荒淫，更为国运担忧：

书剑身将老，纵横学未成。

年随秋叶暮，心与夏葵倾。
社稷烦三顾，朝廷用五更。
异时论出处，天远重含情。

及至明末，政乱国危，爱国激情，催发了岭南诗人绚丽的篇章，岭南文坛，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爱国诗人，其作品都达到了当时全国的最高水平。其中，“粤中屈原”邝露，“粤中李白”黎遂球，“粤中杜甫”陈邦彦，被称之为“岭南前三家”，出类拔萃，青史留名。他们不仅以诗名，更以人品传之后世。

邝露（1604—1650），南海人，平生桀骜不驯，开罪于权贵，被迫流亡。后为南明政权所召，力守广州城十月余，城破，整肃衣冠，抱琴端坐，从容就戮，年仅47岁。其诗如其人，称“旷代仙才”，诗集《峤雅》有明显的楚辞传统。诗人王士禛《论诗绝句》称其“海雪畸人死抱琴，朱弦疏越有遗音。九疑汨竹娥皇庙，字字离骚屈宋心。”诗人晚年力作《浮海》更是如此：

玉树歌残去渺然，齐州九点入苍烟。
孤槎与客曾通汉，长剑怀人更待天！
晓日夜生圆峤石，古魂春冷蜀山鹃。
茫茫东海皆鱼鳖，何处堪容鲁仲连？

黎遂球（1602—1646），番禺人。曾与陈子壮等11位人倡复南园诗社，被称为“南园十二子”。后率两广水陆义师驰援赣州，与清兵苦战，城破中箭而亡。他的出生地因之改为豪贤街，沿用至今。他有《莲须阁诗集》六卷，忧国伤时，正气若虹，其诗颇有太白遗风，如《送李烟客出塞》，录一首如下：

丈夫宁惜别？一路笑桃花。
下水流渐劲，临关怒木芽。
春情违蛱蝶，酒态在琵琶。
莫动将归思，风前有暮茄。

陈邦彦（1603—1647），顺德人。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曾

在南粤扬威一时，不幸城破被俘，绝食拒降，慷慨就义，临刑，长吟《临命歌》：

天造兮多艰，臣也江之浒。
书生漫谈兵，时哉不我与。
我后兮何之？我躬兮独苦。
崖山多忠魂，后先照千古。

著有《雪声堂诗文集》，师法杜甫，笔力老健、风格苍凉，如《丁亥仲春，余归自岭右，暂息乡园，读杜工部秦州杂吟，怅然感怀，因次其韵》二十首，斥清兵杀掳，抒沦丧悲愤。

物产川原尽，生涯寇盗间。
无愁惟岸柳，不改是春山。
古戍饥鸟集，江村乳燕还。
未须愁远道，多恐泪痕斑。

又如其他诗中“中原半已成鱼烂，草野宁当恋鹿群”、难将忧愤填沧海，剩有悲歌贯长虹”“弱骨自缘忧国瘦，旅魂时逐故园飞”等，悲从中来，透骨沉痛之极。

后人评价“吾粤诗笔老健，无逾陈岩野，先生身著大节，诗亦力企大家。感时之作，气喷长虹，骨凌秋隼，直摩少陵之垒而拔其帜。”^①

他的儿子陈恭尹与屈大均、梁佩兰，同为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不仅在广府、岭南，而且在全国、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作为广府文学的一个强劲的浪头冲涌而出。

陈恭尹（1631—1700），其父被捕，全家遇害之际，仅他一人幸免。国破家亡，他一度起兵抗清，终未得成功。其间，写下不少诗作，抒发爱国爱民之襟怀，沉雄悲恻，力透纸背。晚年，始终不仕新朝，自称“独漉子”，取李白诗《独漉篇》“雄剑挂壁，时时龙鸣”、“国耻未雪，何由成名”之义，表明他匡复之志未泯。

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最有价值，颇见功力的，则是其哀悯苍生、感怀身世、追思故国、矢志抗清的那些篇什。尤以《崖门谒三忠祠》不同凡响：

山木萧萧风又吹，西崖波浪至今悲。
一声望帝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亦艰难日，畏向苍苔读旧碑。

清赵翼评价此诗“此等雄骏句，虽李、杜、苏、陆辈，穷尽气力，一生不过数联，而独漉切定其地，不可移咏他处，尤难得。”②

他的《虎丘题壁》，曾“倾动一时”：

虎迹苍茫霸业沉，古时山色尚阴阴。
斗楼月影千家笛，万里天涯一夜砧。
南国干戈征士泪，西风刀剪美人心。
市中亦有吹篪客，乞食吴门秋又深。

此诗可谓声泪俱下，国恨家仇同冶一炉，意境苍凉悲远，难怪会在当时那么轰动。此乃用血用泪写出的至情至性之作。

他的诗中，关心民间疾苦，痛斥贪官腐败的不少，亦有讴歌广府风物的不少佳作。

此外，他的散文也很有成就，赋序记、设论、行状、祭文数量可观。他认为文学创作须与时代一同前进，“文章大道以为公，今昔何能强使同？只写性情流纸上，莫将唐宋滞胸中……”；要有创新精神“当求新于性情，不必求新于字句；求妙于立言，不必专欺于解脱。”

屈大均（1630 - 1696），番禺人。当年亦破产从军，参加陈邦彦发动的抗清斗争。后投身佛门，誓死不为清廷所用。后几度筹划反清复明，未果，蓄发还儒。他与顾炎武、朱彝尊相交甚笃，二人对屈都有很高的评价，称“予友屈翁山为三闾大夫之

裔。其所为诗，多怆悵之言，嶮然自拔于尘垢之表。……当推其志焉。”^②

屈大均诗文皆大义凛然，爱国之心跃然纸上。著述甚多，编有《广东文选》、《广东文集》，又撰有《广东新语》。后者与他的《翁山文外》、《翁山诗外》、《翁山易外》《皇明四朝成仁录》合称“屈沲五书”。

他的《猛虎行》、《大同感叹》、《雷女织葛歌》、《民谣》等对清代贵族鱼肉百姓作愤然指斥，“人皮作秽裘，人骨为箭簇。人血充乳茶，脂膏杂红曲”，最后发出了“为兽莫为人”的呼号。

他决不与禽兽同行，铮铮骨气回荡诗中：

慷慨干戈里，文章任杀身。

尊周存信史，诗赋托词人。

素发存三楚，愁心历九春。

桃花风雨后，和泪共沾巾。

其诗，后人称之为“廓然于天地之间，独抒颢气。”“超然独行，当世罕俦。”又有称“翁山之诗，如万壑奔涛，一泻千里，放而不息，流而不竭。”

他的散文也很卓越，高雅古洁，沉浸秦汉。其《广东新语》，人称“其察物也精以核，其淡义也博而辩，其陈词也婉而多风，思古伤今，维风正俗之意，时时见于言表……”^③

由于他的民族气节影响犹深，歿后，清朝几兴文字狱，他的遗著屡遭焚毁。但民间仍禁之不绝，口耳相传，故仍保留下少名篇。

梁佩兰（1630 - 1705）南海（今广州）人。著有《六莹堂集》，他年少遭兵燹，见生灵涂炭，故诗中多麦秀黍离之哀。为避乱，他一度剃发为僧。

其诗中，感时、吊亡之作，深得杜甫、白居易传统，如《端州》、《养马行》、《采珠歌》、《采茶歌》等。中年遍访名山大川、

形胜古迹，其诗气象愈加雄阔，意境更为深远。笔力尤为老到。如《黄河》中：“奔流星宿鱼龙骇，要与天地驱尘埃。我从彭城乘两马，白口河声撼城下。波涛卷起如丘陵，眼底风雷惊叱咤。……”气势磅礴，奔放豪迈。

其文，主张师法古今、师法社会、师法自然，师法百家，化为胸中学问，发为文章，方能体现性情与见解。有不少精辟的见解，均入《六莹堂集》。由于其士大夫意识甚浓，又曾几欲出仁清朝，在政治与文学上都有偏颇，其成就在“岭南三家”中是较逊色者。

清中叶，有岭南四家，即顺德黎简、张锦芳、黄丹书与番禺吕坚。成就较高的当推黎简（1747 - 1799）。他少年云游四海，中年诗名，画名便远扬中原。他生前手订付刻《五百四峰堂诗抄》25卷，现存诗二千首左右。

其作品中，哀民生之多艰、斥统治之黑暗者众。如《有叹》、《郛外》、《客楼》、《四月二日》等篇，有“觅屋馀墟社，逢人问死生”、“地迴风云急，年饥气象黄”、“身稳几无梦，年荒欲废吟”等痛彻心脾的诗句。而《秋雨叹五首》、《田中歌》、《夜将半南望书所见》则有唐代“新乐府”之传统、满是同情满是泪。

他身兼画家，亦可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广府风光别具风味，如《春江吟》。

雨酿浓青柳醉天，一弯愁黛暮山圆。

船头花影垂垂簇，亲见饥鱼嚼紫烟。

他的田园诗更是别致，如《细雨》：

淑风送深暖，春日浅含情。

细雨光犹暗，孤花冻益明。

林攢远峰立，云重暮沙平。

村路香泥滑，烟蓑试早耕。

人称黎简诗：境新、句奇、意深、情真，如王昶在《蒲褐山

房诗话》中称之为“峻拔清峭，刻意新颖，言人所不能言。”黎简亦自称写诗“刻意轧新响”。

他除开以书、诗、画三绝驰名外，还有曲本《芙蓉亭乐府》二册，作为杂剧，情节曲折，悬念巧设，奇诡曲折，酷似传奇。

清代，广府还有一部小说《蜃楼志》，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仅有的一部描写早期外商与海关官吏的作品，对于中国走向近代进程的了解，此书自有难得的价值与份量。作者真名实姓与生平均无可考，但书中熟悉广府之风土人情，可谓纤毫不爽。郑振铎为之抱屈，称“名作之显晦，真是也有幸与不幸之分的。”^{②4}小说刻划当年的社会生活，颇有近代感，主人公苏万魁可谓第一位以“买办资本家”面目走入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的人物。有钱而无地位，最后花钱捐官，由不受尊重的资本家又重新变回土地主——这实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悲剧。郑振铎称此书“无意于讽刺，而官场之鬼蜮毕现；无心于谩骂，而世人之情伪皆显。”

我们就以此《蜃楼志》导入近代的广府文学。

第三节 近代广府文学的光焰

一、民族危亡的呐喊

诗穷而后工，极而言之，文学的兴盛，每每与诗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分不开，生于忧患，发自肺腑的呼声更见真性情，更有艺术的力度，且不说思想深度与历史厚度了。进入近代，广东更是最早直面列强侵略的省份，民族危亡、迫在眉梢，自嘉道以来上下酣嬉的局面一下子不复存在了，文人怡情养性、游山玩水也继续不下去，刀搁在了脖子上，枪顶在了胸口中，能不冲天一啸么？

鸦片战争的爆发，不仅激发了志士仁人的爱国之心，更痛切地感受到人民的苦难，更痛恨侵略者的暴戾，也给有良知的作家、诗人以一个惊醒，以丰富的情感，以厚重的创作素材。在清朝统治者懦弱屈膝之际，他们却以彪炳的诗文，表现了民族的大义，立起了铮铮硬骨，他们以诗文为战斗的武器，揭露英国侵略者的丑恶本质与滔天罪行，谴责清朝的腐败投降的可耻行径，并且痛斥鸦片所造成的祸害；同时，又以高亢的热情，讴歌了广大人民群众反侵略的正义之战，痛悼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们……从而开创了近代文学史上“三元里诗文”的光辉一页，在近代文学史上成为不朽的篇章。

为此，独辟一节专谈抗击鸦片战争的诗文。

首先，我们不能不提三元里战役的领导者、亲自参与了抗英斗争的诗人何玉成的诗文。

早在战争发生前夕，何玉成已对鸦片危害日深、侵略者威逼日甚、时局日危而忧心如焚，在1840年战争发生之前的夏天，他便写了一组五律，以诉积郁。题为《辛丑首夏书事》：

通商饶国计，天府重衡持。
航海梯山远，薰烟毒雾滋。
犬羊宽梃楚，荆棘满园篱。
反覆连章奏，倾危已在兹。
危亡在即，他在诗中疾呼：
群夷须控制，天设势嵯峨。
谁失虎门险？竟生珠海波。
朦朧频进港，将士尽抛戈。
休养由未久，临危意奈何！
可又有来理睬呢？
粤峤繁华地，乘波上下潮。
弦歌犹昨日，烽火倏今宵。

焰焰红旗动，翩翩铁舰骄。

九重忧瘁意，何莫答皇朝。

末了，他只能哀叹：“和戎今妙策，平虏古良谋。俯仰筹边事，凄然独倚楼。”

依靠当局是虚的，惟有与民众站在一起，投身血与火的斗争。于是，他义无反顾地同三元里人民一道，顽强抗战 20 个月，迭创敌军，大振民气。他写下了《团练乡勇住扎四方炮台等处纪事辛丑四月至壬寅十一月》的长诗，记录了这一气壮山河的反侵略战争：

群处乡党间，安居服先畴。

实遭英夷扰，奋起思同仇。

暂弃耒与锄，来修戈与矛。

奉札备团练，众志成城丘。

下以保家室，上以纾国忧。

敢云冒翎顶，建此殊勋猷。

这是他奉札挑选诗社团民一千名，住城北各炮台防堵。英国侵略者竟来骚扰，老百姓同仇敌忾，“少壮争御侮，老幼同赍粮。天心助我民，一雨沛溟滂。彼枪黯无焰，我兵众且强。”

全诗气势如虹，出色地描绘了当日反侵略战争的壮丽画卷——“万民皆同心，集众惟一呼。以此慑远夷，不战胆已虚。”把侵略者给吓破了胆。

这是战士的诗文，自有血性在！

三元里民众，一举击溃了英军，并击毙了英军少校毕霞，军威大振，更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老诗人张维屏，也就按捺不住，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诗篇《三元里》：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公民合力强徒摧，

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齐作气，

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该诗酣畅地表现了三元里人民团结御侮的英雄气概。张维屏被视为近代文学开创者，此诗也是一个力证。“人心合处天心到”，连天也助三元里人民抗英，“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行其暴。”本来，英夷已陷入重围之中，不料，清将军奕山竟急命广州知府余保纯驰往三元里，欺骗、恫吓百姓，放走了侵略者。诗中只得叹息：“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

愤怒出诗人，抗英斗争使不少诗人留下了不朽的名篇，张扬民族的正气。诗人梁信芬也笔墨酣酣，写了三元里这次战役《牛栏岗》：

……十三乡人皆不平，牛栏冈边愤义盟，
计不旋踵无反顾，连络一心同死生。
男女弱冠频请纓，女能执爨愿从征。
一时众志成城，气吞霄汉——
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
相形之下，清廷的腐败无能实在是太气人了。

仅愤怒还是不够的，诗人们更作了进一步的思考，提出了尖锐的责难。如陈璞的《径北门三元里忆辛丑乡民杀虏事》则有“国殇今共礼，贝冑愧公徒”，“此捷竟无两，言和亦有由”句；蔡召华《三元里行》更有“父老不敢争，眼看蛟离井，功成唾手弃，天地何酩酊”、“何为六省兵，全力及见蹶？何为鸟合众，一怒反得志”。

出脱愤怒，便有冷嘲，象彭泰来的几首律诗，如《辛丑感事》，何等辛辣，“沙角星方殒，莲花宴未收。”而《辛丑广州纪事诗》更以四首绝句，讽刺夷兵退后，清更荒淫无耻之极：“灵峰山是小蓬莱，天上将军避寇来。战舰如云无用处，龙舟听令夺标回。”“史书灾异不无端，物祸人妖一例看。叵耐市儿工狡狴，沿街犬戴晋贤冠。”

其时的民间歌谣，也为之兴盛，并颇具特色，如讽刺官吏的《鬼子来》与《有顶皆白石》：

鬼子来，跑得快，有白顶蓝翎戴。

有顶皆白石，无帽不蓝翎。

见侵略者来则逃，反可戴上白顶蓝翎。再看下面一首《洋鬼子怕百姓》：

百姓怕官，官怕洋鬼子。

官怕洋鬼子，洋鬼子怕百姓。

可谓含义深刻。

但老百姓对议和卖国是怨气冲天的；在《怨气歌》中，他们是这么唱的：

一声炮响，义律埋（靠近）城，三元里顶住。四方炮台打烂，伍紫垣顶上，六百万讲和。七七礼拜，八千斤未烧，久久打下，十足输晒。

仅一个“三元里顶住”，而官方八千斤重炮未烧响过，便十足输给了异邦。这实在令人丧气。于是，又有个《胜利歌》以唱当日大战：

一声炮响，义律埋城，三元里打胜。四方炮台打烂，伍家讲和，六百万补回。七星旗扬扬，八面埋伏，九九打下，十足胜利。

三元里一仗毕竟是胜过的，而众多的爱国将士，在鸦片战争中，也表现出了民族正气，英勇捐躯，如关天培、陈连陞、陈化成及葛云飞等。大诗人张维屏在《三将军歌》中，更以悲壮的笔触写下了“一姓葛，两姓陈，捐躯报国皆忠臣”的英勇业绩。

在追叙三将军壮烈牺牲的场景之后，诗人这么赞叹道：

十日得尸色不变，千秋祀庙吴人建。

我闻人言为此诗，言都一人同一辞。

死夷事者不止此，阙所不知诗亦史。

承平武备皆具文，勇怯真伪临阵分。

天生忠勇超人群，将才孰谓今无人……

何仁山的《陈都督父子挽诗》也写得壮怀激烈，血火刀光，如在近即，令人激奋不已：

男儿事驰驱，许国期马革。

忠考矧两全，更是光史册。

当公镇三山，红夷逞凶道。

虎门忽调守，设备仗筹画。

那知纵敌者，掣肘弃奇策。

遣儿儿不去，誓死守寨栅。

……

血肉交纷飞，创裹闻裂帛。

方其地雷起，石裂惊划划。

犬羊快轰击，尚期一当百。

腹背奈不支，烟焰迸忠魄……

陈连陞战死，其战马不为英夷所役，亦慷慨不食而卒。时人更有《义马行》彼此唱和，成一诗集，可见当日盛况。这里不录其诗了。只是想说明，写的是“义马”，歌颂的却正是我们民族的浩然正气。

鸦片战争时期，不仅诗盛，而且文茂，如当年三元里等处出现的一篇篇檄文，疾呼“同仇共愤，何烦官长操戈；振臂一呼，自足歼诸丑类。”“修我戈矛，整我义兵，壮夫尽力，智士尽谋，举手则江海可平，埋伏则鬼神莫测。”“务使鬼子无只身存留，鬼船无片帆回国。”

其凌厉的气势，犀利的语锋，足以使侵略者闻风丧胆。

可以说，抗英诗文，不仅在广府文学中，且在中国近代文学中，占有厚重而又璀璨的第一页！它也使广东的诗人，成为中国近代诗场上的翘楚。

二、学者与诗人相映生辉

写下《三元里》名篇的张维屏，（1780 - 1859），是番禺人。他中年入仕，却不愿穷征暴敛，告病还乡，改作教职。其诗名早著，享寿又高，成岭南诗坛大宗。林则徐、魏源均来粤拜会过他，并有深交。他早已预感到一个新时代的诞生，1824年便写有《新雷》一诗：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
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

他诗作上的成就很高，当年与宋湘齐名。宋湘曾称：“一唱三叹，沁人心脾，我不如子。歌哭无端，飞行绝迹，子不如我。”他才气横溢，有《松心诗略》，计十集，为其弟子选刻全诗十之二三而成。还有《听松庐诗话》、《国朝诗人征略》、《谈艺录》等。

由于阅历深、学力厚，其诗风自少年、中年至老年亦有几变，于清丽蕴藉中，饶有沉着顿挫之致，渐趋老健、清逸，如《华首台》：

路转不见山，人面忽然碧。
浑忘春阳暄，陡觉古雪积。
林霏结空绿，人影漏微白。
岿岿松冲风，逼仄瀑击石。
一桥飞雨花，妙香淡无迹。
幽篁鸣玉琴，老藓展瑶席。
时间钟两三，欲间僧五百。

他的五古如此冷隽，七古又迥然不同。如《晓望太湖》、《九日粤秀山高》、《洞庭湖大风雪放歌》等，汪洋恣肆、豪迈奔放，酷似太白。

他的文章，亦负盛名，当时即有人言“意新格创”，有的文章更“如风行水，如水行地”，堪称一绝。同广府人诗文传统相关，其文颇见汉魏风骨，如《书黄仲则诗集后》等，但不怎受骈偶之限制，他在《听松庐骈体文抄》自序：“《虞书》纪事，不少骈辞；《周易》文言，亦多偶句，谓必单行乃为古文，是耳目之论也。骈体所贵，树风骨于汉魏，撷情韵于六朝，以意运辞而不累于辞，以气行意而不滞于意，与古文体貌虽异，神理弗殊。至由唐逮宋，风格近卑。然文章开降，与时推移，既有此体，遂不可废，持择者分别观之可耳。”

张维屏后，广府出了两位大学者，陈澧与朱次琦。相伴更有不少文人骚客，蔚为奇观。人称陈、朱并出，遥与陈白沙后先辉映，为诗坛一佳话。

陈澧（1801—1882）番禺人，他博学多才，除经学外，天文地理、音韵乐律、文字算学，无一不通，有《东塾读书记》、《汉儒通义》、《声律通考》、《切韵考》、《东塾集》等，著述丰厚。

他的学术之名每每掩去其诗名，其实，诗也是上乘的。程恩泽称“近人诗多困卧纸上”，独陈澧诗为“此能于纸上跃起者。”评价颇高，此处录一首《十九夜》：

中秋一醉不嫌迟，莫负今宵把酒卮。
人有幽怀爱深夜，天将明月答新诗。
四山雨气全成水，一桁楼阴倒入池。
野鸭闲鸥都睡了，此时清兴有谁知。

诗境静穆，心境自明澈矣。

陈澧作为学者，亦以能文著称，他的散文，风格苍健，文简意闳，脉理清晰，纡徐委曲，卓然自成一格，如《郑小谷〈补学轩文集〉序》、《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书尉先生》等。

朱次琦（1807—1882），南海九江人，故后亦称之为“九江

先生”。其学术人品皆高，康有为曾称：“先生壁立千仞，而其学平实敦大，皆出躬行之馀。以末世污浊，特重气节，而主济人经世，不为无用之空谈高论。”^{②5}

其诗佳作迭出，如《怀廖二熊光清远县》：

直北风声劲，平西日气迷。
秋从双峡老，天入百蛮低。
异地容龙性，前程信马蹄。
行人例回首，肯听子规啼。

五言如此，七绝又不同：

一盞寒泉供养来，楚骚馀裔亦仙才。
前身合是梅花骨，流水空山独自开。

前者沉郁苍健，后者却淡雅见性。后人评论道：“综观其诗，韵高而意远，树骨汉魏，取神初唐，顿挫沉郁，尤得杜陵真髓，独漉后一人而已。”^{②6}

其时，不仅诗歌兴盛，散文亦繁荣，在陈、朱间，亦有梁廷枏、谭莹、汪瑑等一代名家。

梁廷枏（1796 - 1861），顺德人。入仕时颇留心时务，推许西方民主制，林则徐任两广总督时，应邀入幕，对禁烟抗英，多所规划。其为广府著述大家，史学著作主要有《南越丛书》二种五卷、《南汉丛书》四种四十二卷，是古南越、南汉国史集大成者。还有《海国四说》、《夷氛闻记》五卷、《粤海关志》三十卷、《海防汇览》四十二卷等。

谭莹（1800 - 1871）南海人。亦诗文并茂，著述甚丰，有《乐志堂文集》十八卷，续集二卷。且为文献学者，刻书数百卷。

汪瑑（1827 - 1891），诗词文俱佳，有《随山馆丛稿》四卷。

此间，还有太平天国诗文众多。紧接着，便是大诗人黄遵宪，考虑到他们均应列入客家文化的范畴，这里就按下不表了。

三、思想家与作家集于一身

作为戊戌变法二大领袖的康有为、梁启超，不仅在思想史上是一代伟人，在文学史上也功绩卓著。由于政声高于文名，其诗文往往不被多加注意。故在此多写几笔。

关于康有为的诗、梁启超曾称“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⑳更有人称“纯脱然入乎古人出乎古人”、“反虚八浑、积健为健”^㉑由此可见其诗歌思想性之强、艺术性之高，当为拔萃者。

先读其《出都留别诸公》之二：

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
怀抱芳馨兰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重。
眼中国事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
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峰。

汪洋恣肆，上天入地，似闻《离骚》余韵，又见太白《古风》。在他的诗中，对清朝的黑暗、腐败，每每痛心疾首，对百姓的贫穷、苦难，更为之奔走呼号；尤其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万分愤慨，却痛无回天之力，如《闻邓铁香鸿胪安南画界撤还却寄》：

山河尺寸堪伤痛，鳞介冠裳孰少多？
杜牧《罪言》犹未得，贾生痛哭竟如何！
更无十万横磨剑，畴唱三千《敕勒歌》！
便欲极舆长奉母，似闻沧海有惊波。

他的诗，记录了整部中国维新史，兼之海外流亡十数年，又写下大量异域诗章，亦可称之为世界风俗史，所以，在“诗史”上，他堪称杜甫之后又一大家。他笔力雄健，遣宇宙万象、经史百家人诗中，境界高远，辞采瑰丽，自成一格。

他的文章亦不亚于诗，故亦有人认为他“平生最大的成就，实在散文方面，瑰奇雄丽，于清末自成一家。”^㉒他写了不少政

治论文，宣传变法，又有文学论文、书信、游记，艺术性均为上乘。政论，大笔淋漓，气吞万里如虎；文论，新奇瑰丽，融哲理与遐想于一体……这里就不逐篇引述了。

他的学生、战友梁启超，虽说变法中名列其后，但在学术上的声名，却不让于他，成就更要大一些。

梁启超散文成就最高，其所创制的“新文体”，更开一代散文之风，为历代文学史家所推崇。他才气横溢，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动辄万字，力避古奥，务求平易畅达，故“新文体”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他的名篇如《论自由》、《论进步》、《论毅力》等，均力敌千钧，很有鼓动性。尤其是他上书袁世凯，反对袁称帝后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文辞犀利尖刻，令政敌胆寒。

他写了不少传记，也别开生面。而杂文，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如《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等，“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梁启超亦大声疾呼“诗界革命”，力求冲破传统的束缚，以散文化句式自由抒写，把新思想、新知识、新术语及口语纳入诗中。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壮志不改，仍写《读陆放翁集》：

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

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他的长篇巨制《二十世纪太平洋歌》，纵论古今，气势非凡，当是“诗界革命”代表作。

他更提出“小说界革命”，强调小说的社会功用，认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

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正是他，把历代正统文论家所鄙薄的小说，上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这是他对中国小说发展的重大贡献。

他还倡言“文界革命”，力主革新文章内容，输入西方的文化思想，并且最早提倡白话文。

梁启超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涉猎颇广，是我国近代一代文化大师。正因为他的功绩。在于开创，因此，也就留有不多深化、完善的余地，我们也不可在这上面苛求于他，苛求于所有的开拓者。要紧的是第一步，没有第一步，也就谈不上第二步、第三步了。梁启超集中外文化于一身，更以维新变法、振兴中华、改造国民性为己任，所做的实在是太多了，其“雄飞宇内”的理想，也不可能在他这一代人中实现，尚须后人继续奋斗为继。

四、大师级人物呼之欲出

康、梁之外，近代岭南的诗坛，亦有“四家”著称于世。这近代的“岭南四家”，有番禺人梁鼎芬、揭阳人曾习经，顺德人罗惇龢与黄节其中三人为广府人，以梁、黄最负盛名。

梁鼎芬（1859—1920），曾学于大学者陈澧之门，光绪六年进士，因直言反对李鸿章于中法战争中一味主和被贬，几起几落。后人编有《节庵先生遗诗》六卷及续篇、《节庵先生遗稿》等。生逢末世，他写了不少感时伤事的诗篇，为国为民深深忧虑，如中法战争中，有《秋怀》：

羁怀了无泊，抛去又相寻。
闻雁知兵气，看花长道心。
百年红烛短，一水夕阳深。

独有双龙剑，时时壁上吟。

因反言和被斥“妄劾”，降职离京，遂作《出都留别往还》一诗：

凄然诸子赋临歧，折尽秋亭杨柳枝。
此日觚棱犹在眼，今生犬马恐无期。
白云迢递心先往，黄鹄飞骞世岂知。
兰佩荷衣好将息，思量正是负恩时。

此诗“芳菲悱恻，一时传诵”。

他在诗歌的艺术风格上可谓独树一帜，或悲慨，或超逸，人所推崇的有《春日园林》：

芳菲时节竟谁知，燕燕莺莺各护持。
一水饮人分冷暖，众花经雨有安危。
冒寒翠袖凭栏暂，向晚疏钟出树迟。
倘是无端感春序，樊川未老鬓如丝。

罗惇齋（1872 - 1924），在京城，曾以慷慨倾囊，救助京剧名师程砚秋而一时传诵。临死前嘱后人不得把他的官职刻于碑上，只写“诗人罗瘦公之墓”七字。

在四家中，他的诗以冲淡平和为特色，其意境深迥，造境冲夷，以写景见长，如《半山寺即荆公舍宅》：

乱栽花竹公归处，舍宅千秋剩此堂。
髡柳尚傲含雨翠，万荷齐柄远风香。
争墩转益林泉趣，补屋宁知草树荒。
更策疲驴冲潦去，钟山一角坐招凉。

其语淡而情深，让人发思古幽情。

七绝中不迭佳作，如《香山雨香岩杂诗》：

清晨自课踏青峦，小住能令腰脚顽。
莫笑老夫忘世事，爱将朝局作云看。

黄节称其“于世可深而不求深于世，学书可深而不求深于

书，学诗可深而不求深于诗”。^③

过于冲淡随缘，在四家中稍为逊色。但亦有他人不可取代之长处。

而在“岭南四家”中，首屈一指，无论在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造诣上，理推黄节（1879—1935）。青年时东渡日本，又回上海与邓实、刘师培组织“国学保存会”，以宣传国学，反清革命。1909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为广东高等学堂监督。后赴京供职，袁氏称帝时愤而辞职。1917年，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23年为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府秘书长。后历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1924年赴京，任清华研究院导师。1935年病逝于北京。著有《蒹葭楼诗》二卷，《诗学》、《诗律》及多种汉魏诗人诗作笺注。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学者。

黄节一生正直不阿、赤心报国。他在国学保存会中编《国粹日报》、以辨华夷之义，致力于激扬顾炎武、王船山的民族精神，透出反清思想，其师简朝亮（顺德名儒）极力劝阻，但黄节仍不改初衷。两江总督端方想收买他，好抑止其激进的言论，也遭他断然拒绝。袁氏称帝，他挺身而出，致书筹安会以表反对，遂辞官南归，更见高风亮节。及至晚年，“九·一八”事变，仍慷慨陈词，年近花甲还得了个“热血男儿”的美称。

他最大的成就是学术著作与诗作。清乾隆间学者檀萃曾称岭南诗论，自“三家之后，诗道日卑……而先辈之流风余韵，杳不可追矣。”但到了黄遵宪、黄节，也就远远超过屈、陈、梁三家了。他的著述，如《诗旨纂辞》、《变雅》、《汉魏乐府风笺》、《魏文帝魏武帝诗注》、《曹子建诗注》、《阮步兵诗注》、《谢康乐诗注》、《鲍参军诗注集说》、《顾亭林诗说》等，均是后学者在汉魏六朝诗文典籍研究中的典范。

黄节写诗，力主“陈想尽除”、“陈言务去”，其语言、意境，

均刻意追求，自成一家。早年气魄雄伟、悲愤激昂。甲午战争失败，他愤然道：“东望春可怜，千里碧血渍。山高风鹤哀，将军死无地。……丈夫拊髀惊，冲冠裂目眦。”并称“我少学兵法，亦明古武备。何必怯舟师？何必畏利器？苟得死上心，无敌有大义。天下岂无人，苍苍果谁寄？”

中年诗作格调沉郁悲恸，声泪交并。如他三十三岁生日时写的《生朝》：

堕地未容窥究竟，春风回首独分明。
桑能贯矢身安托，柳已成围事屡更。
歌哭且留他日泪，死生齐迸此时愤。
引绁负尽人间世，恐食飞鱼得更生。

1918年与邓实重晤，作《沪江重晤秋枚》：

国事如斯岂所期？当年与子辨华夷。
数人心力能回变，廿载流光坐致悲。
不反江河仍日下，每闻风雨动吾思。
重逢莫作蹉跎语，正为栖栖在乱离。

这是他传诵一时的名作，其感慨之深，非当时当局所能体察也。他的不少诗，寓意深刻，沉郁苍凉，人称其“宋骨唐面”，既有唐人的文采风华，又有宋人的骨格峭健——这便是他高于同时代人的诗歌艺术特色。

他独钟于汉魏六朝诗文的研究，这应是历代广府文人的一条颇值得研究的思路。正如本节从阴铿说起一样，汉魏六朝，广府诗文之盛，不亚中原，且对隋唐有开创之功，当另有一大文章作详尽分析，这里只能点到为止。

黄节自命其室“蒹葭楼”，取《蒹葭》一诗中对“伊人”之追慕，故诗集中对故友一片至情，如《十月十一日夜，月中有怀曼殊》诗：

四载离惊感索居，忆君南渡又年馀。

未遑踪迹人间世，稍慰平安海外书。
向晚梅花才数点，当头明月满庭除。
绝胜风景怀人地，回首江楼却不如。

这苏曼殊（1884 - 1918）当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一位诗僧、情僧、奇僧了。他博学多才，能诗会文，又擅丹青，精通多门外语，译有不少作品，当年，倾倒了一代青年读者。柳亚子曾用“不可无一，不可有二”来评价他，可见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怎样独特的地位。

他是香山入，名戡，曼殊是他出家后的法号。其父苏杰为旅日华侨，他则出生于日本，生母为日本人。其六岁随嫡母返香山，入乡塾，后至上海，从西班牙人庄湘博士习英文。以后，又到日本，再又回上海、下香港，19岁突然去惠州慧龙寺落发为僧。以后过上了亦僧亦俗的生活。他热烈追求爱情，却又出家为僧，从此浪游沪宁、湘浙，日本、南洋新加坡、泰国、印尼……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其诗中，反清、反袁之作，很有骨气与胆识，如《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海天龙战血玄黄，披发长歌览大荒。
易水萧萧人去也，一天明月白如霜。

当然，其使青年人如醉如痴的，却是不少情诗，以僧侣之身谈情爱，已惊世骇俗，更何况写得浪漫而神秘呢，如《为调筝人绘像》：

收拾禅心侍镜台，沾泥残絮有沉哀。
湖弦洒遍胭脂泪，香火重生劫后灰。

这类诗不少，禅心、爱意两相矛盾，真率坦白，哀婉动人。在他身上，表现出一代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的激情与困厄，所以才赢得那么多知音。

他的文言小说，也写得缠绵悱恻。奇文莫如长篇《惨世界》，

假托译书为名，把晚清社会时弊指斥无遗。后发表的《断鸿零雁记》等六篇文言小说，都是通过爱情婚姻悲剧的描写，在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这些小说，无论情节上、人物刻画上，都已接近现代艺术形式的境界了。他把中西、古今各种表现形式，引入小说创作中，无疑对我国“五四”以来新小说的形成，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而称得上近代小说大家，且在中国小说史上有很高地位的，则有吴沃尧与他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中国近代文学上，它与《官场现形记》形成了封建末世文学上一道风景线，与鸦片战争时的抗英文学首尾相衔，在广府文学中熠熠生辉，更在整个中国文学中异军突起。

由于这两部小说开了先河，类似的暴露性小说便接踵而出了。一个很明显的地域特征是，这类小说均出现在南方，出现在沪穗一带，这是意味深长的。南方，哺育了康梁、孙黄等一代改良主义者与革命家，这在前边已经写到了，这得风气之先，不仅影响了思想家、政治家，也同样影响到了文学家们。这是时代使然。所谓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是也。这类小说未可出现于封建正统的北方，这也是必然的。鲁迅把这类小说叫作“谴责小说”（见《中国小说史略》），并指出，清王朝自嘉庆以来，虽然已镇压了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和回民的起义，可在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一一败北，充分暴露了这个腐朽的王朝全然没有保卫自己国家的能力。所以，“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愆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掎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正是在这类谴责小说里，把清王朝整个统治机构及当时的中

国社会的黑暗、丑恶暴露无遗，这是一种绝望后的鞭挞，却也教人猛醒，对封建末世更为鄙视与仇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革命者，爱国者以及坚信未来拥有希望的读者来说，则是有相当积极的作用的。这是南方的反叛，不独是思想的反叛，也包括有文学上的反叛。

谴责小说为广府近代文学落下了辉煌的大幕。

吴沃尧便是最杰出的代表。

吴沃尧（1866 - 1910），其原籍为佛山，所以又号“我佛山人”。其号为趸人。出生时，家道中落，就读于“人才最盛”的佛山书院，十六七岁往上海谋生，1897年，先后主《字林沪报》、《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笔政，声名日著。后致力于小说创作。他生在中国民族危机、外侮日著、事变迭起的岁月，忧心忡忡，认为“无开化，无进步”，便“不能维新”。所以，用通俗小说来批判封建末世，从1903年10月起至去世前七八年间，发表了《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新石头记》、……等近二十部长篇及众多短篇、札记小说，以及不少笑话、寓言、戏曲等，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代表作，仍当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它与《官场现形记》于当时齐名，同为谴责小说的扛鼎之作，全书一百零八回，带有一定的自传性质。主人公“九死一生”，经历了自1884年中法战争至1904年前后二十多年中国的动荡生活，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吏治的黑暗腐败，刻划了众多灵魂卑污的官吏的丑态，同时，也着力抨击了德行伦常的虚伪与沦丧。

其见识过人处，在他认为“商场”较“官场”干净，也就是“人的独立性建立在物的依附性”要比“人的依附性”（马克思语）要进步，这是很难得的；同时，他亦寄望于以“道德救国”作为“实业救国”相辅相成的措施……

他在艺术上也勇于探索，有可喜的成就，如长篇用第一人称

叙述法，在他之前实属罕有；艺术结构也自成一格。

吴趼人的《痛史》，作为历史小说，以南宋末年抗元斗争为背景展开，燃起火样的爱国激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很大影响。

他的小说，在中国旧、新小说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对认识清末社会与探索中国小说发展规律，都有重大意义。

吴趼人之后，还有黄小配（1871 - 1912），番禺人，著有《洪秀全演义》、《廿载繁华梦》、《宦海升沉录》（即《袁世凯》）等十五种章回体中长篇小说，当时也有相当强烈的反响。

从广府古代及近代文学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汉魏六朝，以杨孚、阴铿为代表的一批诗人，“开吾粤风雅之先”，其功不可没。及至其后，相对沉寂，直至宋末明初，又异军突起，后来居上，直至推出不少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师。这说明，广府文学史自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并不完全滞后于中原，亦更非所谓“文化沙漠”，它得自珠江流域作为海洋文明的独特精神气候，是另一种文章，当须另一种目光与尺度来评价。可以预期，随着宋明文化中心南移，更大的辉煌，当在今后。

五、客籍作家群落

前边几节，讲述的是珠江流域或广府核心地区的文学发展，其实，由于历史的发展，群体的互动增强，个性的激发也愈加凸出，更何况文学又更具“个人化”特点，所以，在广府文学发生的同时，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民系文学的发生。它们或许交互、相融，浑然一体，或许相对独立，自有不同轨迹。

而后者，最为突出的，便是近代客籍作家的崛起。

客家文学史中，有追溯到其先民在唐宋的文学功绩，包括了唐代开元贤相张九龄的诗文，唐末邵谒的五言古诗，宋代的粤东

诗人占成之、蓝奎、罗孟郊、蔡蒙古等。但当时客家民系尚未完全形成。其划分尚有可商榷的余地，总的可算作粤人吧。至于入粤的名人，如苏轼、韩愈，一直到文天祥、汤显祖等，我们自然会予以充分评价的。

严格地说，客家文学形成气候并一枝独秀，当从明清之交算起，这期间，有“明清八大家”之一的廖燕（1644—1705），韶州曲江人，其著作《二十七松堂集》多次出版，远播海外，在1862年，便有了日本文久版。人称其“大家笔墨，间非凡手可及”。其历史论文《明太祖论》、《高宗杀武穆论》等，颇有真知灼见。尤其是《金圣叹先生传》，更是字字珠玑，力透纸背。文末评点：

余读先生所评诸书，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觉作者千百年来，至此始开生面，呜呼！何其贤哉！虽罹惨祸而非其罪，君子伤之。而说者谓文章妙秘即天地妙秘，一旦发泄无余，不无犯鬼神所忌。则先生之祸，其亦有以致之欤！然画龙点睛，金针随度，使天下后学悉悟作文用笔墨法者，先生力也。

廖燕的诗也是颇负盛名，其最有客家特色的，当推《曲江竹枝词》，笔下客家风情万种：

河西万室绕溪斜，
另得闲游女作家。
汲水溪边都跣足，
樵妇插得满头花。

而最早的客家小说者，则应推黄岩的《岭南逸史》。

黄岩，大致为清乾隆时代人，程乡（今梅县）人，人称其著作等身，诗尤苍老，纯乎唐音。《岭南逸史》是中篇章回小说，凡28回。主人公是客家士子黄逢玉，以他与张贵儿、李小环、梅映雪、谢金莲的爱情、婚姻纠葛为主线展开，虽不脱才子佳人小说窠臼，但“千变万化而复无事荒唐”，很有历史真实感，又

有引人入胜的情节，有一见钟情，以身相托；有瑶族女王亲自选夫婿；又有生离死别，众女释前怨，共救黄逢玉的血战；还有黄逢玉荡平寇盗……等等，“标新领异，据实敷陈，堪与国史相表里”，写出了民族融合的历程。

小说不仅运用了大量客家山歌，还使用了众多客地的方言土语，人物刻划，匠心独运，不失为南方一部有地方特色的力作。

而首推第一客籍诗人的，当是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有一席之地
的宋湘。

宋湘（1757—1826），嘉应州，即今梅州人。清史有传。著名学者钱仲联称“南邦屈宋无前辈”，把他与屈大均并列，视为岭南的屈原、宋玉，并说明“清初岭南诗人，屈翁山为冠，中期无有出宋芷湾上者。”他的《红杏山房诗钞》，一版再版；其书法视奉为拱壁，对联更传诵不衰。

宋湘出长丰湖书院，再又出任粤秀书院院长，后返京授翰林院编修。曾外放云南曲靖13年。再升任湖北督粮道。

除开大量的展现客家风情的诗歌外，他还“以诗论诗”，有相当出色的诗论。宋诗中，充满了特有的客家情调，客地的田园风光，以及客家文化风情，牧童“叱犊声喧野”，浣女“湔裙影倒渊”，农夫“蓑衣携插出，箬笠采山还”，以及“风雨归渔筏”、“榕径歇柴肩”……令他“长歌爱樵斧，短笛羨牛牵。”

其著名的《西湖棹歌》五首中更有：

卢桔杨梅烂不收，荔枝龙眼出城头。

东坡若解西湖乐，早解朝官住惠州。

宋诗亦有雷霆之力、浩然之气，如写船夫征服急流险滩的《下蓬辣滩》：

群山森盘回，滩声破天地。

山鬼不敢啼，客舟行且至。

且至夫如何，两桨插两翅。

天上一叶飞，雷霆落气势。

他的诗论，尤为强调、突出自我，如《说诗八首》中：

学韩学杜学髯苏，自是排场与众殊。

若使自家无曲子，等闲铙鼓与笙竽。

他强调诗作皆应“从灵腑中流出”，后人则称他“独往独来，全在意兴”。他不仅在客籍诗人中，而且在整个粤诗中，堪称巨擘也。

宋湘之后，客籍诗人中，更出现了黄遵宪，丘逢甲这般洪钟大吕式的历史人物，他们不仅是大诗人，而且是伟大的爱国者。

黄遵宪（1848—1905）是中国近代“诗界革命”的旗帜，时人称之为“中国诗界之哥伦布”。他力主“我手写我口”的创作宗旨，且创作了大量反映近代社会重大历史事件的诗歌，与杜甫一样，为前后两“诗史”，梁启超认为“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单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

少年黄遵宪，就以杜甫诗“一览众山水”破题，出句惊人：“天下犹为小，何论眼底山”，透出他的远大志向。入仕后，曾东渡扶桑，任驻日使馆参赞，当了14年外交官，先后去过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任总领事或参赞。在中国积弱、列强肆虐之际，他用自己的诗歌，抒发激情与爱国情怀——自是在海外有更深的感受。《赠梁任父同年》是炙烩人口的名篇：

寸寸河山寸寸金，孤离分裂力谁任？

杜鹃再拜忧天泪，精卫无穷填海心。

对列强分裂、鲸吞中国领土义愤填膺。

“我手写我口”是黄遵宪响应梁启超“文界革命”之际所举起的“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它强调的是抒发“我”自己的情怀，并且用人人能懂的口语，这对于旧诗无异于是标新立异了。他还身体力行，亲自辑录客家山歌，“采其能笔于书者”，视之为“天籁”，如其《山歌》中所辑的：

催人出门鸡乱啼，送人离别水东西。

挽水西流不容易，从今不养五更鸡。

真是“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人籟易为，天籁难学也。”

他号“人境庐主”，自有深意。当使节得归家，先后写有上百万字的《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等，最著名的，则是《人境庐诗草》及《人境庐集外诗辑》。在美国时，他亲自出面交涉，争取了大批因种族歧视而身陷囹圄的华侨得到释放，被美洲侨领司徒美堂称之为“中国历来驻美外交官中唯一能做保护华侨工作之人。”甲午战争，闻爱国志士在台湾发动反割让拒日寇斗争，更奋笔疾书：

亡秦者谁三户楚，何见闽粤百万户！

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我手写我口”的创作主张，加上无法割断的“客家情结”，是黄遵宪文学创作的三大特色，后者如《己亥杂诗》中：

筲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

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

高度概括了客家人千年迁徙、万里长旋，始终坚守自己的文化边界的一部历史。

在《台湾行》一诗中，黄遵宪写有：

万众一心谁敢侮，一声拔剑起击柱！

这写的却是同时代另一位客家志士、爱国诗人丘逢甲。

丘逢甲（1864—1912）原籍广东镇平（即今蕉岭），出生于台湾苗栗县。1895年，即甲午战争后，奉旨回粤。辛亥革命胜利后，他赴南京出任参议院议员。

清廷割让台湾，他愤而咬指血书：“拒倭守土”，并多次刺血上书，要求“废约再战”。清廷却以“台抗京危”为由，更赶紧把台湾交割给日本。由此，丘逢甲在台湾率部奋起抵抗，打了几

个大战役，连日寇指挥官能久亲王也一命呜呼。毕竟敌众我寡，义军弹尽粮绝，伤亡过半，丘逢甲在部将力劝“台虽亡，能强祖国则可复土雪耻”，挥泪返粤，临别赠诗：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回国后，他致力于兴学，参与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并成中为当中“巨子”，又积极参加辛亥革命，策动广东独立于清朝。后重病，年仅49岁，临终嘱家人：“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

丘逢甲的主要代表作为《岭云海日楼诗钞》，之所以用这个名字，是寓身在“岭云”中，心往“海日”驰之意，念念不忘台湾。所以，诗钞中最突出的内容，便是怀念沦陷后的台湾：

《春愁》：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天涯》：

天涯雁断少书还，梦入虚无缥缈间。

兵火余生心易碎，愁人未老鬓先斑。

没蕃亲故沧沧海，归汉郎官遁故山。

已分生离同死别，不堪挥泪说台湾。

直至十多年后，朋友提及往事，他仍——

多君欲问台湾事，曾作大将军现身。

满目劫尘无法说，青天碧海哭诗人。

诗钞中，他一再悲叹“风雪满天尘满地”，“半壁江山半腥血”，担心“金刀欲下踌躇甚，多恐神州似此分”疾呼：“偏呼黄帝诸孙起，莫作华胥国里人！”

与此同时，他对祖地炽热的“寻根”之心，也跃然纸上，有《忆上杭旧游》15首，内四：

寻碑亲拜左丞墳，谱牒都成史阙文。

七百年来遗老尽，更无人说旧参军。

还有“仗剑归来人事改，故居只有青山在……孙枝万叶偏东南，白宰能归奠尊酒。”

黄、丘二位，当是近代史上，作为中国一代诗杰及爱国志士高高地屹立，应当说，正是激烈的爱国情怀，才熔铸出他们足以传之不朽诗篇。伟大的诗篇，当出自伟大的人格，二者是分不开的。

与黄、丘同时代的客籍文学家、诗人中，还有胡曦（1844—1907），兴宁县人，其著述甚丰，计40多种，主要有《湛此心斋诗集》（十二卷）《湛此心斋文集》（四卷），以及骈文钞、竹枝词、诗话等等。

温仲和（1849—1904），嘉应州松口堡人，曾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翰林院检讨。因母丧归家，从此致力于办教育，主纂《光绪嘉应州志》。主要著作有《求在我斋集》，后人称其“诗联俱佳”。

其间，还出现了好几位客家女诗人。

主要有范萸香（1797—1884），大埔县人。有诗近千首，惜重刊《化碧集》，只见百多首，但在其身后一刊再刊，影响甚巨，其情其才，人称“骇心魂，泣鬼神，至其气之沉雄，才之排奁，直欲登浣花之堂而啖其馘矣。”

叶璧华（1844—1915）嘉应州白渡堡人。毕生致力于在家兴创办第一所女校——懿德女校，并留下了诗钞《古香阁集》。后人评述其“清绮秀妍”、“冰肌玉骨，吐气成虹”，至情至性，为奇女子也，在那样一个封建年代，殊为难得。

客籍作家的崛起，与整个民系在近代脱颖而出，一鸣惊人是分不开的，这也是一种文学气候使然。而随客家文学兴起之势，潮汕也开始推出自己的文化人了。

第四节 现当代文学新一页

一、早期诗歌与散文的特征

“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5月11日，广州东堤便举行了几万人的国民大会，到会者以青年学生为主，却得到了工农群众的支持。由此，也同时揭开广府现代文学的新一页。正如茅盾指出的，“新文学的提倡差不多成为五四的主要口号”。

孙中山的助手朱执信，在北京直接参加了“五四”运动，拥护新文学，力主用白话写文章。正是他，用白话写下了岭南最早的新诗和小说，他的小说《超儿》，发表在《新建设》1919年第1卷第2号上，5千多字，是广府人中最早用白话写的新小说。《超儿》附记说明，“惟欲于人生问题，稍引起读书界之兴味而已”，它尖锐地抨击和讽刺了“支配别人”的封建道德意识及极端利己主义的人生观，且语言清新流畅，注重人物性格刻画，并初具近代西方小说的结构和手法，在新文学中亦是不可忽略的启蒙开篇之一。

由于广东诗界有梁启超等“诗界革命”主张，诗坛上革新之风日盛，新文学运动兴起，诗歌便首当其冲。于是，由近代的“诗界革命”进到现代的新诗运动，也就一脉相连，顺理成章了。新诗运动，可以说是真正的诗界革命。诗人们继承了“诗界革命”的传统，终于以白话取代文言，打破了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

在广府，以《广东省会学生联合会月报》为发轫，于1918年10月创刊号上，便发表了《暴风歌》等多首新诗，引起了众人的反响。不久，广东不少刊物也发表了白话新诗。朱执信一马当先，著名革命先烈彭湃，更身体力行，写下了《农民革命歌》、《田仔骂田公》等，以反映海陆丰的农民运动。

在广府现代新诗中，成就最突出、也是最早崛起的诗人，当数梁宗岱（1903—1985），他是新会人，出身贫寒，自幼随父浪迹天涯，13岁才回到家乡，就读于广州培正中学这么一所教会学校。他自18岁始，便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诗歌，被誉为才华洋溢的南国诗人，直到1923年赴法留学止，不到两年，写下了200多首新诗。并成为文学研究会第一个广东会员。后来又与刘思慕等组织了文学研究会广州分会。1924年12月，他在上海出版了诗集《晚祷》，这是广府第一本新诗集。朱自清对此曾有评介：“梁君之诗有独具的风格，与别的作家显有不同之处，喜欢研究新诗者不可不读。”

梁称诗为“自我最高的表现”，是“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在当时反对封建束缚、倡导个性解放之际，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其诗中丰富的象征意象，也是与同时代诗人所不一样的。如他的《散后》：“竹林啊！/我每朝从你身边经过，/把你一片叶儿摘下。/你叶尖的凉露/就滴在我的手上——啊，我的泪啊。”把清美的竹露拟作凄苦的泪珠。

他一度赴法国留学，自是倾慕那里兴盛的象征主义。不过，同在《散后》，他亦称“悲哀安慰人生道：/‘我是礁石，/我愿在你的坦荡荡的流水中，/溅起无数的雪花似的浪花，/使你越觉得美丽的。’”分明又趋向于净化与美好，出脱于哀惋、悲伤之上。这也使得他的象征与暗示的手法，要自然、清新、晓畅得多。在“五四”时期粗疏、浅露、平直的白话诗中，这无疑是一种新格局，故“不可不读”。

同样受象征派影响，却仍能表现出自己风格，在抒情意象上要清丽、明朗得多的，还有一位广府诗人冯乃超（1902—1983），他是南海人，出生于日本横滨，8岁即随母亲与弟妹回到故乡读私塾，其时正是辛亥革命前夜，颇为革命的风涛所鼓舞。他潜心于西方哲学，亦热心文学，1926年辑成诗集《红纱灯》，是创造

社后期的重要诗人。

《红纱灯》中，写了个森严黑暗的殿堂，在其中央，有一盏红纱灯，“缓缓地渐渐地放大了光晕”，从而使这里黑暗的世界，“撒满了庄重的黄金”。另一首《残烛》，更写道，“焰光的核心有青色的悲哀”，但却“飞蛾扑向残烛的焰心”、“我愿效灯蛾的无智，/委身作情热火化的尘埃。”这几首诗，在哀伤的象征主义中，注入了浪漫的情怀，于黑暗的底色上点起了亮光。因此，也有人认为，他是象征主义与浪漫主义相交融的现代诗人。

而成为岭南新文学第一位散文作家的，则是如今公认的我国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1903— ），他于1927年在上海书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荔枝小品》，这也是岭南的新文学第一本散文集。史家评述：“如果说，梁宗岱以自己的白话新诗，冲破了旧体诗的束缚，确立了岭南新诗的正宗地位，那么钟敬文则是在散文的领域里，洗脱文言文的痕迹，开拓了新的局面。”在当时则誉为“新文艺的小品中的优秀之作”。他的散文，平和、冲淡、静默、夹叙夹议，却不乏热情，加以知识的广博，显得境界开阔，内容丰富，情景交融，颇有情趣，如《荔枝小品》、《再读荔枝》等。当时郁达夫称之为“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是十分恰如其份的。

早期广府新文学，从这三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出端倪来。它较早地在艺术上接受来自西方的影响，却缺乏北方那种慷慨激昂、气势如虹的壮观，也有别于当时岭南的客家新文学——如黄药眠的慷慨雄浑。但其清新、明朗、豁达，却仍与广府人的天性相一致的。

这个时期内，有两位客籍作家，取得更为卓著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只由于过去的偏见，不少文学史上，不是回避，便是语焉不详。所以，这里须补上一笔。

第一位是我国现代象征派诗歌的开山人、奠基者李金发

(1900—)，粤东梅县人，1919年留学法国学雕塑，1920年开始写诗。其时，正是西方象征派诗歌兴起之际，艾略特的著名代表作《荒原》便是发表在这个时期。而李金发的成名作《弃妇》也几乎发表在同一时间。笔者曾专门有这两首诗的比较论，指出其有“不少可比之处，不独在意象、暗喻等象征性手法的运用，还在各自对各自所在民族的古典文化的传承，以及作品中体现的贵族气——阳春白雪，当是一个时代文学高峰的标志。”

我国著名散文家、学者朱自清亦在当时指出，李诗是突起的“一支异军”，是他“第一个人介绍”法国象征派诗“到中国诗里”来的。并说，“象征派诗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虽用文字，却朦胧了文字的意义，用暗示来表现情调。”

可以说，李金发为中国新诗走向真正的独立与成熟，即“纯诗”，还原诗的本体拓开了又一条大道，摒弃“文以载道”的传统，如他自己所称：“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所以他的美的世界，是创造在艺术上，不是建设在社会上。

《弃妇》写的是一位被遗弃的妇女，已无泪水来装饰冷漠的世界——这恰好与《荒原》的意象是极为接近的“四月是最残忍的岁月”、“枯骨伤不了人”……

人们无法忘掉李金发的名句：“如残叶溅/血在我们/脚上，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这当是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一个概括。生命意识与死亡意识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一名句，当是李金发的一个绝唱。

李金发于1925年间，接连出版了《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等诗集，为中国象征派诗歌立起了第一座丰碑，虽说后来这一流派一度因种种原因而中断，但到了世纪末，当朦胧诗又一次异军突起之际，追根溯源，人们仍不得不承认李金发

当年开拓性的贡献。他扩大了中国新诗的题材领域，拓展了新诗的表现手法，促进了诗歌流派与风格的发展，功不可没。

如果说李金发的诗太“贵族化”了的话，那另一位客籍作家张资平则是走“平民化”的路子，甚至流于世俗化了。

张资平（1893—1959），早年留学日本，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著名的文学社团创造社的创始人“四大天王”之一，另三位是郭沫若、郁达夫与成仿吾，无论是从作品反映的社会问题，还是所描写的对象来说，张资平却是彻底地平民化了，这与他自称深受当时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思潮所分不开，他力主“身边小说”，便是这一审美取向的反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发表于1922年）以及众多名篇，如《梅岭之春》、《苔莉》，包括茅盾极为称道的《上帝的儿女们》等，均充分表现了他的艺术价值观。时人称道他运用的白话文的流畅程度，在当时的小说家中首推第一，不似他人文白夹杂——换句话说，他最成功地把平民语言运用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不仅语言，他的创作倾向、写实手法，以及早期作品中的人道主义色彩，都与他的平民思想分不开。他之所以成为当时“海派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正是平民、市民当中无法摆脱的金钱压迫、情感变异这一系列“身边纠葛”在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时人批评他专写三角恋爱，写人的原始性欲冲动，多少不够公允。当时的青年评论家李长之便提出过异议，而今，在重评张的作品时，徐肖楠提出称之为“情幻小说”，当更切合实际。毫无疑问，张资平小说在“五四”以来的文学作品中，其反封建、反对包办婚姻、争取自主、追求爱情上，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在揭露精神箝制至性压抑上，更是不可多得。

在当时的作家中，张资平出版作品的数量是最大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张爱玲在追忆其中学时代生活曾称，张的小说她一本也不放过，也就是说，张爱玲后来成为名重一时的市民小说作

家，则是从读张的小说开始的。二张则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中市民小说的开拓者。目前，研究张资平作品已重新开始，当有新的发现与新的观点。

张资平一共出了 20 多部中长篇小说，这在短短的七八年间，不少作品，如《飞絮》、《最后的幸福》更是八版九版之多。除开所谓“恋爱小说”之外，他主要作品，一类是留学生小说，也是留学生小说的开先河者，表现了“弱国子民”在海外的屈辱与对中国的怀念；二是前述的身边小说，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凄惨处境及“党国要人”的骄奢淫逸、横行霸道，另外还有若干揭露日寇的作品。

李金发、张资平，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异数”，如何重新认识他们，到今天也不是没有争议的。但两人在文学史上却是一个无可抹煞的存在，其积极意义也是不可以低估的。

二、向现实主义的转化

随着大革命的到来，广州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大熔炉。全国，尤其是北方的作家纷纷南下，一下子，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现代文学的大师们，都先后来到了广州，对广府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潮起潮落，由于大革命的失败，他们也都先后带着悲愤的心情离去，但其播下的种子，使广府新文学也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广府的左翼文学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先是大革命失败后，欧阳予倩于 1928 年底来到广州，要“替广东戏剧研究所打开场锣鼓”，不久即把田汉、洪深等都请来了。他批评了当时广东出现的认为作家是“超越了社会的人，著作是个人的著作，享乐是个人的享乐”，作家只是“为满足自己的美欲而创作”的唯美主

义思潮，强调要“注重现实”、为“现代民众所需要”而创作……

随着“九·一八”事变，广东左翼文艺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兴起了。进步的文学社团与刊物纷纷涌现。出了又禁，禁了又出；再禁则更名再出。这些刊物有“万人社”欧阳予倩等主编的《万人杂志》、“新艺术社”主编的《新艺术》；“一般艺术社”陈黄光、潘皮凡、李筱峰主编的《一般艺术》；“广州文艺”欧阳山、龚明、易巩、草明主编的《广州文艺》周刊；“绿天社”宋亦非、温流主编的《绿天》文艺半月刊；“力社”杜襟南、李行建主编的《诗歌》；江穆、杜埃主编的《火花》、饶彰风、杜埃、楼栖主编的《天王星》等等，一共有一百多种。由此，波及到了还被旧势力一度控制了了的香港。正是这势头下，1933年4月，广州的“左联”终于成立了。由欧阳山、龚明、周行负责。

“左联”成立后，虽然遭到了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乃至血腥镇压——广州文总六烈士温盛刚等就是被反动派集体杀害的——他们仍在短短的不到一年内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上演了一系列进步话剧，开展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出版了不少作品，包括粤语小说。

在“左联”被破坏，龚明等人被杀害之后，广州作家仍隐蔽下来继续斗争，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到来，他们又是先后创办了《文学生活》、《文学前哨》、《文学战线》、《国防文学》……等众多文艺刊物，发表了大量抗日题材作品。1936年年底，广州艺协成立了，并发表了宣言，“汇成一条中国历史空前未有的洪流——统一战线。”在这宣言中签名有杜埃、温流、李门、庐荻、楼栖、赖少其……等150人，显示了岭南文艺界最强大阵营。

而广府新文学，则由早期的象征主义、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化，毕竟，血与火的斗争，已不允许作家有那到多的闲情逸

致。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则是欧阳山、草明等。

欧阳山（1908 - 2000）如今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了，他是湖北荆州人，原名杨凤歧，自小随养父到外流浪，先后到过北京、陕西、镇江、上海等地，童年时最后到了广州，从此便立足于广州开始创作。早在1924年16岁时，还是读初二，便在上海的《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那一夜》。1926年，又在他主编的《广州文学》上连载了他第一部中篇小说《玫瑰残了》，这是广府新文学中第一部篇幅较长的作品。小说写了一个爱情的悲剧，要求冲出封建的罗网，得到人的尊严、人格的独立以及纯真的爱情。如他自己所说，“这种作品，只能对旧社会的一种愤怒的控拆，一种不平则鸣的呐喊，但如何改变这种贫困生活，出路何在，我是看不清楚的，指不出来的。”

后来1928年，他到了上海，一连写了七八部中长篇，成了职业作家。长篇小说《桃君的情人》、《爱之奔流》、《密斯红》则曲折反映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知识分子隐藏逃亡的困境，但大都淹没在多角恋爱的纠葛中。直到1931年，他的创作才有重大转折，把视角转向工农大众，转向广阔的社会现实。

中篇小说《竹尺和铁锤》直接写到了广州底层一群城市贫民悲惨的生活，他们投身罢工斗争，从而对黑暗的社会发出了愤怒的控诉。另一个中篇《崩决》则是写西江决堤后，洪水冲毁了一切，村民们的挣扎与扶持，把当时人物的变态，华南乡俗、人情、社会百态交融在一起，作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中篇《鬼巢》则写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反动派是如何冤杀七百多无辜百姓的……他还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描写了工农大众的不满与反抗。这些小说，艺术表现力丰富，技巧也日趋成熟，但为了避开当局森严的文网，写得有些难懂与晦涩。

抗日战争爆发后，欧阳山积极参与了抗日文化活动，辗转于广州、长沙、沅陵、重庆等地。先后创作了《三水两农夫》、《好邻居》、《爸爸打仗去了》、《流血纪念章》等大量反映抗战的大众小说，还写了一部描写农民在抗战期间所受的迫害及抗日要求的长篇小说《战果》。其笔下的人物，有落后、愚昧、自私的一面，又有纯洁、朴实、倔强的一面，所反映的社会是多角度的，所塑造的人物也是多重性的，但他们也都走向了抗日。

1941年，他与草明到了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后深入到延安县柳林子村南区合作社体验生活，写下了他的名著《高干大》。此书后来被译为俄、捷、匈、英、日等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高干大》描写了陕北边区合作化巩固和发展，塑造了一个忠心耿耿为群众谋利益、差点为之丧命的普通农民共产党员高干大的典型形象，但他并非十全十美，如欧阳山在序中所称：“他原先是一个十足的农民，后来逐渐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但还没变完……”、“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一个可爱可敬的人，一个从贫瘠的土壤生成起来的英雄人物。”

解放后，他一直生活在广州，先后写出了中篇小说《英雄三生》、《前途似锦》、《红花岗畔》及若干短篇小说、散文、特写等。自1957年起，着手创作酝酿达15年之久，反映自1919年至1949年，我国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史诗性的长卷《一代风流》（后更名《三家巷》）。它一共分五卷，为《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与《万年春》，约150万字，由于“文革”贻误，五卷直至1985年才全部出齐，历时18年。代表了欧阳山最高的艺术成就，为世所瞩目。

《三家巷》（第一部）具有极其鲜明的广府文化特色，无论从语言上，还是对民俗风情的描绘上，都称得上出神入化。虽然后面几部情节发生的背景大都远离了广州，但仍可以读得出“广

味”来，这种语言功夫的打磨，没几十年是办不到的，作家完成它时已年近八旬。可以说，工程如此浩大、历史跨度这么宽、反映的时代演变之巨，这五卷本在广府文学中，是罕有的。

与欧阳山同时“出道”的女作家草明（1911— ）是顺德人，原名吴绚文。自小与母亲在乡间过着清贫的生活，也深受母亲要自强、自立、自主的思想影响。她的家乡，是以缫丝工业而出名的，她从小就生活在缫丝女工当中，非常同情她们的不幸。1928年，她考进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开始写小说，“少年时代乡下缫丝女工的苦难生活和她们倔强形象在我脑子里升华起来了”，所以，她第一篇小说便从这写起，而后一发不可收，《万胜》、《缫丝女工失身记》等等，发在欧阳山主编的《广州文艺》上。1933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开始在广州搜捕左翼作家，她与欧阳山一道，逃亡上海，加入了“左联”，并在“左联”的刊物《文艺》上发表了《倾跌》、《进城日记》、《人涌围的农妇》、《没有了牙齿的》及中篇《绝地》等。

这些中短篇，大都以缫丝女工或其他工人的不幸命运为题材，对黑暗的社会以血与泪的控诉，随着思想的深化，后来的作品，则不仅写到女工的痛苦，更写到她们的觉醒与抗争。《绝地》正是写她们上东江去，即到根据地去，从而“绝处逢生”——走向了光明。

她自己也走向了光明，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她同欧阳山一道上了延安，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有《陈念慈》、《平凡的故事》、《垫脚石》等作品。

由于长期与工人同呼吸，共命运，她在抗战胜利后，便到了东北，长期深入到工厂生活当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反映一个水电站如何在战后恢复生产的长篇小说《原动力》，被译成十多国文字并被日本收入世界革命文库之中。后来，更有长篇小说《火车头》、《乘风破浪》及《神州儿女》等。

她被誉为终生写工人的作家，虽然后期作品已远离了广东，但她早年对广府文学的贡献，作为广府作家的成就，也都是应当写上浓重的一笔的。尤其是她描写珠江三角洲女子的系列作品，是广府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也很好地表现了 20 世纪初时南方女性的独立、自强的时代精神。

大革命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中，刘思慕（1904 - 1986），广东新会县人，早在 1923 年岭南大学读书时，便开始了文学生涯。1932 年，他游学欧洲，1933 年归来，便发表了十几篇欧行游记，后辑成《欧游漫忆》，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当时，是与朱自清的《欧游散记》、韬奋的《萍踪寄语》、李健吾的《意大利简游》、郑振铎的《欧行日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等齐名的。他以清丽潇洒、抒情诗一般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异国风光，同时深入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对希特勒建立法西斯政权的过程及随之接踵而至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敏锐的社会观察与精妙的心理心析，如王瑶在为其《野菊集》作序时所指出：“这些作品不仅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理应珍视的文献，而且在今天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思慕同志的作品正是因为严于是非、邪正，敌我之辨，所以无论他读什么，都能娓娓道来，切中肯綮，而幽默和机智则自然地增添了文章的风采和力量。”

刘思慕 40 年代还有散文《樱花和梅雨》等。他是广府文学中重要的散文作家，也是我国现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散文大家之一，如王瑶所称，他的“这些作品在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上是有它的历史地位的。”

而广府现当代文学中另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黄秋耘（1918 - 2001），原籍顺德龙江，出生于香港，30 年代即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抗战中，即用笔名发表了不少散文、小说与杂文，参加了《青年知识》等杂志的编辑工作。解放后，为中国作协《文艺学习》常务编委，后调到《文艺报》工作，历尽坎坷。“文革”中

调回广东工作，参与主持修订大型古代汉语词典《辞源》工作。多次出国参加国际笔会历届大会。

其主要代表作有《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丁香花下》、《往事并不如烟》，以及若干散文集、评论集、自选集等。

他的散文，如其代表作《丁香树下》末段所体现出的风格：“在我们一生中，生活有时会像河流一样，与另一条河流是合了，又分开了。带来了某一种情绪的波流，永远萦绕着我们的心灵……淡淡的，却难忘！”在平淡的笔触下，却涌动了解悟了生活的情感的潜流。人们不会忘记，当年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遭到激烈批判，则在于“为民请命”、“为民代言。”无疑，《丁香树下》所说的“在斑白的头发底下还保持着一个二十岁小伙子般强烈的感情，这样的人是不会幸福的。”正是他个人创作的写照。

这种“淡淡的”，在其早年散文中，流露的是孤独、哀伤，即所谓“淡淡的哀愁”，尽管有人认为“不健康”云云，但钟敬文却认为，这反而“充满了真实感”，“是不容许我们蔑视的。”他在1948年出版了第一部散文集《浮沉》（人间书屋版）的确是真实反映了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内心的愤懑与苦闷。而1951年版的《控诉》，则以亲见亲闻为依据，笔锋尖锐泼辣，饱含情感，字字看来皆是血，不乏有力的控诉。而“淡淡的”演变至后面的《丁香树下》则呈现出了成熟的风格。

出生于香港，在新加坡长大，1932年回国的秦牧（1919—1998），原籍为粤东澄海。早在抗日战争时，便在广州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1943年开始发表杂文。抗战胜利后，在香港从事职业写作。后进入广东东江解放区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大学，报社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他是我国当代文学中自成一家的散文名家。不少作品入选中大学课本，散文集《花城》、《潮汐和船》、《星下集》、《贝壳集》、

《翡翠路》、《花蜜与蜂刺》、《长街灯语》等，成为南中国一道独特的散文风景线。他的散文作品寓哲理性、抒情性、知识性于一炉，文笔优美，娓娓道来，深受读者欢迎，其中也不乏批判性颇强的如《鬣狗的风格》等，表现出作家的风骨。

黄庆云（1920— ），广州人，毕业于中山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从1941年起在香港主编《新儿童》半月刊。当年她主持的《云姊姊信箱》，影响了一代人。解放前，她在港出版童话、童诗、儿童小说集及译著20多种。解放后历任《少年文艺报》、《少男少女》主编。1983年出版了《黄庆云作品选》，主要作品有《花儿朵朵开》等，其童谣《摇篮》是当代儿童文学中公认的不可多得的名篇。退休后定居香港，继续从事儿童文学活动。

三、愤怒出诗人

在岭南的抗战文学中，诗歌创作是最为突出的。愤怒出诗人，在当时，这也是最早也最及时拿起的一个武器。由此形成的“中国诗坛”诗派，以岭南的诗人为主，虽然一度有不少南下的诗人加入了这个行列。这个诗派，把表现抗战的主题与争取民主的呼声交融在一起，既坚持了新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又有了南国那种炽热的不同一般的色彩，这个时期广府诗人的代表陈残云就这么在《南国诗潮》序中说过：“因为我们清醒地看见，我们的国土被燃烧，我们的姐妹被奸淫，我们的江河被血染，手执长剑的敌人强占了我们的家园，我们要吼叫，要反抗，要复仇。就因为这样，我们的诗显得粗犷、爽直、充满活力。”这个诗派，包括岭南三大民系的诗人，客家人中有蒲风、黄药眠等，而广府人则有黄宇婴、陈芦荻、陈残云、李育中、欧外欧、雷石榆、何芷等一批，有着强大的阵营。

黄宁婴（1915 - 1979），广东台山人，1924年移居广州，开始写诗时，追求“纯美”，模仿象征派与新月派诗风。到1936年，他写出了《再生》，宣布与过去的唯美诗风决裂。同年《九月的太阳》，更痛心地抒写了“9·18”事变，“三千万同胞在铁蹄下变了奴隶。”，疾呼“你，九月的太阳！从艰苦的挣扎里滚上来吧……奴隶们，记住！咱们要在太阳底下争取解放！”后来的《芦沟桥》更发出高亢的呼喊：“六年来的屈辱，六年来的血帐，让我们一朝来清偿……我们更有炸不碎的，复仇的心，像火一样。”

他写出了著名的抒情叙事长诗《溃退》，描绘了人民在溃退中的灾难与不幸，抨击了国民党官兵不战而退、腐败无能，全诗格调深沉雄浑，场面浩大，形象众多，重心突出，是一部史诗性的杰作。

芦荻（1912 - ），原名陈培迪，南海西樵山人，早年诗颇受现代派诗风影响，伤感、朦胧、晦涩。抗日救亡浪潮涌起，他的诗风也有了转变，“在苦难中铸炼新的信仰。”1937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桑野》，表现了人民的痛苦与民族的灾难，哀怨中升起忧愤：“这世界太荒芜了，需要人工开辟！”“想不到世界变成这么样，我们看不到光明和太阳！”宣布要“在血泊中孕育，在炮火中成长”，预告“原野将是浴血的沙场。”1939年出版了第二部诗集《驰驱集》，自称“这些诗篇，是我在抗日救亡期间，感情达到沸腾的最高点发生出来的。”及至1942年出版的《远讯》，则由“激昂、奔放、豪迈的高歌，转为深沉的含蓄、委婉的低唱”，以描写离乱、乡愁的居多，如《母亲》中，则有“母亲以六十年的小脚，开始走向流亡的行旅。”他把个人的哀悲，融入了对整个民族命运的关注之中，所以并未失去信心：“大地还未睡醒，人心，却亮着一盏灯。”

李育中（1911 - ），新会人，早期的诗，亦受象征派诗

影响。抗战后，诗风既保持了前期意境深沉、语言朴素的特点，又激扬起了高昂的情感，自然畅达。其《英雄的城市》，表达了对“英雄从此生长”的英雄之城的怀念，《凝望》更抒发了未能以自己的热血“去溅染那光荣的街道”的感慨……他的诗中，充溢着爱国主义滚沸的热情，在《登桂林城》里，甚至“不想在这儿看到凄凉的落日”，《我是支那人》中，更对任何人高唱“我是支那人……愿是苦难人群里头的一个”，“更愿是他们抗争群中的一个”！

此外，鸥外鸥（1911— ），虎门人，早期被称之为“未来派的诗人”，人们认为他的诗“有不同于别人之处的怪样子”，比喻颇为新奇，如把二战前的香港说成为“一个穿了军服的商贩”，一个“向着东方的机关枪的巢”。其怪异的诗风，到抗战时也未变，逃亡到桂林后，吟“桂林裸体画”为题，写了不少颇具怪味的政治讽刺诗，如《食纸币而肥的人》、《肠胃消化的原理》等等。

雷石榆（1911— ），台山人，从一开始，诗风就明快、朴实，通俗易懂，气势颇具。如《华南，我们保卫你！》、《人生难得这一回》等，尤其在《心曲》中，更直抒胸臆：“我未死，/应当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咬住痛苦活着，/吐出怒气战斗/我死吧，我应当作为一个真正的人，/带有无数人的悲哀死去/带着敌人的憎恨死去。”

四、长篇小说的崛起

陈残云，（1914— ），广州市近郊人，在抗战之中，他则以诗歌步入了文坛。最早的一部诗为《铁蹄下的歌手》，1938年出版，被称之为“热情呼唤抗战”的“新浪漫主义”。他的诗，一面似乎没多少火药味，内里却有“热情的跃动”。如：“火的飞

舞/力的飞舞/铁的飞舞/血和肉的飞舞/中国/伟大的灵魂!”大诗人蒲风甚至称这些诗能使人“感觉得出一种力量，一种新的滋味”，而且“这些东西，过去我们在田间的诗歌上，还找不出那么浓厚的坚强力。”

在《守夜卫》、《野火》、《木棉花就要开啦》、《母亲的诗》等名篇中，不仅有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表现了蓬勃的抗日情绪，而且对胜利充满了坚信，对光明充满了渴望。他的诗，绝少低沉、消极与徬徨，在“中国诗坛”诗派中是一面高扬的旗帜。它既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又朴厚凝重，自成一格。

战后，他转向小说，先发表了第一个中篇小说《风砂的城》，不久又创作了电影剧本《珠江泪》。

60年代初，他创作了长篇小说《香飘四季》。

不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部小说受到了后人若干非议，它与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作品，堪称广府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在这之前，如《香飘四季》这样带有浓郁的华南水乡风情、明丽的珠江三角洲特色的长篇作品，可谓罕见，它通过几对青年男女纯真爱情的描绘，表现出了一个全新时代广府这一特定地域人民的精神风貌——而这，却是不为历史所局限的。

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全书的广府语言那种明快、流畅的风格，多少经过提炼的民间谚语可以说是随手拈来，跌宕生姿，更为全书增色。对于当过诗人的小说家来说，这部长篇的诗味、抒情味也很浓，仍不失过去朴厚凝重的特点。广府如此有地方特色的作家，是不多见的。

他还与人合作有电影剧本《南海潮》，“文革”劫余，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热带惊涛录》，仍笔耕不辍，不减当年的热情。已有《陈残云文集》多卷问世。

继诗歌的高潮之后，出现长篇小说创作的热潮，可以说是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文学成熟的标志。广府文学，自“中国诗坛”诗

派崛起之后，于抗战中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及建国后，颇具广府特色的长篇小说也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高潮，陈残云、于逢、欧阳山、司马文森、黄谷柳、郑江萍等，都推出了自己的新作。

先期问世的是于逢（1915— ，台山人）与易巩（1915— ，南海人）合作的《伙伴们》，出版于1939年，写的是一位流浪汉在沦落之际，因亲人受害、故乡沦陷而醒了的民族意识，自发抗击日寇，最后英雄献身，小说表现了他从落后、散漫、偏执转变为进步、豪壮的觉悟过程。与此几乎同时问世的还有丘东平、欧阳山、邵子南、草明、于逢五人集体创作的《给予者》，更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把全身心献给祖国，而自己却什么也没得到的“给予者”的艺术形象。茅盾曾称其主人公是“抗战意志的化身。”这部小说，开了抗战小说风气之先。

用广州方言写出来的，堪称广府长篇通俗小说扛鼎之作的《虾球传》，却是由一位客家人在香港写出来的。他叫黄谷柳（1908—1977），粤东梅县人，《虾球传》于40年代后期在香港著名的进步报刊《华商报》上连载。黄谷柳出生于越南海防市，少时于云南读书，1927年辗转到了香港。当过苦力，当过兵。1941年再至香港以写作为生。1947年，写了《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二、三部《白云珠海》、《山长水远》，共28万字。本还有第四部《日月争光》，后未能写出。

小说主人公虾球是个流浪儿，通过他辛酸的、曲折的人生，作者广泛地描写了香港、国统区广州、珠江三角洲一带社会生活，以及广东游击区的艰苦奋斗。所写的人物，三教九流，形形色色，无不活灵活现，有着浓烈的广府地域特色，兼之连载稿用的是广州方言，通俗易懂，加上情节曲折复杂，悬念迭出，十分吸引人。

《虾球传》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在长篇艺术上的大众化、民族化，尤其是地域化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贡献。它继承了

传统章回小说的笔法，又汲取了现代小说的优点，融入鲜明的地域色彩之中，别成一格，令当时的著名作家为之“惊奇”，认为“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的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文字朴素、语言精练。”（夏衍：《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茅盾更称“这在南方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显示了现代小说“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方向的发展。”

小说经过钟敬文介绍，由日本作家译成日文，名为《虾球物语》，后文译成英文、南斯拉夫文出版，并在国内改编成话剧、电视连续剧等。

《虾球传》对日后广东的长篇通俗小说的影响，可以说一直绵延至今。郑江萍的中篇小说《马骝精》，可以说是《虾球传》的姊妹篇。不过，郑著更多得助于新的通俗故事形式，并且在运用广州方言及丰富日常口语上，更为成功，人物对话活泼有趣。另外，还应提一下司马文森的章回小说《南洋淘金记》，也是这一类作品。

广东另一位著名作家吴有恒（1913—1996）恩平人。他的代表作《山乡风云录》，可以说是汲取了通俗小说、章回小说在悬念设置、情节铺排上的众多长处而写出的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当代长篇小说。它出版于60年代初，与之先后的有《三家巷》（第一部）、《香飘四季》等广府文学的力作，形成岭南文学在当代的一个长篇小说创作的高峰。这三部作品，无疑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内广府文学的最高成就，并且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这个时期广府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体现了广府文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它又以鲜明的地域特色，证明了它是“这一个”，也不混同于国内这个时期的其他长篇创作。

这三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标志了广府文学进一步的成熟。个性化便是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三部长篇，既有共同的广府文

化特征。又呈观出各自不同鲜明的个性色彩。《三家巷》语言的老到、色彩斑斓，《香飘四季》的清丽、明快，而《山乡风云录》的传奇性及所带的几分古朴，相映生辉，又各显神通。研究广府文化，不可不在文学上以这三部为典范。我们不难把它们与大西北的《创业史》、潇湘的《山乡巨变》、华东的《上海的早晨》等有较鲜明的地域特色的长篇小说分别开来，并且在对比中发现它们的不同。

当代，在珠江流域内即广府地区，更为直接，也更具典型意义的长篇小说，当推老作家朱崇山的“深港澳”三部曲。它较为深刻且大气地表现了广府这么几个典型的同时也颇为特殊的地方历史沧桑，较为充分地作品中表现出作为海洋文明的珠江文化，揭示了海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南海沿海地带带来的深远影响。

作为深圳史的《南方的风》写在1984年，特区刚刚崛起且正面临“臭三年”挨批之际，作家的艺术勇气堪值称道。而《风中灯》，则抓住1984年中英谈判、中国要收回香港而引发的金融动荡入手，展示了英资、华资、中资三方的历史性较量，堪称20世纪末的又一部《子夜》。而《十字门》，则写的是从澳门被强行租借一直到回归的几百年间好几代人的各自不同的命运，背井离乡、生离死别、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开大合……

可以说，三大部，构成了南中国一部规模宏伟的史诗。

而且有极为鲜明的广府文学特征：海洋文明、商业文化，南方人的敢于冒险犯难，生龙活虎，又不乏市俗化，感官化——鲜明、斑斓、热烈、种种。手法上，既传统又现代，一般“折衷中西”。

也许，现在评价这部“即时性”的作品为时尚早。但众多应景之作与时俱逝后，这几部作品尚可作为“保留节目”，便可知其价值。作为对香港人的“经济心态”、对澳门的“金色之谜”、对深圳的“杀出血路”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与艺术高度，也是无他

人能比较的，大陆没人可比，港澳亦如是。

对这段历史认识的哲学提升，以及对其间经济学的剖析，加上文学上的生花妙笔，可以说，这也是近人所无法企及的。

以朱崇山为代表的当代广府文学流派，当还可以列举出众多的作品，其成就也是多方面的。考虑到这一文学流派正步向高潮，不妨留待日后评好了。

五、走向大气与成熟

从广府文学发展的进程来看，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文化的交融、碰撞，早期广府文学，带有越讴等本土特色文化的影响，故杨孚的《南裔异物志》中的四言韵诗，从一开始，便异于中原诗风，极其斑斓，极富南方色彩。后来，广府一直是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汇的重心，其诗风“务极新隽”、“声调既亮”。相当一段时间不为中原所认同，或者蓬勃于中原之先，或者后起于中原落寂之时。

直至鸦片战争，广府诗文变得沉雄激昂，开我国近代文学之第一章，广府文坛开始大放光华，而这时，广府作家，便崭露头角于全中国，不仅出了思想上的大师，也出了文化或文学上的大师，这包括梁启超等在内。而谴责小说，也只可能出现在南方，毕竟，社会的急骤演变远远先于北方了，用通俗小说来批判封建末世是南方先行的应有之义。谴责小说，也在中国旧、新小说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可以说，其间海洋文化的“腥味”，已由《南裔异物志》拂起，到谴责小说则成浩荡之势了。

谴责小说落下了广府近代文学大幕。而“五四”运动，则给广府新文学揭开了新一页。不过，早期的广府诗人，大都受西方象征派、现代派诗风的影响，走上唯美主义的道路。随着左翼文学的兴起，抗日救亡的呼唤，他们大都转变了诗风，在血与火中

呼啸着挺进了。散文、小说也日趋走向成熟，一直到了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终于推出了广府现当代文学的几部代表力作及秦牧等散文大家，表现出了更鲜明的珠江流域文学的特色。

而这些作品，与充满海洋腥味的广府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其色彩大都鲜明、热烈、斑斓，其手法，也揉合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所谓“折衷中西”，从而区别于内地的不同地域文化的长篇代表作，从而形成了广府文学一个创作高潮。

由于年代较近，评论这个高潮的意义未免为时过早，但不管怎样，这一页是无以抹煞的，至少，目前还没有新的超越。但从这个高潮出发，广府文学无疑是有更灿烂的前景的——至少，其之个性特征已经相当突出与明显了，这毕竟是一个重要的成熟的标志。

珠江文化，当因广府文学、客家文学及其他文学的勃兴而更绚丽多彩！

注释：

①②何藻翔《岭南诗存》。

③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

④《南史》卷六十四，“列传第五十四”。

⑤清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

⑥清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⑦屈大均《广东新语·文语》。

⑧罗香林《世界史上广东学术源流与发展》。

⑨孙光宪《北梦琐言》。

⑩柳宗元《送诗人廖有方序》。

⑪梁善长《广东诗粹》。

⑫文天祥《跋雀丞相二帖》。

⑬林永年《覆瓿集引》。

- ⑭温汝能《粤东诗海·例言》。
- ⑮张其淦《吟芷居诗话》。
- ⑯《明史·孙贲传》。
- ⑰《广州人物传》。
- ⑱《听雨先生传》。
- ⑲《岭南诗存》。
- ⑳檀萃《南园后五先生诗》序。
- ㉑温谦山《粤东诗海》。
- ㉒朱彝尊《九歌草堂诗序》。
- ㉓潘耒《广东新语》序。
- ㉔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
- ㉕《康南海自编年谱》。
- ㉖潘飞声《在山泉诗话》卷二。
- ㉗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 ㉘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
- ㉙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
- ㉚黄节《瘦庵诗集序》。

第三章 艺术

第一节 古代民间说唱

一、木鱼书与龙舟歌

“粤俗好歌”。这是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所作的断语。四个字，高度地概括了广府各民系中渊远流长的音乐传统。从早年的民间歌谣，到粤调说唱文学——它包含木鱼书、龙舟歌、南音和粤讴，再到20世纪初叶的粤曲，乃至今日流行于省、港、澳、东南亚及北美等华侨地区的粤语时代曲，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与海洋文化的印记，展示出广府音乐独特的发展道路。

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诗语》中，如前所引，则已有“考惠时，南海人张买侍游苑池，鼓棹为越讴，时切讽谏。”这里的“越讴”，自不同于后来的“粤讴”，应是泛指越地所有的通俗歌曲。不过，凭此可知，至迟于汉代，“粤俗好歌”之风已相当强盛了，并且进入到了皇帝宫廷之中。

我们在《广东新语》中，还看到屈大均以长达三千字的篇幅，详尽描绘了广东的歌唱风俗，现摘引如下：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以不露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

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为善之大端也。故尝有歌试，以第高下。高者受赏，号为歌伯。其娶妇而亲迎者，婿必多求数人，与己年貌相若而才思敏给者，使为伴郎。女家索拦门诗歌，婿或捉笔为之，或使伴郎代草，或文或不文，总以信口而成，才华斐美者为贵。至女家不能酬和，女乃出阁。此即唐人催妆之作也。先一夕，男女家行醮，亲友与席者或皆唱歌，名曰坐歌堂。酒罢，则亲戚之尊贵者，亲送新郎入房，名曰送花。花必以多子者，亦复唱歌。自后连夕亲友来索糖梅啖食者，名曰打糖梅。一皆唱歌。歌美者得糖梅益多矣。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吕宫词、琵琶行等，至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使警师唱之，如元人弹词曰某记某记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调蹋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比喻，多如子夜竹枝……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历史上广府民乐之盛况，而且可以读出若干与中原文化相迥异的内容。它不好节制，中庸，却“辞必极其艳，情必极其至”（屈大均语），人称“颇近吴越”，屈大均更强调：“粤固楚之南裔，岂屈宋流风，多洽于妇人女子欤？”

而从广府流行，后又收入稍后于《广东新语》的李调元《粤风》中的“笪歌”，则可看出沿海民歌对粤之民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李调元在“笪歌”题解下更注有“广东广西皆有之”，换句话说，正是流行于广府白话的语区中。这就不独是楚之影响，更有自身因素了。

屈大均、李调元均提到“摸鱼歌”，又名木鱼歌、沐浴歌，这是广府音乐中与龙舟歌齐名的一种，通常称之为“木鱼书”。这里，先引两首李调元《粤东笔记》从屈大均《广东新语》中转录的蛋歌，看看其之特色：

清河绾髻春意闹，三十不嫁随意乐；

江行水宿寄此生，摇橹唱歌桨过浮。

虽不见乐谱，但从行文上亦可读出一种与中原文明迥然不同的人生格调，尤其是女性自立的境界来。海洋的自由气息扑面而来，好不惬意！请注意，这是明代或明代以远的蛋歌。

木鱼歌，其名称的来历，一说是与寺庙的敲击乐器木鱼相关。而念经敲木鱼，是要告诫僧侣们致力苦行，这与木鱼书内多是警世劝善是一致的。一说木鱼书是由唐代的俗讲变文发展而演变出来的，佛教化的宝卷，是木鱼书的生身母亲，也就是说，它是佛教宝卷在广府的产物，其歌调的体例，是由佛教的俗讲而演为唱“莲花落”，最后与地方民歌完全结合，形成这一特定的体例。换句话说，它是与海外的舶来品相结合的产物。它也表现了广府民乐的兼容性。

另一说，则认为“木鱼歌者，木蛋、鱼蛋之歌也。”是纯粹土生土长的。谓蛋家有蠓蛋、木蛋、鱼蛋之分，各有各的歌谣，确是“蛋船争唱木鱼歌”（王士桢诗句）。

其实，两种说法是可以统一的，说纯为宝卷所“生”，未免太偏；说纯为蛋歌而不变，也太过了。应是蛋歌与外来的俗讲变文相结合，蛋歌汲取了变文的内容，变文袭取了蛋歌的形式，于是便有了“木鱼书”。

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女子，历来便有演唱长篇木鱼书的习惯，如屈大均《广东新语》前所云，岁时聚会，便唱摸鱼歌，三五知己，互为酬唱或自唱自娱。后来，木鱼则作为一个曲牌，出现在了粤曲、粤剧中。

传统木鱼书中有不少佳作，最著名的有被称之为才子书的《花笺记》等，并且流播到海外。《花笺记》写的是爱情故事，置爱情于功名科举之上，大有南方的叛逆性。

人称其“不但文笔之妙，即其声调亦字字可歌。试于风前月下，令十七八女郎按红牙缓歌一曲，回视花鸟，嫣然欲笑，亦足以乐而忘死矣。”“《花笺记》唯其声调字字可歌，愈见文笔之妙。”“其中自然成文，自然合拍，于此始见歌本之妙。”“盖其文笔声调皆一样绝世。”可见《花笺记》的歌本音乐是何等动人。

与木鱼歌一同久负盛名的，则有龙舟歌，它形成于明末或更早一些时间，盛行于清代中叶以来，是粤方言区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民间说唱音乐之一，直到今天，民间仍流传不辍，时有人唱“呢支龙舟至合送你做人情……”

龙舟歌又名“乞儿歌”、“盲妹歌”。所谓“龙舟”，是指沿街卖唱的艺人们手持的木雕龙船杈头。由于靠卖唱为生，加上歌者多为失目失明的女子——盲妹，所以由此得名。同样，也有人认为龙舟歌同出于“胥歌”，是沿海水上人家传唱的一种歌谣，由于他们长年出没于江海之中，以舟为家，所以敬奉龙母、龙神，自称龙户、龙人，于是，把自己的船只称之为“龙舟”，所唱的歌也就是“龙舟歌”了。这两种说法其实也可以统一起来，沿街卖唱的“斯文乞儿”，自是留恋舟中生活，故把手持拐杖雕成龙船杈头样。

龙舟歌是一种吟诵式的歌谣，没有音乐伴奏，演唱时敲着小鼓，按照锣鼓的节奏，摇动木雕龙舟，其内容亦大多为诫恶劝善以及喜庆吉祥之言。由于龙舟歌行腔朴素，不受节拍限制，唱词结构灵活，作品容量亦可伸可缩，可大可小，这样，便于掌握，更容易流传开来。所以，辛亥革命前夕，便有人用此写了“社会龙舟”、“政治龙舟”。可见这种形式的灵活多变，兼容

开放。

龙舟歌至为出名是广府人几乎无人不识吟唱的《客途秋恨》，它与粤讴《吊秋喜》一道，100多年来，被称为粤调音乐的双绝。

《客途秋恨》全曲1500多字，缠绵悱恻，哀婉动人，时至今日，仍在不断灌制唱片，并且引起外国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内容，是通过一文士缪莲仙的夫子自道，诉述在广府期间，与珠江上名妓麦秋娟之间一段哀顽感艳的风流韵事，叹离乱，诉哀情，字字看来皆是泪，所以在之后100多年动乱的中国，赢得那么多的知音，代代相传。“客途秋恨”，竟成了多少人寄寓情感的吟唱。虽是无望，却是几分自慰，“我愿同埋白骨伴姐妆前，或者死后得成连理枝，好过生前长在奈何天。重望慈云法力行方便，把杨枝甘露救出火坑莲。”

“慈云法力”，可见外来宗教在广府持久的影响，从而渗透到民间音乐之中。这或许可以解释“木鱼歌”与禅院中的木鱼的渊源了。

研究者认为，传统木鱼书在很大程度上还反映了封建制度及其礼教下妇女的痛苦与呻吟，那么，龙舟歌则往前发展了一步，不独反映了这一社会现实，而且通过生活琐事的描写，或多或少反映了民间疾苦，甚至在其中还可以听到劳苦大众或妇女们对于种种压迫的呐喊，控诉与抗议。

而在这基础上，广府的民间音乐又往前迈了一步，产生了“南音”。

二、南音

南音的产生，与广府日趋繁荣的商品经济是相同步的。或者说，它是市民社会的产物，带有南方独有的海洋文化的特征。

如我们在思想文化一章中所分析的，中原动乱，外族入主，破坏了东南沿海的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所以，直到清代中叶，由于社会经济的逐渐复苏，广府手工业中的商品经济，才又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所恢复与发展，其时，广州及珠江三角洲的四邑，五邑，其工商业的繁荣，也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尤其是广府城乡的经济作物，促成了社会分工与商品生产的长足发展，各地经济联系、交往日益密切，城镇的人口日益集中，市民阶层增大，市民意识日强，因此，与之相适应的市民说唱文娱，也就有了相适应的变化了。

于是，南音应运而生。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南音的发展，与当日珠江面上日盛的妓艇是分不开的。据当年的历史记载，其盛况绝不亚于秦淮。妓艇的日盛，也可以说是市民社会的必然。当时的秦楼楚馆，有三个帮派，一是广州帮，一是潮州帮，一是扬州帮，后者又被称之为南词班。三个帮派，为适应市民社会竞争的需要，抢顾客，争生意，相互借鉴，相得益彰，于是，便把原来粤调的说唱歌体——木鱼、龙舟，汇融于各方，尤其是南词潮曲，几经冶炼，从而演化出了一种粤调新声——南音。

南音更具市俗化，而超于胥歌了。它不似木鱼书、龙舟歌那样单调，在伴奏上，加上了弦索或洋琴相和，但与扬州帮的南词相比，又更为精练与紧凑，而且有一定的节拍，加入了起板与过门，所以，音乐性比师承的木鱼、龙舟有了很大的加强，娱乐性自不消说了。可以说，南音已是广府相当成熟的一种民间音乐了。

由于南音务必以广府方言即粤语来唱，这就决定了它的根，还是广府的。首先，是语音上；再就是之前木鱼、龙舟的传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汲收了外来的成份——如南词，加以改造，尤其是适应广府海洋文化、商业文明、包括市民意识的情势，

才发展为一种新的音乐，迅速流传开来。

南音形成后，先在市民社会中传唱，由于音乐性比木鱼、龙舟要强，便于专业演出，所以，其吟风弄月，消遣酬唱的成份居多。这也是它较之内地音乐更为“商业化”的地方。而民间的落魄文人，更是钟情于这一形式，在南音的创作中，每每借助夜阑更鼓之声，来作层层递进的抒情、叙事，发泄其胸中的忧怨，诉说离恨之苦，等等。

这一来，又形成了南音歌本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叹五更”。

最著名的是《何惠群叹五更》，在市井中有着很广泛的影响。

第一段“怀人待月倚南楼”是缘起，而后，连续为叹“初更才报月生西”，“二更明月上纱窗”……一直到“五更明月过墙东”，通过一个妓女的悲叹，以宣泄其红颜薄命的悲惨际遇，文词雅俗共赏，加上音律和谐，很快便在市井中流播开了，后人仿作不少，可见其影响之深之广。

传统南音名作中，还有《男烧衣》，后由粤曲名伶白驹荣唱红，被誉为白氏南音之最。其内容是写一个男士在河上舟中烧衣祭奠已故的女友，声情并茂，感人肺腑，以至感动艇嫂，为其搭“鹊桥”去认识一位新人……虽然并没有多少积极的社会意义，可却在市民阶层中有广泛的市场。

当然，传统的南音作品，也不是全部为伤春怨梦、鸳鸯蝴蝶之类，也有少量的时政之歌，如《光绪二十三年画报南音》中，亦有向清政府倡议改良义学的内容。

南音形式多样，有自弹自唱的“南音弹唱”，还有只唱不说的“南音清唱”，以及“南音说唱”。在唱腔上，行腔婉转，悠扬，旋律优美动人，能表达不同的思想情绪，其伴奏乐器主要为扬琴、椰胡、三弦、洞箫、琵琶等，可谓中外合璧。说唱则

有唱有白，抒情、叙事兼长，文字容量大，可独唱也可集体唱，多是一人多角地表演。

由于它是民间的说唱，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无论社会怎么动荡，迄今仍不绝于耳。不少名作，如今都翻录为唱碟或卡式音带，在珠江三角洲周遭响彻，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在粤剧与粤曲中，亦有以南音为曲牌。

三 粤讴

与木鱼书、龙舟歌、南音并列的粤调说唱中，还有粤讴。不过，它与前三者都不一样。在现存的粤讴曲子中，除了招子庸的《吊秋喜》和叶茗生的《除却了阿九》较长外，每首差不多均是短歌，最多就只十余句。曲中句子，长短参差，不如南音均是七言似的古诗。它侧重于抒情而又稍兼叙事，只唱不说。格调则更严格，如其中一字拗口，平仄韵脚不调，便不成讴了。它还有一定的起板与过门。

在句式、伴奏，尤其是曲调上，粤讴与南音是完全不同体例的，相互不可以混淆。

粤讴的产生，与南音的背景可以说是相差不远的，同是清中叶，南方商品经济又重新抬头，市民意识有所发展，由是珠江面上，妓艇日增。民间的说唱中，由于南音并不很够完备，有着自己的局限，包括内容上的局限，所以，另一种歌体便出现了，它要一扫过去歌体中粉墨胭脂及士大夫的怡情享乐之音，要汇合时代的精神，变化其调式，创造出更具地方特色的，以粤言粤乐、歌粤事粤物的短调歌体——粤讴来。一般认为，粤讴是产生于嘉庆末年的新歌体，从而把粤调说唱，由木鱼、龙舟、南音，推向了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

由于一批失意文人的参与，加上这种形式更具地方性，民

间性，它也就唱出了被压迫被损害者的心声，从而借风月之情，借感怀身世，对当时残酷的社会现状，发出了有力、无情的诉状。一时风靡于珠江三角洲上。

一般人认为，南海才子招子庸（1789—1846）是粤讴这一歌体的创制者或倡导者。无论说法怎么不一样，招子庸对这一歌体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他曾在内地做官，因遣用逃犯与英人交涉，开罪权贵，被指控落职，从而回到家乡。自此后，浪迹珠江，饮酒作乐，由于精通音律，创作了不少名曲。他还会画画，其所画兰竹蟹等，教一时洛阳纸贵，据说购其蟹画，是论个而定，有的高达每只 20 两金。其墨竹巨幅，出 2000 两尚不可得。他平时不修边幅，尤其喜爱民歌，更好耽于珠江妓艇，流连忘返。从而发现了盛行于珠江三角洲的咸水歌与“叹情”，形式自由活泼，即兴成歌，只是文词俚俗，不够音乐性；而南音又文词偏于高雅，却婉转动人。于是动了心思，集二者之长，创制了《粤讴》。时人云其“辑粤讴一卷，虽巴人下里之曲而饶有情韵，拟之乐府子夜读曲之遗丽，以诗余残月晓风之裔……一时平康北里，谱入声歌，虽羌笛春风，渭城朝雨，未能或先。”

《粤讴》一卷，内收作品 121 首，不仅在广东有深远影响，而且被介绍到了欧美各地，成为广东近代音乐的代表作。郑振铎称其“好语如珠，即不懂粤语者读之，也为之神移。”

《粤讴》几乎全是描写青楼女子生活的，内容与风花雪月大抵有关，但并非醉心于花柳情场，而是通过这些底层女子的生活，控诉了黑暗的社会，表现出积极的反抗精神。如历来的人所推崇的《吊秋喜》，就是写一位被逼还花债而丧命的女子悲惨命运。郑振铎则称：“象《吊秋喜》这样温厚多情的情诗，在从前很少见到。”故广为传播，名动京师。著名学者黄遵宪更云：“唱到招郎《吊秋喜》，桃花间竹最魂销。”

《粤讴》中除小部分为感怀身世外，大都对下层艺妓生活深表同情，有义理，有真情，有哀伤，有讽喻。写离别，叙尽人间之苦；写被弃，极尽人生之痛，真可谓千古同人，同声一讴。如《真正撈命》、《薄命多情》、《难忍泪》等，均与《吊秋喜》一道，传诵天下。

《粤讴》由于是最早以第一人称的笔法，走到了台前，描写下层姐妹的悲辛与愤恨，所以更能打动观众，也有着相当积极的社会意义，如今读来，仍可看到一部部血淋淋的人间惨剧。正是由于这，才能流播这么广，这么久，传诵不绝。

粤讴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更趋兴盛，不少人参与了它的创作，在题材上有了新的拓展，内容上有不少突破，愈加贴近现实，讽喻时政。如有写劝人戒鸦片的《鸦片烟》、抗议屠杀华侨的《咪估话同你咁好》、反对军阀内战的《唔怕你恶》、反对女子缠足的《戒缠足》、反对封建迷信的《风气最盛》、针对官场腐败的《唔怕有罪》等等，说明粤讴这种广府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无时不刻没在汲取民间生活的养份。

到晚清民初，由于社会生活的骤变，粤调说唱更与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过去那种偏向娱乐怡情的情绪，从而出现了专门传播反帝反封建思想，鼓动民族革命斗争、贴近现实、锐意革新的新的粤讴、南音、木鱼或所谓“社会南音”和“时事龙舟”了。这些，对后来粤曲与粤剧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二节 粤剧与粤曲

粤剧的形成，与南音，粤讴的形成则有所区别。作为戏剧，不独是音乐，还综合文学、美术诸方面的因素，形成自己的特

点，有着更漫长的过程。不过，粤剧本身在形成过程中的开放性、兼容性，恐怕较之任何剧种要强。然而，在开放兼容之际，它又呈现出最具特色的地方性，与其他剧种“划清了界限”。这看起来是矛盾的，可事实上却是统一的。对于广府人来说，他们独有的剧种便是粤剧。应当说，岭南四大剧种：粤、潮、琼、汉，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是粤剧，最富于地方特色，具有更大独立性的也是粤剧。而汉剧，又称外江戏，内地称汉剧的剧种还有好几处，如鄂、湘等地；潮剧，在闽、台亦流行，非一家独有；而作为潮剧的变种琼剧，也就毋须多说了。其唱腔上的考证，也就与内地姻缘更多了。

而粤剧，用的是纯粹的白话。它流行范围遍及广东、海南、桂南、港澳以及东南亚，包括美、澳大利亚亦有粤剧戏班。

关于粤剧的形成，有不同说法。大抵在南北朝，中原歌舞伎艺便传至岭南，唐代开元寺，已“竞演百戏”，北宋将军庙，亦有“鱼龙百戏”。①元末，孙蕡有诗为证：“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到明代，戏曲更盛。“背城旧有平康十里，南临濠水，朱楼画栋，连绵不断，皆优伶小倡所居。女旦美者鳞次而家。”②至明末，粤剧大抵已定型。故有形成于宋及明中叶说，亦有完成于清代之说，时间上有一定距离，但大致可以把这一段距离理解为形成、成熟、独立成型的过程。它经历了外江腔到本地腔的演变，最后改造为纯然地方戏剧。

一般以近代粤剧，即成熟之后，作为依据。即由戈阳腔、昆山腔转为本地的广腔为准。其用广府方言演唱，且融合、吸收了地方民间小曲，更有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同时，又汲取了外来音乐，即使用西洋乐器加入伴奏，也就更具感染力与戏剧化了。从而与中原戏剧拉开了距离，成为中国独具一格的地方著名剧种。

近代，以李文茂抗清并粤剧中兴为起点，再以粤剧改良运

动至“五四”前后为一段，再进入现代。

李文茂为鹤山人，出身梨园世家，投身太平天国，转战两广，由于其部下均以优伶面目随军南征北讨，无形中为粤剧扩大了影响。加上他又大胆改革了粤剧，一反帝王将相出场扮圣，另命丑角出演这号人物，使粤剧更独具一格。其后，开平人邝新华，更以精湛的演艺，一开粤剧注重念白之先风，使因清军镇压起义而中落的粤剧又再振兴。从此，粤剧艺人自己作了不少“正本戏”，凑成“新江湖十八本”，包括《西河会》、《黄花山》、《双结缘》、《闹扬州》等等。后又由文人参与，又出个“大排场十八本”，包括《寒宫取笑》、《三娘教子》、《百里奚会妻》……等等。从地方掌故与现实生活取材，又有《梁天来》、《贫家妹卖马蹄》等出现，一时形成大潮。

辛亥革命前后，由于革命者多注重戏剧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少人如陈少白、程子仪等，竞相组织“志士班”，以“借古代衣冠，实行宣传党义；娱人耳目，犹应力挽颓风。”大量上演白话话剧。后注意到粤剧观众多，又改演粤剧，从此形成了粤剧改良之浪头。不仅内容不同，白话占了主导乃至全剧，而且唱腔、唱法、音乐发生了一次革命，变得丰富多姿，更注重汲取地方及民间的养份。突破了旧的表演程式。走向了地方化、世俗化与现代化，从而出现了二三十年代名声遐迩的“省港班”。粤剧被美誉为“南国红豆”。

至今，仍很有影响的传统剧目《平贵别窑》、《宝莲灯》、《西河会》、《罗成写书》等，在早期著名演员李文茂、邝新华、肖丽章、千里驹、李雪芳、苏州妹与靓元亨之后，到本世纪初中叶，则有“粤剧四大家”薛觉先、马师曾、白驹荣、廖侠怀等。后来红线女更声誉鹊起，成为全国著名戏剧大师。罗品超、文觉非、陈笑风等，亦名气不小。

薛觉先有“万能老倌”的美称，这主要是指他戏路较广，

能文能武，又敢于创新，在粤剧传统基础上，善于汲取与融汇其他剧种的艺术，从而进一步丰富了粤剧的表现力。他的唱腔颇注重文采，深情婉转，尤其是对二黄声腔，唱得飘逸超脱，形成其独有的、著名的“薛腔”。

马师曾当年更被誉为“台上霸王”，以演丑生见长，但戏路一样较广。他早年即立志改革粤剧，吸收众长，融为一体，运用自如，不露斧迹。尤其是唱词多用广府方言，通俗易懂，易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他的唱腔，特别是唱中板，自然活泼，滑稽多变，适于塑造喜剧人物。他也有独创，这便是“乞儿喉”，又称“柠檬喉”，半唱半白，新颖奇特，顿挫分明，送音悠远，成为群众欢迎的“马喉”。

红线女所创的“女腔”，更是扬名海内外。其博采众长，善于汲取，勇于创新，也就更自成一格。

所以说，无论从粤剧的发展，或从粤剧名流的创新，我们都可以看到，愈能汲取别人的长处，也就愈能形成自己的风格。粤剧唱腔属于皮黄系统，但在发展过程中，它广泛吸收了小曲或创作新曲，纳入了南音与粤讴，同时，又较早吸收西洋乐器到粤剧伴奏中，尤其注重打击乐的作用——所谓“一套锣鼓半台戏”，从而形成了粤剧唱腔音乐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也正是文前所讲的开放性、兼容性与地方性、特色化的辩证统一吧。

粤剧之后，我们再来讲粤曲，因为彼此间有亲缘关系，粤曲本就是粤剧的曲调，起源于粤剧，后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曲艺中的一大曲种。由是 150 年来，粤曲成为了广府方言区内最为流行、最有群众基础的一大说唱艺术。

由于与粤剧的亲缘关系，在近百年间，它又与粤剧在唱腔音乐方面长期处于相互吸收、融化、促进、共同发展的状况之中，故至今二者仍唱着相同的腔调。

故粤曲未形成独立曲种之前，它是作为农村的“八音班”

而出现的，而八音班，则是原来流行于海陆丰的古老剧种“西秦戏”所衍变派生出来。八音班唱粤曲，大约始于清道光初叶，因粤剧不能满足广大农村的需要，所以便出现了粤曲清唱，八音班简小精干，流动于乡间，这一形式是再合适不过了。只是粤曲尚未从粤剧中独立出来，到20世纪初，渐近衰落，为“师娘”所取代。

所谓“师娘”，亦称瞽姬，失明的专业民间女艺人。她们自小被卖身于“堂口”中收养，专习曲艺训练，为“养母”所严格控制。她们以流动演唱为主，入夜后，由开眼陪人领队，提着小油灯、穿街走巷，沿门卖唱。其间，广府茶楼兴盛，多以开设粤曲演唱作为吸引顾客的手段，这一来，茶楼便逐渐成为曲艺演唱的主要场所。

茶楼初期以招聘师娘为主，后渐渐发展到招聘女伶。由于女伶发展迅速，人才辈出，流派纷呈，队伍众多，也就渐渐把师娘挤出了茶楼了。女伶主持茶楼演唱，便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首先，是演唱与伴奏分家，绝少自弹自唱，更为专攻，曲目也以短篇小段的清唱为主了。而具有音乐素养的乐师，也就纷纷进入了曲艺界，对粤曲声腔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乐队除伴奏外，还开创在开场与间场时独立演奏器乐曲的传统，这对音乐自身发展更具意义了。

粤曲也就在这时从粤剧中独立出来，出现了一批专门为这种清唱而撰写曲目的作者，不再依赖于粤剧当中的曲本了。

到了解放后，曲艺趋于专业化，开始了新的改革，从作品结构到表演艺术上都注意发挥曲艺的艺术规律与艺术特点，尤其留意发展木鱼、龙舟、南音等本地区民间的曲艺形式，从而使过去长期停留于单一品种的粤曲清唱的状况有所改变，得到丰富与提高，于是，出现了粤曲说唱、粤曲弹唱、粤曲表演唱等多种形式，深受群众欢迎。

粤曲音乐性强，耐人欣赏，所以产生了如吕文成、尹自重、何大傻等一批有名的乐师。他们多才多艺、能奏能唱，还能创作。如吕文成，首创高胡，演奏技巧炉火纯青，又擅长唱工，对唱腔艺术颇有建树，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广东音乐曲子，对广东音乐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另外，客家人的汉剧、潮汕的潮剧，都各具特色，不可或缺。

第三节 广东音乐

广府，称得上是音乐之乡。广东音乐，在国内外也是久享盛名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过很大的推动作用，而广府音乐家，更大都不只局限于本地，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一席之地，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重要的位置。广东音乐的地方特色，鲜明突出，自成体系；广东音乐家兼容并蓄，又在现代音乐上颇有建树，对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更有着杰出的贡献。

近代渐成体系的广东音乐，当然离不开粤曲。所以，我们还是从粤曲讲起。粤曲名师何柳堂（1870—1934年），是番禺沙湾人，20世纪初活跃于广州、香港乐坛。相传他拿出来名曲，如《雨打芭蕉》、《饿马摇铃》，甚至广东音乐的经典之作《赛龙夺锦》初稿，乃是其祖父何博众作曲的。不过，后来的名曲，如《回文锦》、《七星伴月》等，则确是何柳堂所作。而《赛龙夺锦》至少也经他多次精心修改。何柳堂的乐曲，是以弹拨乐如琵琶、三弦为主制曲的，较铿锵雄壮，所以，何柳堂作品，是属于雄壮有力的这一类。

而前面提到的吕文成（1898—1981年，中山人）比他晚30年，早期清音作品《蝶恋花》亦广泛流行，有《蕉石鸣琴》、《平湖秋月》、《渔歌唱晚》等，则成为久传不衰的粤乐名作，其

作品时代气息浓郁，旋律优美。而丘鹤俦（1880—1942）则介乎何、吕之间，既有二弦的粗犷，又有扬琴的欢快；他的《弦歌必读》是广东音乐的入门课本，后又编了《琴学新编》，广东音乐的新作，也就兴起在此书印行之后。他的《娱乐升平》、《狮子滚球》、《相见欢》、《双龙戏珠》、《声声慢》，均活泼、明朗。还有一位广东音乐奠基人严老烈的《旱天雷》，亦属振奋人心的乐曲。

广东音乐界，是最早去国外学习西方现代音乐的，他们回来后，致力创建我国的现代音乐及其教育，成为一代先驱者。这批人中，当首推萧友梅（1884—1940），民国最早的国歌作者。

他是中山县石岐镇人，出身书香门第，曾留学日本，掩护过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又赴德国留学。回来即聘为国歌研究会会员，他应征的曲谱入选，这便是《卿云歌》，当年陈毅在法被囚，则高唱此歌以表示不屈。

后他致力于创办音乐教育事业，先后创立北大音乐传习所、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等。他一向注重民族音乐，写过不少爱国歌曲，如《国难歌》、《从军歌》（为义勇军作）等，还几乎把《九宫大成》的曲谱全译成五线谱。

广府音乐教育事业，现代最有影响的，要算欧阳予倩（1889—1962年）于1928年来广州，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了音乐学校，培养了一批音乐人才。这是应记上一笔的。

在萧友梅的培养下，我国音乐大师，也是广府音乐的骄子冼星海脱颖而出。

冼星海（1905—1945年），是广东番禺人，生于澳门，原籍为番禺。1918年随母由新加坡迁入广州，1920年进入岭南大学附中学习。1925年，由于对音乐的热爱，他只身上了北京，1926年春在萧友梅领导的北京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进修小

提琴，半工半读以维持生活。1927年冬，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成立，萧友梅任代理院长，1928年冼星海获准免试进入了这国立音乐院。1929年冬，他自费赴法国留学。一直到1935年归国。

回国后，他积极参与左联的文化活动，创作了大量电影歌曲，如广州流传的《救国军歌》、《只怕不抵抗》等，以及《夜半歌声》中的《热血》、《黄河之恋》。抗日战争爆发后，更追随进步人士组成的“战时移动演剧队”，辗转各地，写下了大批抗战歌曲，如《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等等。

1938年底，他到达延安，翌年任“鲁艺”音乐系主任。也就在那里，写了千古绝唱《黄河大合唱》及其他著名作品，如《九一八大合唱》、《牺盟大合唱》等，以及大量的歌曲。

1940年底，他到了莫斯科，完成了他的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交响乐》，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等等，1945年因病去世，年仅40岁。

他在短短一生中创作有200多首群众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剧、2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1部交响诗，一部管弦乐狂想曲以及许多器乐独奏、重奏（不少是民间音乐改编曲）和大量艺术歌曲。他毕生为追求中国民族风格、富于时代特色、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新音乐而奋斗。他的作品，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丰碑。

与冼星海在岭南大学同学的何安东（1907— ）是广东江门人，在岭大是冼星海的挚友，后是他接任冼为乐队指挥。“九·一八”事变后，他愤慨奋笔谱出《奋起救国》等著名歌曲。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更写出了《保卫中华》、《全国总动员》、《大众的歌手》等一系列著名歌曲，在全国广为流传。广州沦陷，他随岭大迁至香港；香港沦陷，因他写了大量抗日救亡歌曲，被日寇投入监狱，施以酷刑，险遭杀害。后返回广州，继续创作。解放后，创作有小提琴独奏曲《解放组曲》，钢琴独奏

曲《醒狮》，后遭不公正对待，则致力于培养其子何东，使之成为我国著名的小提琴独奏家。

我国当代著名小提琴家、作曲家马思聪（1912—1987年）也是广东音乐的杰出代表。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各种题材和体裁的音乐艺术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他仅 11 岁便到了法国攻读音乐，并如愿以偿考进了欧洲著名的音乐学府巴黎音乐院，且与冼星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0 年回国后，即受聘于欧阳予倩创立的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音乐学校。第二年，他创立私立广州音乐学院，出任院长，后又受聘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并于沪、宁、穗、港多次举行独奏音乐会，开始了室内乐创作。抗战后，写了不少抗日歌曲。抗战胜利后，又创作了《民主大合唱》。解放后，即出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后“文革”浩劫，被迫出走，客死异国。

马思聪始终坚持从民间音乐中寻找创作灵感，追求艺术创作的个性，力求以新鲜的和现代的音乐语言来构成开放性的民族风格，这与广府文化给予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曾说过，“要拥抱的是整个世界。”

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李凌（1913— ），是广东台山人。少年时酷爱粤曲，抗日战争后到了延安，考进了鲁艺。1940 年在桂林创办《新音乐》月刊。抗战后在上海创建中华星期音乐院并任院长，1947 年又同马思聪等创办中华音乐院于香港，任副院长。解放后，任中央音乐学院教务长，中央乐团团长。他从事音乐工作 50 余年，出版了《音乐札记》、《音乐美学》等 20 余集，还创作了管弦乐曲《南国组曲》、民族器乐组曲《乡音》等作品，主张中国音乐应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中外交流和向外国音乐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民族音乐现代化的发展。

从何氏三杰到萧友梅，又从冼星海到马思聪，广东音乐由

于得其天时、地利、人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率先步入了近现代，涌现了若干称得上为大师级的人物，这与广东音乐善于保留与发展民族化、地方化特点，又能容纳百川，既吸收中原音乐之长，又迅速消化外来的现代音乐是分不开的。这也是广东音乐的一个优势，是别处所不可得的。

第四节 客家山歌、潮汕英歌

在珠江文化的大范畴内，作为客家文化中最有特色、也最有标志性的一种形式，那便是客家山歌了。显然，客家山歌与南音，木鱼歌等作为民间艺术的瑰宝，则显示有不同的风格与特质。

山歌，作为民间的口头创作，是以口头传唱作为发表手段与传播方式的，因此，也就有着较深广的文化内涵。客家山歌在中国音乐中的影响，更相当深远。很多流传很久、很广的音乐，不少人已视为整个民族的了，可细细一寻究，其源仍是客家。这也与客家本就是中原汉族分不开的。因此，有人认为，客家山歌的形成，与客家民系的形成是同步的，先是汉魏六朝中原乐府发轫，而又因在江淮辗转，又为江南等地的竹枝词所融合，到了南方，更与土著，包括壮、瑶、畲等少数民族相交汇——如著名歌剧《刘三姐》，其曲调可以说完全源于客家山歌，可又表现的是壮族歌手的故事。而刘三姐本身，在客属中心地带梅州，则很早便有刘三妹的原型。

关于客家山歌，笔者在《客家圣典——一个大迁徙民系的文化史》中，有过较为详尽的研究与论述，考虑到客家民系近代同样为海洋文明浸染，与海上丝绸之路有着同样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这里亦予以一定的概括。

首先，如我在《客家圣典》中所称，“称情直往”、“兴往情

来”，是客家山歌最为显著的特点。因为这个民系，发生于魏晋南北朝那样一个天放的时代；在生活最痛苦——战乱、灾荒、颠沛流离、背井离乡之际，所寻求的一种精神最自由、人格更独立的境界，这也就反映到其文学创作上——一如鲁迅称的“文学的自觉时代”，敢于无拘无束，泼辣大胆地唱出自己内心的一切。最著名的，莫过于如今炙脍人口的《生死缠》：

入山看到藤缠树，
出山看到树缠藤，
树死藤生缠到死，
藤死树生死也缠。

又如《唔怕山高水咁深》：

郎有心，催有心，
唔怕山高水咁深。
山高自有人开路，
水深自有撑船人。

后一首中，业已融入有粤语“咁”的成份。再看《生爱连，死爱连》：

生爱连来死爱连，
两人相好一百年；
曼人九十九岁死，
奈何桥上等三年。

客家山歌中，情歌的数量是最多的，也反映了这个民系在感情上的浓烈、奔放，以及在人生态度上重情重义的开放心态，有别于已被格式化了或扭曲了的传统观念——诸如“笑莫露齿，话莫高声”之类，客家女子不缠足，不束胸，也有别于封建社会后期汉族女子缠足束胸的陋习。

其次，来到近海地带，虽说所居之处为山地居多，土地贫瘠，工商业不发达，可海边的一切，还是有吸引力的。不少客

家人，由于生活所累，不得不经过潮汕、穗港等地，远涉重洋去“过番”。因此，粤东闽南客地，亦大都为侨乡。可见海洋文化亦有相当影响。因此，作为客家山歌第二大特点，恐怕就是《过番谣》中表现出的思乡之情，以及“客人开埠”的坚强信念。

想起当日过番客，
黄连树上挂苦瓜。
黄连树下埋猪胆，
从头苦到脚底下。

“过番客”的凄苦，从这寥寥 28 个字中当可以品尽。在外，未必全是“金山客”，成功者毕竟少而又少：

想起过番更孤凄，
水蟒准席搭准被。
转来大家喊番客，
几多凋凉谁人知。

水蟒为浴巾俗称，凋凉即受苦受难。在海外，思乡、思妻之情，更是揪心：

阿哥出门去外洋，
郎就孤单妹凄凉，
赤水黄沙家门远，
望妹唔到痛心肠。

以上两种，即情歌与过番谣，当是客家山歌的主要代表，当然，它们反映的生活内容还很多，包括劳动、家庭、祭祀、歌颂、对酒、戏谑、相骂、嗟叹、劝戒等等。

与客家山歌相映生辉的，还有邻近的潮汕民歌或闽南民歌。尤其是潮州春季，连村插秧，更有一种“拳歌”，清代郑昌时《韩江闻见录·观稼亭》诗注中有“分秧时击鼓唱拳歌是潮人旧俗”——这是一种用潮州方言唱的土歌。不过，现已演变为一

种游戏性的“秧歌”了。

而“秧歌”如今又叫“潮汕英歌”另还有叫“莺歌”、“因歌”的。有“北有安塞腰鼓，南有潮汕英歌”的美名。这是一种兼表演的小演唱，“前棚”为“唱英歌”，“后棚”为小演唱，表演杂耍与武术队。一般以“前棚”为主。

每年“社日”，抬神赛会，神人同乐，秧歌、社火、花鼓、武术也就融为一体，形成别具一格的“英歌舞”。

第五节 电影艺术

电影艺术，是本世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综合艺术，它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大众传播手段的发展是相同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在中国的“登陆”，首先便在广府文化区——这与外来文化最早接轨的地方。

1896年，也就是在电影发明之后的第三年便传入了香港。1909年，亚细亚影戏公司在香港拍摄了第一部故事默片《偷烧鸡》，它也是中国最早摄制的故事短片。1913年，香港成立了第一间电影公司华美影片公司，主要创始人是黎民伟。同年，华美拍摄了《庄子试妻》，这是在香港正式出口的第一部故事片，也是第一部在国外放映的香港故事。黎民伟，是广东新会人，1892年出生于日本，很早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庄子试妻》是第一部改编自粤剧的影片。中国电影初始发展阶段中，粤语片占了很大分量，这与电影首先传入广府文化区是分不开的。中国第一部粤语片《白金龙》（由粤剧名伶薛觉先和唐雪卿主演）却是在上海摄制的。不过，它仍在香港拍摄的第一部故事长片《胭脂》之后。

《胭脂》改篇于《聊斋志异》同名故事，只是把故事背景移到了现代，它开拍于1924年10月，除部分外景在香港拍摄外，

全部在广州拍摄。它的编导是黎北海，演主角之一宿介，可谓自编、自导、自演。男主角鄂生由黎民伟扮演，女主角胭脂由林楚楚扮演，摄影师罗永祥，化妆师关文清。

由于省港大罢工，不少电影工作者移居广州，从而促使了广州电影业的萌芽与发展。从1926年到1934年，广州就一共出产了22部故事片，第一部默片是《爱河潮》，第一部粤剧片是《铁马贞禽》，由梁少坡导演，薛兆荣、小瑶仙主演。此外，还拍了3部纪录片，即《热河血泪史》、《十九路军光荣史》等。

从一开始，广府电影的发展便有两个比较明确的方向，一个是民族化、地方化，大量的粤剧被改编为电影，占去相当份量，而粤语片也同样在中国电影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据统计，80年间，这要占去中国影片的一半左右。这与香港作为世界电影生产的重要基地之一是分不开的。当然，粤剧片大都属艺术故事片的范围，与商业片相区别开来。

另一大类则是商业片，从30年代开始，广府影片便开始走上了商业化道路，主要追求票房价值，完全迎合市场需求，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流行方式，如武侠片、功夫片、惊险片等。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内地大批电影工作者来到了南方，先后于三四十年代，发起了两次电影清洁运动，以新民主主义思想为内涵，以批判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着重揭露社会现实黑暗，关怀和同情被压迫的小人物，鼓励其同心同德，奋起挣扎；在艺术上，则继承中国戏曲文学的传统，讲究情节结构，以情感人，寓教于乐，向善向上。于是，一批抗日影片应运而生，如《游击进行曲》、《白云故乡》、《前程万里》等。由此，形成了广府影片的写实主义传统。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广府，尤其是香港的电影业得到迅速的复兴，内地不少电影工作者又再度来到香港，拍摄了《野火春风》、《珠江泪》和《清宫秘史》等一批经典之作。由蔡楚生

发动的又一次粤语电影清洁运动，更对广府影片的写实传统起到了巩固作用。

由于香港作为一个国际自由港，一个现代化的现代工商业的都会，它为广府电影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环境。它是战后最大的华语（尤其是粤语）影片的生产基地，也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电影基地之一，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目前，香港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出口地，港产影片数量仅次于美国与印度，排名世界第三。因此，论及广府影片，与其他艺术类不一样，主要以港片为代表。

当然，在广州拍摄的影片也不少，解放后，成立了珠江电影制片厂，也拍摄了如《南海潮》（蔡楚生导演）等，与此同时，蔡楚生还在港导演过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等名片，当时，粤港影界的关系还是密不可分，难分彼此的。直到50年代末，才由于种种原因，渐渐分开了。而后，广东陷于“文革”动乱之中，香港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直到“文革”后，双方又再重新携手，开创了广府电影的新纪元。

而作为艺术片的写实主义传统，应当说，仍是广府电影的主流，虽然一度中断或失落。而商业片，也随时代变迁，仍历久不衰，品种亦在增加。

在中国电影艺术发展史上，广府电影艺术不仅占有重要的一页，而且是最初的、开创性的一页，因此，广府电影艺术传统，迄今仍深深影响着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进程。

黎民伟，作为广府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从一开始，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影前，他经过商，有一定的商业意识，这在广府人是很自然的事，但他却更看到电影不仅仅具有娱乐性、商业性，更可以移风移俗，以正社会风气，改良社会，所以，“电影救国”的口号就是他提出来的。他不仅是电影中众多“第一”（第一间电影制片公司、第一部故事短片、第一部新闻纪录

片、第一部长故事片、第一间全华资电影院、第一间训练电影演员的机构……)的创始者,而且积极投身于革命当中,拍摄了不少国民革命军北伐及孙中山晚年活动的珍贵纪录片,后剪辑为《勋业千秋》。1926年,他的公司迁到上海,拍摄了充满爱国意识的《祖国山河泪》和《蔡公时》等片。1930年,又与罗明佑制作了《渔光曲》、《大路》等名片。作为广府影业的元勋,也是中国影业的功臣,他一生爱国爱民,为建立中国的电影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积蓄与精力。电影界“黎氏兄弟”,即名导黎北海,以及黎海山,都献身于这一事业了。

他的妻子林楚楚,也是新会人,在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饰女主角,也是广府故事片中第一位女演员。而后,到上海与欧阳予倩等人合演了《玉洁冰清》,而后,主演了《和平之神》、《海角诗人》等多部片子。联华影业公司创立后,他与粤籍另一位名演员阮玲玉合演了该公司第一部影片《故都春梦》。之后,又演出了《人道》、《天伦》、《慈母泪》等。她一直尽心竭力辅助丈夫创立中国影业,倾家荡产,亦毫无怨言。

与她、阮玲玉齐名的另一名演员胡蝶,上海人,但自小则到了广东,并考入了中华电影学校,在《火烧红莲寺》中饰红姑,一举成名。她主演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30年代主演了《盐潮》、《姐妹花》等,被选为“电影皇后”。1940年,又主演了《绝代佳人》,后又拍了《孔雀东南飞》、《家》等。1947年主演了《某夫人》、《春之梦》等。1959年在香港邵氏公司主演《街童》、《苦儿流浪记》、《两代女性》、《后门》。其中《后门》获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禾奖,她获最佳女主角奖。而后,她还演了《塔里的女人》等。

著名男演员有吴楚帆等,吴系广东番禺人,1937年,因主演《人生曲》获“华南影帝”之誉。他一共参演250部影片,1955年,被选为中国最受欢迎的5个演员之一。他主演有《新

青年》、《家》、《春》、《秋》、《寒夜》、《危楼春晓》等名片。

从黎北海到蔡楚生、李翰祥，名导演迭出。其中，蔡楚生最杰出的是《渔光曲》，1934年出品，曾创下连映86天的空前纪录，其主题曲《渔光曲》流行至今。后来，珠影名片《南海潮》，也是由他导演的，而李翰祥，则是辽宁人，却一直在港执导，有名片《雪里红》、《江山美人》、《梁山泊与祝英台》、《西施》等，“文革”后更杰作迭出。

与蔡楚生合作编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郑君里是中山人，早年在南国剧社演出多剧，解放前夕导演有《乌鸦与麻雀》，解放后，更有《宋景诗》、《林则徐》、《聂耳》等名片。另一位名导演司徒慧敏，开平人，30年代导演有与蔡楚生合作的《血溅宝山城》与《游击进行曲》等，后长期从事戏剧、电影的组织工作。

著名演员陈波儿，当年也是左翼戏剧活动家，拍有《桃李劫》、《八百壮士》等名片。后从事组织工作及领导工作，英年早逝。而中山籍的著名演员阮玲玉，20年代便斐声影坛，是我国默片时代电影表演艺术最精湛者，“1·28”事变后，她主演了《三个摩登女性》、《小玩意》、《新女性》等名片，演技出神入化，却终因“人言可畏”而被迫自戕，年仅25岁。

以上只是简略提一下对广府电影艺术有贡献的主要人物，有不少遗漏。但是，从以上发展的历史来看，影视业，从一开始，在广府文化区内，便带有鲜明的产业化走向，这是比别处要突出得多的。其通过产业化和商业化方式进行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供应及传播，较之内地，更具规模，更超前。香港影视产业化的成功，恐怕在全国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里，除开自由港的特别因素外，作为广府文化潜质所起到的根本作用，应该说是无可否认的。这也证明，愈具现代科技文化的产业，在广府文化区内是如鱼得水，较少受到阻滞或

压迫。

第六节 岭南画派

广府艺术中，到近现代，以“岭南画派”奇峰崛起，以独有的风格与个性，在中国画坛登堂入室，与京、沪各画派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产生了“三足鼎立”的新格局。

说到“岭南画派”，尚须寻根溯源。自古以来，岭南画家及绘画风格亦负盛名。根据考古发现，远在新石器时代，其彩陶艺术便颇具地方色彩，岩画更有抽象的图案化倾向。尤其到了秦汉时期，更有显著发展。象岗山南越王墓中，壁画图案运笔流畅，风格雄健，已很有艺术表现力。而绘画人物铜镜，形态生动，线条洗练，颇见功力。

到了唐代，则有南海人张询、僧微脱颖而出，成为史册上留名的大画家。可惜，他们的作品均未能留下来，只有评前者“善画吴山楚岫，枯松怪石。”后者“闲工小笔得意新”的文字记载。而宋代，则有罗浮人何裕夫，有“活笔”之誉。直到明清，画家辈出。有南海人林良，擅水墨写意花鸟。顺德人李孔修，善写禽鸟动物，在民间颇有声誉。东莞人张穆，画马著称于世。新会人高俨，擅长画山水。石涛，广西人，山水、花卉、人物皆能，细笔粗笔，渴笔泼墨皆长，风格沉郁豪放，亦秀逸闲静，极有创意，且有一部《苦瓜和尚画语录》流传后世，其“搜尽奇峰打草稿”、“我自用我法”等主张，对后世中国画发展影响甚大。而后，则有顺德人黎简（即二樵）、苏六朋、苏仁山等番禺“二居”居巢、居廉，也卓有建树。以上各人，求新求变，技法五彩纷呈，为后来“岭南画派”的产生奠下了基础。

20世纪初，一批有志亦有个性、眼界开阔的广府画家，力主“折衷中西，融汇古今”，终于开创了南方一大美术流派“岭

南画派”。

其创始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均是广府番禺人。三人早年都曾到日本留学，看到日本美术界在西方绘画影响下革新日本画的进展，又接受了孙中山思想的影响，从而锐意求新，以自身的才气与全新的画风，脱颖而出，成为“岭南三杰”。

高剑父（1879 - 1951）与高奇峰（1888 - 1933）两人为叔侄，自日本回国后，同在上海出版《真相画报》，该画报成为了推广“新国画”的阵地。陈树人（1884 - 1948），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出任南方政府要职，三人均是投身民主革命的斗士，绘画亦更有创新意识。

其艺术风格，可以看出日本画与西洋画影响，但更有广东画坛向来师法自然、求新求变的“南气”所在。

三人可谓师从居廉、居巢，高剑父则亲为居廉弟子，而“二居”则可上溯到前代画家。但三人并没就此止步，在融入日本、西洋技法后，他们走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道路。20年代，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上成为“新国画”运动的倡导者，30年代，其画派日趋成熟。表现语言逐步进入精微层次。1948年高剑父、陈树人、黎葛民、赵少昂、关山月、杨善琛六人在广州举行《岭南名家书画展》，把“岭南画派”推上一个新的阶梯。

“岭南画派”在推动中国画走向现代化上，是功勋卓著，名垂史册的。他们实际上也代表了广东艺术界那种开放、兼容、求新求变的可贵精神。其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主张、形神兼备、雅俗共赏的方向、兼工带笔、彩墨并重的艺法，也都体现了广府人的积极向上、广纳百川的胸臆。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绘画观》一文，可看作是这一画派的宣言：

我之艺术思想、手段，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是欲取古人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更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之营养，

使其成为自己之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之生命。

因此，“岭南画派又不是 一个时过境迁的历史概念，而是具有一定生命力的思想体系……岭南画派不但没有消亡，岭南画派还在发展。”^③

第七节 建筑

广府的建筑文化，在中国建筑中，可以称得上别具一格。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个性选择，都包容有较深的文化意蕴。它没有北京四合院的格局，也不如客家土楼及围龙屋那么大包大揽，聚族而居，也都有各自的独立，无四合院与围龙屋的紧密关连——从中也可以看出中原大一统观念与此地的不同。作为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产物，广府建筑浸透了南方的务实精神，也充分显示了其不同的审美情趣，同时，也有着鲜明的历史走向感，不曾似别处建筑沉淀或凝固得那么重钝与硬化。我们把重点放在近现代，从中亦可见其历史流变。

早期，从洞穴发展到干栏式建筑，也就是五六千年前的事了。它是适应于南方的气候与环境的，底部悬空，由低于栏向高于栏发展，为的是防湿。而后，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由于中原汉文化的渗入，建筑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们从古任器城的格局来看，已经有了大型宫殿以及种种特种建筑，如越王台、朝汉台、尉佗楼、越台井等。尤其是广州市中心地下发现的秦汉造船场遗址，说明大规模的制造业建筑业已诞生。至于宏大的南越王赵昧墓，也证明了当时墓葬建筑的水平。寺庙的建筑，亦已有了汉光孝寺、南朝净慧寺、西来庵，伊斯兰教的怀圣光塔寺及道教冈院（三元宫之前身）等。而建筑结构布局，已出现了以纵轴线为主，横轴线为辅一类，如南越王墓的铜屋模型。

从隋唐到清末，广府建筑文化走向了成熟与多元化、个性

化。隋唐广府尚少有城镇文化景观的形成与集中，到了宋代，修筑府州县城则在广东勃兴，广州更作为路、州、县三级行政建置治所，城垣扩建与修缮有十余次，按中原京城规制，分出官署、坛庙、学宫、道路的位置，并划分出功能区。

而“竹筒屋”、“西关大屋”以及茶楼、骑楼，堪称最有广府特色的建筑。

竹筒屋作为广府传统民居，开间小、进深大，由前至后排列出用天井间隔的众多房所，形状就如竹筒。通风、采光、排水、交通则借助于天井与巷道。到近现代，受西方建筑工艺影响，升至两三层，屋顶改平顶，还设有小的阳台，局部有装饰，30年代较有名的有将军东、将军西、霞飞坊等街巷建筑。其前后缀连，浑然一体，外狭内宽，保持相对独立，聚族而居，却并不大包大揽以示一统天下。竹筒屋先是沿海各县草创的，而后进入广州，经历史沧桑，才发展成这一较为典型的风格。

“西关大屋”是广府的传统民居，用花岗石为墙脚，门口两边为水磨青砖墙，正门的门为三层，一是矮脚的吊扇门，颇为考究；二层为独有的“趟栊”，即可以拉合的横栏式门；三层才是全闭合的硬木大门，很是结实。屋内，为砖木结构的一两层房间，间隔门窗均装有套色玻璃的刻画，一为采光，二作装饰，精雕细刻，很是精美。外加一个小巧玲珑的庭院，轩峻，且荫凉，极适合南方溽暑的气候。兼之屋内一般均配置名贵的宣枝或其他红木家具，十分典雅与舒适。其布局为纵深延伸，三间两廊，左右对称，中间为主厅。中轴线由前而后则为门廊、门厅、轿厅或茶厅，正厅、头房、二厅、二房或尾房，每厅为一进，厅之间用小天井间隔，天井上有可拉合的天窗采光与通风。正间两侧有书房、偏厅、卧室与楼梯间，末处为厨房。小庭院一般在门厅右边。

传统茶楼一般高二至三层，上有亭盖，建筑彩画灰饰，底

层为园林或茶座，角度不同，景致则一变，楼上为“八阵图”式茶座，室内四壁均为名人字画、诗词对联，显得高雅别致。广府人好饮茶，因而促成茶楼建筑成为广府特有的人文景观。

骑楼同样是广府的一大景致。它当是广府传统建筑形式与外来建筑艺术的一个有机的结合。作为一个城市的主要特色，骑楼几乎遍及各主要街道，并在中国建筑艺术中独具一格。这主要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广州拓宽马路，扩大商业街之际而滥觞的，把西洋的巷廊与广州的麻石巷融为一体，不失空间，又留下了人行道。它可以避风雨、遮日晒，尤其适应广府亚热带倏忽骄阳当空，倏忽豪雨倾盆的气候骤变。较早的骑楼出现在一德路、石室一带，很快便推广开了。

以上四种，当是广府建筑文化的代表之作。其如书院、如洋馆、如高楼大厦，均有明显的内地祠堂或西方建筑的印记，这里就不一一叙说了。至于镇海楼、寺塔、道观之类，当然亦融有广府若干特色，但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

综上所述，广府建筑，当是承古越之风，聚中原之气、合西方之式而一步步形成自己在中国建筑艺术中独备的风格，与“岭南画派”所称的“折衷中西，融会古今”的观念可以说是相当一致的。它体现出了文化的融合、碰撞、激活的历程，很值得研究与推进。

《岭南古建筑》中，把广州及周遭的建筑艺术造型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庙宇、祠堂之类，风格比较壮丽豪华；另一类是民宅店铺类，风格比较朴素淡雅。但它们又具有很多的共同特点，即：

1. 强调脊饰的艺术造型作用；脊饰比较高，脊饰母题多是民间爱好的岭南风物人情。

2. 强调人门的端庄与气派；岭南人把门面看作是最重要的，是重点艺术处理所在，几乎是模式化了。通常有凹凸廊和

高台基，这种手法一可以防风避雨，二可产生立面阴影，以虚实对比来加强中轴。门簪和横楹联精心雕凿，蔚为壮观。门上屋顶也较两边升高，前面还有石狮、抱鼓、旗杆石等；

3. 有哲理性的山墙形式处理……这些山墙按金木水火土哲理，有的夸张飘逸，有的庄重朴实，有的层层叠叠，有的行云流水，给人以强烈的吸引力，变幻了方整平面的立体空间视觉。有些祠堂庙宇还把山墙做成排山滴水，施加彩画泥塑，更丰富了侧立面的造型；

4. 讲究柱范的艺术造型……

5. 适宜的色彩处理。在建筑比较密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建筑通常以灰为主调，灰麻石勒脚、灰青砖墙面、灰瓦面，只有屋脊和山墙才用较鲜亮夺目的灰塑或琉璃脊，这些颜色是材料真实质地的反映，可减少辐射热，有一种安宁感。在山墙上为加强轮廓，常施黑色边条线饰，其间画白色卷草点缀，颇醒目清新。

这里说的岭南，主要是指广府地区，显然不包括客家围龙屋、土楼之类。

作为珠江三角洲建筑艺术的经典之作，如广州的陈家祠，以及四大名园——东莞可园、番禺余荫山房、佛山十二石斋、顺德清晖园，亦可以看出上述的几大特点，故不赘。

末了，还得再提一下客家的围屋土楼，以及围龙屋。

应该说，它是魏晋时期中原士族“聚族而居”的产物，是当时的庄园向南方迁徙之际，随地形地貌、气候环境、治安保卫而发生演绎、变异而成的。因此，由庄园而围屋，包括围龙屋，均是服从“聚族而居”这一伦理准则的。

围屋或土楼，其外形或圆或方，近似于堡垒，事实上也起堡垒的作用。大的围屋，高达30余米，占地十数亩，有3至5层不等，外墙厚达1米左右，底层不开窗户，3层以上则开有

类枪炮眼的小窗，兼采光与防卫用。围中有水井，当中有的设祠堂，一样有几进身。也就是说，一个围屋里，一般是一个姓，分支为几十户人家。

至于围龙屋，则多建于较缓的斜坡上，屋前是必有半月塘，亦有人称这是“八卦图”阴阳相济。半月塘后，是一块大坪，可供晒谷或活动用，再是二三至七八个围不等，如今仍可找到六七围的大围屋，从天上看，如半个剪开的靶。但在中轴线上，亦有正天井，天井后为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式正厅，天井左右为东西侧厅。一个围龙屋，一般也是同姓人家，常有十几乃至几十个小家庭“聚族而居”。

客家围屋，是汉民族五大民居之一，享誉中外建筑界。

而潮汕民系引以为骄傲的，则是潮州古城作为一个整体的建筑，俗话称“到广不到潮，枉走此一遭；到潮不到桥，白白走一场。”潮州城里，古文物、古建筑，均教人目不暇接。其中最有名的是开元古寺以及世界历史上第一座启闭式石桥——广济桥（湘子桥）。

开元寺始建于738年，即唐玄宗开元26年。为粤东第一古刹，外观庄严肃穆而又带有鲜明的潮州建筑艺术风格，内藏大量经书，以及宋代铸的大铜钟，元代的铜锣、云板及明代的金木雕千佛塔等。

广济桥是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始建于南宋年间，全长500米，横跨水深流急的韩江，与赵州桥、芦沟桥、洛阳桥同为中国古代四大石造名桥。江中有24个石桥墩，其中段原由48艘梭形大木船连结为浮桥，与两边石桥连在一起，可以自由启合，便于航运。可惜，1959年浮桥改为现代钢梁混凝土桥面，把这一具有古代高超建筑艺术的名桥毁了。

潮州城中亦有西湖、内不少文物遗存，城北有摩崖石刻、宋代古窑、广济门城楼、凤凰古塔等等。

广府艺术，可谓多姿多彩、瑰丽生辉，让人目不暇接。以上我们尽可能加以展开，但亦免不了挂一漏万，有遗珠之憾。

我们亦不难看到，广府艺术，林林总总，既具有鲜明个性，却也有相对一致的地方，如其民族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故只要把握住广府文化艺术的主脉，也就触类旁通了。总之，广府艺术，在中国艺术领域中，也是缺一不可，且独树一帜的，它对中国艺术产生的辐射与推动作用，更以近现代为最，它开了中国现代艺术的新风，并将再一度走在前面。

第八节 民间艺术

广府民间艺术，由于其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特殊，南越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宗教信仰、风俗习尚等因素的历史传承与演变，处处表现出它的地域性、民族性的浓郁特色。同时，广府地区以是我国与外国交往最早的地方，外来文化影响不菲，从而在民间艺术中也有充分、鲜明的反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广府民间艺术既集中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又体现出广府文化兼容并蓄、善于汲取外来文化之长的特色，从而自成一家，博大而又精深。

在考古中，我们早已发现远古的艺术化的陶纹、图腾、石刻、岩画等等，尤其是新石器时期古越族人创造的几何形印纹陶，更在学术上引起重大关注，一般认为是自蛇纹演化过来，是蛇（龙）图腾的神秘形象。及至商国以后，越族先民与中原内地经济文化交往日趋频繁，民间艺术也渐渐趋向汉文化，古越族也大部分同化为汉族，当然，既往的传统也经消化吸收，交融在一起，从而变得丰富多彩。直到明清两代，广府民间艺术更有了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繁多的品类，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首先是广绣，即广州刺绣，它与苏绣、蜀绣、湘绣齐名，为我国大四名绣。广绣主要包括广州、佛山、南海、番禺和顺德等市县的刺绣。它在唐代便已有了相当高超的技艺，且为封建帝王所珍爱，工精艺巧。到了宋代，受绘画艺术影响，刺绣工艺日臻成熟，“画绣之工，共期职也。”到明代中后期，则已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其时有南绣、北绣之分，“南绣实用性强，用披草绣，效果平、薄、细、真、色彩细润，采用套节绣……”由于广州对外贸易发达，不少外商来广州，均采购大批广绣回国，所以，到清朝，广绣更进入了鼎盛，形成以广州为中心的刺绣行业，且以男工为上。广绣以孔雀羽笔扫绩为线缕，绣制谱子及云肩袖口，金翠夺目，后又以马尾缠绒，作为勒线，绣制轮廊或边沿，增强了艺术表现力。故 19 世纪英国艺术家波尔西在《中国美术》一书中称：“中国人长于刺绣花鸟，而广东人于此技尤为特长。”学者认为，广绣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绣品大量外销有关。及至乾隆年间，广州有了第一个刺绣行会——绵绣行，绣工 3000 人，店坊 50 家。邻近城乡更有数以十万计妇女从事绣花业。

广绣著称于世的特色是：构图饱满，繁而不乱，装饰性强，色彩浓郁鲜艳，绣制平整光滑，手感柔软，金银垫绣立体感强，富丽堂皇。品类繁多，应用范围广，题材广泛。

而后是雕塑。主要有木雕，牙玉雕刻、端砚、角雕、根雕、砖石雕、骨雕、缅茄雕刻等。清代广州数十层象牙雕刻，闻名海内外。端州（即肇庆）的端砚，更居我国四大名砚之首。不仅石质天下无比，雕刻制作更丰富多彩，题材、主意、构图、雕刻都十分讲究，雕刻上侧重于细刻与线刻，线条精确、细腻、婉转、流畅、轻快。端砚，业已成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留传于世。

再是陶瓷。广府陶瓷，以石湾陶塑为最杰出的代表，其中，

最具特色的要算石湾瓦脊了，它用于建筑装饰上，与木雕、砖雕、灰塑、壁画等相结合，构成了广府建筑独有的民间装饰艺术。石湾陶塑瓦脊是在清代发展起来的，其题材以人物故事为情节，配以亭台楼阁、山石桥榭，形成一条完整的艺术化的陶瓷瓦脊，蔚为奇观。广府地区，即珠江三角洲及粤西各地，加上广府人所至的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古建筑，也多采用石湾瓦脊作为美化装饰。石湾陶塑艺术，渊源深厚，名家辈出，各领风骚。明代有可松，清代有黄炳、陈渭岩，清末民初有潘玉书，成为石湾陶艺四大宗师。此外，还有闻名天下的“石湾公仔”、石湾民间陶器。而广州彩瓷，也久享盛名。

醒狮、舞龙，更是广府人生气勃勃的民间艺术，表现了一个民系的艺术风格。最为出名的，则是佛山狮头。相传始创于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6年），佛山城乡瘟疫流行，人畜皆伤。百姓相信狮子是吉祥之物，于是狮会团体便舞着狮子穿街走巷，为各家各户驱灾求福。后果然消除了瘟疫，这一舞狮的传统便留下来了。

这一来，彩扎这一制业便兴盛了起来，以佛山、广州、鹤山等珠江三角洲各地扎的为代表，与北方狮子舞各具各自形成南、北两大派别，成为我国著名的民间彩扎杰作，享誉全球。所扎制的，不仅狮头，还有彩龙、灯色、风筝等，还有各式动物舞具、亭台楼阁、舟车乘舆类。

广佛狮子头，造型夸张、浪漫，模仿历史英雄人物戏剧脸谱，设计有多款狮子头脸谱。具有不同的性格和用途。广府狮舞是集武术比艺、文化娱乐、体育竞技于一身的民间艺术，其造型、色彩、装饰等，均以这些为目的。南方狮以神似为基础，北方狮却以形似为标准。广府狮以狮被为狮身的象征，以几何色块为纹样，耍时人狮并见，以跳跃、过桥、攀登、采青等各种不同动作，表现其威猛、矫健乃至好斗、凶悍的武术，以惊

险、敏捷、灵活与欢乐引得观众开怀。

广府民间动物舞，除狮舞外，还有新会纱龙舞、中山醉龙舞、佛山草龙舞、东莞麒麟舞等。其中，佛山的彩龙最为出名。早在明代永乐年间兴起的秋色赛会，就已有用茭白（俗称茭笋）叶壳扎制火龙游舞在街巷间，后来又有“纸马火龙”的规定娱乐项目。而由民间彩扎艺人扎制的龙灯，更成了秋色赛会的重要内容。到了清末，佛山彩龙还出口到澳大利亚，是该地华侨团体回佛山订做的，因此，在海外久有名气。解放后，佛山彩扎龙灯更有新的发展，有彩龙、金银龙、秋色生花龙、火龙等。1979年，澳大利亚墨尔本市华侨团体再度到佛山，要求再为他们制作90米长的金龙、银龙各一条，以应当地“蒙巴节”及华人春节舞龙之用。于是，两条巨龙在海外轰动一时。自始，佛山彩扎龙灯，愈做愈长，一般在100—200米之间，也有300米，更有甚者，长达1300米，成为特大的“东方巨龙”，也成为中国民间彩扎龙灯史上之最。

而佛山秋色，也因彩龙而从明代大大出名，从此，凡是世泰平和，风调雨顺之年，秋和日丽之时，佛山秋色便大兴了，这成了民间举行庆祝丰收游行的活动，也是珠江三角洲的民间娱乐之最。史书上有载：

会城（即广州）喜春宵，吾乡（佛山又名忠义乡）喜秋宵。醉芋酒而清风生，盼嫦娥而逸兴发，于是征声选色，角胜争奇，被妙童以霓裳，肖仙子于桂苑，或载以彩架，或步而徐行，铛鼓轻敲，丝竹按节，此其最韵者矣。至若健汉，尚威唐军，宋将，儿童博趣，纸马火龙，状屠沽之杂陈，挽莲舟以入画，种种戏技，无虑数十队，亦堪娱耳目也。灵应祠前，纪纲里口，行者如海，立者如山，袖灯纱笼，沿途交映，进尽三鼓乃罢。

秋色的艺术表演——舞蹈等，可谓绘声绘色。60年代初，

郭沫若亦有诗称“凭将秋色千张纸，夺得乾坤万象春。神似人灵神已废，而今百姓尽为神。”

秋色之热烈、奔放、豪迈以及尽欢，也充分表现了广府人开放、豁达的个性。

以上所列举的民间艺术，不可能以一概全，但它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是珠江流域内广府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也可以看出，与外部——包括内地与海外的交往，如何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如广州牙雕之鬼斧神工、石湾陶塑的成就卓著，端砚的名满天下，乃至佛山“东方巨龙”的脱颖而出，都无不表现了这种文化交流的重大意义，而今，这种交融仍在生生不息地进行着，预示未来更大的辉煌。

① 《广州府志》。

② 《羊城古钞》。

③ 关山月《试论岭南画派和中国画的创新》。

第四章 民俗研究

第一节 民俗的传承与变异

民俗，是文化系统中具有较大稳定性、承继性或传统性的一个层面。所谓“相沿成风，相习成俗”，本身就包含有很深的历史内容，是在一定发展时间上显示出来的特征，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特征。例如，顺德的自梳女、番禺的“不落家”的习俗，皆是广府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女子在某种程度上取得经济独立性，从而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而产生的，这也是只能是广府文化中独有的民俗，而在内地却不可能有的。由此，作为民俗的一个特征，这便是它的历史性。凡是标志民俗特定历史的产物，都显示有它的历史性，深入研究这种历史性，我们甚至可以得到比从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所提供的东西更多的一切。换句话说，一部民俗史可能更包罗万象，折射出更多的历史内容。

其次，民俗本身，也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也就是它的地方性。所谓地方性，便是指民俗发展在空间上所显示出来的特征，也有人叫做地理特征或者乡土特征。民俗的地方性具有普遍意义，无论哪种民俗，都受一定地域的经济、生产、生活条件以及地缘关系所制约，有着一定的地方色彩。为何在广府地带，南海观音会如此受崇拜，恐怕与广府地带作为沿海地区极有关系，与广府人的主要生产、生活环境密不可分，从而祈求平安、丰产（渔业方面）等等，所以，“拜海”之类民俗才如此顽强，南海神庙香火才那么鼎盛。进而言之，广府迷信

风俗比中原为烈，“子不语怪力乱神”在这里历来没有市场，这也与珠江流域的地理气候环境有很大关系。广府人好鲜、淡的饮食习惯，也是与地域、水土相关的。总之，民俗，每每打有很深的地方性的烙印。

民俗，是扎根于民间的，变化相对较为缓慢，是一种文化长期的积淀。在历史发展上是有传承性的。

同样，在地理上，也有其浸润扩展的态势，并且在扩展中发生变异，这也是文化的交融、碰撞与激活。也就是说，在民俗的地方性上，在存着变异性。

因此，民俗是一种传承文化，传承性是民俗的动态特征。这种传承性常常表现出某种类型的民俗在发展、流传的过程中，始终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内容或形式上的联系。例如，几百年来，珠江文化区内，有不少“飘色”的习俗，这同内地“迎故事”在形式上相似，同是娱神，但后者主要去避灾祛祸，但前者却演变为“人日飘色”，标志人的主体精神的高扬，被高高举起的是打扮为各路英雄的幼童。如今，“教育基金百万行”，在形式上与这种“飘色”活动可以说是一种传承，只是更大规模和加上现代色彩罢了，但主旨仍在于“人”的“高举”——提高人的文化素质。这也是广府文化中独有的历史传承。至于其他，如节日习俗、婚丧礼仪……等等，自古以来均有非常生动的记载，让后人看到这些民俗的传承关系。

正是有了诸如此类的特征，才使我们从广府民俗继承、流传的来龙去脉中，看到作为广府民系这么一个群体的历史背景、地理风貌、社会形态以及文化的发展——它更可靠、更有力，更为稳定与恒久。

同样，民俗也是一种变异的文化。变异同样是民俗的动态特征。这种变异，或许在时间上即历史上不会太显著，但在空间上即地理上都每每容易发生。所谓变异性，便是指某种民俗

在流传、扩展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影响与原因，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某些变化。例如，赛龙舟，据闻一多先生考证，这一风俗可以追溯至原始图腾时代。端午节是越人——也就是土藉广东人为祈求生命得到庇护而举行的图腾祭的节日，这习俗北上至荆楚，才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如今，广府中龙舟竞渡，则是全国最盛大的地方。这里的龙舟，选材十分严格，制作更为精细，装饰得非常华丽，竟成了一种很讲究的工艺品，而不仅仅是竞渡工具了。而粽子也从祭品走向了民间的食品，供百姓享用而不是祭神了。仅此一例，例可以看出历史时代的差异，尤其是地方上的差异，更是文化传统上的差异了。

简单归结一下，可以这么说，各种民俗都在自身发展和传播中，有着相应的变化，要么注入了新的内容——如赛龙舟演变为纪念屈原，要么改换了一些新的形式——如“飘色”成了百万行，等等。所以，在时空上的传承性与变异性，在其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也是作为民俗文化的普遍特征。

这种稳态上的变异，是为了一种新的平衡而出现的貌似不平衡的状态，并不能否定民俗的稳定性。我们这里之所以强调稳定性，因为它才是民俗最大的特征，没这种稳定性，历史性与地方性便是一句空话。事实上，作为民俗本身，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很明显的地理范围内，是很少有变动的，更少有大的变动。否则，就无以区分此处与彼处的民俗，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就失去了普遍的意义。民俗的变异，尤其是真正的“移风易俗”，产生本质上的变化，总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及相当艰难曲折的道路的。有时候，貌似变化很快，但细究下去，却骨子里还是一回事，所谓“新瓶装老酒”。

当然，民俗，总是要随历史、社会、文化以及地理、气候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的，但变化每每比政治、经济等“显性文化”要慢一些，小一些。所以，我们务必在历史性、地方性基础上，

先看到其稳定性，才能谈其承传性与变异性。

当然，有些恶俗，是随现代文明的发展而渐渐被淘汰的，如珠江三角洲“吃鱼生”的习惯，尽管现在还没得到根除，但总归要被废止的，不可能、也不应该延续下去了。

在稳定中传承，在传承中有变异，在变异里包含传承，从而又显示出其稳定性——这可以说是民俗发展中的辩证关系。离开了稳定，便离开了民俗的根本特征——它毕竟与流行音乐，与某项有时效性的科学发明，有着完全的不同。

正是立足于这么一个科学的基点上，我们来研究珠江文化中的民俗或广府的民俗文化。

第二节 从节日民俗切入

应当说，广府民俗文化，有自身产生的、带有鲜明的地方特征的主体部分，也有在中原、江南民俗文化流传过来，在广府发生变异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化是广府文化的大背景，也是广府民俗文化的大背景——这并不等于把中原以儒家文化为独盛独尊的民俗文化作为惟一的背景。如果这样认为，中原文化就不是作为地域文化而存在了。但人们每每有这么一个错觉或错误的认识，这是应当特别指出来的。否则，无以解释广府民俗文化中，为何没有儒家文化的多少地位与影响。要有，也发生了不同一般的变异。

从这一点出发，自秦以降，广府便成了中央封建集权制的州郡，汉初，有过独立的一段时间，但仍与汉朝保持“君臣”关系，所以，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汉文化的一部分，它有其一致之处，也有其独立的地方，从而形成广府自身的民俗文化，总体属于汉文化的一部分，但又有其特异的、独具的风彩。

追根溯源，广府民俗，是当年融入汉民族的越人的民俗在

传承、变异的演进中，作为文化积淀的最沉稳部分，至今仍有不少保存下来，如在日常生活包括饮食中，仍处处可见。

而另一方面，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广府地区受西方文化影响又较之内地要早、要强，经过抗拒、接触与整合，外来民俗对广府民俗也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尤其是广大的侨乡，外来交往日多，日常生活、饮食衣饰诸方面，渐渐被内地人看作有了“洋味”——这“洋味”，事实上也作为了一种民俗而存在。这样，使得广府民俗，在古、野的“越味”上，又加上了雅与现代的“洋味”，好似“蛋黄莲蓉饼”一样，是多元组成的。这可以说是地理的优势所带来的变异。

广府民俗，也就是这样与广府人的社会生活一起形成、发展、演进的。它是中国民俗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缺一不可的部分，其特异的色彩，尤其引人注目。

我们先从广府的节日民俗谈起。

表面看来，广府的主要节日，大致与内地的节日，也就是与整个汉族的节日是相同的，这说明了它的中国文化或汉文化的大背景。但是，仔细研析，就会发现，安排的方式却有所不同，习俗上更有了不少变化。作为广府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的民俗，更有自己的历史承传与地理上的差异，不能光看外部的表现形式。

早在清代雍正年间，由郝玉麟编撰的《广东通志》，对岭南（主要是广府）的岁时民俗有过一段记载，细细品味，自有不同的体会，节录如下：

春日竞看土牛，或洒以菽稻，名曰消疹。啖生菜、春饼，以迎生气。元日礼神，贺节，上元欢灯，或作千秋百戏。十六夜，妇女走百病，撷取园中生菜，曰采青。十九日挂蒜于门，以辟恶，广州谓为天穿日，作缚

吒请神，曰补天穿。二月祭灶，分肉小儿食之，使能言。入社后，田功毕作（谚曰懒人傍灶）。十五日花朝，至三月上巳祓禊。清明插柳于门，其前五日始。三月中扫墓郊行，谓之踏青，亦曰铲草，俗曰压纸，以楮置坟上也（《岭南杂记》云：宗孙盛者，堆如积雪）。四月八日，浮屠浴佛。五月朔日祀祖先。五日饮蒲酒，饷角黍，镂艾虎，书木符，为儿女佩采莲，竞渡，至五日乃止（广州有逾月者，夺标较胜，往往成讼。今此风已戢，唯大舟龙船高大如海舶，具鱼龙百戏，积物力以三十年一出，出则诸舟行以从。悬花球、绣囊，香溢珠海。孙仲衍所云：“天香茉莉素馨园”是也）。夏至日擘荔荐祖考，磔犬以辟阴气。七月七日曝衣书，家吸井华水贮之，以备酒浆，曰圣水。儿女以花果作供，捕蜘蛛乞巧。十四日，浮屠盂兰盆会，剪纸为衣，以祀其先。望日以龙眼、花果相饋遗，曰结缘。二十五日，士庶多为蒲涧游（广州相传，安期生以是日升仙，自古有邀头会）。八月望夜，赏月、剥芋食螺。重阳有墓祭者，亦曰登高。细民放纸鸢（风鸢之戏自古有之。或云因天地之风候以舒小儿之气，而除内热。但广州则以重阳。若琼州则于五月南风盛时，截竹绷布，续藤为绳，放之声闻数里，鸢制大可十倍）。十月朔日，以五敛杂芥菜食，辟寒气，举火星醮（广州禳回祿，闾闾次第行之，自十月朔至岁暮）。冬至，作冬糍祀祖，有祭墓者。腊月念四日，为小年夜，祀灶，用爆竹、饴糖。除夕祀祖，家人聚饮，曰团年酒。围坐达旦，曰守岁。相遗以物，曰饋岁。易桃符，小儿卖痴呆。此粤俗大较也。①

看上去，所有节日，大致与内地没有多少不同。但是，作

为形式上的，以及地域上、民情、习俗而形成的表现方式及活动内容，便有了很多的差异。

除开上面得列举到的节日外，按时间顺序须列举的还有，正月人日、白衣观音诞、玉皇大帝诞等；二月有文昌诞、洪圣诞（波罗诞）观音诞等；三月有胥民“买力”日、北帝诞、何仙姑诞、天后诞等；四月鱼花节、金花诞等；五月有龙母正诞、关帝诞；六月龙母娘娘诞、观世音诞等；七月中元节等；八月口娘诞等；九月观音诞等；十月盘古王母诞等；十一月洗夫人诞，十二月腊八节、紫姑神诞……加在一起，我们便可以看到：

第一，广府民俗，充分表明它处于整个汉文化（但不完全等于中原文化）的大背景下。正如明代嘉靖年间修订的《广东通志》记载：“自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之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女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俗庶几中州。”加上南宋末年与明末的两次大迁徙，岭南的流风遗俗，与中土民俗几度融合、交互，并渗透，可以说是浑然一体了。我们从前边可以看到，广府的节令，包括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乞巧、盂兰、中秋、重阳、冬至等，与中土的节令是一致的，只是形式上有所区别，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也大致相近。包括嫁娶礼仪也是如此——在这点上，应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南岭的阻隔，某种习俗从内地传入，甚至可能比内地保留时间更长，呈凝固状态，当内地已淡化或改变，这里仍然如过去一样。所以，广府文化一方面因本土因素呈现出远儒性，但在某些方面，又带有浓烈的、较目前内地更为古奥的特征。这里说的是续族谱、祖宗崇拜一类，也包括婚俗，他们遵循“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无币不相见”的原则，其聘娶过程中，包含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严格的程序，比内地今天更加讲究，尤以广府世家大族为甚。女人的贞节观也相当严苛——儒家正统文化意识深深地渗透其

中，我们在珠江三角洲处处可见。如今在中原，所谓续族谱，立祖宗牌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类，反而要罕见得多了。正所谓古语中所道“礼失求诸野”了。

第二，广府民俗，仍鲜明地呈示出其地方色彩，与其地理，或生存环境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珠江流域是古越人的故乡，古越人虽已在民族交融中消失于汉、壮等民族之中了，但其民俗因素，仍通过传承、变异、演进的方式，多少有所保存，而且成为其鲜明的地方色彩。如广府地区的“除夕卖懒”，在《广东新语·广州时序》中则有：“岁除祭，日送年。以灰画弓矢于道射祟，以苏木染鸡子食之，以火照路，曰卖冷。”说的实为“卖懒”。这却是百越古老的习俗。又如除夕花市，这也是广州所得得天独厚，因地理气候的缘故，而在别处则不可能的。另外，在广府人，有“冬至大过年”、“瘦年肥冬”的习俗，这是古越人的习俗，内地不盛，广东却很看重……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只单说另一项：食槟榔——这一广府著名民俗，到当代已经比较薄了，这是由于医疗条件变化了。过去，广府人“多食槟榔，月至数十”，还以此作馈赠礼品、婚嫁聘礼，乃至于鬼神祭祀（鬼神也得祛病）。黄瑜《双槐岁抄》中道：“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惟事祭鬼。没犯伤寒阴阳二症，岂有座视而不药耶？且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妄发汗吐下，其祸可立而待也。瘴疠之作，率因饮食过度，气痞痰结，槟榔能下气消食化痰，故岭海之人多食之。此可类北人之食酥酪……。南地热，食槟榔故脏气疏泄。”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广府人吃槟榔的民俗，是与这个地方的大气候、地理环境、物产，甚至流行病有密切关系的。

过去，“广州不论货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这习俗，也在北方某些地方传开了，如湖南湘潭等地，但没这么普遍。生存环境的因素，恐是最重要的。热带亚

热带的气候，易生瘴疠，故须槟榔以解气。

第三，同中原儒家正统文化独尊祖先或独尊文、武二圣（孔子与关公）不同，广府民俗中，其祭祀的对象，则广泛得多，故古书中有称越人“信鬼神，好淫祠”一说。他们祭祀的有各路神仙，且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大有越人尚鬼遗风。其“各路”，包括至佛、道、名人、地方英雄等等，均可以进入被祭祀的行列，带有很强烈的功利性。尤其是对财神爷的焚香顶礼，更首屈一指——这一迷信活动，反映了广府民俗中亦包含有广府文化中的重商精神在内。

当然，对于开发当地，有所建树的尊者，如冼夫人等，也都是享有祭祀的对象，以寄托广府人对其怀念与尊重，并成为了节令。这里没有独尊一家的儒家文化的中原习俗，也反映了广府人的兼容并蓄的文化精神。

进而言之，这种不独尊一家，推崇世俗功利的民俗，也反映在方方面面，如广州近郊乡均于农历正月二十四日为食生菜的节日，乡民聚在一起，大啖生菜，并且各带回一把，“生菜”者，生财也，取其谐音。还有春节期间的醒狮采青的风俗，也是如此，用舞狮去采回青菜，也就是采回“财”运的意思。

这些，与中原儒家正统文化的重义轻利、义利相分的价值标准是格格不入的，这也是广府民俗中与中原民俗有根本不同之处，也说明其文化环境的不一样。

其四，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的“阴性”特征——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广府祭祀的对象中，女性神灵占去了很大一部分，如冼夫人、天后、龙母、何仙姑、日娘、盘古王母、五谷母、紫姑等，连观音也叫作了观音娘娘，等等。这一方面，母系社会在这个地方遗留的影响仍很大，历史上延续的时间亦比较长；另一方面，也与广府女性较中原妇女少受压抑有关。她们有着更多的自强、自立、自司的意识——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女

性也能在经济上取得相对的独立性，如顺德的“自梳女”等。

这也与地域有关。珠江流域处于亚热带、热带，一年四季，高温持续时间长。所以，正如北极圈附近的人们崇尚太阳一样，热带人却崇尚的是月亮——太阴。因此，主张以柔克刚、以阴制阳的道家会出在南方并在广东发展成为宗教。

其五，广府民俗中，亦反映了广东历来对外开放、吸收外来文化的特色。佛、观音不消说了，还有波罗神达奚司空等……包括某些青年的婚礼，如今也兴上教堂等等。由于广府地区处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带，不仅欧风美雨有影响，印度、东南亚地区也有影响，更何况还有香港、澳门——它们正处于广府的中心地带。那里的民俗的变异也就更为明显了。过圣诞节，嘉年华等等，也都郑重其事。

当然，“西风日渐”，文化的交流，同化，也都是有一定规律的，如何保留优秀的民俗而淘汰其糟粕，却是值得思考与研究的。例如，近三百年内，珠江三角洲地区兴起的“人日飘色”的活动。过去，“人日”在整个春节至元宵的活动中，是不怎么突出的，这从“人日”排行为七，也可以看得出来。尤其是近代，“人日”的喜庆活动愈来愈盛大——我们从欧阳山的《三家巷》中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显然意味着，在珠江流域，在广府，人的独立性日益在凸现出来，人的主体精神更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得到了弘扬，封建专制的桎梏日益在被打破——这里，分明有着很深的历史意义。这里既有传承——即“人日”本身的存在，也有历史与地理上的“变异”——近代人文精神的兴起，当然更有新的演进，——如前所述的“教育基金百万行”：其目的仍立足于人本上，人的教育与素质，人的现代化进程。

第三节 重要民俗剖析

以上五点，只是一种粗略的扫描，在这么一部专著中，不可能给它以更多的篇幅，在这五点以外，还可以有别的概括。

其汉文化的大背景、鲜明的地域色彩、重商精神或功利特征、阴性特征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均是相对突出的，它有相当稳定的方面，也有易变的一面。这恐怕相对于中原、江南文化而言，更是这样。

总的来说，民俗具有相对稳定的恒态结构，在历史演变的风风雨雨中能保持其恒久不易的状态，且顽强地延续下去，它是一个民族或者民系文化的深层结构，从中可以找到更切近一个民族、民系的历史变迁的答案，譬如神话、传说、仪式，均这样，在这去相对稳定的、封闭的社会生活中，它的影响是巨大而又广泛的，左右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包括历史进程。但是，民俗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开放的系统中，它经历动荡、颠簸、起伏，随着文化的交融和激活，随着经济的变革与生产方式的变化，它同样也会有它自己的变迁的。如前所述的顺德“自梳女”的出现、番禺的“不落家”现象乃至“人日飘色”，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不过，这绝不意味着，随着现代的进程，人类文明的趋同化，民俗无论如何稳固，它也会被趋同化掉，从而失去自身的特征，这显然是错误的——当然，也存在着这样的危机，中国的“文革”，也在“破四旧，立四新”中破坏了不少民俗的传承，这是需要汲取教训的，但“文革”毕竟是一种历史的错误，与文化的浩劫，是一种“意外”——虽然，意外中也包含某种必然性，例如其暴民运动与墨家行帮色彩的“钜子”首领下的“死不旋踵”，多少也是有着传承的，这已是题外话了。

虽然以上已列举了不少广府民俗中的节令与景观，但为了

更生动形象地作出表述，不妨来对主要民俗进行若干剖析——

一、广府岁末花市。这作节令的代表。

珠江三角洲，尤以其中城市广州为代表，历来就有对花异乎寻常的兴味。西晋稽含所著《南方草木状》曾引西汉陆贾《南越行纪》云，当时广州鲜花四季常开，品种众多，有“自别国移至”的素馨花与茉莉花，成为越女钟爱的饰物。南汉时广州便出现了花市，亦有称宋代形成花市，均是一千年前了。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载，花农于花季，“旋掇花头，装于他枝，或以竹丝贯之，卖于市。一支二文，人竞买戴。到了明清。尤其是19世纪中叶，花市例定在除夕前几天举行。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称：“珠江南岸有村曰庄头，周围里许，悉种素馨，亦曰花田。”商人们“涉江买以归，列于九门，”从而让“城内外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量花若量珠。”可见当日之盛况。相传五仙门渡口当日因花农每每由此渡江进城而被叫作“花渡头。”

近一百多年里，更是十里长街，争妍斗艳，游人如潮，花事若云，蔚为奇观。广州亦得名为“花城”。合家老少结伴外出观赏，形成了“行花街”之习俗，大抵均抱上一盆金桔、几束鲜花，尽兴而归。秦牧《花城》的散文写此可谓炙脍人口。而百年前，已有志云：“粤有藩署前，夜有花市，游人如蚁，至彻旦云。”②

花市于一百多年前走向兴盛，同广州工商业的勃兴是密切相关的，亦可称之为广州的“第三产业”的先声——以消闲观赏服务的目的，这在小农经济时期是不可能的。花市由南汉、宋代兴起，于明清走向盛期，与广州的经济、尤其是商业有很大关系。如今，广州城郊——包括已成为城区的芳村，还有邻近的顺德陈村、南海盐步等，均成了花卉生产的专业区，并且可以预期将日益繁荣发展。

二、顺德自梳女。这作婚嫁风俗的代表。

研究自梳女，已经有了不少文章，大抵从经济独立、近代文明浸润入手。其实，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在广东一带，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这一阶段，相对比中原、江南等地要短，所以，父执的权威建树得也不是那么严酷与完备，于是，古越遗风一下子便同近现代经济独立的文明之风连结了起来，由古越的“不落夫家”演变为“自梳女”了。这里简要概述一下。

不落夫家是指女子出嫁后，除了年节、红白喜事外，一般不回男家而住在娘家，时间两三年甚至十年八年，直到生下孩子才回去，方定下夫妻名份——这点，在西南民俗中迄今仍可见，这正是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期的遗俗。向南《西南旅行杂写》中就说：“此系女人在台山、新会、顺德为最多。”乾隆《顺德县志》中亦有“乡之处女，强之适人者，归宁久羈，不肯归其夫家。”随着的近代珠江三角洲蚕丝业的发展，女子有了独立谋生的可能，为了摆脱封建婚姻的束缚，遂由“不落夫家”进而“自梳”，即把头发自己梳起，以宣布终生不嫁，就算被迫嫁人，也坚决不落夫家，只余有名无实的夫妻关系。头发高高盘起成髻，一如古越人的“箕踞椎髻”，夏天穿里胶绸衣，年纪大了，集体住在“男人不得入内”的“姑婆屋”里，死后则专葬在专用的“姑婆山”墓地……

这种习俗，前传承于古老的母系社会的婚俗，后呼应于近代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社会生活中，其文化底蕴颇值得玩味。

三、粤菜。这可作饮食风俗的代表。

粤菜名扬天下，素有“食在广州”之美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五大洲都享有盛誉。

广府人“无所不吃”，其实，应说是杂合南北之美味才贴切。古人云：“东南之人食水产，西北之人食陆畜。食水产者，龟蛤螺蚌以为珍味，不觉其腥臊也；食陆畜者，狸兔鼠雀以为

珍味，不觉其膾也。”③广府人把东南西北，荟萃于一炉，化作美味佳肴，所以才成了“无所不吃”。

尤其是吃蛇，所谓“秋风起，三蛇肥”，秋冬更是吃蛇的黄金时节。由广府人吃开去，如今，更是国人趋时趋尚，连外国人都都跃跃欲试了。早在汉代杨孚的《异物志》中便载有：“蚺为大蛇，既洪且长，彩色驳犖，其文锦章，食豕吞鹿，腴成养创。宾享嘉宴，是豆是觞。”可见吃蛇的历史有多长了。

粤菜选料奇而广博，制作也糅和中西精华，精而神妙，口味淡中有别，让人百吃不腻，在营养上尤为讲究——于健康上亦很功利，食物热性寒性，何物温而何物燥，……等等，都分得很清楚，作有机的配合。

粤菜通常以广州菜为代表，事实上是集珠江三角洲食区南（海）、番（禺）、顺（德）及东莞、香（中）山的地方特色——在海外，顺德饭馆每每是粤菜会所，并且吸收了京、苏、杭的烹饪特点，甚至融汇了某些西餐的长处，用料精而广、配料多而巧，注重质量与味觉。食品讲究清、鲜、嫩、爽、滑、香，调味则有酸、甜、苦、辣、咸、鲜，制成菜肴更讲究香、酥、脆、肥而不腻、浓淡相宜之美，即所谓“五滋六味”。

而宴会上菜式，大都冠以美名，有色、香、味、形、名俱佳之妙。由于重命名，故有人评价粤菜“犹如抒情诗”。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广州访问，广州白天鹅宾馆为她制做的一席粤菜，其菜名为“月映仙兔”、“双龙戏珠”、“燕入竹林”、“凤凰八宝鼎”、“锦绣石斑鱼”、“金皮乳猪”、“清香荷叶饭”、“淋杏万寿果”、“一帆风顺”等，颇具诗意。

饭前有汤，在粤菜中也是很讲究的。所谓“饭前一碗羹（即汤），胃口格外醒”，不仅有促消化作用的实用性，更有调动口味的意义。下汤料十分讲究，均随季节、冷暖、燥湿等而定，内容很是丰富，式样有近千种之多，以至可以专门出一部汤谱。

广东人重吃，这是出了名的。连早上见面，都不问“早安”，而是问“饮咗（了）茶未？”可见把饮茶当作一日大事。所谓“叹茶”更是一种享受。无论大小茶楼酒店，大都经营“三茶两饭”（早、午、夜）。也有把谈生意、分配工作放在了饮茶时做，更增加了实用性。当然，另一种实用意义则体现在如下俗语中：“清晨一杯茶，饿死卖药家”、“早晨一壶茶，不用找医家。”这自然是有科学道理的。

举了以上几例，广府民俗亦可管窥一斑了，能丰富本章前半部分的阐释。通过这，对广府人的民气、民风，乃至性格特征以及文化价值，也都能有所了解。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现代文明的进展，某些特征与景观，将得到强化，如花市、粤菜等，有的，亦会消亡或变化，如白梳女等。这也许不是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是珠江文化不曾固化而活生生的表现。

注释：

①郝玉麟《广东通志》。

②《广州城坊志》。

③张华《博物志》卷一，五方人民。

第五章 方 言

直至今今天，海外，包括欧美、澳洲等地，都仍把 Cantonese（广州语或白话）当作中国话，而把 Mandarinese（北京方言、清代官话，现亦移义为普通话）当作满洲话，这当然是误会，是中国与外界交流的历史所造成的误会——因为广州对外交流早于内地、早于北方，在海外的华侨，早期几乎全部都是广东人，而且大都是讲 Cantonese 的广府人，所以，欧美等国，也就以为所有中国人都讲这种话，以至产生这种“误会”。

不过，说全是误会，也不尽然。因为今天的普通话，自清代以来，已经糅合了大量的满语，有的语言学家认为，至少是四六分，也就是有四成满语，讲究腔正词圆，等等。而另外六分，在两三千年内，中原汉族亦融合了众多的北方民族，同样，也融合了众多民族的语言在内，古汉语的成份，在这六分中也得打不少折扣。譬如，古汉语中的入声，如今在普通话里完全消失了——当然，也不能凭此走向极端，认为如今的普通话已不是汉语了。一种语言，总是同一个民族的经济变化、政治集中而演变的，不会一成不变，直至今今天，它也同样在变化着。这些变化，有时很大，有时很小；有时很明显，有时很隐蔽，但总归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不会停止的。普通话如此，广府方言亦如此。由于历史的原因，古汉语成份在广府方言中沉淀不少，还保留有入声，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亦有的学者认为，广州白话，在秦汉之际，有可能是中国的官话——如今称普通话。那么，老外的误会也就不成为其误会，有了某种合理的依据了。

我们就从这里切入，研究作为广东的“官话”——白话。

第一节 两广的官话——白话源起

白话应是汉语方言中最为复杂、也最难听懂的一种。在中国七种方言中，恐怕就是白话，再加上闽语，是最不易学也最难听懂的，其它五种方言，在发音上多少有相近之处，差别不是很大，很容易触类旁通，但白话与闽语则不然。

这种差别，自然是与历史及地缘有密切关系的。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不可把它仅仅作为文化的载体，而应看作是所处的特定的文化环境的产物。从方言的形成上，我们可以看出历史文化的变迁，而从历史文化的变迁中，亦可以看出方言起到的作用。方言反映一个特定的地区及民系认识世界的普遍水平，人们正是借助方言这一工具来认识世界，反过来，又受到其制约。所以，语言学家亦称，语言属于其所在文化体系中最稳定的深层结构中的一部分。白话的形成、发展与特色，正好展示出广府文化生长过程中的一个侧面并反映出某些本质特征来，这也是我们研究广府文化所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通过它，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本书在其它方面对广府文化研究所得到的若干结论相吻合或进一步深化的地方。

广府方言，即白话，在相当稳定的状态下，长期作为岭南地区的官话——无论中国当时政治中心的官话是什么，这同广州始终是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分不开的。岭南其它两种方言：客家话与潮州话（即闽南话）均无此地位。在公共交际场所，一般均以白话为交际语言。这在心理上已是一种认同，千百年来均是如此。到了现当代，尤其是辛亥革命及今天的改革开放，由于广府的政治、经济上的地位日见突出，白话的影响力也就日益增大了。不少纯客语或纯闽语的地县，也成

了与白话交杂的地方，甚至以白话为主导，这里面，也包含有战争的因素，如抗战中不少广州人迁移到了粤北等地区，此后便在那里长期居住下来了。至于今天，内地学白话成为一种时髦，则主要是经济发达产生的影响了。这可谓它的“现代进行时态”了。

首先，打开广东省地图，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地图，我们便会发现，许多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已经消失的古字，却大量出现在这里的地名上。

例如：

元塍、深滘、南荫、迳口、簪滨、寮窠、大窝埗、下埗、长埗、赤坭、茶雷、高塘。

至于畀（给）、孖孖仔（婴儿）、苴（次、差、劣）、瞞（闭眼）、踎（疲倦）、斟（倒）等古字词亦不少。

这是古字，而在用语方面，就更多了。尤其是单音词，这些单音词，多存在于古汉语中，而在现代汉语里已不再单独出现了。

例如：

翼	翅膀
斟	商议
企	站立
知	知道
忧	担心
行	走路
睇	看看

这只是少部分，又如，穿衣，说是着衣；喝水，饮水；打伞，为担遮；蚯蚓，为黄犬；笑嘻嘻，为笑吟吟；收拾，为执拾；消瘦，为落形；竹竿，为竹篙；风筝，为纸鹞……等等，也都是从古汉语中直接过来的，与当今普通话大不一样。

连流行的谚语中，也有大量的“古意”，譬如，不说乱七八糟，却说“七国咁乱”；不说病急乱投医，却说“事急马行田”；不说高低不平，却说“岩岩崦嵫”，不说不知如何去做，却说“唔识驾步”；不说横下一条心，却说“立实心肠”；不说会精打细算，却说“知慳识俭”；不说单身汉，却说“寡佬”；不说邻居，却说“隔篱邻舍”……颇有几分古稚之味。

再还有人声，在白话中则普遍存在。

这些，都充分说明，在白话中，保留的古字、古词、古音是很多的，说明它的相当一部分构成是古代汉语。如果同客家话、闽语中保留的古汉语成分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同时期传入南方的古汉语状况之不同。古汉语的许多声韵调均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或呈有规律的演化。

尤其是在古诗韵中，我们更会发现，如果分别用普通话与广州白话去吟诵时，广州话竟会比用普通话押韵得多。这里，不妨引用晋、唐、宋三个不同朝代的古诗为例。

陶渊明的《咏荆轲》，晋代，此诗十五韵，更为说服人，故照录如下：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再读杜甫的《春望》，唐代，四韵。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还有苏轼的《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宋代，六韵。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隣。
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
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
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
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
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

这三首诗，皆是随手拈来，不难发现，用普通话读，其韵脚均分别为 en 与 in，可以说是不同韵了，而用广州话，则均是 em 韵，一韵到底。查古代音韵书籍，其均入侵韵或入侵覃合韵部，为合口收音，同广州语音，而在普通话的现代诗韵中，显然不同韵了。而“家书抵万金”一语，普通话当为“抵”注作“值得”意，而在广州话中就根本毋须加注了，因为这是个常用词。又如“问渠哪得清如许”的“渠”，广州人则是口语中的“它”或“他”，普通话则须加注解才得明白。

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

作为白话，根据《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自交趾至会稽（指越南北部、两广大部至江苏长江以南、茅山以东及浙江北部），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加上《史记》、《吕氏

春秋》、《吴越春秋》的记载，可知很早百越之地便有汉人到达。尤其是周秦以降，中原汉族人便大规模地南下到达广府了。这如前所提及的秦五十万士卒入粤戍边，迄今惠州一带还有当年的“军佬话”流传；汉朝，又有大军南征越国，于是带来了中原汉语。可以说，广府方言中的古汉语成份存在较其他两个民系要早。于是，在这个阶段的古汉语，便在广府地区沉淀下来。由于南岭造成的天然阻隔，中原汉族大规模南下的机会不是太多。所以，当中原汉人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发生战乱、交融之际，其汉语也发生了急骤的变化，却不曾越过南岭，影响到广府地区。这一来，这里接受的古汉语的成份就相对稳定得多，与多变的北方汉语渐渐拉开了距离，古字、古词、古音也就较内地的汉语相对保留得多了，一直沿用到了今天，更同普通话有了很大的区别。所以，有人认为，岭南三大民系不同的方言。正是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语言的活化石。于是，一个边远的地方，反而保留古风古俗要比中心地带多得多。

但是，并不能说，粤方言或白话，就完全等于古代某一阶段的汉语，它只是古汉语与广府地区原居住的“百越”族的语言交融在一起，才形成这么一种独特的方言。关于这，学者亦有不同的说法，这里不一一列举了。

我们发现，上古汉语的语序，在白话与壮语中竟有相当多的一致，如“蝗虫”，说作“虫蝗”，“客人”，成了“人客”，“褥垫”成了“垫褥”，“秋千”为“千秋”，“要紧”为“紧要”，……等等，把如今普通话顺序倒了过来，把定语放在中心语后，专名在类名词后。

这种一致，说明白话与壮语同受古汉语的影响，同时，白话亦不可避免与壮语有某种融合。根据有的语言学者研究，认为：“我们将粤语同壮语进行了认真的比较，发现在现代粤语里，有20%左右的古百越语（当今壮侗语族仍普遍使用的词

汇)。”

例如，在白话中常用的基本词，读 [nak] 的额你——骗你，读 [sa: I] 的噍气——白费劲，读 [tsang] 的重系——还是，读 [nam] 的秣——考虑，想一想……等等，与壮语中的读音都很近似。而且，是作为白话中的基本词汇而不是非基本词汇，可见构成期相当地早，在古汉语到来之前，并不同于语言交流中的“借词”。这是很值得深究的。

这一来，既有横向的影响，也有纵向的插入，构成了白话中错综复杂的成份，从而形成汉语系中一个独立的分支。我们不妨可以认定，其主脉仍是古代汉语，但却是以地方古百越为基础而发展起来，所以，基本语汇仍保留较远古的痕迹，而后来的发展是古代汉语的直接楔入——而这毕竟是一种较为先进的语言系统，所以，在交融中被迅速接受甚至于替代，故大量的语汇及文字均以古代汉语来表述，基本语汇反而很难找到对应的字眼写出来了。

第二节 白话中的海洋“腥味”及其古汉语、壮语的“根”

前述为白话形成之源。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白话中，包含有众多的海洋文明的气息，这点，过去人们不曾重视过，也没有细加研究，但却是广府文化中较为鲜明的特征。

例如：

白话中不说路费，而讲“水脚”；

不讲捎客，而讲“水客”；

不讲迁就，却说“移砧就船”；

不讲心意、头脑，却说“心水”；
不讲警觉，却说“醒水”；
不讲路程，却说“水路”；
不讲冒失，却说“失魂鱼”；
不说好帅，却说“好威水”；
不说装模作样，却说“整色水”；
不说栏杆，偏说“栏河”；
不说质量差，偏说“水皮”；
不说把风、放哨，偏说“睇水”；
说不了解情况，偏说“一头雾水”；
还有：

借别人的条件谋私利，为“借艇割禾”；
学习时左耳进，右耳出，为“水过鸭背”；
说这人一口下流话，为“炒虾拆蟹”；
拔了头筹，也成了“饮头啖汤”；
横行霸道，称之“虾霸”；

连河边，也称之为“海皮”；粗心大意，则为“大头虾”；以势欺人，则是“大石责死蟹”……这些，都无一不说明了，白话中有相当大的成份，是来自于海洋一面，而有别于中原。这包括海洋经济、运输、生物……诸方面的用语，都引伸到了日常用语之中。单以“水”的家族来概括白话的一个特征，似乎是太表面化了一点。因为它也反映了广府人业已形成的生活习惯，乃至思维方式。

可以把这些称之为“海洋语言”，作为海洋文化中的一部分。上千年来，广府人的生活，无不与海洋息息相关，与海洋带来的商贸业息息相关，所谓“通水”、“睇水”、“醒水”、“心水”、“威水”、“一头雾水”……分明是与航海业有着直接的关系，连栏杆也称之为“栏河”，这分明说明其建筑多临近“海

皮”。是褒是贬，均以海运或海洋作业为参照系，才会有这样的语汇出现，什么“咸鱼翻生”、“移砧就船”、“借艇割禾”等等；要么，就以鱼虾来作比喻，诸如“卖摆臂鱼”、“干煎虾球”、“炒虾拆蟹”、“大头虾”……细细品味，白话中不正给你带来了一股来自海洋的腥味么？

这种特定的海洋文化背景，左右了人们的生活内容以及语言构成，这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以上的语言特征，还可以引出广府人的思维方式来，诸如“饮头啖汤”的为天下先的心态，讲究“威水”、“猛”、“劲”的精神上的充分渲泄，“顺风驶悝”的审时度势，对“打死狗讲价”的讥讽……等等，无一不反映出广府人的性格特征以及契约平等的作风。

以此与内地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望山跑死马”一类语汇，其思维特征也就更加突出了。更不用说在这里绝对产生不出“水贵如油”之类的谚语了。

海洋文化中，除开其重商性，也包含其世俗化。白话中，同样可以找到众多的世俗语言，如“叹世界”——享受之义，花名——外号，这在古语中也有，是俗语，而今内地却不用了，契爷契妈——干爹干妈，却突出个“契”字、……等等。

连海盗、黑社会的用语，也“登堂入室”，引伸为一般意义了。

如“磅水”，这是指海盗及黑社会向人勒索钱财时所用的黑语，也就是“交保护金”、“留下买路钱”的意思。如今，已通用于经商上了，成了“交费”、“交款”的意思。

又如“散手”，这是江湖上讲的拳脚功夫，现已泛指本领，技能了。

……

类似的用语，还可以找出不少来。

这些，都在研究广府方言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它

与地理环境——涉临海洋，历史沿革——南岭阻隔而海上丝绸之路兴起，气候条件——热带亚热带的温湿天气，都是不可以相分的。例如，广府方言中的“咸湿佬”、“阴湿鬼”都是极为贬义的用词，指一个人猥亵、不三不四和专搞阴谋诡计，这是因为“湿”是广府地区最为讨厌的观象，很容易造成物品霉变、心情压抑，并生出诸多病症来。所以，凡带“湿”字的，大都是贬义词。

还应当指出的是，广府方言中存在有不少自己独特的成份，在其它方言中是找不到相似的，而这些大也都构成了它的基本词，这应是作为广府方言独有的“根”，从而区别于古汉语或壮语。

例如：

煲——下饭的菜；

打掂——直放；

搵——寻找；

乜嘢——什么；

发啲厉——撒泼、发脾气；

撈——拿；

瞓——睡觉；

嚙——嚼；

剉——宰；

咧——能干；

嗌——叫喊；

跔——蹲；

挾——捏拧；

揸——背；

冚——盖；

……

关于这一点，尚未有较重份量的文章加以研究、论述过，我们在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加深白话之“根”的发掘，而不把它简单说成是某一种语言的变种。

另外，广府方言的语法上，也有古汉语，壮语的倒置现象，这是很常见的。

例如：

鸡公——公鸡；

你行先——你先走；

饮多一杯——多喝一杯；

这就不多例举了。

第三节 外来词的融合

以上的研究，还只是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基础上，无论是古百越文化，还是古汉族文化，都还是在中国的本土上，其相互渗透、交融或转义，都是很自然的。然而，广府方言中，有一个与其他方言有显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外来词——指中国本土之外的语言影响——比任何一种方言都要多，而且出现得也要早得多，并深深地融入了通常使用的语汇当中。无疑，广州几千年来，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口岸，有时甚至是唯一开放的口岸，白话中外来词这么多，正是这一历史的原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民系，其对外接触的面越大，交流得越深越广，外来词的成份也就越多了。所以，早年间，白话中外来词之多已令人咋舌，那么，如今改革开放，广州又成了第一线，外来词增加的频率也就更大了，尤其是近年大量外来词涌入了广告、涌入了报刊，也涌入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

较早的外来词，如今已成为了一个构词能力很强的因子出现了，同其他词语组成了新的复合词。如恤（shirt，衬衣），便

有T恤——指针织化纤有领的短袖汗衫，士钵恤（sport shirt）运动衣、波恤——球衣等；而波（ball，即球）则更让人眼花缭乱了，广府人几百年前便把球叫作“波”，如乒乓波（乒乓球）、波钵（球鞋 ball boot）、靚波（好球）、恤波（投篮）、针波（跳起抢球）。

较早用的外来词，我们可以举出若干的例子来：

邋遢——la ta，（阿拉伯语）脏；

仙——cent 英币，泛指分币；

飞土——face，面子；

酒吧——bar，小酒店；

波士——boss，老板；

的士——taxi，出租车；

飞——fare，票，门票等；

菲林——film，胶卷；

果占——jam，果酱；

卡士——cast，演员表；

冷——laine（法语），毛线；

冧巴——number，号码；

领袂——tie，领带；

唛——mark，商标；

咪——microphone，话筒，麦克风；

鸦片——opium，大烟；

蛋挞——tad，一种西式点心；

一打——dozen，十二个；

……

以上这些，有相当一部分，如今有不少广府人，都不大会意识到会是外来语了，因为用得太多、太泛了，以为是祖先上传下来的，如鸦片、果占、领袂等等。

而处于中近期，使用频率相当高，但一般人都能意识到是外来词的，也就更多了。而这些外来词，一般与经济、新科技的关系比较密切一些，有的，是外语中的新词，也就更为明显了。

我们不妨也举出若干比较突出的例子来：

“第三世界杯葛这一议案”——杯葛，boycott（联合）抵制；

“这个协议给他康素了”——康素，Cancel，取消，作废；

“今晚放镭射电影”——镭射，laser，激光（大陆用）；

“他是个基佬”。——基，gay，同性恋。

“把这个材料费克司过去”。——费克司，fax，电传；

“你可以柯我的 BB 机”。——柯，call，BB 机，传呼机；

“二话冇说，就派司了。”——派司，pass，通过。

“去泊车。”——泊，pag，停放。

“我让两个巴仙。”——巴仙，per cent，百分之一。

“这是仄纸。”——仄，cheque，支票。

“等我仄一仄。”——仄，check，查验。

……

这些，只是其中一部分，人们举目可见的如士多（store 商店）、燕梳（insure，给……保险）、花令纸（warrant，传票）……就更多了，以至有人惊呼白话在“后殖民化”。

其实，这也用不着大惊小怪，随着时代的前进，合理的，自然便被吸收，融合进来，不合理的，是必会被淘汰或消化掉。其准则自然是合乎时代心理、民族心理，以及急骤变化的现代生活，例如“你柯我”三个字，就很省了，它含有“你用我 BB 机上的数码给传呼台挂电话通知我复机……”三个字，省去了一大串用语，无疑正是合乎当今现代生活的快节奏的。反过来，如果用外文须是一连串的字眼，比中文还多，那是必不会用外

文了。

有些外来词，转化为广府方言，甚至会显得很生动、很贴切，是原义的引伸。最为典型的便是 trouble，在英文中，它是麻烦、令人头痛、很是棘手、忧虑、困窘等意思，在广府方言中，它接近似音译成了“茶煲”，乍一看，似乎是土话，因为白话中的“煲”便是“煎熬”“没完没了”、“慢慢拖下去”的意思，如“煲电话粥”就说老占住电话不放，说个没完。所以用“茶煲”一语，便相当形象地表达出翻腾、烦扰不已的意思，十分贴切。又如 brake，英文中是刹车闸之义，白话音译为“逼力”，也多少也带有动作感与形象感。象 boxing，英文拳击，白话为“打爆成”，颇有力度，且骇人了。而 party——舞会，译成“派对”，自然与西方舞会成双成对的交际舞相吻合了。有的已是几个词的转义，如“呵打”——命令，“呵佬”——口试，与原发音有近似之外（order 与 oral），却也隐含了原义在内了。

在合资工厂中，近来出现了个新词，为“拉长”，拉——“line”，是指流水线上的负责人，如果按音译下来，反而好接受一些。有些译法也颇有情趣，如把 jelly，即果子冻，按音译为“啫喱”其口型上的变化，恐对儿童嗜好这种食品颇有吸引力，极富形象感。而 powder，即发酵粉，按音译为“泡打粉”，也是很有形象感且极切近原意的。

说了这么多，不知人们有否发现，以上所例举的，除极个别外，绝大部分外来词，均是从英文中过来的。这与英国人在近代较早来到广东，且侵占了较大的一块我们的国土——香港是很有关系的。旁边就是澳门，葡萄牙殖民者可以说是来得更早，但葡语的影响比英语少得多，所以，渗入白话中的葡语则较少。此外，这与英文本身作为国际流行的语言也是分不开的。在香港，由英文而演变为白话的外来语，比目前广州显然多得多，只要一打开香港报纸，有些外来词甚至连广州人一下子也

弄不明白。这也有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有的很可能还是会被淘汰掉的。

没有理由过多指责广府方言中的“后殖民文化”现象，语言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包括语义的转换，都有其必然过程，我们所要遵循的，恐怕还是一条“顺乎自然”的原则，人为的干预，每每适得其反。凡为历史所要求的，有利于人们充分、及时、精确地表达的词语，自会使用下去并且扩大使用范围，相反，则会自然消亡，这是毋须担忧的。广府文化，本就是一种开放性的、世俗化的文化，它的语言演变，也在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外来文化在它绝不是一种负担或对抗，它自能兼容也自能消化。

第四节 白话的语言特色

末了，我们再来讲讲广府方言的语言特色。

不少语言学者认为，在汉语方言群中，广府方言是相当优美、柔和、富于韵律感的，就类似于欧洲语言中的法语一样。这一点，应该说是比较合乎事实的。

人们不难发现，用广府方言来诵读中国的旧体诗词，如五律、七律等，是相当有平仄感的。由于普通话上千年变化很大，不少字的发音已不是过去一样的了，所以，教学生用平仄来写诗、读诗，十分困难。但在广府，这却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学生很容易琅琅上口，毋须多加解释，读起来，平仄分明、韵脚分明，节奏分明，甚至套用数词“一二一二一”就可以了。这说明，广府方言中相当多汉字的发音，都与古音十分接近的。

此外，在语音上，广府方言，即白话的声母上是微母字与明母字合在一起，一律都念的是 m-。白话中没有浊塞声母以及浊塞擦声母，而塞声母与塞擦声母，只有清音送气与清音不

送气之分，而无清浊音之分。塞擦音和擦音只有一套，都念成 ts、ts'、s。古溪母字一部分念为 f- 或者 h-。古疑母字在洪音前大都念 η 声母。没有介音 i、u，却有半元音性的浊擦音声母 j、w。

韵母上，元音 a 有复合韵母、鼻音尾韵母和塞声尾韵母中有长短音的对立。入声韵即以 -p、-t、-k 结尾的韵母和以鼻音结尾的韵母 -m、-n、-ŋ 都完整保留下来并整齐地两两相对。没有舌尖元音。

声调上，一般都有九个声调，普遍存在入声，通称“九声六调”。这就不一一细说了。

在语音上，由于地域不同，也都有各自的差异。使用它的有近 5000 万之众。广东占 70%，广西占 30%，至于在广东境内，无论从使用人数上（近 50%），还是地区分布（40% 以上），都占优势。

纯白话区或以白话为主地区在粤中与粤西南，含 47 个县市，在其他 16 个县市，包括粤北、粤东亦可流行。这么大的覆盖面，一般分为广府片、四邑片、高阳片、勾漏片、吴化片等五片。

其中，广府片包括广州、南海、番禺、顺德等，以珠江三角为中心地带，北至韶关、曲江、乐昌，东至东莞、深圳，西至电白、云浮，南至珠海等 24 个县市，人数为 1200 万，以广州话为代表。

四邑片，包括鹤山、新会、江门、开平、恩平、台山、斗门等 7 个县市，人数为 340 万左右，以台山话为代表。

高阳片，包括阳江、高州、茂名、信宜、廉江、湛江、化州、吴川等 9 县市，人数 520 万，以阳江话为代表。

勾漏片，包括四会、广宁、德庆、罗定、郁南、封开、怀集、信宜、阳山、连县、连山等 11 个县，人数约 660 万。

吴化片，包括吴川、化州、湛江三县市，使用人数约 100 万。

其分布区域的差异，与所处的地理环境，特别是地形有较明显的关系。均为某一流域或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在同一区域内展开，语言得以趋于同一。其中，交通的便利对于人群的流动，从而造成语言上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还应该补充一点的是，以上的所举的众多范例，大都是可以用今天的汉语文字加以注解、说明或解释的，但是在民间语汇中，仍有不少广府方言，是无法用汉语文字加以注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怎么解释也说不准确甚至大大地走样。

这种“不可译性”，恐怕在外文翻译遇到的更为多一些，笔者是广东人，但长期生活在内地，两种语言都比较熟悉，同时，也翻译不少外国作品，所以，这种感触或“发现”，相对会比一般专一语言的多，特在此点出来，供语言学家们去进一步深究好了。

由广府方言或白话构成的文化景观是丰富多彩，很有地方与个性色彩的。单以粤剧唱腔为例，就不下十多种，很有表现力与感染力，既有京剧的慷慨激昂、力拔千钧，又有越剧的缠绵悱恻、哀怨悲叹，二者均能兼之，所以风行两广、港澳，并传至欧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而用白话演唱的小曲也活泼、宛转、悠扬，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而今的以白话演唱的流行歌曲，更风靡全国。至于珠三角的咸水歌、儿歌、粤讴等民间演唱形式，也很有魅力，颇有地方风味，雅俗共赏……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由广府方言构筑的文化景观，是中国文化当中独有的一部分，不可或缺，并且极大地丰富了民族文化的色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第五节 客方言、闽方言

在珠江流域内，除开粤方言作为主体外，第二大方言当是客方言，又称“客家话”。在广府地区，广东则是第一大客方言省，也就是说，流传最广、使用人数最多的当推广东，有2000多万，第二则是广西，有400多万，合计约3000余万。广东境内的客方言，主要分布在粤东，粤北与粤西较为偏僻的山区，而广西境内，则主要是桂东，并延及中、西北部。此外，贵州省东南属珠江流域内部分县区亦如是。可以说70%客方言区正是在珠江流域范围内。

港台及海外华人中，其“母语”，有不少是客家话——他们大抵是海上丝绸之路上去的。

众所周知，客家人主要是来自中原的“移民集团”，历经战乱，在不同历史时期南迁而来。由于客家人坚守其文化边界，语言发展也就相对地稳定，从而形成与中原或北方方言有别，又与南方原有方言不同的一种新的方言。

著名客籍学者、大诗人黄遵宪有如下论断：

此客人者，来自河洛，由闽入粤。传世三十，历年七百，而守语言不少变。有《方言》《尔雅》之字，训诂家失其意义，而客人犹识古义者；有沈约、刘渊之韵，词章家误其音，而客人犹存古音者。

可见，客方言中较多保存了古代词义与读音。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也说过，如果弄清其之来龙去脉，一部中华民族的迁徙史也就能基本上高明白了。

由于梅州位于客家民系“赣闽粤”大本营的中心，且人口聚居之多，又外出移民不少也是从这里出去的，所以，客方言基本上就以梅州（梅县）话为标准。

广东学者陈澧说：“客音多合周德清《中原音韵》。”不过，还是有一些差异的，不少地方也汲收了南方方言，包括粤方言及若干土语。人称“它是一种语音面貌处于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间的‘中间型’方言，业是一种处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的‘过渡型’的方言。”

一般来说，客方言有自己的语汇特点。

首先，是单音词多，从简，这与粤方言相近，如明，即明白，明事等。皮，即皮肤；毛，含头发；翼，即翅膀；索，绳子；惊，害怕；企，站立；话，说话；食，吃；……

其次，则是保存有较多的古汉语词，例如，揆，即两手相搓；拗，即折断；系，即是；颈，脖子；衰，倒霉；樵，柴火；遮，雨伞；拭，擦，抹；扭，拧（毛巾）；刮，划（火柴）……

还有，与粤方言相一致，“雪”“冰”不分，车大炮，即为吹牛；番枧，即肥皂；大褸，即大衣；行街，即逛街；打理，即料理；抵，即划算、便宜；……等等，也有与潮汕话相混的。

另外，则有自己特有的语词，如牯为雄，姆为雌，“孩”为儿子，“番豆”则是花生，“斋嬷”称尼姑，报生却是报丧，还山是出殡，二次葬则叫“捡金”……等等。同样，外来语不少，如“番薯”、“红毛泥”（水泥）、“荷兰薯”（土豆）等。

潮汕方言，也是古老而重要的汉语方言。虽说这一方言大都不在珠江流域内——潮汕于韩江水系范围，雷州半岛的河流也南流入海，均不入珠江支干流，但从文化影响范围而言，与珠江文化也不无关系。

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一书中这么说：

潮汕闽越地。自秦始皇属南海郡，遂隶广至今。以形胜风俗所直，则隶闽者为是。……潮在南交之外，又水自入海，不流广，且即在广界山之外，而与汀、漳平壤相接，又无山川之限，其俗之繁华既与漳同，而其语

言义与漳、泉二郡通，盖惠作广音而潮作闽音，故曰潮隶闽为是。

这说明了，潮汕方言与闽南方言是属于同一系属的。上古，吴越人向南推移，带来了吴越语，闽及潮均为其所化；中古及近代，福建人进一步移居潮州、雷州，又加强了闽语的分化……这样，使现代潮汕方言的形成。呈示了相当复杂的成份。

现在，一般把潮汕地区及雷州半岛看作闽方言区。虽然二者方言也有一定区别，后者主要属闽方言中的莆仙话。人口约1000多万。如加上海外操潮语者，则在2600万左右。

潮汕方言中，同样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词，如瘠，《广韵》梗韵：“所景切，瘦瘠。”挖，牵引，接，两手相切摩；囤，收藏……

而作为外来词，粤语大都是从英文引入的，而潮语更多的来自马来语，因为近几百年，潮人下南洋的多。如吗淡，即警察；巴萨，即市场；咕哩，即苦力；巴突，即合理，事；罗的，即饼干；峇羽，即气味……等等，这均源自马来语。也有源自英语的，如唛头，即商标；妈多西居，即摩托，等等。

潮汕俗语中，亦不乏水文化色彩，如：

老婆跋（跌）落水——妻（凄）凉；

三婶烫蚶——想大擘（伯）；

破船镇港——霸住地盘；

水水；水份太多。

客方言、潮汕方言，同粤方言一样，都呈示出古汉语南下的断层现象，这一研究目前正在深入之中，这里也就点到为止了。

第六章 珠江文化新质论

当我们寻溯历史文化之源之际，我们总是站在今日的制高点上，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是“当代的目光”，因此，势必楔入了当今的思想观念以及当今的参照物。正是“今天”使我们对“过去”产生了兴趣，这才有历史的存在，如果没有今天珠江文化的兴盛，恐怕，一部珠江文化的历史也就不会让人为之关注。所以，今天，终于有了第一部《广府海韵》的诞生，正是启动于它的“现在进行时态”。“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本世纪著名历史学观，也就是这么来的。如果没有今天，广府，乃至珠江文化，势必被人一言以蔽之：夷蛮之地，有何文化可言。正如黑格尔当日断言中国“无历史”一样，因为他是以动态的观点来阐释历史的，在他看来，中国几千年均是一个皇帝由始至终，有何“历史”可言？当然，这是他的偏见与浅识。

但今天，无疑也是历史的延续，历史的投影无所不在。我们只能在珠江文化的“过去时”上，来构筑其“现在时”并揭示她的“将来时”。因此，审慎地找出当今珠江文化的新质，加以分析研究，才可能指出其未来真正的走向。也就是说，须基于珠江文化现状所呈现的特征，以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为参照，我们才可能真正认识自己。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两广，尤其是它的中心地带广府，如同当年洪杨起义、康梁变法、孙中山最后推翻帝制时一样，又一次为国人、为世界所瞩目，特区在这里崛起，“四小虎”脱颖而出，广州健步迈向国际大都市，不仅广货北上，广府文化也产生极大的辐射力……总而言之，一种新的文化特质，较之

表层的变化，更加深深地楔进了内地，影响了四邻，瓦解了农耕文化、自然经济带来的慵懒、保守、妄自尊大、温情脉脉、人身依附、权力至上……种种陈旧腐朽的观念。

一时间，大有惊世骇俗之势。

无论人们取怎样的态度，欢迎，还是抗拒；激赏，还是冷漠；欢呼，还是愤嫉，都不能不承认，这已是一股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

第一节 大众文化与文化生机

那位“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李鸿章，极力扶持“官商”以给气数已尽的大清帝国“补天”之际，却无以阻止南方“民商”势如破竹地兴起与发展，由此，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说了一句迄今仍为学者们屡加引用的名言。这就是，他认为，过去中国的文化是自北而南、自西而东，而此刻则来了个倒转，成了自南而北、自东而西，从而形成了：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无疑，他是较早感到了中国文化这一回的历史大动荡。

这大动荡，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转换；而为天下先者，又是广东。其实，市场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广东省的发难以及推行，本就是中国主体性文化的一个重大的建树，却可惜没有人在这一意义上为广府文化“正名”。

然而，市场经济的先走一步，使广府文化在这经济转型期五彩缤纷。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对内地亦不无参照意义。从独特中抽象出一般，在过程里寻求定位，而在错综复杂之际把握住其走向，这也许不易。

可其生命力就在这里了，希望也就在这里。

如今，谁能否认，广府，或珠江文化，已在近代，由中国的非主导文化转化为了主导文化，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在其先锋意义上，已经揽括了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这仍属“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此消彼长、此起彼落。这同样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过去相对落后的，亦可能后来居上，过去比较先进的，却可能从高处跌落，甚至衰亡。珠江文化是中原儒家正统文化的“化外”之所在，却在近代成了新思想的策源地，在世纪初一度思想北伐，并持续不断发起过文化北伐。

在不得不承认这种文化的冲击力的同时，有的人总是极力去贬低它、排斥它，以维护其自身的“文化贵族”的地位，其实，这是徒劳的。

历史每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我们不妨寻找一个历史的参照物。

世俗化、平民化，当日，对于欧洲的封建贵族无异于洪水猛兽，在他们眼中，平民中崛起的中等阶级，都是暴发户，只有几个臭钱，粗俗不堪——可他们却竟敢向贵族的统治表示轻蔑。

——这是二百年前资产阶级革命兴起时，欧洲文化最显著的特征。

从和平革命过来的英国人，如今仍以贵族派头，蔑视美国牛仔：看，他们连文雅的 yes 都不用，只会一口一个粗鄙的 yah。

纵然如今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的人数，绝不比英国本土的少。可这顽强地沉淀在英国人意识中的文化观念，几个世纪也不可移易。①

这也许可以说明，当今以拥有中原文化为骄傲的北方，有

的人为何始终对南方的文化抱有一种轻蔑、漠视乃至鄙薄的态度，纵然广东一再表白——甚至以西汉古墓为证，广府文化仍是中国文化的血脉，同是一个祖先，他们仍置若罔闻。

也许，这与广东是中国最早，也许是最大的移民省有关——因此，这里本身就已带上了移民文化的特征？

而珠江流域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育，造成了文化上的多元追求，也就大大冲击了作为大一统的中原文化的结构，何况还有外来文化的不断的浸润呢？于是，文化各个层面引入商品机制所出现的活力与社会适应性，在这里首先得到迅速的加强，反过来，也大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社会化——如同前所说的平民化、世俗化。这一来，企业文化、城市文化、乡镇文化的兴起，文化市场的形成，文化产业的初具规模，也就使广东文化有了一个多元的、开放的、全新的结构。

本来，广府地区独有的地理及自然环境，自古以来便有别于内地传统的自然农业社会，这是人们已反复证明了的。史称这里“多务贾与时逐，农者以拙业力劳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②“海物往错，民多仰机利而食”。^③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商业文化走向及其价值观。

因此，这种历史文化本身带有的商业性、流行性、或称消费性、享乐性，总是广府文化必不可免的一个表征。所以，文化生机，往往首先表现在大众文化或泛文化，亚文化上面——这也是“文化贵族”们所不屑的。而他们还每每以此作为依据，去惊呼文化的“堕落”、“失控”，从而造成一种“文化恐惧”。

但事实已证明也将继续证明这仍是“杞人忧天”。

只要不带有偏见，我们便能看到：

——作为广东的大众文化，包括亚文化与泛文化“为天下先”亦不无积极意义……。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必将根除文化冲突引起的恐惧，而当主文化失去鲜明的现代色彩（由于恐

惧或控制)，亚文化却不乏这一色彩，如流行音乐之类，这也是对主文化的“淡化”和反叛。如美国的 Beat generation，这种亚文化有畸变，亦有缺乏真诚而过多矫饰、做作，但在美国却促成了今日的新文化。摇滚音乐在美国曾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后来却成了美国精神文化的主流，所以，亦不难从这种亚文化的反叛中寻找生机……。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正是为主文化的兴起与成型起到了廓清道路的作用。

曾几何时，广州对“时代曲”（当时对香港流行音乐的一种统称）还视如洪水猛兽。某些顽固坚持正统观念的人一度告诫年轻人千万不可以中“毒”——诸如“无病呻吟”、“享乐主义”、“庸俗低劣”……等等。但是，这毕竟没能阻挡得住流行音乐的兴起，不仅香港“时代曲”红极一时，连广州的作曲家也趋之若鹜，成为一股潮流，广州也有了自己的“时代曲”。

文化的突破，就是从这“边缘”开始的，流行音乐、时装设计、室内装修、卡拉 OK、酒吧、夜总会……诸如此类。

如今，人们不得不承认，广州已成为流行音乐的大本营——而人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流行音乐中的港味，由占主导地位显然退居到次要地位了，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文化底蕴本身最后显示出最大的实力，各种风格开始各领风骚，走向了多元发展。歌星，哪怕是走红大陆的港台歌星，也不可能独领风骚并恒久不易，而是愈来愈迅速地更新换代。

然而，这也如前面所述的，流行音乐是平民化、世俗化的需要，它也可能产生某种畸异、变形，亦有可能缺乏真诚而过多矫饰、做作。这是它的弱点，甚至可能毒化高档的艺术。这自然是需要引导的。但我们更要看到，当厚实的文化底蕴显示出自身的潜力之际，这不也有某种“自然趋势”在起作用：流行音乐的档次本身也在逐步提升，人们的欣赏口味也在逐步提高，整个文化风尚也就为此改观——也许，这么说还为时过早，

但这却又是必然的或理所当然的。

其实，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把双刃剑，不可以简单地表示一种义愤便一了百了。空谈易，务实难。文化发展有它的自身气候，我这里说的“提升”或“提高”，绝不是那些“文化贵族”们所希望的那种回复到过去的“高雅”状态，去制作什么“御用诗”或“宫廷诗”之类，这里将有全新的开拓，全新的境界。正如后来美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决不如同英国封建贵族所期待的那种类型一样。

历史毕竟在前进，时代已经不同了，广府人已毋须为一日三餐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全国最早地进了小康的地方，人们的文化品味也就不会一样了。

一种文化总是与它所处的历史阶段、自然的地理环境及与其他文化发生相互联系的程度分不开的。当广州人突破了温饱的生活基准线，奋力朝着物质生活更高的层次上努力攀登的同时，对某些颇为陌生的文化领域，也在不断的探索中。这种探索，将会给他们带来一种全新的情趣，全新的享受，并将使他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更加绚丽多彩。

“不信东风唤不回”。如今，反过来，连香港人也在惊呼“大陆文化南下，入侵渗透港岛”，岂不证明当日制止时代曲渗入未免过于多虑了么？这“大陆文化”，应该说，是以珠江文化为先导、为代表的，这比任何宣传攻势都更为有力也有效得多！

珠江文化的“北上”与“南下”表明了现代文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地域性应是形成文化作品的独特风格的条件，而不是文化隔膜的依据；现代走向只会提高文化作品的艺术质量与品格，而不会降低其水平与俗化——整个人类文化的大走势正是我们文化达观的最根本的基点！

第二节 文化的产业化走向

只有在对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不再用挑剔的眼光说三道四之际，我们才可能进而谈广府的文化产业——显然，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出现的。这也只有商品经济发达的前提下，在广府可率先提出的一个问题。它与传统文化即农耕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

在英文版的《文化产业：来自未来文化的挑战》一书中，乌涅斯科如是说：

“简而言之，文化产业意指通过产业化和商业化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供应和传播。这里，大规模的需求与经济上的策略，比其它考虑更为重要。”^①

这里，大致归纳了一下文化产业的范围。只要是生活在今日珠江流域的人，不难可以作出直觉判断。

事实上，今天在广州，文化经纪人、文化个体户、文化公司之类，包括出版、印刷、传媒、演出、影视、信息等方面的运作，已经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吃皇粮”的方式，而是作为一种经营、一种商业行为，也就是从旧的文化事业在向市场经济转型期中形成的新形态。《广州日报》被批准为全国第一家报业集团，还直接参与主持《广州来了新疆娃》电影的制作及建立全广州文化连锁店……等等，也就最直观也最直接地证明了文化产业在广州业已形成气候，形成规模。我们还可以援引更多的众所周知的典型事例。

当然，香港在这方面要比我们早走一步，其文化产业的开发有着不少可以借鉴的地方。如前面专题提到的香港电影业的巨大成功。

经济发展要立足于资源优势，文化产业亦是如此。香港经济上先行；文化产业亦先行，但资源优势对于这个弹丸小岛来

说，则不那么好说了。而广州是广府文化中心，有二千余年历史的通商口岸，中西文化交汇之地，海内外华人的文化桥梁，粤语、粤菜、粤人流传世界。许多外国人认识的中国文化，其实是广府文化——一种当今中国最具商业色彩和国际色彩的文化，一种朝气蓬勃的年轻文化。从文化产业角度看，广府文化资源是一笔无形资产，能够作为生产要素创造利润，能够制造出走向中国、走向世界的新一代广货，对珠江三角洲甚至整个华南经济有长远价值。香港就是用文化产业手段充分开发广府乃至岭南文化资源的成功范例。在现代文化产业的一些领域，如影视、音像等娱乐文化、畅销书、广告、旅游、饮食、成衣、玩具等方面均有建树，充分体现了广府及岭南特色。可是，香港是脱离大陆文化腹地的孤城，香港文化缺乏深厚的底蕴，视野狭窄，拓展不开。这都是其文化产业难以蓬勃发展的限制因素，也是从长远看香港文化不能成为华南经济精神母体的原因。事实上，香港的经济也只是在 60 年代开始超过广州。相形之下，广州资源优势胜于香港，归根到底广府与珠江文化中心是在广州。

由于历史的错位，香港较早卷进国际的大市场中，其文化产业也就一度走在了整个广府的前面，这是我们所必须承认的。但这仅仅是历史暂时的错位，从几千年流过来的历史文化来看，再从今后未来文化的大走势来看，在文化产业上，它不可能不让位于广州。所以，97 未到来之前，香港文化产业向广州的靠拢、迁移，已经看得很明显了。所谓“双子星座”也只是一个过渡。

而从广府文化来看，它更无法与广州匹敌。

也就是说，无论是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资源，以及可以大展拳脚的用武之地，广州的文化始终居于优势，而广州的文化产业也是必有一天会超过香港，这是毋庸置疑的。广州的文化产

业兴盛指日可待。

有人把“港派”说成是与“京派”、“海派”三足鼎立的当今中国文化之大势，这一说法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所谓“港派”，仅仅是广府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为殖民化畸变了的一小部分。而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均是广东人，他们本身就深深浸透了广府文化——事实上，他们更多是广府文化的成份。人们每每将“广派”误读成“港派”，只是一时间媚俗之风，是后殖民文化影响造成的。无论如何，所谓“港派”是无以取代博大精深的广府文化的，更无以涵盖整个的南方文化。

正如一位文化学者斩钉截铁所说的：

重新为“广派”文化定位并摒弃“港派”一说，尤其是更为严谨地剔清当今后殖民文化造成的影响，使已非西方化、本土化的精英文化脱颖而出，得到更大的播扬与发展——这一条，无论对广州，还是对上海、北京，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⑤

人们之所以发生“误读”，恐怕更多是由于广府文化最早出现的商业化、产业化特征，而每每被视为异端的缘故。的确，对于中国大陆，乃至对于广州而言，文化产业的历史仅仅只揭开一个序幕。但问题在于，只要承认当今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具有进步的性质——这点，恐怕很难否认，那么，就没有理由不承认文化产业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文化产业或扬或抑，始终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确立与发展分不开的，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应当说是与历史发展相一致的，而毋须引用这样那样的教条来解释。

尽管精神产品生产的气候并不一定与物质生产同步，但作为文化产业的“物质性”或“商品化”，却说明二者又不可以截然分开。经济与文化、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同步与不同步都不是绝对的，恰巧，经济发展总是久久地

潜藏着一种对文化的渴求并对文化推动的力量，古人早已有话，衣食足而知礼节——这类话已太多了，所以，经济发达了，文化也应当发展起来，盛唐就是明证，中国难得有这种长时间的同步。广府文化产业的兴起，应该说是经济起到的推动，所以，可以说，从总的、宏观的视野上，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不会破坏文化的发展，而只会最终推动文化的发展，可能在局部上一时看不清或者出现迷误，但大趋势就是如此。今日经济腾飞，在改变着旧的历史景观，说到底，也是一个文化革命与观念上的革命。

如今，在广州、在深圳、珠海，在珠江三角洲，不正在出现一幅幅艰苦创业、开天辟地的壮丽画轴，这比当日上海滩、香港地的历史画面无疑是壮阔得多，其文化意义也深刻得多。人们，新文化下的新人，在观念更新中脱颖而出，几可叱咤风云。——广府文化也正是凭此获得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并且走在中国其他区域文化的前面。它不仅为文艺创作提供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而且为文化产业的未来提供了璀璨的蓝图。创作与产业，同样在展示中国人走向太平洋世纪的雄姿！

珠江文化或广府文化应当有更博大与更深厚的构想，这是今日现实与未来发展所提出的历史性的要求。

今天，以广府文化为先导，文化自身的产业化与商业化，较之历史上的“御用诗”、“宫廷诗”——把文化作为某些封建贵族的装饰品或作为遵命而作的单纯口号宣传而为朝廷所统揽摆布的工具，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也是文化发展走出的一条新路。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这只是唯一的路。文化本身是多元的，其发展也是多元的，但是，这毕竟给文化注入了极大的生机，更拥有了普罗大众。

关于文化的产业化的研究，这里只能是浅尝辄止，但指出了它的开端，也就看到了可能的方向。

第三节 文化的激活

文化的产业化、商品化或大众化、流行化，是否就意味着对高品位的精英文化的排斥？对这个问题，我们事实上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作了正面的回答。从东汉杨孚《南裔异物志》，到余靖的《海潮图序》——学术文化，从阴铿开律诗先河的名篇，到梁启超的“文界革命”——文学艺术，从葛洪、惠能的宗教改革到康梁变法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文化……等都证明，珠江流域的精英文化同样是成过气候而且是能成大气候的。

之所以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却是他们基于中国传统以中原文化为正宗所建立的参照系来看待今日、甚至过去的广府，来看待今日又一次“为天下先”的文化产业化进程，仍抱住认为广府“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成见，从而断言广府没有产生精英文化的自然气候，出不了黄钟大吕式的惊世之作，更没有恢宏博大的理论体系。广府只能“有始无终”，可开风气之先却不可集大成而完成丰功伟业、鸿篇巨制——某些自命为开明的人也这么叹息。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守旧的观念。文化本身总是此消彼长，谁也不能“独领风骚”。几千年的文化因时代而在变化，文化随历史而在前进。既往的评判尺度，已不适合于后来的形势，尤其是现代文明在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文化形态已不可能定于一尊而不移易了。我们不妨听听本世纪初的一个呼声：

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长的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影响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

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世上不只有一种雕刻，一种绘画，一种数学，一种物理学，而是有很多种，在其本质的最深处，它们是各不相同，各有生存期限，各自独立的，正如每一种植物各有不同的花、果，不同的生长与衰落方式一样。这种种文化是纯化了的生活精髓，它们和田野的花儿一样无终极目的地生长着。它们和动植物一样属于歌德的活生生的自然，而不属于牛顿的死板板的自然。⑥

这是世纪初最著名的历史哲学经典之作，它的作者是奥·斯宾格勒，而这本著作的名字更是意味深长——

它的书名叫《西方的沉没》。

其时，正是西方文明最鼎盛、也最得意的时刻，但作者没有蔽于表象，及时发出了这振聋发聩的呼声。

西方文化曾一度落后于东方，但到了文艺复兴之后，却后来居上。而东方文化虽一度领先，后来却弄到落后挨打的地位……当然，如今，它又正在面临一次复兴了。

那么，中原文化与珠江文化之间的消长，不也有个“各领风骚”的生长季节么？

按现成的观念，佛教属神学范围，而人的历史则按“神学——玄学——科学”，顺序而演进的，而在中国，三国两晋南北朝，正是玄学风行之际。如套公式，神学的佛教，与中国的道教，已有先进落后之分了。但是，佛教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却不曾起到“开历史倒车”的作用，恰恰相反，如一位日本学者所论断的，佛教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恰巧是一种进步的因素。

大唐的繁荣，无疑是佛教文化引入之后予以“激活”的。

一个古老的、沉滞的文化，总是需要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

才可能得到“激活”。——正是中国历史上这一次文化的大碰撞，才激活出一个盛唐文明来，古老的文化才得以更新、复兴而青春焕发。

那么，新的“激活”，正是自上世纪始，到本世纪乃至下个世纪，西方文化对业已在明清之际沉滞了的中国文化又一次大碰撞。如果说隋唐之际的文化大碰撞，还只是亚洲大陆上不同文化的“激活”的话，那么，今天碰撞的范围，则更为广阔、更为宏大，是整个世界文化的相互冲击了。⑨

这就意味着更大的“激活”。

也更意味着中国文化重建的任务更为艰巨、更为博大与崇高。

而在碰撞中，出现沙砾、碎片以及不可免的“破坏性”，又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腐朽的旧事物如果还顽固地炫耀自身的正统，辉煌与伟岸，那反而有点可笑与可悲了。

作为这次已有几个世纪的激活点，自然便是在东南沿海一带，而其中心，一度便是广州、上海——也就是说，中国文化重建的任务，也就历史地落到了东南沿海的“激活”地带上了。而沉滞与僵化的地方，势必以老眼光看待新文化的诞生，斥之为“粗俗”什么的，甚至大喊“文化的沦陷”、“文化沙漠化”。——其心目中的文化，自然是他们过去的标准，试想想，白话文兴起时不就是如此么？

这些理论愈真诚、愈有文化责任感，就会给我们新文化的前进造成愈大的障碍——因为这种文化心态包含有一个极为可悲的前提，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尤其是正在建树的新文化，似乎可以置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现实于不顾，无视中国与世界之间业已存在的有机联系，甚至抹煞这几个世纪以来产生的新文化生活方式，就可以自说自话地构建起来——殊不知，

到头来得到的会是怎么样的玩意？

照此推理下去，文言文才算得上是“精英文化”的范本，而用白话文写的一切，包括新文化运动中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如《阿Q正传》之类，又“算是什么东西”？！

所以，如今珠江文化中出现的某些新质，更需要大加鞭挞，从而采取一种鸵鸟政策，最终加以抹煞，一概不予承认，哪怕它足以与当代世界文化中的上乘之作可以媲美——当然，他毋须加以比较鉴别就会这么去做。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同他谈什么高品位的、精英的珠江文化吗？！

这里需要的是从容的剖析：你是否有健全的、自信的、以及兼容并蓄的文化心态？是否能冷静地面对文化冲突、碰撞乃至激活中出现的多元选择、艰难营造及错综复杂的状况？

没有这些，那么，你就是在寻找遁词，就是你无法适应而面临被淘汰发出的哀叹，重返狭隘的文化国粹论以使自己心态重新恢复平衡，从而自欺欺人。

这也许说重了点，却是谁也回避不了的。

如果不回避的话，那么，便会自然而然地意识到，在中国新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世纪之交的广东，也同样似乎像上个世纪之交的广东那样，完全有可能带来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写下有力的一笔。

一方面，如前所述，在广州及东南沿海兴起的现代都市文化、商业文化、旅游文化、信息文化……等等，将会迅速形成雄厚的文化产业，以其进取、开拓的精神，务实、多元的色彩、全新的观念而蒸蒸日上，从而涤荡“正宗”的顽固、保守、中庸、自大与虚浮，动摇大一统的文化垄断。

而另一方面，在大众文化之上，于另一个背景下形成的，并逐步会取主流文化而代之的精英文化，显然也不会同于内地业已由盛而衰的、仍死死抱住古老传统不放的正统文化及其派

生物。换句话说，作为高品位的、精英的文化，广府亦会走出自己一条不同的新路来。珠江文化也正在这条新路上重塑自我。

任何呼唤，都只能在业已提供了相应的客观条件与环境时才可能发出，或者说，是现实已经产生了这样的需求。在广府地区，对精英文化的呼声，已是一日甚于一日了。

它是必将破土而出！

注释：

①译自《Historical Philosophy and Problem of Value》A Stern 著。

②屈大均《广东新语》上卷九。

③张翰《松窗梦语》卷四。

④《Cultural Industries: A Challenge for The Future of Culture》by Unesco, 1982, P 9.

⑤《书城》1995年四期，上海人民出版社，秦柯文《文化质态的落差》。

⑥《西方的沉没》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页。

跋

今日的珠江文化，其所拥有的巨大历史内涵以及鲜明的当代特色，将是哲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者们挥毫泼墨、冥思深究的对象——这里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在大碰撞中闪烁着璀璨火花的结合部。

古老的华夏文化，由于历史的凝聚力与漫长的岁月里潜移默化化的作用，已经深深地植根于岭南人的文化的心理结构中；但由于珠江流域所辖的广府本身与外部世界接壤这一地理特征，尤其是2000年海上丝绸之路的影响，又使它的文化更容易汇聚百川、兼容并蓄，能够迅速形成其新的特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改革，更把文化的大碰撞推向了新的巅峰，从而使珠江文化的新质更为闪光与突出。及时对这次大碰撞进行研究，探讨，以迎接新的历史挑战，是刻不容缓了。

这个大碰撞是空前的、广泛的、激烈的、复杂的同时又是深刻的，它在摧枯拉朽，又在“十月怀胎”，正在催生一个文化的新时代，展示出中国文化发展的光明前途——要认识今日的中国么？不妨先从珠江文化入手。因为，这里是中国走向世界的 Passport！

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文化的大碰撞，正决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命运，决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能否在这广袤的神州大地上迅速崛起与生长成熟。

正如前边所提及的——

一个多世纪之前，民族英雄林则徐就站在这块土地上，面对珠江口大潮，挥毫写下了这么十六个大字：

海汇百川，有容乃大；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这无疑也是文化选择的一个写照。我们应“有容”——善于取百家之长，亦应“无欲”——不至于淹没在种种猥琐的私利之中。

纵然，文化的大碰撞会是艰难与痛苦的，我们将不得不与我们世代崇奉的，曾使我们为之自豪的旧文化道别，去迎接我们所陌生的、新奇的，甚至是曾为我们认为不值一顾的文化。但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历史不再留给我们多少时间与犹豫、观望、等待，甚至连讨论的片刻都没有了。

因此，研究作为中国海洋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富于经典性的珠江文化，并以此创立一门珠江学或广府学——如同客家学、潮学一样，也就尤为重要与必要了。

它不仅仅包含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地缘学，以及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内容，更着重于探究思想文化的碰撞、交融、汇合，尤其是激活而产生的巨大的文明推动力，对中华民族未来人格的浇铸。

也许，现在还不是介定其学科界限的时候。而这部作品，也只是一个选择，一个参照，可能会太仓促了一点，粗糙了一点，但作为一种参照，却未始不是毫无意义的。

1994年—2001年

下篇 1994—1997

上篇 2001. 7

